

## 朝鲜战争中在美方的中国战俘集中营情况综述

编委会

## (一)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情况

50年代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自1950年10月25日入朝作战开始，至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的整个期间，共被俘2万余人。其中师级干部1人、团级干部5人、营级干部30余人、连排干部600人左右，其余为班级和战士。此外尚有少数山东沿海一带的渔民。全部被俘人员中幸存的女同志仅1人。

这2万余名被俘人员中有7094人历尽苦难、经过斗争，冒着生命危险表达了自己要求重返祖国的愿望，先后回到了祖国。其中有1030人于1953年4月下旬双方交换伤病战俘时先期回国，有5640人是于同年7月27日双方停战协定签字以后于8月5日开始到9月6日为止交换战俘时陆续回国。还有424人是在中立国遣返战俘营中，经过自己斗争或我方代表解释回到了祖国的。这先后回国的7094人占被俘人员总数的30%，其余的14200余名志愿军被俘人员在停战以后，绝大部分被裹胁到了台湾，少数去了中立国。

## （二）中国战俘集中营的分布情况

志愿军人员被俘以后，被美军当局首先押往南朝鲜釜山战俘临时收容所进行登记编号，然后绝大部分被送往距釜山不远的巨济岛上战俘集中营关押。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绝大部分亦被关押于此。釜山战俘集中营主要关押朝中伤病战俘及女战俘。

1951年的夏秋之际，中国战俘接近最高数字，以后只有零星人员被俘。在釜山第一收容所收容有志愿军被俘伤员数百名，第三、四收容所有中国战俘病员近千名，第十收容所则为登记卡片与美第八军情报机关“G—2”审讯战俘的营场，第十一收容所为向巨济岛转运战俘的营场（后为服劳役的中国战俘营场），第二、第五收容所有数百名服劳役的中国战俘。巨济岛上关押志愿军被俘人员的集中营主要是“72”和“86”两个战俘营，“72”关押7000余人，“86”关押8000余人。这两个战俘营是美方看管最严，并派遣叛徒特务力图从内部全面控制的重点。此外还有“70”战俘集中营关押有1500余名服劳役的中国战俘以及在“61”战俘集中营（转运战俘营场）的少量中国战俘。在1951年11月8日以后，分别由“72”和“86”两个战俘集中营内冲出了两股力量共219人。他们在“72”战俘集中营的对面“71”战俘集中营内建立了一个坚持遣返的回国阵地。1952年4月8日以后，在美军当局的强迫“甄别”中冒死表达回国意愿，从各战俘集中营冲出来的5000余名中国战俘，被集中在岛上一个新建的“602”战俘集中营。同年7月，这5000余人又被美军当局移往济州岛上新建的第21战俘集中营，即后来的第八战俘集中营，直至停战后遣返为止。其余的14000余未能表达回国意愿的志愿军战俘，则于1952年4月中旬“甄别”后，被美军当局移往济州岛第一、第三、第六战俘集中营，直至停战以后，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部队看管为止。



### (三)美军对中国战俘营管理情况

战俘营场是用双层带刺铁丝网围成，四周设有岗楼，配以电话、机枪及探照灯，由美国士兵或南朝鲜军人担任固定岗哨或日夜巡逻。战俘营内仅有少数美军管理人员，负责行政管理的多为中尉、上尉级军官，负责伙房及卫生管理的多为军曹或上士，这些美军管理人员只在白天进入战俘营。战俘编为联队、大队、中队、小队。联队和大队一级还设有“警备队”号称“P. G”，美方允许警备队员带上木棒以“维持内部秩序”。联队部除设置正副联队长外，还配有翻译、书记长（主管来往战俘卡片）及通讯员；大队部除正副大队长外，还有书记长、通讯员、卫生指导员；中队则仅配置书记、卫生员；小队配置文书，上述管理职务均由战俘担任。另外，每个战俘营皆设有医务室，主要医务人员多由朝鲜战俘中的军医担任，被俘初期各级队长职务由战俘选举产生，再由队长指派辅助人员。但 1951 年 7 月以后，在“72”、“86”等主要中国战俘集中营，美方开始指派联队长、大队长、警备队长以期贯彻“以俘制俘”的管理方针。

负责战俘管理的美方机构为战俘管理司令部，除直接负责警卫的“宪兵警备队”外，还配有海军陆战队，装甲部队。“宪兵警备队”设有关押“暴乱分子”、“刑事罪犯”的小监狱。在巨济岛上则设有正规化的“最高监狱”。在巨济岛和济州岛上还设有“战犯集中营”用来长期监禁中朝战俘营内被判为“战犯”的斗争领导人。

另外，美第八军司令部还在战俘营地派驻其情报与审讯机构：计有“G-2”（美国远东军总部情报处）；W. C. I. S.（War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ection“战犯调查科”）；C. I. C.（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反情报队”）；C. I. D.（Criminal Investigation Department“刑事调查处”）；以及 C. I. E.（平民教育部）等。

这些情报机构各有分工，或通过强行审讯收集我部队的军事

情报、我大陆的政治经济情报、我集中营地下组织情报；或以“组织暴乱”罪名，对我地下斗争领导人加以刑讯监禁。其“平民教育部”还在“72”、“86”集中营内建有“C. I. E. 学校”，由其指派的“战俘”担任校长、教员。该校不上文化课只上政治课、宗教课，常见美军“牧师”、“神甫”以及南韩的“和尚”、“道士”来“传教”、“布道”，有的并借此在战俘中发展特务组织。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军上校牧师伍培礼（Woodberry），该“牧师”曾在“72”、“86”直接指挥叛徒、特务残酷镇压战俘！

据了解，负责控制镇压中国战俘的美方特务头子是美中央情报局的哈德曼少将。此人化名菲利浦，自称是“中国通”，以“常驻记者”名义自由出入集中营。

我被俘人员在到达釜山后即被强迫脱去全部衣服，每人发放内衣裤一套，和美军士兵更替下来的旧军装二套。这些军装的前胸、后背上均用黑色或白色油漆印上“P. W.”（prisoner of war 即战俘）字样。1951年夏天，美军当局在巨济岛还曾经强迫中国战俘换上作为罪犯标志的深红色短衣短裤，侮辱战俘人格。“72”由于已被叛徒控制，全部被迫换衣，“86”则群起反抗，美方意图未能得逞。天冷后，战俘们虽补发美军军用旧大衣一件，但在刺骨海风袭击下，大家只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在居住条件上，我被俘人员一般每50人住一个军用帐篷。帐篷内正中挖一浅沟，两旁即为土炕，上铺稻草袋一条，根本无法防潮。每人仅发旧军毯一条，席地而眠。夏天拥挤闷热，冬天阴冷潮湿，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在饮食上，主食供应主要是未研磨的大麦、小麦粒或十分粗糙带霉味的大麦粉，我被俘人员肠胃长期难以适应。在数量上，美方宣称每天每人为1磅，实际上经过内外克扣达不到这个定量。副食为每50人每天一斤肉食，一般为干鱿鱼，配以少量蔬菜。正常情况下，我被俘人员每日两餐，每餐一个拳头大小的饭团或半洋瓷碗“大麦米饭”，一碗飘有几片菜叶、几粒油星的清汤，偶尔能

幸运地碰上几块鱿鱼或牛肉。在被叛徒控制的战俘营里，由于各级俘虏官和警备队员们多吃多占，一般战俘连这样的伙食也难得到。在坚持遣返的中国战俘营里，美方又时以扣粮、断粮作为对“不服从当局命令”的惩罚手段。因此，我被俘人员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营养不良，贫血、夜盲、肺结核、肠胃炎等大量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战俘们还要经常外出做苦工，从事筑路、码头卸货等重体力劳动。

战俘生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即使到医院看病也难以得到认真诊治。在这种常年衣单被薄，腹内苦饥，劳役消耗，疾病折磨的情况下，我被俘人员不少因此长眠异国他乡！

#### （四）美方对待中国战俘的政策与措施

在 1951 年 7 月朝鲜停战谈判之前，美方对朝中战俘基本政策是抓紧对战俘的监管，防止战俘营的骚乱，特别防范朝鲜人民军战俘的暴动。美方的特务情报机构的任务也仅限于从战俘身上索取军事情报及有关战俘营内部的秘密组织活动，及暴动准备的情报。

在 1951 年 7 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我方坚决要求按日内瓦战俘公约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而美方最高决策人采纳了国务院意见：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坚持“自愿遣返原则”。其对待战俘政策即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被动防止战俘暴动转变为主动地在战俘营采取行动以迫使尽可能多的战俘拒绝遣返回国。后来当美方发现战俘遣返问题还是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砝码和拖延谈判的有效手段时，便更加强化了它在战俘营中采取各种措施来强迫战俘拒绝遣返的政策。美方在中国战俘营采取的强迫战俘拒绝遣返的措施有：①思想上进行反动宣传；②精神上加以折磨；③肉体上加以摧残；④政治上进行陷害；⑤对坚持遣返的战俘的抗争实行血腥镇压。兹扼要分述于下：

思想上欺骗宣传，如强迫战俘在“C. I. E.”学校听宗教课，发

放“圣经”，宣传宿命论。派特务去上政治课，发有《韩国之战》、《共产之实际》、《苏帝侵略亚洲》等教材。在济州岛则改为通过高音喇叭进行广播宣传，通过叛徒特务在战俘营中的反动组织，在战俘中开展各种形式的反动宣传。

对战俘进行精神折磨，侮辱战俘人格。如强迫战俘穿着深红色的囚衣，强迫战俘对美军管理人员敬礼，对战俘突击裸体搜身等等。严厉禁止和镇压战俘以唱歌、升旗、游行等活动公开表达对祖国的思念和回归祖国的意愿。拒绝战俘要与家人通信的合法要求，以切断战俘与亲人的联系。

美方对中国战俘进行的肉体摧残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其手段首先是通过生活上的虐待，使战俘长期处于饥寒疾病交迫的苦境，再以强迫劳役对战俘进行体力折磨。而对他们发现的“共产党顽固分子”和“暴乱头目”，则抓到“宪兵司令部监狱”或“最高监狱”，由高大强悍的美军打手或拳脚相加毒打一顿，或关在“浴室”内以高压水枪给予“淋浴”，更有施以“电刑”（将电线缠在双手拇指上，用手摇电机通入高压电流）和打入“水牢”者。我被俘人员中营职以上军官和各集中营主要领导与骨干，几乎无一幸免上述刑罚。美军为强迫我师级干部吴成德同志“号召”战俘叛国，曾残酷地反复施以强微波射线及噪音刺激，使之处于昏迷状态，诱其“发表声明”。使该同志神经严重受损，至今仍留有后遗症……

美方为强迫战俘拒绝遣返，更多的是通过纵容唆使叛徒们在其控制的集中营内对不愿去台湾的广大战俘进行人身折磨。叛徒们以各种借口将这些战俘押至“警备队”或其私设的小牢房给以“处罚”，从罚趴、跪着顶水、顶砖、跪石渣，到吊打、棒敲踝关节、针刺指甲、灌辣椒水、烙肉，甚至残忍之极地将战俘脱光衣服在放玻璃碴的汽油桶中倒放在地推其滚动……

美方为迫使我被俘人员不敢回国的最阴险的手段乃是政治陷害。即强迫战俘喊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演反动戏、辱骂共产党、

辱骂毛主席，强迫战俘在“要求去台湾的请求书”上签名，盖血手印。强迫战俘举报共产党员和军官，更为恶毒的是强行在战俘身上用墨汁写字，然后用针刺刻下永远洗不掉的反动字样（如“反共抗俄”）及反动图案（如国民党徽和党旗）。开始是刻手臂上，以后则刻在前胸后背，最后竟刻在额头上！

美方强迫战俘拒绝遣返的最后手段则是血腥镇压，从肉体上消灭那些敢于带头反抗的战俘，以“杀一儆百”。在 1952 年 4 月 8 日“甄别”（即强行要战俘表达其是否回国的意愿）之前，美方通过叛徒在其控制的战俘营内杀害敢于带头号召难友回归祖国的被俘人员，我威忠堂、阳文华、林学逋等烈士皆因此先后壮烈牺牲。在“四·八甄别”之后，美军直接出面对坚持遣返、反对强行“甄别”，反对敌人强迫扣留战俘的斗争给以血腥镇压。在巨济岛“71”，釜山第一、第二收容所和济州岛第八战俘营，美军对我被俘人员高升五星红旗，庄严宣告其誓死回归祖国的合法行动，公然用坦克、机枪、步枪、火焰喷射器等进行屠杀，我被俘人员死伤数百名。

美方为了更有效地实现其政治企图，也为了掩盖其罪行，曾力图假借叛徒特务之手来贯彻其强迫战俘拒绝遣返的政策。早在 1952 年 6 月，即将三批战场投敌的，我军中未改造好的原国民党军人王顺清、李大安等送往日本受训，然后派回“72”、“86”掌权。并在战俘中网罗动摇变节分子，成立“国民党六三支部”、“反共抗俄同盟会”等反动组织，逐步从上到下实现对战俘营的内部控制。美方还指派其特工人员以随军牧师、记者等名义，进入战俘营进行指挥。最后才导致 1.4 万余被俘人员被裹胁去了台湾。

#### （五）我被俘人员的反抗斗争情况

在我志愿军 2 万余名被俘人员中仅极少数是战场叛变投敌份子，绝大多数是在各种突发事件中失去战斗力或被围困后战至弹尽粮绝突围不成而被俘的。被俘后除少数同志能保持较清醒头脑

外，大多数皆因环境剧变而不知所措。由于我军的传统教育一直视被俘为贪生怕死的失节行为，我被俘人员普遍陷于极大的羞耻和绝望之中！加上我被俘人员中还有一些未改造好的原国民党官兵，这就给这场空前的特殊的战俘营斗争带来了巨大困难。

但我被俘人员中有近千名经过革命战争锻炼的各级指挥员，有数千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不少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知识分子，我们的战士也大多数是向往新中国至少是希望回家与亲人团聚的。这就决定了中国战俘必将对美方的强迫战俘背叛祖国拒绝遣返的政治企图给予坚决的反抗与斗争！他们的斗争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 一、被俘初期的反虐待、反背叛、反控制的斗争。
- 二、被俘中期的反强迫去台湾、反强行甄别的斗争。
- 三、被俘后期的反对敌人分化、坚持回归祖国的斗争。

兹概述如下：

一、第一阶段：从 1951 年初到 1951 年 11 月。

在这个阶段，战俘中的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爱国知识份子，面对美军当局的虐待、迫害和叛徒特务的猖狂气焰，较快地从被俘后的彷徨苦闷中清醒过来。他们克服了各种思想顾虑，挺身而出，各自在群众中开展秘密的宣传与组织活动，领导群众为自身的人格尊严与生存权利而斗争。同时，在政治上开展坚持革命气节、反对向敌人暴露军事机密和出卖领导干部等变节行为，并进而领导大家开展夺权斗争。早在 1951 年 4 月，釜山中国大队内即有孙振冠、董勤荣、李春明等同志成立了“回国小组”。5 月底，在前方战俘临时收容站有张泽石、姜瑞溥等同志成立了“爱国主义小组”。6 月上旬，在“72”军官大队有孙振冠、董勤荣等同志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在釜山第六收容所，则有陶钧善等同志组成“党团小组”。7 月初，在釜山第三收容所，有王化英、段天祥、徐寿田、刘振荣等同志组成“七一反美运动小组”。7 月中旬，在“72”四大队有黎子颖、马有钧等同志组织“回国小

组”。8月中旬，在“86”有张城垣、韩子建、时占魁等同志建立了“地下党支部”，同时在其领导下，通过曹明同志在“86”一、四、五大队成立了以代玉书、王刚、岳大宏为首的爱国“弟兄会”。9月上旬，有李喜尔、韩子建等同志在釜山第二收容所组建“中共党团支部”。9月中旬，在釜山第一、三、四、六等收容所有赵佐端、郭兆林、王化英等同志成立了“中国人爱国同乡会”、“中国人自治管理会”。9月下旬，在“61”有魏林、马兴旺、薛山娃、梁中正等成立党支部，在“72”二大队有张达、丁先文等同志组织“青年团敌后斗争小组”。10月上旬，在“72”二大队有杜岗、史振荣、门培英等同志建立“回国同志战斗总部”等。上述地下斗争组织，分别在各战俘营团结周围难友，采取秘密与公开斗争相结合，“非法”与合法斗争相结合，反虐待与反背叛斗争相结合的方针，积极与叛徒特务争夺战俘营内部控制权。

这个阶段，在釜山伤病战俘收容所，由于敌人控制较松，叛徒势力较弱，又有朝鲜人民军战友的直接支援，通过斗争我们基本掌握了营内控制权。而在巨济岛“72”、“86”则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叛徒特务控制严密，难以统一领导。加上缺乏斗争经验，因而显得斗争规模较小，人数不多，声势不大，仅有几次规模较大的斗争：一次是在1951年10月9日，“86”的爱国力量为反对叛徒在其“双十节”升国民党旗而发动的“夺旗斗争”，我方出动了数百人包围了联队警备队，打算一举夺权，但在美军进入战俘营直接干预下归于失败。另一次是在1951年11月上旬，在“72”军官大队，我地下党组织领导了一场反迫害、反背叛斗争。地下党员们以秘密串联、公开签名方式动员难友们，打算一举赶走叛徒、夺取军官大队领导权。但也在美军当局干预下失败，仅争取到140余名斗争骨干脱离了“72”的反动统治。

我被俘人员在“72”、“86”的夺权斗争中尽管皆以失败告终，且付出了重大流血牺牲的代价。但它是革命种子，是燎原之火，它告诉精神窒息处于苦难中的中国战俘：人心不死、党心还在！锻

炼和培养了斗争骨干、积累了斗争经验，为以后建立和巩固“71”这块回国阵地、以及“602”这块更大的回国基地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再加上釜山伤病员的英勇斗争，为保证直接遣返的 7000 战俘的胜利归来起了巨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阶段的斗争中，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由于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思想觉悟和较少的思想顾虑，他们被俘后能较快的清醒过来，挺身而出，举起爱国主义旗帜与叛国者进行斗争，并积极寻找党的领导，靠拢革命干部，掩护和支持他们站出来领导斗争。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在被俘初期起了斗争带头作用，在以后的阶段成了有勇有谋的可贵的斗争骨干。

二、第二阶段：从 1951 年 11 月到 1952 年 5 月。

1951 年 11 月，“71”回国战俘营成立后，各中国战俘营的夺权斗争告一段落，基本政治分野已明朗化。釜山各伤病战俘收容所和巨济岛“71”战俘营控制在我们手中，巨济岛“72”、“86”则先后被敌特控制。釜山的 11 收容所和在巨济岛上不久后建立的第 70 号战俘营，由于是“劳役队”，队员大多是敌人视为的“不稳份子”，仅部分领导权掌握在敌特份子手中。

这时，战俘遣返问题已成为停战谈判的主要内容，“全部遣返”和“志愿遣返”之争日益尖锐。在战俘营内，敌我斗争的重点也转为“坚持遣返”和“拒绝遣返”之争。在被敌特控制的集中营内，敌人加紧对战俘的欺骗、折磨、陷害、镇压，而在由我们掌权的巨济岛“71”与釜山各伤病收容所则不断开展各种斗争。包括口头交涉，递交《抗议书》，游行示威，绝食斗争等以揭露和抗议美方唆使叛徒在其控制的战俘营内强迫战俘拒绝遣返的种种罪行，并用唱歌、喊话等方式鼓舞附近中国战俘营的难友们坚持回国意志。这些斗争受到美军多次毒气弹的镇压和扣粮断水的惩罚，却也得到了朝鲜人民军难友们的声援。与此同时，“71”的战俘还写了《美军当局屠杀志愿军战俘罪行录》及《集中营内的情况及强迫刺字、写血书、盖手印之真象》两份材料，托朝鲜劳动党巨



济岛地下组织，试图转送到北朝鲜志愿军司令部，以期祖国人民能了解战俘营真情，并让世界舆论能了解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真象。

1952年4月8日，美方在战俘营强行进行“甄别”，以造成中国战俘大多数“拒绝遣返”的假象，迫使我方在谈判桌上让步。事前美军当局的各种特务组织倾巢出动，对坚决要求回国，誓死不去台湾的战俘进行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和残杀。叛徒们从这些忠贞不屈的战俘身上割下他们被强迫刻了字的肉皮，把拒不表示去台湾的戚忠堂、阳文华、林学逋、张振龙、佐文刚、任道木、唐开建等多人活活打死。甚至当众剖腹挖心，将人心剁成肉馅包饺子吃！四川大学学生、共青团员林学逋在临死前高喊：“祖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英勇就义。在敌人残酷镇压下，“72”仍有700余人，“86”仍有2100余人冒着生命危险表达了回国志愿，来到“602”回国战俘营。

在4月6日，美方向各中国战俘营代表宣布《联合国军关于对战俘进行甄别的公告》时，我“71”代表孙振冠当即向美军当局提出：此一甄别必须在战俘营内毫无恐怖气氛，战俘生命安全有绝对保证条件下进行。当晚又立即以“71”全体战俘名义向美当局提交一份《备忘录》，提出在甄别前由我战俘营最高级别军官前往各中国战俘营宣读公告，各营场内“俘虏官”应隔离拘留，美军应增加岗哨日夜监视营内情况防止流血事件发生等严正要求，但均未得美方答复。遂于甄别前夕，在“71”升起巨济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以表示我全体战俘坚持回国的意志，鼓舞公路对面“72”的难友们冲破叛徒的镇压，坚持遣返。美军立即包围了“71”开枪镇压，打伤吴孝宗、任贵全、孙长清三位同志。

在釜山伤病战俘营则掀起了坚决拒绝甄别，要求遵照日内瓦战俘公约，无条件遣返全部战俘的斗争。第一、第三收容所都升起了五星红旗，拒绝美方进入营内实行甄别。美军当局先以断粮、断水、断药强迫战俘就范，我伤病员坚持不屈服，数日后饿晕、渴晕者无数。战俘以互相喝尿、吃带有伤口浓血的药棉充饥继续反

抗。美军竟然以坦克冲入营内并开枪射杀护旗队员，死伤逾百人。最后用刺刀逼着战俘进行了甄别，押送巨济岛“602”。

巨济岛上经过甄别聚集在“602”的近6000名坚持遣返的中国战俘为适应新的形势，开展新的斗争，组成了以原“71”党支部为核心，以赵佐端为首的临时党委会。随后又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以团结从各战俘营和不同番号部队来的被俘战友，并统一各地下组织，实现对全体回国战俘的统一领导。在“共产主义团结会”领导下，“602”战俘营开展了一系列揭露敌人罪行，抗议美方血腥甄别，要求严惩凶手，要求按“71”备忘录条件进行重新甄别的声势浩大的斗争。先后举行了追悼死难烈士大会，举行了示威游行和绝食斗争。

1952年5月7日，在我们的密切配合下，“76”朝鲜人民军战俘营一举抓获了美军巨济岛战俘营总管美军第八军参谋长杜德准将，迫使敌人召开了全体朝中战俘代表大会。我“602”派出了孙振冠、张泽石、黎子颖、柳一四位同志前往“76”，参加“代表大会”，与朝鲜战友一起向杜德进行了说理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5月10日，杜德与营场外新上任的战俘营总管柯尔逊准将共同签署了一项“声明”，向全世界承认了美军当局强迫战俘拒绝遣返的罪行。对所谓“战俘不愿遣返”的宣传给予了最有力的打击。美军当局于6月10日血洗“76”，将“76”夷为平地，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做了顽强反抗，死伤500余人。四位中国战俘代表也被关押进“最高监狱”，孙振冠、张泽石并作为“战犯”被长期拘禁在巨济岛“战犯集中营”，直到1953年秋遣返回国。

三、第三阶段：从1952年6月至1953年8月。

这一阶段，我“602”回国战俘营被美方迁往济州岛第八战俘营。美方为动摇我坚持遣返被俘人员的回国意志，分化我队伍，将我被俘人员分到十个小集中营关押。不断让叛徒指认我领导人然后扣走隔离关押，继续对我实行欺骗宣传，精神折磨和残酷镇压。强迫我被俘人员进行各种苦役，常对我战俘进行无理挑衅，制造

借口枪杀。于是敌我斗争的重点转为反对敌人分化，揭露敌人阴谋，坚持回归祖国。

在“共产主义团结会”统一领导下，在长达一年多等待回国的艰难岁月里，根据总委会提出的“团结、学习、斗争”的行动方针，我被俘人员继续开展了为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必要时自己解放自己的各种斗争活动。首先是加强了组织建设。总委会建立了多层候补领导班子以应付敌人的破坏，保持统一领导。加强各小集中营（分号）的分委会领导班子，使之能独立战斗。健全了组织、保卫、宣教、联络通讯等工作系统班子，特别是以惊人的智慧制定了敌人自始至终未能破译的通讯密码与联络方法，始终保证了全战俘营的集中统一领导。在这个条件下，全战俘营开展了学文化、学政治的群众活动。各分号都成立了“扫盲班”、“初小班”、“高小班”，自聘教员，自编教材、自制教具，学习热情很高，效果很好。全营统一编发了政治学习材料。如《形势教育》、《美帝本质教育》、《中苏友好教育》、《气节教育》、《个人的前途、出路与集体斗争的关系》等等。为配合政治学习，各分号宣传队还创作了不少歌曲教大家唱。更难得的是他们完全靠回忆排演了《刘胡兰》、《白毛女》、《钢铁战士》、《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放下你的鞭子》等歌剧、话剧，奇迹般地想尽各种办法制作了各种乐器、服装、道具。他们的演出大大鼓舞了难友们的革命乐观情绪，坚定了难友们的回国意志。

为了表达大家对祖国的热爱与思念，每个重大节日如“七·一”、“八·一”、“八·一五”（朝鲜光复节），都在全战俘营举行庆祝活动。1952年9月，总委会从敌人的报纸上了解到，在板门店谈判中敌人仍然在污蔑中国战俘多数不愿回国，仍然坚持其“自愿遣返”的原则阻碍谈判进程，决定在“十·一”国庆节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升旗斗争，以行动表示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回国意志，和支持我方代表的谈判斗争。难友们准备了十面红旗，踊跃参加了护旗敢死队。“十·一”那天一声令下，十面红旗升起在济

州岛上，6000人高唱国歌，歌声响彻云天。敌人恐慌了，开来10辆坦克及一个营的步兵，冲入7号营场强行夺旗。我敢死队员奋起护旗，与敌人展开肉搏，美军上校白乐摩总管悍然下令开火。我敢死队员前仆后继，为保卫国旗，当场有109人光荣负伤，56人壮烈牺牲。

我6000坚持回国的被俘人员，在济州岛第八战俘集中营坚持团结战斗，直到1953年9月全部交换回国。

而同时被强迫扣留在济州岛上的14000余名所谓不愿回国的我被俘人员，尽管受到叛徒特务更加严密的控制，但反抗斗争仍未停止。1953年7月下旬，杨玉城经过多次严重自伤被送往釜山医治，坚决要求遣返来到釜山第一收容所。其余的在1953年10月被押往板门店中立区由印度部队看管，在接受我解释代表团的解释时，又有424人带着满身伤痕，冒死冲出营场回到祖国。

还应该强调的是我被俘人员的反抗斗争，自始至终得到了朝鲜战友们的兄弟般的支援。朝鲜劳动党巨济岛战俘营地下党组织一直与我地下组织密切联系，并肩战斗、互相支持。朝鲜战友都学会唱《东方红》，正如我们都会唱《金日成将军之歌》一样。在釜山，在巨济岛，每次重大斗争中都可听到中朝战友互相鼓舞的歌声。在巨济岛，朝中战俘代表团被共同监禁在“战犯集中营”的一年多里，朝中战友们更是亲如手足，共同斗争！朝中两国被俘人员在美方战俘集中营里结下的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永志不忘！

我志愿军被俘人员为了争取重返祖国，同美军当局及叛徒特务进行了长达两年多的针锋相对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不只是坚持了自己的革命气节与民族大义，也是在敌人后方开辟了另一个战场，继续了自己在抗美援朝前线进行过的保家卫国斗争！我被俘人员的斗争事迹与前线的英雄战友们的光辉业绩同样是我党我军革命历史画卷中不可磨灭的一页！他们在敌人的囚牢中，在异国的土地上，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革命战士与共产党人的“正气歌”！谱写了一页炎黄子孙的爱国主义悲壮史诗！

# 陷入重围

## 集结在丹东

1951年春节刚过，我六十军一八〇师从河北沧县泊头镇登上军列，直抵沈阳站奉命到丹东集结。

火车在轰轰隆隆地奔驰，战士们在唱歌、欢笑，大家的情绪很高。此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绪万千……

“今后部队就在四川安家落户，永不出川，不论国际、国内发生任何变化，都不出川。”这是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同志在1949年12月31日讲的。我师已进入成都，他号召我们安定军心，在四川扎根，进行和平建设。但没料到仅仅一年，形势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美帝不让我们进行和平建设呵！我又想起：12月份出发前，军政委袁子钦在军部对我说：“你们一八〇师现在政委空缺，你就代理吧！”我说：“我不行，派一个来吧！”他说：“前一段你干的就不错，干吧！走群众路线。”虽然时间紧迫来不及下文字命令，实际上我已承担起政委的日常工作。这是党对我的重托，临危受命，我不能辜负党的信任啊！

1951年春节前部队到达河北沧县泊头镇。为了统一部队的武器，将原来乱七八糟各式各

样的武器改换为一律的苏式步机枪、高射枪和炮。由于换了新装备，有些武器战士不会使用。我去北京找到苏联大使馆，通过我爱人的嫂子在使馆当翻译的关系，我见到了苏联武官，向他们求助，但他们也搞不清楚。我还想起：部队行动的两月前，我到天津参加中央军委召开的出国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朱总司令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讲话，那热情鼓励的话语，直到现在仍回响在我的耳边。

车就要到沈阳站了。战士们精神不减，手握心爱的枪支，在不停的拆卸、琢磨。我想：在干中学吧！只要正义在身、真理在手，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目的地到达了，我们在丹东休整一个星期。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上级的一声命令，跨过鸭绿江，打败美帝，保家卫国。鸭绿江在滚滚流动，我的心也在不停地波滚潮涌，我知道迎接我们的将是一场陌生的、特殊的、艰苦卓绝的，同时又是光荣的战斗。党啊！放心吧！不论发生什么，你的儿女将经得起任何考验。

1951年3月17日我军奉命跨过鸭绿江，以强行军速度向志愿军司令部指定的位置—伊川郡开进。

部队徒步行军，师的领导分乘两部吉普车行进，为了工作方便，师小报编辑张城垣、文印员何雪泉都随我乘车同行。鸭绿江南岸一派空旷，所有的村镇都是断垣残壁，一片瓦砾。敌机则三五成群地来往不断，将成吨的炸弹一批又一批投到公路和村庄上，已经反复轰炸过的目标，到处是燃烧的火光。为了防空，部队夜行晓宿。入夜后，大路上渐渐热闹起来，从四处山沟树林里隐蔽了一天的部队和运输车队以及火炮牵引的车队纷纷拥上公路，挤挤挨挨向南涌动着。在一些岔路口常常有几个军的单位挤在一起，争着抢行，秩序很乱。公路上汽车的喇叭声、马车驭手的吆喝声、甩鞭声以及部队行进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形成了朝鲜战地夜行公路上特有的交响曲。

我们走过8个县，没有见到一座完整的民房，部队只得在寒

冷的野外露营，14天要走完近700公里路程，其艰难困苦情况超出了国内任何一次行军。尤其过三登以后，敌机更加疯狂，每夜都轮番不停地轰炸。部队既要防空，又要抓紧天亮前的时间尽快赶路。我们坐在吉普车上任车子在凹凸不平的路上颠簸，一路思前想后，心事重重。让我感到担心的事是既要按照志愿军司令部的命令，准时开到预定集结地，又不能把部队拖垮、拖散。部队战士负荷平均在25公斤上下，牲口负重在100—150公斤。时值冬末春初，冰雪融化、道路泥泞，实在难走，特别是下雨给部队的行进带来巨大的困难。栗树林里，部队的宿营地一片凄风苦雨。战士们有的几个人撑起一块雨布避雨，有的坐在泥水里树根上背靠背打盹儿。有的实在无处藏身，干脆互相用背包绳子把身体捆在树干上，就贴着树干站着睡觉。由于大雨无法宿营，我们请示军部后继续行军。这样大的困难，我们一万多人的部队，没有人叫苦。战士们提出只要两条腿不断，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按时赶到三八线。但是快要到达集结地的前几天，部队所带粮食大部分用完，每天吃些炒面坚持行军。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共产党员和下面干部更苦，在极度疲劳的时候，战士们在休息，他们还要召开党委会、支部会研究部队情况，提出解决办法。各团营在行军中，进行了“追苦根、找甜果”、“评功记好”等活动，大大鼓舞了部队情绪，全师出现了不少模范、积极分子。有的在遭到空袭后在烈火中抢救群众或抢救军用物资，有的在千里行军中背双背包、扛双枪，有的班、排长在极度疲惫时，给战士烧洗脚水。不少带病的脚打泡的战士坚持不掉队。张城垣同志一到宿营地，就及时收集这些好人好事，通过新闻、通讯、快报等形式编印在《行军快报》上，以鼓舞行军士气。但是太艰苦啦！白天露营，夜里摸黑走路，敌机又轰炸，吃不好、睡不好，非战斗减员天天在增加。我的吉普车一到宿营地，就开回去接有病或行走困难的战士。

## 越过三八线

由于我志愿军圆满地结束了第四次战役，美伪进攻的势头大大减弱。为防止敌人乘我疲劳再次越过三八线及组织新的登陆阴谋，我志愿军总部决定提前发动第五次战役。我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紧急进入朝鲜，并迅速进入指定的作战位置。4月22日黄昏，在三八线附近西起开城、东至麟蹄的100公里地段上，我军万炮齐轰打响了第五次战役。这次战役，我兵团为西线中央集团，担任了正面歼灭美3师和土耳其旅，尔后再和兄弟兵团一起歼灭美二十四师和美二十五师的任务。我六十军为兵团左翼，奉命经高台山出击，插向纵深，割裂美二十五师和土耳其旅的联系，抗击美二十五师西援，牵制美三师。我军一八一师为第一梯队，我一八〇师为第二梯队。到4月23日，我们已向敌纵深插入了30里，并相机投入战斗，对敌进行追击，歼灭了一部分敌人。同时，我师在实践中初步了解了异国战场的基本情况，也掌握了直接对美军作战上的一些规律。

为了继续扩大战果，歼灭有生力量，5月16日开始了战役的第二阶段，志愿军司令部决定集中力量向东线李承晚军攻击。

16日黄昏，我六十军奉命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割裂美军和南朝鲜军之联系，阻击美陆战一师美七师东援。战斗打响后，我军一七九师和一八一师奉命为兵团的机动部队，分别配给十二军和十五军指挥。因而实施牵制敌人的重担落在一八〇师身上，即要以我们这个劣势装备的一万人的部队去抗击优势装备的五万人的美机械化部队！其时美陆战一师、美七师已进至我师的正面，企图东援。军部命令我师实施以攻为守的战术向春川、洪川插入，控制春洪公路，拖住两个师的美军不让东靠。

16日，我师命令五三九团和五三八团三营由下立岩、发雷分别渡过北汉江，控制寒崎县至阴谷山一线。17日，五四〇团由发雷渡江进至仑村里，五三九团进至杜武洞。当日五三八团直插新



岩里与敌遭遇，击毁美军坦克 10 辆，歼敌一个连。18 日，五三八团二营进至孝子洞、万树洞一线，黄昏占领万树洞以西 3368 高地，遭敌陆战一师疯狂反击，二营为坚守阵地伤亡过半。同时五三九团二营控制洪川北岸二六五、二八六高地，胜利完成阻击敌东援任务。战斗进行到第五天，我们接到军里通知，雨季来临，各部队携带粮食不多，已前进一百多公里，后方供应一时又接济不上，即停止进攻。我师遂于 21 日奉命停止进攻，战役第二阶段遂告结束。

### 驾德山陷入重围

在我们停止进攻的同时，敌人很快开始了反攻。无数的炮弹和炸弹倾泻在我们的阵地上，树木东倒西歪、烟熏火燎，巨石被炸得粉碎，土地被炮火翻了一遍。由于我军坚决阻击，敌我双方激战终日，敌人尸体横躺竖卧。22 日，军部命令我师向北转移，渡过北汉江至春江西北地区组织防御。正在执行命令期间又复奉兵团命令，要我师担负掩护中线伤员转运任务，在加平、北汉江以南地区建立三道防线，坚持三至五天。执行此一任务看起来简单，实际并不容易。自 22 日始各部队携带粮食已尽，部分营连已断粮。23 日，我师右翼的六十三军已北撤，侧翼暴露。敌掌握了我军作战规律，并发现我主力后撤，粮弹不足，部队疲惫，即集结很多部队（后来知道敌投入 4 个军 13 个师）沿主要公路向北展开全线反击。美七师和南朝鲜军第六师从六十三军撤出留下的空隙，乘虚插入我师侧后。正面之敌为美二十四师、南朝鲜军第二师等，并以摩托化及快速部队在航空兵配合下向我疯狂进攻。23 日，敌以大量飞机对第一道防线的师部和五三九团施行轮番轰炸和反复炮击。部队积极组织步机枪向俯冲的敌机射击，但给部队造成严重伤亡。在炮空袭击中，每个连伤亡人数达 1/3，三连伤亡最重有 2/3，据五三八团参谋薛天林说该团一营几乎全完了。停炮后，敌军一个团的兵力在 16 辆坦克配合下，对五三九团四连防守的九峦

山阵地猛攻。在此险恶处境下我部仍顽强反击，四连打退敌人五次进攻，毙敌百余人。防守在土木洞阵地的第五连，也同时遭到美军一个机械化团的进攻。五连在营长马兴旺带领下，连续打退敌人 8 次冲锋，并缴获敌机枪一挺。敌人集中优势兵力，使用一个团和两个营的兵力对付我们一个连。他们仗着坦克和空军的优势，向我们阵地上疯狂地倾注钢铁，大地化作一片焦土。坚守在城隍堂一线阵地的五四〇团和济宁里的五三八团，同时遭到敌人猛烈的反扑。五三八团战士们用步枪击落敌机一架，坚守城隍堂五四〇团一营三连的排连干部都伤亡了，170 人的连队最后只剩十来个人，指导员孟晓峰在前沿阵地身负重伤不下火线。三营教导员任振华带领战士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后，子弹打光了，他最后用手中仅有的一枚手榴弹和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我们阵地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树木都打光了，工事也被炮弹摧毁，墟土比膝盖还深。部队伤亡严重，这两天的坚守阵地战中，全师干部的伤亡超过了国内战争中两年的数字。五三八团一营营长刘吉耀、教导员赵国泰、五三九团政委韩启明、三营教导员杨彬、一营副教导员郭青五、五四〇团政治处主任王体先、炮兵营长张允浩都先后牺牲了。五三八团牺牲了 5 个连长、6 个连指导员。五三九团牺牲 8 个连长、5 个指导员。国内三年解放战争中，五三九团团部只牺牲了两个干部，而在这三天内却牺牲了两个参谋和四个干事！情况十分危急，很显然敌人为了减轻东线压力，已动用几个师的美军向我压来。那么是守还是撤？守吧，容易使部队陷入四面夹击。撤吧，兵团和军都没有指示。到底怎么办？师指挥所意见不一。而我和师长都是政治工作人员出身，缺乏临机处事的决断。而党的政工干部应有的准则却发挥了作用，没有命令不能撤。事实上，我们师已与整个后撤行动脱节了，在汉江南孤零零只剩下我们这一师人了。整个部队像陷进了沼泽，无法进退，被卡在敌阵中间。拥有立体打击手段和高度机动能力的敌军施行所谓“磁性战术”，五个机械化师向我逼进。5 月 23 日，沿加平方向

前进之敌美二十四师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抢先占领了我师指挥所北侧高地。南朝鲜军第六师进占江春里并控制了该渡口，美七师特遣队至春川。我师处于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不利态势。

在这严重的形势下，24日晚，军部命令我们立即渡过北汉江，在江北组织阻击。当时敌人已控制渡口，由于从不是渡口的地方涉水，又没有向导，部队扶着几道临时拉起的铁丝渡江，江流湍急。朝鲜五月的黑夜还有些寒意，江水更是冰冷刺骨，江心中的水已深到齐胸，站都站不住。敌人飞机不断从江面掠过扫射投弹，以及震耳欲聋的榴散弹爆炸声，稍有惊慌就会被水冲跑，全师一夜被水卷走600多人。仅五三九团一营二连被水冲去30多人，五三八团七连大部被冲走。过江后天已亮。25日，师部及五三九团住明月里和九唇岱山，五三八团转移至上下芳洞阻击，五四〇团撤至北培山、鸡冠山一线进行阻击。我师在边打边撤的阻击战中，敌人和我们分秒必争。当五三九团二营到达明月里时，敌人已占领西南3067高地。教导员关志超立即组织部队夺占高地，他命令战斗英雄许四保率领四连二排以迅速突然的动作迂回到敌侧翼，一举夺回高地，毙敌50余人，俘敌二人，缴获机枪四挺。当天下午四时，敌先头部队一个营进至九唇岱山，向防守山头的五三九团二营五连连连续猛攻，经反复争夺，弹药打光了，用石块、刺刀拼搏。战斗英雄连指导员杨小来带领战士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敌人被打死打伤无数。最后我阵地上只剩下四个人，仍打退了敌人最后一次进攻。杨小来这位年仅20岁的指导员身负数处重伤，坚持冲向敌群，在白刃格斗中献出宝贵的生命。与此同时五三九团二营副营长车学智带四连和九连一个排，在九唇岱山坚持阻击敌人，并消灭了南朝鲜军第二师的一个连，俘敌8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三支。五四〇团三营在鸡冠山抗击敌人合围，在营长韩月季带领下同三倍于自己的敌人殊死战斗，打退敌人数十次进攻，

26日全营只剩下50人！五三八团三营在团驻地上下芳洞南面

一座大山担任警戒任务，该营机枪连三门八二迫击炮，由连长郭如峨带着相随营部行动，六挺重机枪由指导员南阳珍指挥掩护第七、八两个连的阵地。25日八、九点钟，敌人向全营发起进攻，向该连机枪排进攻。一开始敌人一个分队进攻被打退，继之而来的一个营到两个营的无数次的进攻，均被打退。黄昏时阵地前敌人尸体一大片，约100多人。可是重机枪排50多人，连伤员加在一起只剩下14人。有的班没人了，四班只剩下一个四川战士段少云，六挺重机枪子弹全部打光了。他们整个一天不仅战胜了敌人进攻，还战胜了饥饿。没有粮食吃树叶草根，广东籍战士辛文标吃蛇肉，有的吃野羊角葱中毒而死，有的战士牺牲了口还含着草根。因为没水喝比饿还难受，派战士到沟内提水还被打死一个。黄昏时，营部通知集合向驾德山防地转移。这六挺没有子弹的重机枪，战士们发愁抬不动，连排干部一面带头抬，另一面动员大家克服困难把机枪抬到营部再研究。这次阻击战进行得异常残酷激烈，战士们以血肉之躯抵御着敌人铁甲之师，付出了巨大的伤亡。终于迟滞了敌人的推进，为兵团主力后撤争取了时间，但也使自己陷入了绝境。

5月25日下午五时，在半小时内，我们在明月里接到军部转兵团的两道命令。第一道命令，要我们师部带两个团沿公路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一个团沿山路到驾德山，两面阻击敌人，掩护全兵团伤员撤退（据说有3000伤员未撤下来）。接到第一道命令后，即令师直属队和各团重炮连、五三八团、五三九团先行出发到马坪里背后山侧，大部队正要出发时又接到第二道命令。即：师部带两个团通过土山路占领驾德山，另一个团背抬着全师200多重伤员沿着公路送到马坪里兵站，然后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同时一再说明一八〇师任务掩护全兵团伤员撤退，而一七九师掩护一八〇师完成任务。这时，正面美二十四师及陆战第一师已紧跟后面，右翼南韩第二师也已从城隍堂方向向我师右侧背后压过来。我向师长建议我们执行第二道命令应考虑敌我友情况变化后，我

们要撤过公路北就较困难。郑师长认为一七九师已去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已无后顾之忧了。便对我说：“你应该相信上级、相信友军，放心地执行第二道命令！”于是，又命令已经向北转移的五三八团返回协同五四〇团到驾德山重新布防；命令五三九团送伤员到马坪里兵站后，立即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但不知是谁改变了命令，五三九团却上了鹰峰山！）

这样我师就失去了占领马坪里背后大山的时机，失去了进可攻击敌人，退可转移撤退的有利地势，也失去了至少两个团可以突出重围的宝贵时机！部队不得不在饥饿中往返爬几十里高山使部队疲惫不堪，减员严重，大大削弱了最后突围的有生力量！

5月26日拂晓，我们到达驾德山时，听到马坪里背后山上有枪声。我两次提醒郑师长：“北山上可能已被占领。”他仍说：“你应该相信友军的战斗力！”当再次听到枪声时，我派侦察连连长前去侦察，没过5分钟敌人的炮弹猛射过来。大家才恍然大悟：友军已不在了，山头已被敌人占领！

后来才知道：当时我师孤立突出50公里，背后仅有五三六团两个营掩护，无法挡住敌人两个师的穿插迂回。左翼美七师迅速占领了马坪里、梧喃里，控制了制高点。右翼美二十四师已占领松亭里、甘滩里，正面则有南韩第六师、第二师占领了鸡冠山、向驾德山逼近。我师已经处在敌人4个师的包围之中，而且是内无粮草、外无援兵！

更为严重的是，情况已万分危急，我们却一昼夜和上级失去了联系！郑师长遂于5月26日中午在驾德山五三八团指挥所，在四周密集的枪声中，召开了紧急党委扩大会议。段龙章副师长首先讲了敌情：“情况非常严峻，美二十四师已攻占间村，伪六师已进占芝岩里，美七师进至马坪里超出了我师侧后，敌人已对我形成合围！”郑师长说：“是固守待援还是突围？请集体研究决定！”

当时，炮弹不断在指挥所周围爆炸，一个警卫会场的战士竟被敌机枪射中。我心情沉重，必须立即突围的想法也更加明确！

说：“就这几天的战斗看，我们部队的重大伤亡并不在于与敌人真枪真刀面对面的较量上，而是吃亏在敌人的猛烈炮轰之中。继续如此被动地打下去，部队会被炮火打光的！更何况我们已无弹药补充，怎么固守待援？我还是主张突围！”

紧接着五四〇团政委李矛召、五三八团团团长庞克昌在发言中，都坚决要求突围。他们说：敌人有4个师的重炮群和空中优势，我们固守在一起，恰好让敌人发挥其立体战术优势！只有突围才是上策！随后不少同志都提出：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拼死一战！会场气氛凝重悲愤。性急的炮兵主任郭兆林忍不住高喊：“师长，快些决定吧！你忍心让部队就这么叫敌人给一口吃掉么？这可是咱一八〇师的最后一点老本了！”会议开到下午一点多。郑师长终于宣布：“立即做好突围准备！作战科马上向军里请示，批准后立即行动！”但我们一直等到下午5点多才得到军里的回电。同意我们向鹰峰突围，并说：过了马坪里公路就是我方阵地。时间已极其紧迫，部队来不及进行深入组织动员和认真探索地形，便于下午六时匆忙实施突围。

当时决定在山上的师指挥所五三八团、五四〇团为一路，在山下的五三九团为一路向西突，由王化英同志传达的命令。由于考虑沿山路突围笨重的山炮无法运走，只得将炮弹向敌人发射，最后剩一发炮弹在炮膛内自爆。那些辛辛苦苦将山炮弄过江南又运回江北的炮手们，含着眼泪目视自己心爱的炮身爆炸。遗憾的是因战士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杀死自己的驮马，便将驮马解开笼头放进深山。突围中师部和五三八团、五四〇团从驾德山到鹰峰山要通过一个六、七里地深而长的沟，几千人拥挤在一个深沟里（五三八团作前卫、师部在中间、五四〇团作后卫），在遭敌炮群和飞机的猛烈轰炸中，大家非常勇敢，相互搀扶，相随前进有很多战士、干部要求前边快走，尽快通过深沟与敌人决一死战。怎奈受沟底宽度限制，回旋余地太小，只能一路前进。在敌人密集的炮火袭击下，有些人为了抢先而造成建制混乱，不少人失散。说实在，

整个部队，由于四、五天没吃饭，如五三八团辎重连几十个人 5 天只吃了拣来的 18 斤炒面不少人在急行军中饿倒掉队，不少的新战士缺乏战斗经验，在震耳如雷的炮声下惊慌卧倒不敢前进。有些没改造好的起义战士畏缩逃跑。甚至五四〇团代理团长刘瑶虎在指挥部队前进时被一名起义老兵枪击，负重伤（后被俘死在敌人的医院里）前卫团五三八团在驾德里山与鹰峰山之间十字沟中掩护部队通过时，遭到敌人坦克和炮火的密集封锁与激烈冲击，损失也很严重。承担打开口子任务的二营，在营长李全有的指挥下。在沟口与敌坦克搏斗，四、五两个连几乎全部牺牲！三营在冲击路口时与敌摩托部队激战，大部伤亡全团只有一营还有半数兵力，但在进入鹰峰后，营长刘吉耀、教导员赵国太和多数连指导员相继牺牲，部队失去指挥！因此，27 日拂晓，到达鹰峰东山时这一路只剩下 1500 多人了。当时，山上敌人已经控制了主峰和许多制高点，五三八团团团长庞克昌、参谋长胡景义组织班以上党员干部一举攻下了东台峰。我又命令五三九团政治部主任李全山、保卫干事王洪运和警卫排长吕铁拴、侦察员张林川带领团直机关干部 30 余人，一鼓作气攻取了鹰峰主峰。这样，部队有了立足点但敌众我寡，到下午鹰峰主峰又落入敌手，突围失败。

快黄昏时，再次和军里联系上，韦杰军长命令我们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并说有兄弟部队接应。当时部队大都在山中四处寻食，第二次组织突围时总共不到 400 人了。临时编成三个连，随师指挥所转往史仓里方向突围我们几个师级干部年纪较大、精疲力竭。只得被警卫员架着走山陡路滑，还不时遭到敌人炮火拦阻，山林都被烧成了焦木枯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搞“铁碾扫荡”时也没有这么残酷啊！

### 美军坦克追赶碾压

部队转移到鹰峰西边一片灌丛茂密的山凹里时，我们四面山头上都是敌人，敌机在空中盘旋，不到天黑不能行动。几个师的

领导都心神不宁，敌情、我情一天数变，面对几个师敌人的包围，感到兄弟部队的接应很难靠住。天黄昏后，师长和我在沟口上想到突围中在沟内部队受损失很大，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我说：“师长你的身体负过重伤开过刀，几天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可要注意！”他反问我：“你的胃病好些吗？能吃东西吗？”我说不能吃不紧要还能行军。接着我对他说：“这里距史仓里在地图上看有四、五十里，但是要翻山，今天晚上很有可能碰见敌人。我建议把队伍集中到山顶上讲清情况，重新组织以战备姿态行军。他说不行啦！我已经下命令让部队前进。这时沟下边一个同志叫：“吴主任！吴主任！”我问清他是五三八团二营军医叫王洪兴，身负重伤，要求带上他。我一面叫通讯员去找五三八团的首长来处理此事，一面观察他的伤情，安慰他。这时师长他们叫：“老吴快走，部队已经走了。”我说：“你们先走，我处理完就跟上。”为此耽误 20 分钟时间，就同大家行动脱节了。加之连日来我的胃病复发，疼痛难忍，行军困难，在警卫员帮助下到天明才爬上山顶。天刚亮，敌机又是一阵疯狂的轰炸扫射，发泄之后离去了，留下山谷里滚滚的浓烟。这里是敌人封锁地带，不能久留，必须很快去追赶大部队。下了山，顺着一条有泥泞脚印的东西沟谷踉踉跄跄向前行进。走过两道山梁，拐过一处洼地，在一片松林下的泥地上，不知是谁叫了一声“吴主任来了。”“吴主任把我们带上”！人群顿然轰动，将我团团围住。重伤员也从地上爬起来，一点一点艰难地向我跟前移来。望着眼前这几百双希望于我的眼睛，我心如刀绞，痛楚异常。大家关心的是前边的情况，究竟前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命运，我和大家一样，一无所知。可是我是这师最高的政治首长。从四川到安东，每一次出国作战的政治动员，都出自我的口中。现在，在这紧急关头绝不能抛弃他们当逃兵，一个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感，使我心里升腾起一种新的力量。我立即向大家宣布：“我不走，我带领你们一块突围。”这一片洼地里有 400 多伤员，一部份是吃野草蘑菇中毒，一部份是在炮击时负伤。我指定了几个干



部进行了逐个登记和编组整队，按原师直和各团的建制，编成四个中队和几十个小分队。掩埋了牺牲的战友，包扎了伤员，组织伤员扶着伤员行军，出发前作了简单的动员。我说：“情况很明显，我们现在处在敌人的严重包围中。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大敌人：一个是美国侵略军；一个是饥饿。首先要咬紧牙关，勒紧裤带战胜饥饿。要发扬团结一心，不怕牺牲的精神，敢于近战，利用夜间冲过封锁线。共产党员要冲锋在前。”这时候敌人飞机上的喇叭不断播出劝降的广播。我号召说：“大家不要受骗，要发扬民族气节，不当叛徒。谁要想叛变投敌，你们就打死他，我负责任……”

人多了似乎也增加了安全感，重新组织起来的人，身上又产生了新的力气。一些重伤员也不让其他人搀扶，抱着树棍，紧跟队伍行动，大家克服了无法形容的困难。

入夜，枪炮声愈加密集了。敌人的探照灯和空投照明弹交叉在夜空，大炮和机关枪封锁着每一条路口。冲在前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被敌人子弹击中，看来硬从西北突围不能成功，队伍又转向东方。下雨路滑，山道崎岖，夜又漆黑，不少人失足跌进深谷。好不容易下了山，但是东边山口又被敌人的坦克挡住了。一发接一发炮弹在沟内爆炸，鉴于炮火的压力，不少伤员宁愿牺牲在封锁线上，也不愿后退到沟里被炮弹炸死，急切回归的愿望使他们鼓足气力冲向沟口，但又遭到了敌人坦克野蛮的追赶碾压。当时天已快亮，部队伤亡了一大半。我们又撤回山内采集食品，恢复体力。到第三天和第四天晚上又进行两次突围，都没有成功。有不少人已近 10 天没有见到粮食，很多人伤口腐烂，疲惫已极，无力行动。为解决吃的，我们确定以分队为单位进行游击活动，相机再突围。

夜深了，远处不时有零星枪炮声，风在不停地呼啸着。我睡不着觉，回忆了几天所遇见的事，“师长他们为什么不等我一同把几百伤病员妥善处理后再走？现在处境这么险恶，我怎么能把同

志们带回去？”我彻夜难眠。

我们这个分队是师直机关和山炮营及警卫连的 100 多人，经几次突围后仅剩 30 多名同志。分队长是师政治部保卫科长阎宏义同志，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太原游击队的指导员，在敌人的格子网里打过多年游击。可是面对朝鲜这个现实，语言不通，又无群众，并处在百里无粮区，解决吃饭成了最大的难题。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拖着两条疲惫的腿，边走边动员同志们到山坡上采些野葡萄叶充饥，边走边吃，吃得嘴角溢出绿色的泡沫。我的胃疼难忍，什么也吃不进去。翻了一座山又走了一个多小时，走在前边的阎科长高兴的喊我，树林里发现了一匹死马，决定吃马肉充饥。为了解决刀、火和锅的问题，派几个同志到山上找刺刀和炮弹箱。在一个山头突出部，派出的同志高喊我们过去。在那里躺着十多个美国鬼子，中间有一位身着干部服的志愿军，头部血肉横飞模糊不清，身边还有五、六颗手榴弹木柄。大家不约而同地将这位同志抬到一棵松树下的自然坑内，面向祖国，上面盖上石头，并行了鞠躬礼。在距公路不远的山凹里找到了炮弹箱，从美国兵身上找出了打火机，大家正在兴致勃勃煮马肉时，李医生立即制止。他鉴定这匹死马已经腐臭，吃了有中毒的危险。望着一锅马肉，大家只得失望而离去。为了解决吃的，阎科长自报带一个小组到山下去搞粮食，但两天后也未回来。后来才知道他在拦截敌人军车时身负重伤，十天后死在釜山敌人的战俘医院里。接着又派去了几个小组去找粮都没有回来，有几个同志已经饿死。我看着一个个躺在血泊中面容憔悴、呼吸微弱的战友，心简直都要碎了。

正是一筹莫展的时候，从东南方向来了约一个排的兵力，大家揭开了手榴弹盖，进入了战斗位置。我用望远镜一看认定是自己人，到了跟前，发现是师工兵连代理连长王贵锁和一排长汝本泥。他们带领 30 多个同志突围之前去完成爆炸一座公路桥时被隔到敌后。他们在马坪里兵站拣到一些含有汽油味的高粱米，舍不

得吃，拿出一些与大家分享，并愿和我们一道突围。我喜出望外的是不仅有了一些粮食，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的战斗集体。

从 5 月 23 日以来，我的胃病一直未愈，战士们用炮弹箱煮了些高粱米汤都喝不进去。我的警卫员小虎子在清理他背的皮包时，发现里面有一瓶多种维生素和一盒炮台烟，我叫他把烟分给战士。我每天吃三次维生素，每次三粒，吃了三天后果然见效，胃病减轻了，大家非常高兴。十天后病情好转，我决定再行突围，先由汝本泥排长带一个小组到敌人前沿侦察情况。但他们走了四天没有返回，大家很着急。队伍沿着汝本泥小组前进的方向找去，走不到十里地发现山头上有敌人，敌人也发现了我们，用火力追击。我们钻进树林，越过小岭走进了一条很深很长的沟里，远远看见前方有一点火星，走近了就闻出一股米饭的香味。走到跟前发现是一间小草屋，内坐四五个女人，看见我们连哭带叫，在炕角挤成一团。有的战士饿得受不了想吃人家的饭，我坚决予以制止。这是一群逃难的朝鲜妇女，我叫她们看了看我们头上的志愿军军帽，她们才不哭了，并伸出大拇指向我们致意，可惜我们不会朝语。

我考虑到敌人对各山口的封锁尚未撤除，不能急于突围，应暂在山中游击，等待我军发动第六次战役。为了打好游击，加强党的领导，我提议建立党的支部，选出了三个支委，王连长任支部书记。十多天来，工兵连同志拣来的一点高粱米舍不得吃，每天只是煮些汤加野菜，但现在连煮汤的米也没有了。在忍受一次暴风雨之后，饥饿又向我们袭来，我们的肠胃开始空磨，吐出使人难受的叶青水，因而搞粮又成了当务之急。但这一带仍是百里无粮区，是李承晚的战略村，炮火已经把这里的村子打成废墟。我们白天进入茂密山林里隐蔽休息，夜幕降临后下山到村内的废墟里刨粮食，但收效不大。第二天我们在山口用望远镜观察，忽然发现一个女人从被火烧过的村子里出来到山坡上取粮食。我们得到启发，也到山坡上去刨，果然刨到十多斤大米。我们知道这是群众的东西，是违犯群众纪律的，我们写了一张借条放在取粮的

地方。附近的村里找不到粮食，队伍就向南发展。有一天，在一个山口发现了三个小村庄，我们组成三个组，一个组掩护，两个组进村找粮。没有料到村内驻有伪军，他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向我们开枪，我们撤出时他们又出来追击。掩护的小组用冲锋枪还击，打倒他三个，可我们也牺牲了一个同志，负伤一个。为此，同志们非常气愤，决心消灭这个村里的伪军，几次攻击都未成功，反而引起敌人的警惕。美军的搜山活动更加猖狂，常常趁我们不防包抄我们。有一次把我们压缩在一片稠密的林丛里，敌人不敢进来，在外边用卡宾枪和机枪拼命的射击。有的同志负了重伤，为了顾全大家从不叫喊。这一场殊死的战斗，树林里外迸溅着血肉，流淌着鲜血。敌人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白天，天天搜山，在暗地里同我们周旋。队伍在山上行走中常常和敌人打遭遇战。有一天一只美军警犬向我们队伍冲来，警卫员虎子眼明手快把警犬打死，我们很快藏入密林，没有受到损失。敌人搜山活动越来越频繁，所有制高点都安上了警戒，每天朝密林打枪，用火焰喷射器喷火，企图把我们置于死地。可喜的是天气已经进入 7 月，山上的桑树仁已经成熟，朝鲜的桑仁又大又黑。同志们饿了上树吃个饱，但下树两泡尿，肚皮又空了，饿了再上树，这样生活了七八天才没饿死。

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屠杀，我们向南移动，在一条挺深的沟谷里躲藏着。夏天深山水沟里的青蛙肉能吃，就立即组织抓青蛙，把二三十个青蛙穿在铁丝上用火烤熟，一剥皮鲜嫩的肉就出来了，非常好吃。不到几天，这条沟里的青蛙被吃光了。后来又发现地上的野菜和树上的蘑菇能吃，没有想到树的种类不同，有的树上的蘑菇有毒。有一天大家饱餐一顿，结果中了毒，幸亏有两个同志吃的少还能动弹，给大家烧开水作了缓解，没有发生事故。深秋后，山上的板栗和毛栗子成熟了，它成了我们的主要食粮，由于野粮充饥，在生活上的顾虑少了一些。但进入晚秋，朝鲜深秋的夜晚寒气刺骨，晴天还好受，到了雨天没有任何遮避，寒风吹

打着湿透的衣服，冻得人牙齿直打颤。晚间我们只有互相挤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抵御寒气。为了躲雨，我们到公路上美国人居住过的地方，拣回一些油毡纸壳箱子架成帐篷，铺在地上既防雨又防潮。而敌人却不让我们安然自在地在山上生存下去，每天都在追踪追袭。为此，我们三天一转移，每天派人在树上带望远镜放哨，由于时时警惕，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问题。

罕无人迹的深山老林里，是野兽的世界。炮声隆隆，野兽不敢嗥叫，但枪声一停，整个山林是死一般的寂静。为了战胜寂寞，我们搞起了文娱生活，用纸箱子作棋盘、棋子，走开了象棋；用硬纸做成扑克牌，打扑克；或摆龙门阵，讲故事，乱扯各地不同的生活习俗等。同志们每天要我讲战斗故事，从狼牙山五壮士说到百团大战，从三打运城战役讲到五次战役，从现代故事讲到水浒和三国演义，使大家既增加了精神粮食甚至也忘记了肚饥。

秋风开始扫落叶，严冬即将来临，隆隆的炮声仍在 40 多里的前方昼夜不息地响着。我们期待的我方第六次战役仍没有任何信息，下一步如何办？有的同志提出到公路上袭击敌人，为牺牲的同志报仇；有的提出等不来六次战役，趁早返回前方去突围。我们综合大家的意见，最后决定秋收季节已过，抓紧时间下山搞些粮食，恢复体力，利用元旦机会去摸敌人前沿阵地，突围出去第二天就下山打粮，弄到了五、六十斤粮食，但伤亡了两位同志连续下山三次搞粮，既有大米又有豆瓣酱，可是惊动了敌人，又开始对我们围剿追击。10 月间的一天，对我来说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一天敌人改变了白天搜山的规律，用一个连的兵力利用黄昏包围了我们。幸亏一个战士去小便时发现敌人已占领两侧高地，他回头喊了声“敌人来了！”我的警卫员虎子说：“首长，你快往山下滚，我掩护你，这里的地形我们非常熟悉。”我滚到沟底又从后面爬上山顶，和王连长等从侧面袭击敌人，向敌群扔去手榴弹。美国兵怕夜战也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乱放了一阵枪就仓惶逃跑了。敌人走后，我们回到住地，发现虎子牺牲了，同时还牺

牲了另外一名战士。在虎子身旁还躺着两个美国鬼子，敌人头上有二十响手枪子弹打的痕迹，肯定是虎子干的。虎子的牺牲，我实在忍不住流出了心痛的泪水。他是一个战斗英雄，从1950年跟随我在一起，我只知道他是太原人，没有记住他家的详细地址，使我多年内疚不已！这个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英雄，只能在我的神往中、我的梦幻中出现了。

### 美军与警犬堵住了我们

三个月的突围游击，一排多人因为牺牲和失散只剩下了六个同志。由于长期吃不到青菜和食盐，四个同志患上了夜盲症，眼睛看不见如何突围？白天突围没有战斗力，晚上突围看不见路，因而打消了元旦突围的计划，决定在深山过冬，等待来年春天我军的第六次战役吧！我们在山上找到了三个能够过冬的岩洞，每个洞都得弯着腰进去，有的还要爬着进去才能坐着煮饭。煮饭必须在黄昏以前完成，以免被敌人发现火光。为了储备充足的粮食，我们又组织了几次下山搞粮，由于4个人是夜盲眼，晚上全靠没患夜盲眼的班长带两人领路。可班长在一次搞粮时被敌人打死了，这给我们夜间下山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每次下山要往返50里路，我们5个人有4个人看不见路，只得一个拉一个在树林里摸着前进。有一次往返时遭到敌人追击，我们因看不到路都跌得遍体鳞伤，吃了很大的苦头，幸而夜盲眼在春天吃上野菜后就复明了。

1952年6月30日，我们计划在树林里纪念党诞生33周年。我们决定晚上每个人下山背20斤粮食，没有料到在返回的路上敌人堵住了我们，行走间和敌人面对面地遭遇。走在前面的王连长一面命令我们快跑，一面朝敌人走去，只听到一声手榴弹巨响。当我们后来去找时，王连长和四个敌人同归于尽了，7月1日这天，我们在一棵松树下埋葬了这位英雄。

王连长的牺牲，使我悲痛不已，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怀念他。自从我们在山上汇合后，为了我的安全，他心里凝聚着高度的责

任感。游击时，碰到过敌人，在公路上也碰到过敌人的汽车，几次有机会可以伏击敌人，但都被他制止了。他常常向战士们讲，我们的任务是保卫首长，而不是消灭一两个无足轻重的敌人。因而他控制了自己的仇恨和愤怒，尽量避开这些敌人，但到关键时刻他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样的好同志怎能不叫人心痛不已啊！

自那次遭遇战后，我们还剩三位同志。回忆我们当初 33 个人在敌后山上坚持了 420 天游击生活，扰乱了敌人的治安，消灭了 20 多个敌人。由于在异国土地上，言语不通，地形不熟，又没有地方党和群众的支持，结果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伤亡了几十个战友，已经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因此我们三个人研究了当时的处境后，决定返回前线突围归队，宁可牺牲在战线上也不牺牲在敌后。于是在 7 月 10 日开始向西北方向探索行进当时我的胃病复发，行动缓慢，沿着绿色的林海走了半天。那天雾气特别大，不仅肉眼看不清前面树林的情况，就是用望远镜也难以分清什么。我们翻过一座大山，正走进两个深沟交叉处的凹地，突然被十几个美国兵和几只警犬堵住了我们。我身边的战士在拧手榴弹盖的时候，被警犬扑倒在地，几个高个子敌人立即把我们压在地上不能动弹。随即推进吉普车里，一边一个敌人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臂。情况这么突然，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而落入敌手。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颠簸，我的心乱如麻，思绪万千，想到为什么落到这个地步，怪自己吗？这次战役我们部队受到了严重损失，自己也落入敌人之手，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而自己是一个高级政治工作干部，过去在血与火的战斗中，不愧为勇敢的战士，受过同志们的尊敬，获得了党的信任，现在处在没有上级领导的境地里，手无寸铁地陷在凶恶的敌人魔掌之中。这要我们由党培养出来的自信力与崇高的感情，对真理颠扑不破的信念，用自己的血肉作武器，同敌人作坚决斗争过去在部队学习过不少革命者在敌人监狱宁死不屈的斗争事迹，现在轮到自己头上。要作艰苦斗争的准备，任何残酷的环境我都能忍受下去，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

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不能舍弃党，不能舍弃祖国，我有一天生命就要为它们奋斗一天。

敌人把我们押送到他们团部所在地，作了简单的讯问。在汽车上我已告诉同时被俘的两个战士，要他们证明我是他们连的炊事员，并如实回答敌人我们是一八〇师工兵连的。一说是一八〇师的，敌人也就不再多问，用车把我们送往汉城的一个战俘转运站，里面有十多个被俘人员，倒卧在帐篷内的湿地上。

第二天，敌人的情报机关（后来知道是美八军情报处）单独对我进行了口头审讯，从年龄上我要比一般战士多出七、八岁，这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审讯人突如其来的说我是个团长。我说是炊事员，他们不相信，在职务问题上问了近三天。第四天押来了自称是二十六军一个连指导员，住进了我的帐篷内。他说他被俘后报的是战士，后来承认了指导员的身份。我告诉他，我是炊事员，是个老兵，你如果真是指导员的话，更应该忠于祖国，不能叛变祖国，叛变革命，要敢于斗争。他听后流出了眼泪。

### 阴森的水牢

不久，敌人将汉城转运站的被俘人员全部送到釜山战俘收容所，将我单独关押在第三收容所外边一个小铁丝网内的囚室，由美军情报机关对我进行残酷的审讯。审讯的主要内容是姓名、职务，今后去向。我仍坚持我被俘后的口供，姓名是武德，职务炊事员，去中国。后来我得知，1952年7月上旬，正是美国当局对中朝战俘进行政治分化的紧要时刻，美方代表为了7月13日在板门店会上，向我方提交一个志愿军战俘坚持遣返的6400人名单（见《杜平回忆录》433页），因而加紧对战俘进行残酷的人身迫害，以达到强迫扣留志愿军战俘去台湾的目的。当时所有被俘人员在审查时都要表明自己的去向。为此目的，敌人在囚我的窗外安上了两个带有尖锐嘶音的高音喇叭，白天黑夜反复叫喊：“吴成德快交代。”把我的脑子搞的嗡嗡响，昏昏沉沉（现在知道是一种微波



噪音)。我曾用手指堵耳朵，用纸团塞耳朵，但这些都不顶用。我就大喊大骂，敌人用棍棒制止，他们昼夜轮班，要我听喇叭，坐电椅审讯。我的脑袋都要爆炸了，神志不清醒曾几次昏死过去。每次醒来我都痛苦地抓挠头发，不料头发纷纷脱落，仅仅两天时间我的头发就脱落了一半。三天后，敌人告我说：“对你审讯获成功，你已承认自己叫吴成德，是一八〇师政治部主任，要到台湾去。我们已将你的讲话录音在前方阵地上广播了，你现在还想回大陆吗？”我说：“你们太卑鄙了，你们这种诬陷战俘、迫害战俘的罪恶行为，我坚决不承认。现在郑重向你宣布，我叫武德，是连队炊事员，死也要回中国大陆”。如此连续两三天向敌人抗议，而敌人不但不理，白天黑夜继续放高音喇叭。折腾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其痛苦比肉体上的摧残更残忍。为了反击敌人，暴露敌人迫害战俘的罪行，我决心以自杀来抗击敌人，用背心套带上吊，结果因带断掉了下来。这时进来了两个敌人，问我为何上吊？我说受不了你们的迫害。晚上，我对自杀进行了反思，回想自己是受党几十年教育的共产主义者，不应轻生。我想起方志敏同志的遗言：一个革命者首先不怕死，然后是争取晚死或不死。一天不死，一天和敌人势不两立，这是监狱斗争的特殊条件所决定的。应努力斗争，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因而产生了越狱的念头。在一天晚上 12 点下大雨的时候，我从小窗口钻出去，爬到铁丝网边，用双手刨挖网子下面的砂石地，磨破了十指，硬是挖出一个坑，钻出铁丝网，走了二、三百米远被大铁网周围的卫兵逮捕了。他们把我捆起来毒打一顿，钉上了手铐脚镣，用吉普车拉到一个有水的囚室。这阴森的水牢，水深一米左右，只能站着，特务和美军情报人员不时地走进水牢殴打我。他们用木棒打我的关节，用帆布鞭抽我的全身，使我全身伤痕累累钻心般痛，甚至把我倒插进水缸中，用刷子刷我的脚心！生活上极力虐待，每天只给两半碗大麦饭。身上创伤的剧痛和屋里令人窒息的空气，更使人难以忍受，但我内心仇恨的烈火却燃烧不息。

我想敌人的一切手段，无非是想使我产生一分钟的动摇、一闪念的恐惧，从而毁灭我毕生的信念。我决心用皮肉去承受痛苦，用毅力捍卫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和无尚尊严。敌人对我百般折磨之后，又进一步恐吓我，你只要答应去台湾，答应刺字，就可以获得自由。我明确的告诉敌人，你们不要再打我的主意了。让我用放弃回国的原则来交易自由那是永远办不到的，用卑躬屈膝出卖祖国利益换取自由，就是自由了，也是一个政治上的死人，倒不如让我死在这里。敌人的威逼诱降没有成功，半个月后，把我从水牢里放出来，并卸掉手铐和脚镣，押往新的地方。

随后，我被囚禁在釜山战俘集中营第七收容所侧旁的一个小铁丝网内的独立房。进大门时，一个年轻的志愿军被俘战友，在集中营门前放大嗓门高喊，新来的被俘战友，你们要坚定立场，不要上当受骗他揭露敌人用美国式的假民主、自由、人权来宣传台湾是天堂，强迫战俘去台湾。同时揭露敌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采取种种惨无人道的毒辣手段，如制造战俘写血书，毒打战俘强迫往身上刺字，把战俘整残废，这一切罪行都是为了迫使战俘背叛祖国到台湾去。因此，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斗争，坚决要回祖国大陆。这是我被俘以来第一次听到我们自己人的语言，使我倍受感动。后来知道这是战俘营地下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派出的宣传员当时在釜山地区领导对敌斗争的是我师司令部炮兵主任郭兆林，我为被俘战友这种精神所鼓舞，流出了兴奋的眼泪。（1980年落实中共中央74号文件时，这个青年还同我通了信）

七号收容所周围岗哨林立，有两道铁丝网和两层电网，我住在小铁丝网内一座小房里，看起来象是一所监狱，我作好了思想准备，在这样特殊的地方与凶残的敌人斗，不但要勇敢，更重要的是有智谋。第二天，敌人送来一个志愿军被俘人员，是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他的名字叫曹德成。调他的任务是专门在铁丝网门口送饭，不准我出门。开始我对这个年轻人很怀疑，以为是敌人派来监视我的特务，很少接近他后来我想，他毕竟是志愿

军被俘战友，处境相同，年龄也不大，只要不是专门受训的特务，可以争取。于是我主动接近他，首先想办法同他玩，用纸作棋子画棋盘，教他下棋，不久他的棋艺比我还高。接着教他学珠算，先学“九九口诀”，在地上划个算盘模子，用泥蛋作算珠，他也学得很快，并知道将来有用。接着给他讲了很多革命故事，我们两个又学《唐诗三百首》。（30年后，落实政策我们才通了信，他给我来信中提到还记得一首爱国主义的诗，并给我背写下来，他用我教他的珠算当了会计，并培养了几十个会计人员）。这样，我们在思想感情上更为亲切。他说他是陕西××县人，参加二十军后当通讯员，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俘。他告诉了我有关板门店停战谈判，我方坚持战俘全部交换的消息，表示坚决回祖国我们的相处，已结成了不可征服的兄弟友爱。后来，敌人发现我俩关系非常密切，很不高兴曾数次调他出去叫他打我，他都拒绝了。敌人气急败坏，多次的毒打他，有一次把他的牙打掉了四个。还诬陷是我打的。另外我和敌人不屈不挠进行激烈的斗争，对他影响很大。特别是见我拒绝穿敌人的皮鞋，坚持穿志愿军发的经过我一补再补的胶鞋，他奇怪地问我为什么还要留这双烂胶鞋？我说它现在是能代表我们祖国唯一的物件，穿到脚上看到它就象看到祖国一样，它鼓舞着我对敌人斗争的勇气。敌人发的衣裤上边都有“PW”字样，我都把它刮掉，为此敌人打过我多次，我都坚持干下去。为了抗议敌人审讯时毒打，我曾绝食四、五次。有两次五、六天，一次七天美军对所关押的战俘，每个人都要发一个号码牌，要登记一个战俘卡片，而卡片上的名字必须同其实际的姓名一致。我的号码牌早就没有了，名字职务和敌情报机关掌握的都不一样，为此敌人首脑机关逼迫战俘管理人员必须弄清我的身份，而我又死不交代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停地迫害我，打了审讯，审讯中又打，到了这个小监狱，我还是挨打。逼我交代职务、姓名和去向，而我每次回答都是八个字：武德、炊事员、回大陆。敌人气急败坏，对我更加频繁地审讯和毒打。后来我用绝食来对抗，

不吃不喝，一睡好几天，敌人也停止审讯、拷打了。一旦我恢复进食，他们接着又审讯、毒打，我又再绝食，前后有四、五次。有时我想敌人为什么对我的情况了解这么清楚，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一次在我绝食后三、五天，又调我审讯，这次审讯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一进门，屋里有十多人，还有几个人荷着枪，表现出杀气腾腾戒备森严。桌上放着两个圆盘盘，当时不知是录音机。审讯人说：今天给你享受宽大改善处境，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只要你说到台湾去，我们就改变对你的态度和待遇，不然就对你加倍处罚。两条道路由你选择，现在你可以开始对这个地方讲话。我说：“来釜山有两个月啦！从实际中看出你们说和做是两回事，你们宣传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宣传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宣传‘自由遣返’，实际上你们做的又是一套。你们威胁强迫战俘采取饥饿政策，强迫写血书，背上刺字。用卑鄙的手段制造假口供，强迫战俘背叛祖国，到台湾去。‘日内瓦战俘公约，有这一条规定吗？符合‘自由遣返’吗？刚才你们还说我能到台湾去，改善待遇，不去台湾加倍处罚，这哪里有民主、自由、人权的味道呢？今天你们荷枪来审讯，要杀要剐就动手，要我去台湾万万不能！”敌人没等我讲完，上来几个打手打了我一顿才草草收场。

在几个月的审讯过程中，美国人曾向我提出如下问题。

问：朝鲜战争谁是侵略者，谁是被迫自卫和解放者？

我说：“美国在万里之外，并没有受北朝鲜和中国侵略，而是美国人跨江渡海走几万里来朝鲜半岛侵略，还跃跃欲试进攻中国。中国和朝鲜一江之隔，唇齿相依，你们将战火已经引到鸭绿江边。因此中国为了自卫，组织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问：朝鲜战争的结果谁是胜利者？谁是失败者？

我说：“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战争的性质和民心向背，朝鲜战争美国是侵略者，是非正义的。虽有强大的物质和现代化武器，但由于是非正义之战，遭到人民反对。尽管武器装备强于我们，但

最后美国必败，北朝鲜、中国必胜。”

问：谁是独裁专制的国家？谁是民主自由尊重人权的国家？

我说：“中国与美国是不同的两个阶级专政。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广大人民实行高度的民主，对少数人实行专政。而美国尽管有两个政党轮流执政，但都是属于资产阶级集团，对广大人民没有民主，不然为什么不允许共产党有合法的权利和参政呢？”

问：对斯大林逝世怎么想的？

我说：“1953年3月斯大林同志逝世，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感到悲痛，痛感失掉了指挥社会主义前进的伟大领袖。而美帝国主义叫嚣世界上独裁专制头目死了，社会主义集团要垮台，社会主义制度要完蛋。斯大林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虽去世，但将会有千千万万无产阶级接班人继承他的遗志继续前进。”

问：你想过你会被俘吗？你想过被俘后再回去，共产党能相信你吗？

我说：“战争胜败是兵家常事，死亡与被俘也是不可避免的，有什么可幸灾乐祸的呢？你们美国少将迪安不是也被我们俘虏了吗？所不同的是我们对战俘是多方优待，而我和我的难友们则是被你们残酷迫害。至于被俘后就会被共产党不信任，这一点你们又打错了主意，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的，实事求是的。对待战俘，我党历来的态度是看表现，看实际，决不会把被俘者都看成变节者！”

### 一个年轻女人的“拜访”

一天，天下着毛毛细雨，阴沉沉的。猛然间从外边进来一个年轻女人，一进门就扭捏作态地用地道的中国话说：“先生你好，我来看你来了。哟！你怎么还会补鞋呢？看多困难啊，这是女人们干的事，让我给你补吧！”我说：“下雨你来看我已经够意思了，再给我补鞋，那可劳驾不起，艰苦奋斗是我们中国志愿军的传统。

这间屋子太小，没有座，那就请你站一会吧！你来有什么事？”她说：“没有别的事，就是来看看你，你不想家吗？”我说：“咱们都是炎黄子孙。今天你来，我分析你既不能代表中国人，更不能代表你自己，而代表美国人和蒋介石来的！给你的使命是想通过你来劝说我到台湾去，同时叫你以女人的身份来软化我，所以我认为你是个可怜的女人！请你回去给美国人说，我是有骨气的中国人。身被俘而志不能移！尽管在这个口是心非男盗女娼的鬼地方会受到折磨，但决不屈服，不投降！请他们对我死心吧！如果他们真正关心战俘的话，就应该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协议，停止对战俘的残酷迫害，停止胁迫战俘违背自己的良心背叛祖国。同时请你今后要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不要为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她脸色不正常，感到没话可说，灰溜溜地走了。

过几天，又来一位自称叫菲利普的中国通，中国话说的很流利。高高的个子，有点学者风度，进门点点头不说话，东瞅西看，在我睡觉的地方看见一本《唐诗三百首》。他说：“你好吗！你这本书还是我托人给你送来的，让你消遣消遣。”我说：“谢谢你的关心。”他说：“你谈谈对这本书的认识。”我说：“这本书主要是唐朝杜甫、李白的诗，他们因为做官说真话、做真事被贬逐放他乡，有些失落感。但他们敢于说真话，写真人真事。虽然唐朝距现在一千多年，但它的生命力特别强大，对后世人的激励鞭策前进作用也很大。”他说：“这个咱们不谈了，我今天来了解你生活有什么困难，在这儿住还好吧？”我说：“美国人对外不断宣传人与人‘平等’、‘自由’、‘博爱’，宣扬‘人权’，在战俘问题上你们自称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还在板门店强调‘自由遣返’，你们所说的话与行动向着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中国有句古话，叫作‘口是心非’。因为今天你问我，我才说，希望你们美国人能真正尊重战俘的‘人权’，不然我们这些被俘者只有跟你们搏斗，为争取人身自由选择去向而奋斗。你们想过没有，你们的将军、师长迪安被中朝俘去，他们的生活、学习、娱乐都享受什么待遇呢？”

他见话不投机说：“咱们就谈到这里，以后咱们再见吧！”

### 干净的是灵魂

一天，5个中国人，抬着一大水缸热水到我的住房内。美国人下令叫我下水缸洗澡。他们说：“你太脏，要洗洗”我说：“不需要洗。”于是美国人责令那5个中国人，强拉带推往缸里拽我死死撑着缸沿，他们就用拳头、棍子使劲打，一个把棍子打断了。我躺下不能动了，并喊叫着：“我的灵魂最干净，不需要洗，你们打死老子也不能屈服于你们。打吧！”折腾有半个小时，美国人看制服不了我，最后他们亲自动手连扒衣服带推，我拼命抵抗。门外进来另一个美国人，看了看，挥手让他们把水缸抬走了。这场斗争算暂时告一段落

美国人认为他们征服不了我的立场、观点，不能为他们政治上服务，尤其还不断地揭露他们迫害我的种种罪行，十分恼火，便想干脆除掉我以灭口，因而曾数次派人来要打死我。

曾数次命令曹德成打死我，但遭到了曹的拒绝，最后把曹调到别的地方把他门牙打掉了四个。

第二次命令五三八团一个干事用绳子勒死我，这位干事不干，后来他活活被敌人打死了！

《杜平回忆录》63页中载：“据釜山第七收容所归来被俘人员徐正祥说。一八〇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和一名被俘人员被关禁在距第七收容所不过六七米远的小铁丝网围场里在7月27日深夜。收容所中的国民党特务胡正明、王谦等交给他一根铁棍和一条绳子，强迫他勒死吴成德，被徐正祥婉言拒绝。徐乘机于8月13日逃跑到要求回国的战俘营，遣返后揭露敌人扣留和要打死吴成德的罪恶。祖国通过板门店谈判组与美方交涉，要求把吴成德、王芳、魏林、孙振冠、李彦、李德等人的下落交代清楚，同时把美方派徐正祥要打死吴成德的消息登在各报上。”

美国人把我作为人质加以扣留，藉口种种原因拖延，不予遣

返。直到中朝将美方所有被俘人员全部遣返完毕，才将中朝人质最后遣返。因此，我直到 1953 年 9 月 6 日才最后遣返回国。

### 党在我心中

我和同室住的曹德成坐车到达板门店，很远看见高大的五彩门上挂着“祖国怀抱”四个大字，我们不约而同地呼出“祖国万岁！”看见很多志愿军和人民军，看了周围环境，我才确信无疑是回到祖国。排除了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压力，在祖国亲人们热情欢迎和亲切的慰问下，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来到我方交换区棚子内，我放声痛哭。向中朝首长和世界各国记者控诉美帝用残酷的手段迫害我的经过，如高音喇叭和各种电刑破坏我的神经，在人力不可忍受的情况下，我如何同敌人进行斗争的。

到开城第二天，外交部李克农副部长、首席政治谈判代表黄华、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及志愿军领导首长来看我。我深感祖国无比亲切和温暖，在我理发后，杜主任说：“你来吧，谈谈战俘营的情况。”我把在战俘营遭受的种种残酷折磨和自己进行反抗斗争的经过，向首长作了详细汇报。一气说了几个钟头，我还要继续说。他看我精神太兴奋，叫我和一部分人先去辽宁昌图东北军区归管处休息，还派马兴旺同志护送我到归管处。

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回国后，全部集中在辽西昌图县。一面学习形势，一面恢复身体健康，所有人员一律享受中灶待遇，团以上干部都生活在归管处招待所。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深感到党和祖国对我们的关怀，从而使我对自己的前途和未来充满信心，我也未曾想到竟会有新的灾难在等待我们。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和恢复体力之后，组织处理，交代问题学习开始了。归管处号召我们以抗日战争时期“狼牙山五壮士”对照自己，归管处领导对被俘人员的讲话始终贯串着以下指导思想：

第一、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右倾怕死，就是可



耻，为什么不和敌人拼死或自尽；

第二、一个怕死被俘的人，怎能和敌人坚决斗争呢？即是有些斗争，也是迫不得已的反抗，因此只能交代过错不准谈有功，功过更不能相抵。

第三、只能在主观上深挖错误原因，不能从客观上找理由。

在这种极左思想的支配下，我们拼死回归祖国的 6000 多人，被认为全是右倾怕死变节。处理结果：除一两人外，百分之百终身控制使用，党员 98% 开除党籍。

1955 年元月，我被开除党籍军籍后，被分配到盘锦农垦局大洼农场当副场长。这个农场前身是日本人用中国战俘为苦力建立起来的水稻农场。解放后由解放军接收，1952 年归地方管理。没想到我这个美国人的中国战俘又来到这里。

这是一片荒凉的土地，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退海后的盐碱地，没有村落，没有人烟，除了碱和野芦苇之外，一无所有，被称为东北的南大荒。

夜晚，我孤独地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想。难道我此生此世就这样完了，就这样任凭命运的嘲弄，带着屈辱，遗憾地了此一生吗？或许这就是命运。可命运又是什么呢？也许是巧合，西方人认为不吉利的数字，是 13，而我，14 这个数字，却伴随了我 1260 天。从 1951 年 5 月开始我在南朝鲜打游击 14 个月，在敌人集中营也是 14 个月，回国后在归管处又是 14 个月。这三个 14 个月，都是我生命中最痛苦的三个阶段。每个人在生命征途上，都无例外地接受生活的挑战。如今当新的生活又推到我面前的时候，该怎样迈出这一步，将是对我的革命人生观和世界观一个新的严峻的检验。过去我追随共产党这么多年，就是因为我热爱她，了解她。共产党之所以伟大不同于其他政党，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能够纠正错误。生活有时也不那么公正，难道因为个人的得失就丧失对人生的信心？“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始终把党看成是慈母，虽然被从慈母身边拉开，但终究有一天慈母的手会摸到

我的头顶。挫折压力与屈辱不能动摇我热爱祖国的信念，也不能扼杀我革命的意志。”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我开始轻松振作了，排除不应有的心理障碍，下定决心热爱新的生活，大胆地拥抱新生活。我才三十几岁，还可以大干一场，如果是真正的英雄，那就到处都有用武之地于是我仍本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开始了历史上新的一页。

说起容易干起难“被俘”两个字象幽灵一样伴随着自己，政治压力如同千斤重。到农场初期确实压得我抬不起头来，常常为自己的政治处境无法抓好工作而苦恼。于是我把当时的处境看作组织上对我考验，变压力为动力，不断告诫自己政治上永远向前。我逐渐对农场工作和农业工作发生了感情，认识到，农场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在思想上自己承认自己永远是个共产党员，在行动上处处事事以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

1957年，农垦局选送我到农垦部干校学习。1958年，农垦局四个农场合并后，任命我为大农场场长，并报省委解决我的晋级和入党问题。尽管由于“左”的干扰，没有批准，但我仍一如既往努力工作，大家称我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1975年，我到了退休年龄，回到了山西老家，到我战斗过的运城安家。

运城是生我养我的地区，也是我参加革命的起点。1937年，我在这里参加了薄一波同志领导的军政训练班，在这里斗老西（阎锡山），打日本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现在又成了我的终点。我带上行政16级的75%的退休金，养活四个儿女，经济上负担沉重，由于经济困难，大儿子30岁才结婚。

1979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政治名誉和经济待遇恢复正常，退休也改为离休。生活在老同志中间，面对社会、家庭、身体等各方面因素所造成的精神上的创伤，我没有自悲自怨自暴自弃，不彷徨，不退缩。在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中，寻找自己的归宿和位置。我认识到晚年的幸福和价值在于无

私追求和奉献，只有不断增强革命责任感时间的紧迫感和生活的充实感，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晚年。我觉得唯一能够给我补偿的是抓住今天，通过今天的努力工作来弥补昨天的损失。

自1984年以来，我一直担任运城北城办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和市委巡视组长，并义务担任少先队校外辅导员。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启示离退休老同志并积极帮助解决其实际问题。自1983年以来，我们的支部八连贯评为先进支部。自己连续8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我三次出席省老干部先进代表会议，省委并将我们支部的事迹录为“火红的晚霞”，在全省播放。8年来，我荣获省地市发给我的荣誉证书25个，奖状35个。1991年12月，我被“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评选为“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并获荣誉证书。

我的亲人们常用爱护的口吻埋怨我说：“您不要命啦！”她们哪里知道我的内心呢！我是个战争幸存者，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幸存者，更是被俘归来后错误路线之下的幸存者。那么多战友、难友先我而去了！我无非是继承他们的遗志，去为他们所献身的党的理想——让人民幸福，盼祖国富强而尽自己最后一点心意罢了！

（吴成德 原志愿军六十军一八〇师政治部主任）

## 战俘营内的中朝战友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后期，一次激烈的战斗中，我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不幸被俘。

在美军集中营里，我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难忘的岁月。这是一个特殊的战场。在那里，我们同朝鲜人民军被俘的战友们一起经历了血与火的锤炼，彼此勉励，互相支援，并肩战斗，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斗友谊。

将近 40 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顽强斗志，他们的战友情谊，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脑际，历历如在眼前。

人民军战俘问“蒋介石好？毛泽东好？”

被俘不久，我就被一个曾在国民党军队当中尉的投敌份子出卖，暴露了干部身份。我经受了敌人的刑讯和毒打，但却承受不了被俘给我带来的精神创伤。在押运途中，我曾几次冒险逃跑，准备一死了之，但都被同行的难友们劝阻了。与我同日被俘的两位排长（金香云、董有才）带着责备的语气对我说：“你要死，容易。可你想到我们吗？我们怎么办……”是啊，我有责任跟大家在一起，不能只想到自己。就这样，我强忍着心灵和肉体上的创痛，踏进了

美军设在釜山的战俘营大门。

1951年1月中旬到釜山，我就因双脚严重冻伤，被关进了当地的战俘“医院”。我与自己的同胞、同行的难友们分离了，茫茫前路，亲人何处？孑然一身、孤掌难鸣，我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的心被痛苦咬啮得几乎要窒息了。

这里名为“医院”，其实与别的战俘营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草草搭起的帐篷，层层围起的铁丝网，同样是挨冻受饿，生死无度，这里的伤病战俘要比“健康”的战俘们更多一层苦难。“医院”里既无必要的医疗设施，又无急需的医药供应。少数几名美军医生不但不给战俘看病，有的还贪污战俘的生活用品，甚至在伤病战俘身上作“试验”，练“技术”，使一些本来可以康复的人也成了残废，或是不明不白地死亡。照顾伤病员的工作主要落在被俘的人民军医护人员身上，但他们都两手空空，无能为力。

当时，志愿军被俘的人员不多，军官更少，“医院”里住的多是人民军伤病战俘。我一到“医院”，就有一些人民军战俘三三两两来到我的帐篷看望。有的可能是出于好奇，看一下就走了。有的则见面就问：“蒋介石的好？毛泽东的好？”当我回答“毛泽东好！”的时候，他们就高高地翘起拇指，露出了微笑。每当这时，一股暖流就会从我的心头涌起，使我获得莫大的安慰。

住院的第二天晚上，来了一名衣着整齐的年轻人。他先用生硬的汉语问：“……毛泽东的好？”然后用英语夹着汉语悄悄对我说。有几位朝鲜同志知道我是军官，想跟我谈谈。我怀疑他这身打扮，心想，这里鱼龙混杂，我可不能上坏人的圈套。于是对他笑笑，未置可否。

接连几天，一到天黑（这时看管的美军都离开战俘营），这位年轻人就把我领到他住的伙房帐篷里去，问前方战况，问我被俘情况，还找来战俘医生替我洗伤口，换药。我向他谈了前方胜利的消息，他非常高兴。他说，他姓朴，大学生，是南朝鲜“义勇军”（人民军南进后组建的队伍）战俘，在学校里就是地下党员，

现在是“医院”的英语翻译。说有几位人民军战俘中的劳动党员很想跟我见面。因为他活动比较方便，所以先让他跟我联系一下。我经过几天观察，觉得他不像坏人。心想，如果他是好人，我就不能放过这个机会，要是坏人设的圈套，那就随机应变，反正我已暴露了身份。经过考虑，我答应跟他所说的那几位同志会面。

第二天晚上，我按约定时间到老朴的住处，同几位人民军被俘的同志见了面。其中一位姓金，会说流利的中国话。据他说，他曾参加过我东北民主联军，是劳动党员。另外几位也是党员，他们已经秘密组织起来了，希望通过我这个中国军官，把“医院”里的志愿军伤病员也逐步组织起来，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恳切的态度，使我消除了原来的怀疑，同他们愉快地交谈起来。我向他们讲了志愿军入朝必胜的信心和中朝人民的传统友谊，也表示了我与他们一起斗争的决心。谈着谈着，我们的心越来越贴近了，几双手久久地紧握在一起，激动不已。

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终于在异国他乡的战俘营里找到了同志。我们为正义的事业共同奋斗，正义的事业没有疆界！

那时候，“医院”里只有几十名零星散处的志愿军伤病员。我就负责做这些人的工作，经常利用夜间出去，到各帐篷看望他们，向他们传播胜利消息。鼓励他们不要忘记祖国，安慰他们好好养伤，帮助做一些简单的护理工作。朝鲜的战俘医生也常常同我一起去看望这些同志，精心地照顾他们。每当我们去看望他们时，他们就会像见到亲人一样，泪水盈眶，有的还扑到我的怀里，泣不成声地表示：决不给中国人丢脸，决不变心。看到这种情形，朝鲜同志也热泪盈眶。

几乎是每天晚上，老金他们和我都要在老朴的帐篷里会一次面，商量怎样把一些“好同志”组织起来；怎样孤立和打击“坏蛋”；怎样发动战俘身份的医生向美军要药品，要医疗器材，监视美军“医生”不让他们制造人为的“事故”（把战俘当试验品）。一天，老金兴奋地对我说，他们已同其它战俘营的同志有了联系，打

算春暖花开后，组织一部分伤病痊愈的同志，越狱到智异山去找游击队。对我来说，这不啻是一个福音。在当时情况下，也只有这一条出路了。我们都全力以赴地为此做了种种准备，或物色对象，或储存口粮，或与李伪军“拉关系”、摸情况，等待春天的到来。

### 与审讯员摆“龙门阵”

2月间，美军在“医院”里搭起了一个美第八军情报部（G-2）的审讯帐篷这是专门在战俘口中榨取情报的机关。对这类“审讯”，我已有了一些针锋相对和虚与委蛇的经验。所谓“审讯员”，都是20多岁的美籍华裔，会说普通话或广东话、上海话。审讯中，我就用上海话答对，同他们拉起了“老乡”关系。利用他们的无知和好奇心，趁机向他们谈了祖国解放以后的进步情况和对资本家、华侨的政策。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一次，我和他们争论“谁是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这一话题时，其中一个姓陈的“审讯员”带着一种近乎自豪的口气对我说：“不争了，你说美国侵略，我们将军说你们侵略，这个我们说不清。我只知道，1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受人家侵略的，现在你们能到朝鲜来打仗，就算是侵略吧。也说明中国比以前强大了……”他的话引起周围几个“审讯员”的共鸣，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台湾老头（蒋介石）的政府就是腐败……只有中国强大了，在国外的中国人才能抬起头来。”看得出来，这是一些民族自尊心尚未泯灭的华人。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老金他们，他们很高兴，建议我利用审讯的机会在那里设法搞一些地图、指北针之类的东西，有可能搞到武器就更好了。我答应试试看。经过几次试探，发现要完成这个任务很难，因为美第八军情报部（G-2）这些人毕竟是穿美国军装的士兵。老金他们劝慰我说：“这不要紧，能给他们上几堂‘政治课’就是很大的收获了。”于是，只要找我去审讯，我就跟那些“审讯员”们摆“龙门阵”，上“政治课”。当然，这只有在监督的美国军官出

帐篷时才行，美国军官一进来，他们就恢复到一本正经的模样。

正当我们积极为越狱做准备的时候，3月的一天，美第八军情报部（G—2）陈某偷偷告诉我：“听说朝鲜人要暴动，你可千万别参加进去，死了划不来。”我估计可能有人告密，立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老金他们。大家研究，决定暂时停止活动，作好被审被抓的准备，并注意查找告密者。不久，一些被怀疑参加活动的人民军伤病员陆续提前调出了“医院”。

很快，我也被传讯了。审讯的美国人气势汹汹地威胁我，要我承认参与了朝鲜同志准备“暴动”的活动。我矢口否认，要他们拿出证据来。他们拿不出，只能把我暴打一顿出气，同时通知我：“准备出院”。

当天晚上，我到伙房与老金、老朴等朝鲜战友最后一次会面。他们估计，我这次出院，很可能会进监狱，也可能送到“中国大队”去。同时还向我介绍了“中国大队”的情况，说那里有不少人是原国民党军官，“心都坏了”，嘱我小心。并希望我到那里后继续做工作，团结同志，尽快同人民军战俘的“军官大队”取得联系，好配合行动。我一一答应了，对他们充满了由衷的感激和依恋之情，也做了更坏的思想准备。

第二天，我拖着没有痊愈的双脚，被迫离开了“医院”。

被俘初期朝鲜同志对我的短暂接触和帮助，犹如黑暗中进出一簇火花，它虽不耀目，却照亮了我脚下的路，撒下了一颗颗小小的火种。越狱计划虽然流产了，但“医院”里不少伤病员大都成了以后对敌斗争的积极分子。其中一位叫王云山（李春明）的同志，更成了我后来斗争中最可靠的战友。

离开“医院”，我被押送到釜山的“战俘转运站”。这是一个临时战俘营，所有前方下来的新战俘都先要经过那里编号、登记卡片，然后分别送到不同的战俘营去关押。

办完登记手续，我正要回到住的帐篷里去，突然有人拉了一下我的胳膊，一看，原来是刚才给我填写卡片的朝鲜战俘。不等



我开口，他就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悄声问我：“从医院里来的？”我点点头。他不再说什么，只让我等在那里，匆匆握了一下我的手，走了。

不一会，他又领来了两位朝鲜战俘。他们先跟我一一握手，然后用英语介绍说，刚才那位姓崔，带眼镜的姓李，另一位姓朴。早在几天以前，他们就从出院的同志那里知道了“医院”里的一切，也知道了有我这么一个“中国大尉”。他们告诉我：在这里登记卡片的都是大学生，因为会英语，所以被留下来搞这个工作。他们几个都是劳动党员，利用比其他战俘活动方便的条件，曾掩护过一些干部。还随时了解前方的情况，经常对新来的被俘人员进行必要的鼓励和安慰，让大家振作精神，不忘祖国。发现表现较差的，就向他们提出警告，教育争取，把少数坏家伙孤立起来。他们说，这里是一道“关口”，做好这些工作，对今后的斗争有帮助。因为我会说一些英语，他们希望我能留下，跟他们一起工作。

我犹豫了很久，终于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做中国人的工作确有困难。

当时中国战俘逐渐增多，正需要会英语的中国人帮助登记卡片，我很顺利地留下了。

我很快就同转运站内“中国小队”的张鸿彬、王洪达两位同志接上了头，通过他们找一些新到的难友来谈话，鼓励他们不要忘记祖国。像在“医院”时一样，很多难友在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都淌下了眼泪。

同我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叫方向前的志愿军战俘，也是朝鲜同志留他在那里做填写卡片工作的。他虽不是党员，但思想进步，说话不多，还经常默默地帮我找人谈话，随时告诉我中国被俘人员中的思想情况。我十分感谢朝鲜同志为我们创造了这样的活动条件。

在帐篷后面有一小块空地，那里有几棵歪脖子树，树枝上挂了几个练拳击的沙袋。老崔、老李、老朴和我经常在这里碰头，一

边装作练习击拳，一边交谈有时候，方向前和别的朝鲜同志就站在远处替我们望风。

在一次碰头时，老崔他们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今日成将军号召战俘“自己解放自己”说志愿军参战后节节胜利，很快就会南下，要全体战俘趁敌人溃败混乱之际举行武装暴动，上山与游击队会合，迎接反攻大军并说，釜山的人民军战俘“军官大队”，已经指示各战俘营的地下组织要把一切工作都放到“自己解放自己”的准备上去。这使我意识到人民军被俘人员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整体，各个战俘营的活动并不是孤立和自发的行动。我钦佩他们的爱国精神和组织能力，对斗争更加充满了信心。

当时在釜山的人民军战俘约有 10 万人左右，组织起来确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如果战局发展顺利，一旦行动起来，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和老崔等朝鲜同志一样，大家都兴奋不已，更加小心翼翼地加紧进行教育和物色积极分子的工作，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同时，也更加希望了解战局的发展。

4 月末的一天，又来了一批新的中国战俘，我们照例向他们询问前方情况。其中有一个矮个子的家伙十分嚣张，叫嚷说他不是俘虏，是自己驾驶汽车“起义”过来，投降“联合国军”的。这把我们大家都气坏了我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并且警告他：再做坏事，要小心他的脑袋。那家伙顿时傻了眼，又看到周围朝鲜同志一个个怒不可遏、磨拳擦掌的样子，吓得连连求饶，灰溜溜地走了。

这个家伙，就是后来在战俘营里干尽坏事、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李大安。我们原以为把他教训一顿之后，他会老实一些可是，我们太大意了

第二天，我被一个美国军官叫去进行审讯，说李大安向他们告发，我是什么“共产党派来做宣传的间谍”，“要组织暴动”。我据理驳斥，他们就找李大安与我当面对质。我说李大安是诬陷，让

他们拿出证据来。美国军官恼羞成怒，示意李大安打我。在主子的指使下，李大安像一条疯狗似的扑了上来，狠狠地向我挥起了拳头……这就是这条走狗在战俘营里开始罪恶生涯的第一步，也是向他主子献媚的第一个见面礼。

审讯之后，我随即被命令离开转运站。在回帐篷收拾“行李”（破军毯、碗、筷）的时候，监押我的美军士兵留在帐篷外边等候。我趁机告诉老崔他们：李大安告密了，要他们小心！并怀着悲愤的心情对方向前说：“如果你能生还祖国而见不到我，就请你告诉首长和同志们，我不会对不起祖国，已经死在战俘营里了。”方向前泪流满面，只是点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周围的朝鲜同志也都忍不住淌下了眼泪，一个个前来同我拥抱告别。就在这个紧张的时刻，老李仍没有忘记告诉我：如果能到中国大队，要团结中国同志，和（朝鲜战俘）“军官大队”建立联系。我感激地点点头。

乌云低垂，春寒料峭，海风掠过带刺的铁丝网发出凄厉的啸声我跨出转运站的大门，回头望去，老崔他们仍久久地立在铁丝网里边，目送着我远去。

去监狱？去刑场？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想到的只是：我不能玷污自己的祖国，也不能辜负异国战友的信任和期望。

出乎意料，我被送到距离转运站约二公里的“中国大队”——志愿军战俘营。

当时，这里约有 1000 多名中国战俘。其中有一处用铁丝网单独隔离的小营场，关押着三四十名被俘的排以上干部，称作“军官小队”我就被送进这个“军官小队”里

一到这里，我就感到气氛不对。担任“大队长”、“小队长”的是王顺清、魏四喜之流，都是曾经混进我军、没有改造好的原国民党军官。他们污蔑祖国，叫嚣“反共”，狐假虎威，欺压同胞，开始形成一股反动势力，控制了整个“中国大队”。在这样的环境中要进行活动，显然十分困难，必须加倍小心。

刚到“军官小队”，我不说不动，默默观察。慢慢地，在我周围秘密聚集了董勤荣（化名刘光）、王云山等十几位同志。他们热爱祖国，痛恨敌人，都希望能有所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急切地希望与人民军“军官大队”取得联系，以期得到他们的支援。但我们同他们的营场相距很远，怎样才能联系上呢？

正在我十分焦虑的时候，我们十几个人中间的全成铉同志告诉我，他有办法了。老全是朝鲜族人，被俘前是四野某部的朝语翻译。他说，他曾到附近一个“战俘门诊部”去看过病，候诊时，从各战俘营前去看病的人都混杂在一起，他就曾同朝鲜“军官大队”来看病的同志有过接触。这确是建立联系的一个好办法。我与同志们商量，决定先派全成铉去“看病”，与朝鲜“军官大队”的同志挂上钩，约定日期，然后由我装病去“门诊部”与他们派去的代表正式联系。

老全很快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说，朝鲜“军官大队”的同志已经知道有个姓孙的“中国大尉”，他们也很想与我见面。我喜出望外。

5月中旬的一个上午，我和老全同时装病到了“门诊部”。候诊的有好几十人，东一堆，西一群，有的蹲在地上下跳棋，有的晒太阳，有的聊天。押送的美国兵都远远站在铁丝网外边。老全机警地在人群中转了一圈回来，指着不远处的一个人说：“他就是。”那人也转过头来望我。我俩缓缓地挪到了一起，同时蹲下来，在地上画了一个“跳棋盘”，装作下棋的模样。通过老全的翻译，悄悄交谈起来。

我俩相互介绍了自己。他姓卢，是朝鲜“军官大队”派来同我接头的代表。我简单谈了“中国大队”的情况和希望得到支援的意愿，他也扼要介绍了人民军被俘人员的概况。说大多数朝鲜战俘营内的领导权已控制在自己人手里，并有了党的秘密组织，“军官大队”的党组织已成了各个战俘营的领导中心。当前的任务是“响应金首相号召，自己解放自己”，积极进行武装暴动的准备

工作。根据前方战局胜利的情况，估计大军很快就会南下，“可能6月份就可以行动”（事后看来，当时对战局估计是过份乐观了）。他还告诉：他们已搞到了地图、指北针和少量武器，并与智异山游击队有了联系。希望中国同志作好一切准备，一旦行动起来，就积极配合。有行动，首先从“军官大队”开始，各战俘营都听从“军官大队”的指挥。

我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回来，把这次会晤情况告诉了刘光、王云山等同志，大家都异常激动。在此之前我虽然也听到过“准备暴动”的消息，但都不如这次这么具体，这么迫在眉睫。尤其是与“军官大队”联系的成功，更使我们有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使我们感到，在我们身旁，有数万名朝鲜战友做我们的后盾，我们绝不是孤立的。

为了迎接这个梦寐以求的时刻，我们仔细观察了周围岗哨的分布、哨兵的活动规律和地形地物。并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做了使用武器的分工，同时积极研究与“战士队”联系的办法。我坚定地相信，虽然当时骨干的人数并不多，但绝大多数难友内心里是热爱祖国的，决不会甘心任人宰割。一旦大军胜利南下，朝鲜同志揭竿而起，只要有少数人拼死带头，振臂一呼，就会立即汇集起一支能够战斗的队伍。

这时，张福庆（原六十四军某部营长）等同志也先后到达“军官小队”，参与了我们的活动。我们继续物色对象，扩大骨干队伍。

正当我们紧张活动的时候，一个名叫谭××，自称是新四军老干部、老党员的人，主动来接近我，要求我们“不要抛弃他”。并说他听说朝鲜人可能举行暴动，他“宁死也不放弃这个机会”，希望我们到时候“不要把他忘了”。尽管他伪装逼真，手段狡猾，但由于我们有所警惕，没有中他的诡计，最后终于暴露了他丑恶的叛徒面目。通过谭××的表演，我们警觉到敌人可能已经嗅到了什么气味，马上把这一情况向朝鲜同志作了通报。他们也通

我们，他们那里也有几名被俘人员爬出铁丝网找美军去了，要我们提高警惕。

6月初的一天，我突然被叫出去进行审讯。说有人报告我们要暴动，胡说什么“刘光他们已经招供”，要我承认，否则就“军法处置”。我完全相信我的战友们，知道这是拙劣的圈套。我一口咬定没有此事，并要他们找刘光等人来对质。他们作贼心虚，又拿不出证据，只得把我放回“军官小队”。

不几天，釜山的所有中朝战俘（除伤病员），全部被迁移到了釜山南边的一个荒岛——巨济岛。

“劳先生”真名叫朴相显

迁到巨济岛后，全体志愿军战俘和人民军战俘中的“军官大队”被送到了编号为“72”的战俘营（即以后臭名昭著的“72联队”）。我们“军官小队”被编为该“联队”的“四大队”，仍与“战士队”隔离，单独关押。

利用岛上美军对战俘营内情况还不清楚的机会，通过合法斗争手段，我与张福庆同志分别担任了“四大队”的正、副“队长”。把原“队长”魏四喜一伙反动份子赶下了台，从“文书”、“班长”到勤杂人员全都换成了我们的人。随后，又秘密组织釜山时期的骨干，建立了党支部。

虽然我们掌握了“四大队”内部的领导权，但“72联队”的领导权仍掌握在王顺清之流的败类手中，我们（四大队）是孤岛（巨济岛）中的“孤岛”。魏四喜等家伙继续与“四大队”外面的敌特份子互相呼应，暗中破坏，制造谣言，威胁恫吓，企图瓦解难友们的斗志。后来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纠集一批败类暗中成立了一个国民党的“六三支部”，与我们唱对台戏。斗争紧张复杂，形势十分严峻。

要改变我们这种孤军作战的处境，与朝鲜战友协调行动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必须重新建立与人民军“军官大队”的联系。我

利用“大队长”的身份出入“四大队”比较方便的条件，通过全成铉、张季龙两位朝鲜族同志协助，秘密进入对门的朝鲜“军官大队”。由釜山时期认识的老卢引见，会晤了他们党组织的领导人辛泰凤同志。老辛是日寇投降后，从苏联中亚地区回到朝鲜的。曾在南日领导的教育局里工作过，职务较高。他老练、稳重、知识丰富。在相互通报了情况和分析了当前形势之后，老辛告诉我，他们认为迁到岛上之后，武装越狱暂已不可能。今后的斗争任务是同敌人针锋相对地进行政治斗争，反对政治迫害，揭露敌人暴行。团结教育战俘，保持革命气节，扩大进步力量，孤立反动份子。同时，也不排除在大军胜利南下时自己解放自己。我们商定，在今后斗争中要进一步加强联系，配合行动。在交谈中我察觉到，在他们“军官大队”的组织之上，似乎还有更高一级的领导，但我不便多问。

我向支部的同志汇报了这次会晤的经过，大家觉得今后的斗争目标更加明确了，信心也更加坚定。

6月中旬，五次战役的志愿军被俘人员大批到达巨济岛战俘营，其中有不少曾在国民党军队服过役的官兵，成份比较复杂。我们支部加紧活动，很快就与新来的赵佐端同志（原五三八团政委）接上了头，在他指导下，商量了下一步斗争的具体任务和策略。与此同时，魏四喜一伙也在暗中加强了活动，网罗败类。

一天早晨，美军借故向我们对门的朝鲜“军官大队”开枪射击，造成伤亡。朝鲜“军官大队”立即宣布全体绝食，抗议美军暴行。他们手挽着手，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齐声高喊革命口号，斗志昂扬，动人心魄。战俘管理当局调来大批美、伪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72联队”营场，剑拔弩张。我们支部紧急研究，决定“四大队”也全体绝食，声援朝鲜战友。我以“大队长”身份宣布绝食的决定后，多数难友积极响应。有的向朝鲜同志挥帽、鼓掌致意，有的高喊“不要吃饭，不要丢中国人的脸！”也有少数人在坏人的煽动下吵嚷着要

吃饭，企图出去抬门口的饭菜桶，被我们坚决制止了。我们的行动赢得了朝鲜战友的一片欢呼，歌声、口号声更加激越昂扬，震慑了少数败类。就在这时，魏四喜等人偷偷溜出“四大队”向美军告密，美军当局立即把我和赵佐端、张福庆、刘光等七个人扣押起来，送进了监狱。

这是中、朝被俘同志第一次公开的配合行动。其后不久，朝鲜“军官大队”就被迁离了“72联队”。

也许是因为准备不足的缘故，我们所进的“监狱”，其实只是远离其他营场、用铁丝网临时围起来的一个小营场。里面有两个帐篷，一个关我们7人，一个关人民军的十几名战俘。铁丝网外边由美、伪军监视，不准两个帐篷的人来往。

我们被扣的7个人中，有6个是党员。我们建立了临时党小组，总结了前期斗争的经验教训，筹划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同时，与前来审讯的美国人进行了面对面的舌战，揭露他们虐待战俘，纵容国民党特务胁迫战俘背叛祖国的罪行。这时，我们为被隔离监禁而焦急不安。

7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帐篷外放风时，无意中遇到了人民军“军官大队”的老卢，原来他就住在隔壁的帐篷里。他瞅瞅周围动静，把我拉到背人的角落里用不纯熟的汉语轻声对我说，这里有一位“大大的领导”。约我们第二天到他们帐篷里去会面。

第二天下午，我和赵佐端悄悄地进了他们的帐篷。在帐篷中间用土堆起的“炕”中央，盘腿坐着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人。看起来个子不高，身体不胖，脸色有些苍白，但两眼却炯炯有神。在他身边，还围坐着10来位朝鲜同志。见我和老赵进去，他们都站起来表示欢迎。其中一位操着流利汉语的同志自我介绍说，他叫郑耿介，曾在中国太行山打过游击。随即又指着那位目光炯炯的中年人介绍说：“他是‘劳先生’，是战俘营里劳动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

我们和“劳先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互相热情问候。然后



由老郑翻译，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两国两党和人民是最亲密的同志和战友。你们辛苦了！”“劳先生”握着我们的手诚挚地说。然后，他和我一起坐下，侃侃地谈了起来。他从当前国际形势，谈到朝鲜战局，然后又谈到战俘营的斗争。他指出，敌人正在耍阴谋，企图胁迫战俘背叛祖国，不单是为了搜罗炮灰，更主要是为了想在政治上打击我们的党和祖国。现在敌我双方已经开始停战谈判，遣返战俘的问题也已列入议程，但是敌人迫害战俘的阴谋绝不会轻易罢手。我们在战俘营斗争的最终目标，是在时机成熟时自己解放自己，但目前条件并不具备，不能冒险行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同敌人进行政治上的斗争，用各种方式，向全世界揭露美帝虐待、杀害战俘的残暴行径和进行各种政治迫害、企图强迫扣留战俘的政治阴谋。要争取和团结更多被俘的同志参加斗争，把战俘营内的领导权掌握过来，在战俘营开辟一个“第二战场”，在政治上狠狠打击敌人……

我们向他介绍了中国战俘营的情况。并向他表示，要向人民军战友学习，愿意在他的统一领导下，共同开展斗争。他听了赶忙说：“不，不，中国共产党、志愿军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今后我们要加强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持……”

事后经郑耿介同志介绍，我们才知道，“劳先生”是个代号（劳动党之意），他的真名叫朴相显，是从苏联乌兹别克回到朝鲜来的，曾任劳动党黄海北道的委员长（相当于我们的省委书记）。现在是“朝鲜劳动党战俘营党员总指导委员会”（代号“21Tent”，即21帐篷之意）的委员长，也就是人民军战俘营内劳动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至于他是怎么进战俘营的，老郑只是笑而不答，我们也不便多问，只觉得有点“神秘”。

这次会晤，使我和老赵都很兴奋。我们很钦佩“劳先生”的气度和见解，并从他的谈话中得到了启示。这也是我们同“21Tent”（以后我们习惯地称之为“地下党”）建立组织联系的开

端。

### 秘密通道

1951年7月底（或8月初），我和赵佐端等7人从“监狱”被押回“72联队”。这时，“72联队”已完全被反动份子严密控制，公开亮出了国民党旗号。在美蒋特务的策划下，使用各种卑劣手段胁迫战俘“反共”、“去台湾”，在肉体上、精神上、政治上残暴地迫害被俘人员。白色恐怖弥漫，成了阴森可怖的人间地狱。他们还把这一套法西斯手段逐步“推广”到新成立的志愿军战俘营——“86联队”，企图用暴力控制所有的中国战俘。

与人民军被俘人员相比，志愿军被俘人员所处的境遇要险恶得多。人民军被俘人员内部成份比较单纯，而且多是成批被俘，一开始就便于组织，大多数战俘营组成了能够同敌人进行公开斗争的战斗集体。而我们的被俘人员中，混有不少未被改造好的原国民党军官和兵痞。初期多是零星被俘，一开始就被那些败类们掌握了战俘营，很难把爱国力量组织起来。尽管客观条件不同，但朝鲜同志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即使在战俘营内，也有一个“夺取政权”的问题。只有掌握了战俘营内部的领导权，才能把绝大多数被俘人员集结到爱国斗争的旗帜下。

为了夺取战俘营内部的领导权，1951年10月，被囚在“72”、“86”两个联队的部分党团员和爱国的干部、战士，分别组织发起了“反迫害、争自由”（反对去台湾、坚持回祖国与政治信仰自由）的“签名运动”和“夺旗斗争”（反对悬挂台湾“国旗”）。由于美蒋特务的阴谋破坏，“夺权”未成。11月份，200多名斗争骨干先后被送到了“71联队”，单独关押。在那里，我们利用自己“掌权”的条件，组织了党团支部，高举爱国大旗，集体开展了一系列反对迫害、坚持回国的公开斗争。“71联队”的人数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它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敌人惊呼为“死硬的共产党份子”，而难友们则把它称之为“红色根据地”和“小延安”，

心向往之。

“71 联队”内设了几个小营场，除关押我们这批中国战俘之外，还在其它营场关押了一批在斗争中被敌人清查出来的朝鲜难友。我们刚到“71 联队”不久，朝鲜同志就利用送饭的机会（伙房设在他们营场里），给我们送来了大量的慰问信。热情鼓励和称赞了中国同志的斗争精神，还挤出他们有限的口粮，增添到我们的份额中来。每当见到中国同志的时候，他们就伸出拇指，用生硬的中国话招呼：“毛泽东，好！”“中国，好！”他们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使我们每个人都深受感动，更加激励了大家的斗争意志。

一天中午，从伙房抬饭回来的同志捎来朝鲜同志的口信请我们一位负责人到伙房去会见一位他们的领导同志。党支部研究后，指派我在当天傍晚装作“抬饭”到了伙房。在昏暗的灯光下，早在等候的朝鲜同志兴奋地冲着我喊了一声：“孙同志！”。我仔细看去，原来是“监狱”里替“劳先生”当过汉语翻译的老郑。我们又一次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原来，他是受“劳先生”的委托，以“地下党”总委成员的身份前来同我们进行联系的，随身还带来了总委给我们的文件和慰问信。在送来的文件中，我们第一次比较系统地知道了前方军事形势和板门店谈判情况，了解了“地下党”对当前斗争的主要意图：坚决揭露美帝所谓“自愿遣返”（即强迫扣留战俘）的政治阴谋，配合板门店我方谈判代表的正义斗争。这与我们的斗争意图完全一致。两支斗争的洪流，终于汇合到一起来了。

在这次会面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劳先生”请老郑给我们送来了一只崭新的瑞士手表。这在战俘营中可称得上是一件十分珍贵的礼物了。有了这个计时工具，给我们的生活、学习和斗争都带来了很大方便。小小的一只手表，寄托着朝鲜战友多么细腻而诚挚的兄弟情谊啊！

从这以后，我们这个“小延安”与朝鲜同志的“地下党”总委之间，经过一条秘密通道，开始建立了正常的组织联系。这条

“通道”的枢纽是岛上的战俘“医院”（那里有“地下党”安排的人民军战俘医护人员当联络员），双方派人装病住院，通过“医院”交换文件。值得一提的是那些装病住院、担任联络任务的同志（“71联队”派出去的联系人员，起初是朝鲜战友。以后由我们的李喜尔、南阳珍等同志担任），为了“造”出病来，他们有的用辣椒揉烂眼睛，有的喝酱油呛进肺部，有的自己制造外伤，把秘密文件塞进皮鞋后跟、内衣缝、绷带夹层中携带出去。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忍受肉体痛苦，一次又一次勇敢机智地完成了任务。有了这个秘密通道，我们得以经常从朝鲜同志那里获得前方战局和板门店谈判情况，经常互通情报，协调步伐，形成一条行动一致的联合战线。

关押在“71联队”的朝鲜战友是我们的比邻，我们相互之间更是直接配合，亲密无间。美军为了破坏我们同朝鲜战友之间的关系，一度把数千名混在战俘中的南朝鲜反动份子迁到“71联队”内，镇压这里的朝鲜战友，并不断向我们挑衅。在一次反动份子组织的“反共示威”中，我们的同志怒不可遏，用石头袭击了他们，把他们打得狼狈不堪，从此再不敢进行挑衅。这一行动，有力地支援了“71联队”内的朝鲜战友，也使我们恢复了与“地下党”总委的联系。而当我们需要支援时，“71联队”的朝鲜战友也伸出了友谊之手。我们计划绝食，他们立即为我们准备应急的口粮；我们示威游行，他们也起来响应；我们要同“地下党”总委联系，他们为我们开辟通道……充分体现了中朝被俘人员之间的战斗友谊。

在“四八甄别”我们离开“71联队”的时候，我们向“71联队”的朝鲜战友赠送了一面自制的朝鲜人民共和国国旗。这面象征中朝被俘人员战友情谊的旗帜，后来就升挂在毗邻我们“602联队”（志愿军“回国支队”）的人民军战俘营——“604联队”，与我们升起的五星红旗交相辉映，傲然飘扬在巨济岛的上空。

## 中朝战友与美国人谈判

1952年初，我们获悉，停战谈判只剩下最后一项议程——遣返战俘。由于美方捏造“战俘不愿回到共产党统治下去生活”的弥天大谎，坚持所谓“自愿遣返”的荒谬立场，使板门店谈判陷于僵局。战俘遣返成了举世瞩目、阻碍停战的突出问题。

为了给“自愿遣返”提供“根据”，美方不仅假手战俘营内特务加紧胁迫战俘“刺字”、“写血书”，制造“拒绝遣返”假象，蒙蔽世界舆论。而且公然指使战俘管理当局变本加厉虐杀坚持遣返的中朝战俘。仅1至4月份，就杀伤战俘400余名，妄图迫使战俘就范。4月份，美方又精心策划，通过使用暴力和欺骗手段，在惨绝人寰的恐怖气氛中对战俘进行“甄别”（即所谓“区别”愿意或拒绝遣返的战俘）。连美国合众社的记者也不得不承认，“关押战俘的巨济岛变成了一个恐怖之岛”。

面对这种野蛮践踏人权强奸战俘意志的一系列暴行，中朝被俘人员忍无可忍，决定针锋相对，加强斗争，扩大影响，向全世界揭露战俘问题的事实真相。

4月8日，美方对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了血腥“甄别”（即“四八甄别”）。5000多名热爱祖国的志愿军被俘人员冒死冲出“72”“82”特务份子的魔掌，与来自“70”、“71”和其它战俘营的中国难友汇合。敌人把我们集中关押到“602联队”。在“71”党支部的基础上，吸收各战俘营的爱国组织成员，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性质的“共产主义团结会”，迅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活动。5月2日，“602联队”全体战俘宣布绝食，抗议非法“甄别”，要求惩办凶手与派战俘代表去板门店陈述战俘营真实情况。

在此之前，我们接到朝鲜“地下党”总委来信，除通报当前斗争部署外，还提到他们将要搞一次“重大行动”，要求我们配合。希望我们在与管理当局谈判时，一定要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亲自出面，并把谈判经过通报给他们。

5月3日下午，在我们的坚持下，杜德准将亲自来到“602联队”大门口，与我们代表隔着铁丝网进行谈判。最后他不得不答应替我们转交致板门店谈判代表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函件，以及继续寻找死难烈士遗骸等要求。当时我是由“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指定的代表，张泽石同志任翻译。我们看到，在谈判时，杜德漫不经心，最后还显出一付唯有他“出马”才能“解决问题”的自得神情。在他周围担任警卫的士兵们中松松垮垮，毫无戒备。

我们迅速将同杜德谈判的经过情况，通报给了朝鲜“地下党”总委。

5月7日，杜德到人民军战俘营的“76联队”门口，以同我们谈判的方式与人民军战俘进行谈判，被人民军战俘出其不意抓进了“76联队”营场，当了“俘虏的俘虏”，被迫同意与朝中战俘就有关强迫扣留战俘等问题进行谈判。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

杜德被扣后，美方同意我“602联队”中国战俘营派代表参加谈判。“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决定派我和张泽石（通晓英语）、傅稚衡（即黎子颖，精通文墨）、柳一（朝语翻译）4人，代表志愿军被俘人员前去“76联队”参加与杜德的谈判斗争。当天晚上，“劳先生”与我们见了面，互致问候和祝贺后，他把我单独留下，领到一个地下室，参加了他们正在召开的总委会议。担任翻译的仍是老郑同志。

由于“地下党”总委成员平时分散在各战俘营，这次才得以以战俘代表的身份进入“76”营地全部会齐。“劳先生”与部分总委成员平时就关押在“76联队”，扣留杜德的行动，就是以他为主，精心策划组织成功的。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召开这一次全体会议。统一认识，制定下一步行动计划。由于有我参加，“劳先生”礼貌地把这次会议称之为“有中国（党员）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议进行中，“劳先生”利用中间休息接见我及同行的中国同

志，扼要地向我们介绍了这次行动的筹划经过和目的，并郑重地对我说：“感谢中国同志的密切配合，使我们顺利地抓住了杜德……”我这才明白，他们要我们详细通报同杜德谈判的经过，就是为了组织这次“重大事件”。我向朝鲜战友表示祝贺，并代表全体志愿军被俘同志表示向他们学习。“劳先生”谦虚地说：“不，这是我们的共同胜利。中国同志的斗争艰苦，我们要向中国同志学习。”

当时会上讨论的主要是三个问题：一是与杜德谈判的具体内容（条件）；二是在什么情况下释放杜德；三是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对策。大家一致同意“劳先生”的方案，向杜德提出的条件（大意）是：一、停止虐杀战俘；二、停止为“自愿遣返”所做的一切；三、成立“朝中战俘代表团”，承认其合法性和保证其经常活动。对释放杜德的时机，必须在杜德承诺了这些条件之后。争论的问题是，万一敌人使用武力“营救”，该如何处置杜德？有的认为，也用武力对抗，必要时处决杜德，事后可推说是在混乱中被敌方打死的。有的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是“冒险主义”。争论中，“劳先生”似成竹在胸但不置可否。他示意老郑，要我表示意见。我发言的大意是：同意谈判的三项条件，但建议：可否加上“甄别非法”这一条。因为“甄别”是美帝制造“自愿遣返”的重要根据，应该突出一下。关于动武时对杜德的处置，我同意保护杜德的安全，千方百计把他隐蔽起来，或趁乱转移到附近战俘营去（他们同李伪军有“关系”，过去也有人钻过铁丝网）。只要杜德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有主动权！同时说了西安事变的历史，说明活老蒋比死老蒋有用。最后，还说了我们党对敌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在我发言时，“劳先生”一直微笑、点头。我说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甄别非法”这一条已包含在原来提出的三条中了，不必重复。最后，“劳先生”总结发言，同意我的意见，决定把“甄别非法”单列一条。并说：“老孙同志对在动武时如何处置杜德的意见是正确的。”

会议结束后，“劳先生”把我拉到他身边，对着大家让老郑把他的话翻译给我说：“孙同志虽然是个年轻大队长（指营职干部），可比我们的大队长有水平多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干部，中国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我脸红了。我想，我说的这些，不过是在部队里听首长们说起过的一些话罢了。如果我们总委的同志们——赵佐端、魏林、杜岗、顾则圣、马兴旺……这些同志在这里，一定会比我说得透彻得多。但是，从这几句话里，我也体会到朝鲜同志对我们党和领袖那种由衷的景仰之情。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共党员而自豪。

在“朝中战俘代表团”成立大会上，我被选为副团长（团长是朝鲜同志李学九，原师参谋长）。我想，这也不是意味着我有什么“水平”，而是出于朝鲜战友对我们志愿军被俘同志不屈斗争的尊重。

在这三天里，中朝被俘人员代表同杜德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白天开代表会控诉揭露，晚上开总委会及时研究。当东京美军总部任命柯尔逊准将接替杜德职务之后，总委又指示代表团，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对策。对内（杜德）对外（柯尔逊）同时进行谈判，并利用杜德与柯尔逊在西点军校的同窗之谊和杜德妻子恳求柯尔逊“营救”她丈夫的迫切心情，采用“攻心战术”。对杜德晓之以个人利害，动之以儿女之情。经过会上会下、对内对外紧张频繁的谈判和“攻心”，在铁证如山的事实和同仇敌忾的气概面前，战俘营内外两个“总管”将军终于被迫在“四项要求”的协议书上签了字。保证不再虐杀战俘，不再进行“甄别”，不搞“自愿遣返”，承认朝中战俘代表团的合法性。

5月10日，杜德被释放。

这是中朝被俘同志联合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它震动了全世界，彻底揭露了美军迫害战俘、阻挠停战的野蛮罪行和险恶用心。美军受到了世界舆论的同声谴责，搞得白宫和五角大楼惊惶失措，一片混乱。在板门店会谈中，我方代表据此向敌方提出义正词严



的质问，驳得敌方代表张口结舌，丑态百出。

杜德刚刚获释，华盛顿的“人权卫士”们就迫不及待地重新举起“文明”的屠刀，对中朝被俘人员进行了“人道主义”的报复。一个更为凶残的刽子手——波特纳准将，被任命为战俘营的“总管”。

波特纳一上任，就立即撕毁协议，背弃诺言，把参加杜德事件谈判的中朝战俘代表全部扣押在“76联队”，不准返回各自的战俘营。同时杀气腾腾地叫嚣：美军有权对战俘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持”战俘营的“秩序”。

为了镇压各战俘营对“76”的声援，他们不时断粮断水，动不动就投掷毒气弹，甚至把坦克开进“602”战俘营，用火焰喷射器烧毁那里的大幅标语。从5月中旬到6月上旬，又有上百名战俘被美军士兵开枪杀伤。

接着，波特纳又命令所有战俘营都必须迁移，把原来几千个人一处的大营场，分割为几百个人的小营场，企图分散战俘的斗争力量。并公然威胁说，如不迁移，就要动用武力。

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形势越来越严峻。

设在“76联队”的“地下党”总委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我也参加了会议，商议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敌人完全有可能进行武力报复，而且很可能会拿“76”开刀。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进一步暴露他们的残暴本质，显示我们热爱祖国的坚定信念，有必要在“76”组织自卫行动，进行武装抗暴，即使酿成流血事件，也在所不惜。但为避免敌人制造大规模屠杀战俘的口实，必须防止盲动，在达到预期目的后，就适可而止。

“76”全体朝鲜战友热烈响应“地下党”总委号召，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了突击队，准备了自卫武器（防毒口罩，汽油瓶，用汽油桶上割下的铁皮绑在帐篷杆子上制成“长矛”），并在各个帐篷内挖下了避弹的壕堑。我们四名被扣留在“76”的志愿军战俘代表，也积极投入了这一行动。

6月10日清晨。东方刚刚发白，数十辆坦克、装甲车，数千名士兵，团团包围了“76”号营场。波特纳全副武装，亲自临阵，指挥督战。隆隆作响的坦克、装甲车一齐把炮口指向营内，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的士兵个个刺刀出鞘，面向营场，准备冲击。

“76”营场内的同志们也紧急行动起来，按照事先部署，作好一切应战准备。

8时正。“砰——！”一声凄厉的枪声，划破了长空的寂静。霎时，大门正面和两侧的坦克、装甲车猛然起动，压垮铁丝网，冲入营场。步兵群也以战斗队形紧跟其后，蜂涌而入。火焰喷射器烧着了帐篷，机、步枪疯狂扫射，手榴弹、毒气弹四处投掷。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黄绿色的毒气弥漫了整个“76”营场。

“满赛(万岁)!”“满赛(万岁)!”一批批人民军的突击队员手持长矛，高声呐喊着冲出了壕堑。他们奋不顾身地迎上前去，用长矛同敌人拼刺，把燃烧瓶投向坦克、装甲车，用血肉之躯，阻挡敌人前进。在那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同时响起了雄壮的人民军军歌和《国际歌》声。“前进！人民军队勇敢的战士们……”“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歌声伴随着密集的枪炮声，从“76”营场上空直冲云霄。

整个“76”营场烈火熊熊，浓烟冲天，许多帐篷被烧毁了，几辆坦克被击中起火，在人群中打转。奋勇拼搏的突击队员和从燃烧的帐篷中冲出来的难友们，一个接一个倒在鲜红的血泊之中，鲜血汨汨流淌，渗入了生养他们的祖国土地。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搏斗。

这是一场人类为了争取生存权利而同吃人野兽所进行的搏斗。

朝鲜人民经历的苦难太多、太重了！他们再也容忍不了侵略者的蹂躏，他们正在为民族的解放、祖国的尊严和自身的权利而进行着一场殊死的、力量悬殊的战斗。

被朝鲜同志拼命拉进掩蔽壕内的我、张泽石和黎子颖，再也

忍受不住了。我们准备冲出壕去，与朝鲜战友们一起战斗。可是，负责保护我们的朝鲜战友紧紧地拉住了我们，关切地恳求我们说：“我们有命令，要保护好你们几位中国同志。你们万一出事，我们可不好交待啊！”

许久许久，枪声和呐喊声渐渐停息下来。我们被搜索的美军士兵从掩蔽壕里拖出来，押到营场中央的广场上，同被搜索出来的朝鲜同志集中到了一起。

这时，整个“76”营地几乎已经成了一片焦土。大多数帐篷已经倒塌，有的还在燃烧，有的已成了灰烬。满地都是弹壳、弹皮和散乱的杂物；牺牲的战友东一个西一个地倒在地上，到处都渗透着红褐色的血迹。浓烈的硝烟味、毒气味、汽油味刺人鼻孔……

几辆美军坦克在燃烧。一些佩带红十字臂章的卫生兵正在忙乱地抬走受伤的美军士兵。

据美方事后公布，在这场屠杀与反屠杀的斗争中，被俘人员死伤 150 多名。这显然是谎言，是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按照朝鲜战友事后调查，死伤人员在 500 人以上。但是，参与暴行的美军，也付出了代价。

这一天，曾在“76”营地的朝中战俘代表团所有代表都被送进了设在巨济岛的美军“最高监狱”。我和张泽石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志愿军战俘营，被关押在巨济岛上，直至遣返回来。

“76”营地的血迹未干，10月下旬，我们在巨济岛上又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10月1日，迁往济州岛的原“602联队”志愿军被俘人员，又一次遭到了敌人的残酷屠杀，那里的难友们又进行了一场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流血斗争。10月1日清晨，志愿军所在的战俘营为了庆祝祖国国庆，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敌人调来十几辆坦克与上千名步兵，强迫难友们降旗，被严词拒绝。早有预谋的敌人又一次兽性大发，用密集火力向战俘营疯狂射击，并冲进战俘营企图夺旗赤手空拳的我志愿军被俘

战友立即用石头和其他自卫工具奋勇还击，并在火力下抢回了国旗。他们用鲜血和生命维护了祖国的尊严，回答了敌人的凶恶和残暴。在这场斗争中，有 56 位战友壮烈牺牲，109 人光荣负伤。又是一笔血债！

巨济岛——济州岛，中朝两国被俘的战友虽然被迫分离了，但依然是配合默契，心连着心。为了世界和平，为了祖国尊严，为了争取返回各自祖国的权利，血染黄沙，共同谱写了壮烈的历史诗篇。

### 革命的小“家庭”

6月10日美军血洗“76”营地的当天，朝中战俘代表团的所有代表都被投进了设在巨济岛的美军“最高监狱”。

这是一所“正规”的美式监狱。石砌的高墙，密布的电网，暗无天日、阴冷潮湿的牢房，不分昼夜严密监视的狱卒。“不准说话、不准躺下、不准……”每人一条破旧薄军毯，每天两个半碗带皮的大麦饭和没有咸味的“酱油汤”。我们这些战俘代表的“特殊待遇”，是关进单人牢房。这种牢房大小不到二平方米（一张单人床的面积），头顶是铁丝网，空荡荡没有生活用具，夜间只能用鞋子当枕头席地而睡。我们成了美军心目中的“要犯”。

这里监禁的除了我和张泽石、黎子颖、柳一共 4 名中国“囚犯”（黎、柳两人在一个月后“释放”回原战俘营，此后只有我和泽石两人），其余都是朝鲜同志。尽管每个人都受到了非人的折磨，被殴打，被高压水枪冲射，甚至被刑讯，但没有一个人“悔过”，没有一个人消沉。难友之间，特别是中朝难友之间，依然洋溢着兄弟般的同志感情。放风时，我们虽然不准交谈，但见面时的一次点头，一个手势，都会引起彼此间会心的微笑。我们经常偷偷地伸出自己的拇指，握紧自己的双拳，互相示意，表达团结斗争的决心。7月1日，我们 4 名中国同志绝食一天，抗议美军非法监禁，纪念党的生日。第二天复食时，我们发现自己的碗底里都埋

着一团小小的肉丸——这是监狱伙房里做杂工的朝鲜战友偷偷地塞进去的。看着这小小肉丸，一股热流涌上了我的心头。这里包含着多少无言的安慰、鼓励和同志之爱啊！这种友爱感情，是任何人也无法加以损害的。

但是，却有人试图破坏这种感情。

一天，一个矮矮胖胖、缀着一颗白色星徽的美国军官，突然出现在我的牢房门口。他装出一副“和善”的面孔，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向我招呼说：“你好，孙。我是你们的长官，波特纳。”什么“长官”？刽子手！我没有吱声。

以下是他同我的一段对话：

波：我在中国住了很久，我对中国人是有感情的。中国是一个大国，朝鲜是小国。朝鲜人是什么东西？你们跟他们合作，搞在一起，太不值得了。

孙：（忍不住）中朝两国人民从来就友好相处，我们一起打过日本人，一起得到解放，一起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是同志，是战友。国家小，难道就应该受人欺侮吗？

波：（开始恼怒）哼，你们扣留杜德将军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是犯罪。你们要受军法审判，是死是活还不一定呢！

孙：正是为了维护《日内瓦公约》给我们的权利，我们才不得不同杜德将军谈判。我们没有损害他一根毫毛，应该受审判的不是我们。为了正义的事业，我们愿意坐一辈子牢，直到死。

波：住嘴！你们就跟朝鲜人一道去死吧！

愤怒使他失去了“将军风度”。像一名没教养的大兵那样，粗鲁地骂了一句“God demn”（混帐东西），狠狠瞪了我几眼，忿忿然走了。我几乎有点可怜起这位美国将军来，竟会用这种小学生不如的伎俩，来离间中朝人民的关系。

9月中旬，我、泽石和十几名朝鲜战俘代表被“释放”出狱，随即又送进了巨济岛的“战犯”集中营。我们居然成了“战犯”，真是岂有此理！

“战犯”营里有好几个小营场，我们出狱的十几人被关在单独设置的一个小营场里。其中辛泰凤、金泰勋、李学九等都是人民军战俘中的主要领导同志，有的还是“地下党”总委的主要成员。我们虽深知处境险恶，但不能无所事事。我们面前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中朝两党党员混合组成的“特别支部”。我和泽石被吸收为劳动党党员，参加支部生活。辛泰凤为支部书记，我被选为副书记。

在支部会上分析了当前形势，决定：一、积极寻找“劳先生”，与其他战俘营建立联系。继续以代表团名义抗议美军虐杀战俘、撕毁协议，抗议把我们当作“战犯”，要求返回各自的战俘营。二、支部内部必须健全组织生活，加强团结，努力学习，增强斗志。同时，要承担起对“战犯”营内其他几个营场的领导。

尽管我们已意识到自己成了人质，生死难卜，但在这小小的革命集体内，照样充满了乐观、和谐的气氛。我们互相教学俄语、英语、汉语和朝鲜语。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张泽石充当英语老师，从苏联回来的辛泰凤教授俄语，每个人既是“教师”，又是“学生”。没有纸笔，就用水泥袋纸和烟盒纸订成“练习本”，用泽石从美军士兵那里搞来的铅笔头，有时干脆用枝条在地上划，用手指蘸着水在“桌子”（破木板）上描划。学习之余，就互相教唱中、朝、俄文的革命歌曲和民歌，或用自己制作的棋子下围棋。除此之外，我们还用朝、中、俄语混合的“国际语”，比划着讲述各自国家的革命历史、民情风俗和民间故事。十几名中朝战友，在这里组成了一个革命的“学校”，革命的“家庭”。

通过为我们送饭和搞勤杂的战俘做“交通员”，支部领导“战犯”营内的难友整顿和健全了组织，发动全营进行了几次统一的抗议、示威，还帮助他们进行有组织的政治和文化学习。我和泽石都为他们写过“中国革命史”等政治学习资料和文化学习材料。

很快，我们又通过医院内的组织：同各战俘营与“外界”取得了联系。当得知“劳先生”被单独扣押，“地下党”总委已被解

体的情况之后，经辛泰凤提议，由他、金泰勋等四名朝鲜同志和我组成了“战俘营劳动党员临时总指导委员会”（简称“临时总委”）。统一指导巨济岛、龙草岛、凤岩岛各人民军战俘营的斗争活动。

在“临时总委”的指导下，人民军各战俘营经受了“6·10”事件后“波特纳恐怖时期”的严峻考验，恢复或重建了党的组织。继续开展抗议、示威、游行等斗争活动，使美军当局企图通过强迫迁移、分散和削弱战俘斗争力量的阴谋陷于破产。

在与各战俘营和“外界”联系的过程中，人民军战俘的“联络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以“战犯”的身份，冒着比一般战俘更大的风险，来往于医院与“临时总委”之间，不仅交换文件，还带来了许多“外界”传来的消息（停战谈判、战局、战俘问题动态，甚至附近美伪军的分布情况），为“临时总委”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他们是一批值得钦佩的勇敢的战士。

1953年7月上旬，“临时总委”组织巨济、龙草、凤岩三岛的人民军战俘营，开展了一次统一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斗争，强烈抗议李承晚“释放”两万余名朝鲜籍战俘（即强迫扣留战俘去李伪军的“军训中心”），企图破坏停战的罪恶行径，再次表达了坚决要求遣返的决心。这是“临时总委”指导下，在战俘营内进行的最后一次统一行动。

停战协定终于签字了，双方遣返战俘的工作接着开始。可是，我们这批“战犯”却被继续扣押着不予遣返。经过板门店我方谈判代表的多次严正抗议、揭露和公布我们的名单，美方才不得不在9月6日——遣返工作的最后一天，把我们遣返回来。

当离开“战犯”营，与朝鲜战友们握别的时候，在我们兴奋欢悦的心情中，同时充满了难分难舍、依依惜别的感情。十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和特殊的斗争生活，使我们结下了亲如手足的生死情谊。每个人都含着热泪，作了最后一次拥抱。感情丰富的泽石与一位年长的朝鲜战友“朴老汉”，竟抱在一起失声痛哭起来。是

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在苦难与斗争中孕育起来的战友之情更为珍贵的呢？我们分离了，但是，我们的心将永远跳动在一起。

回来后没几天，在开城驻地，我和泽石（似乎还有赵佐端、魏林、杜岗同志）接到一个通知，要我们立即到志愿军谈判代表团的驻地去，会见一位朝鲜同志。

踏进代表团驻地一个院子的大门，我一眼看到一位穿着灰色毛料列宁服的同志正在凝神注视着我们。啊，是“劳先生”——久违了的朴相显同志。顾不得什么礼仪，也顾不得周围同志会“笑话”，我们互相奔跑到一起，紧紧地、紧紧地拥抱起来。滚滚流淌的泪水，打湿了对方的脸颊和衣襟。来不及寒暄和问候，我们只是互相轻轻拍打着彼此的肩背，哽咽着松开双臂，泪眼朦胧地对视一下，又重新拥抱在一起……

代表团首长为朴相显同志举行了便宴。我们高举酒杯，为胜利、为重逢而互相祝酒。在胜利的喜悦中，回忆了在集中营并肩战斗的艰难历程，怀念着未能再次见面的战友，衷心地感谢党和祖国对我们的关怀。

“劳先生”要回去了，我们走到他的座车旁，紧紧握手，互道珍重。吉普车载着他的背影在扬起的尘土中渐渐地远去。树头的扩音器上传来了《人民军进行曲》的军乐声。雄壮激昂的旋律，把我的记忆带回了我们曾经战斗过的“死亡之岛”——巨济岛上。那里，也曾经回响过《人民军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的歌声，回响过《金日成将军之歌》、《东方红》……的歌声。那是千万名面对屠刀的中朝被俘人员从心坎里迸发出来的希望之歌，战斗之歌，而更加激励斗志、鼓舞人心的，是那悲壮雄浑的时代最强音：“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歌声，将永远回响在我的心际。

（孙振冠 原志愿军二十军教导员）



## 釜山战俘收容所

### 我背上爬着上百只蛆

我是 1951 年 11 月在朝鲜中部马良山反击战中左腿被炸断后被俘的。被俘后我在釜山的“战俘医院”动了 7 次手术，躺了 8 个月。如果没有地下组织的难友们的照顾与帮助，我可能早就成为美军军医手术刀下的牺牲品或被叛徒们胁迫去台湾了！

从前方下来，我被押进釜山伤病战俘第一收容所。一般需动手术的重伤员都先送到这里，附近有一个“开刀房”，是一座两层的红砖楼房。除美军医务人员外，还配备了 10 多名做杂活的战俘，一般都是美军挑选的变节者。“开刀房”离“一所”大门约 40 米，我们从铁丝网里三天两头就能清楚看见从红砖楼里推出死人送往太平间，不一会即有卫生车前去运走尸体的情景。难友们都把“开刀房”叫做“屠宰场”。我被俘较晚，据难友们介绍，我去那时，由于难友们的反抗斗争，“屠宰场”的状况已有较大好转了。但我仍然亲身体会了这个“战俘医院”的实情。

我到“一所”不久，美军军医来查房，看了一下我的伤情就挥手让抬走，检查很马虎，怎样治疗，能治到什么程度等一些应向我们交待的问题，直到进入“开刀房”也没人向我做任

何交待。不仅如此，站在手术台边的几位美国大夫，个个冷若冰霜。给我打完腰椎麻药后，立即用针扎我的大腿，故意问“痛？”实际麻药没散开，哪有不痛的？你说：“痛！”他仍然笑嘻嘻地扎着你，他们的这种行为怎能不让人对他们仇恨呢？

不知不觉中手术开始了，我心里又气，又烦躁。心想：不把战俘当人能认真给作好手术吗？不久便给我打石膏送回“一所”。疼痛不断加剧，我常常满头大汗。周围难友都很同情，但没有任何办法，当局对此从不给止疼药吃。后来转到“三所”，疼的我向军医要求截肢，他们却连理都不理。

一天开饭的时候，我痛得连饭都不想吃了，有位难友动员我，并到床前准备喂我饭。这时他发现我的床边有条蛆在爬，掀起毯子一看，已经到处都是。他放下了碗就出去了，过了一会找来二根细棍和一个瓶子，在我床上夹起蛆来，一个一个地装进瓶子里。他扶起我后发现上身光脊背沟里就有上百条蛆。这时又来两名难友，连扫带夹算是整净了。但还有蛆从石膏缝里往外爬，这才知道蛆的来路是在石膏里。

在难友们的要求下，第二天，来了两名美方雇用的工作人员，带着一种专门开石膏用的钳子，将石膏打开，里面的蛆成蛋蛋了。原有的伤口烂了，没有伤口的地方，也给蛆拱成了新伤口。我明白了这些天我为什么昼夜疼痛不止，折磨得我连腿都不要了。但是我又糊涂了，为什么天气这么冷，连蝇子都看不到，怎么会有蛆，而且繁殖的速度那么快？有的难友说：“甬说了，你是让敌人做了试验了！”我找不出别的原因，这次手术就这样白作了。几天后，美军军医检查后决定转回“一所”，重新手术。

还有一次是植皮，把我的好腿开了个碗大的刀口，在大腿上取走了皮。但是，应当植皮的伤口却依然如故。我遇到美军军医，问为什么让我白挨了二刀，他同翻译对完话，什么也不讲走了。在我后来又断断续续动了 5 次手术之后，便下定决心不再让敌人动手术，几次向查房的大夫表明了态度。由于我坚决反对再做

手术，便被转到“三所”，我就这样痛苦地听天由命躺了 8 个月，才在难友们的照料下慢慢能靠拐杖走几步。

1952 年年末的一天早晨，美军动用了许多武装，围在棚子外。美军军医带着两名荷枪实弹的美军，进入棚子检查病房，到我床前时，美军军医说了几句，两个美军端起了刺刀的枪对准我。翻译说：“让你截肢”。我当即提出抗议，表示坚决不接受截肢手术。叙述了过去多次因为痛得受不了要求截肢，时间过去一年，已经动过 7 次手术。不疼了，你们为什么要我截肢而且为什么还动用武装，天下哪有这样的怪事？难友们也围上来为我助阵。美军军医不回答任何问题，却说：“不截肢，你就得去海岛（指济州岛中国战俘营）。”以此威胁我。后来经过几次斗争，才算保住了这条腿，但是并不能走路。直到回国后，由 26 陆军医院和长春军大三院各做了一次手术，我才能扔掉拐杖正常走路了。现在回想起来，在伤病战俘收容所那极度痛苦的一年多，如果没有难友们的团结友爱，我是难以活着回来的！（李正先）

### 美第八军情报部门的审讯

1951 年 6 月我受伤被俘后，即被押往釜山第一伤病战俘收容所治疗近一个月，体重降了 50 斤，勉强能行动就被押送第十收容所，准备前往巨济岛。

在等待上船期间，敌人便抽一部分人去审讯。审讯机关叫“G—2”，后来知道那是美第八军情报部门在釜山战俘营设立的机构，专门从战俘身上收集情报。“G—2”设在第十收容所内、用一个铁丝网隔开，里面有十来个帐篷。

我们这一批人被敌人带进这个地方，要我们在一个帐篷中等着，喊到谁谁就去，没有喊到的不能离开这个帐篷，我接连两天都没有喊到。到了第三天就喊到了我的拘留号码，我被带到了—一个帐篷里，见里面摆着两张办公桌，帐篷两端各放一张，一张桌子旁放着三把椅子，坐着一个美国人，侧面坐着一个黄种人像是

日本人，他是当翻译的。他们让我在美国人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桌上摆着热水瓶和水杯，日本人倒给我一杯开水，还放着一包美国香烟。美国人递给我一支烟，我就拿出敌人发给我们战俘的劣质烟说：“我吃这种烟就行了。”看起来在这审讯室里是不会动什么刑的了，因为没有发现刑具。我想这就要与敌人面对面的政治斗争了，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人，日本法西斯和美帝对中国人民曾经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可以利用这个地方，来揭露日本和美帝的侵华罪行。我坦然自若地坐着，敌人开始问我卡片上登记过的项目。敌人问：“你的姓名？”我答：“杨国光”。又问：“什么地方人？”我说：“江苏崇明县人”。问我年龄，我说：“38岁（比实际报大了几岁）。”敌又问：“你读过书吗？”我说：“读过五年书。”敌又问：“原来哪一个部队的？”我说：“你面前的这张纸上不都写着吗？”敌人又问：“你家中还有几个人？”我说：“还有我母亲”（实际上我家中父、母、妻、妹、儿子都有）。敌人说：“你这样大的年龄，为什么没有妻子儿女呢？”我说：“怎么没有呢，但都死了。”敌人说：“怎么都死了呢？”我就装成很悲哀的样子，表示不愿讲。当翻译的日本人催我“说吧！”我说：“十年前，我有一个很好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我们一家五口，是一个很美好的小家庭。但是日本佬打进了中国，有一天，我妻子抱着儿子，到田坂头去割菜，碰到了日本兵。日本兵见到了我的妻子，在田坂头就要强奸我的妻子，我妻子逃到江边，已经被日本兵追着了，急忙把小孩子扔在路上，纵身跳到江里，就被长江的水浪吞没了。那个日本佬一看，抓不着我妻子，就把我的儿子抓起来抛到江里。这样，我就失去了妻子和儿子。”我说的时侯，还流下了眼泪。当我说这番话的时候，那个日本人没有译给美国人听，美国人催问他，他才结结巴巴讲了一些。美国人听了之后就说：“那么你的父亲怎么也没有了呢？”我回答说：“我父亲是打鱼的，三年前的一天，打了许多鱼，想到上海去多卖一些钱。不料碰到一辆吉普车，里面坐着一个美国兵，还有一个女人。这个美国兵好像喝醉了酒，车开

得很快，横冲直撞，我父亲避来避去，却被这辆吉普车撞倒在马路上。等到附近的上海人见到时，吉普车已很快开走了。上海人把我父亲送到医院抢救，但因脑部伤重，就死掉了。从此，我的家就只有我的母亲和我二个人了。”敌人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我是什么时候来到部队里的。我说是去年 10 月。敌人说：“那你母亲谁供养？”我说是我母亲要我参加志愿军的。我母亲说：“我们一家好好的，日本佬和美国佬害得我家破人亡。你不用管我，现在还是去参加志愿军吧！”我实在离不开我母亲，不敢答应，我母亲发怒了，大骂我一顿说：“你难道忘记了你父亲和你老婆孩子是怎样死的吗？你不去参加志愿军，我也不要你这个儿子，我也不要活在这个世上了。”我见我母亲发怒，就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敌人说：“你到部队干什么？”我说：“部队里认为我年纪大了，要我到担架连抬担架。我们连长知道我读过好几年书，担架连里的同志年龄都比较大，读书不多，连长要我写字，看看还写得不错，所以要我当文书。”敌人又问我：“你的家住在哪个村庄？”我说：“小杨村。”他说：“有多少人家？”我说：“除我家外，还有一户人家。”敌人又说：“你家的房子有多少，有几公尺高。”我说：“二间小房子，只有这个帐篷这样高。（当时我想可能敌人要查地图，看看有没有我说的村庄，就说是这么一点小村庄，地图上也是找不到的了。）”

敌人停了一会儿，又问我说：“你到上海去过没有？”我说：“上海这么近，怎么会没有去过呢。”他说：“你见到过飞机场吗？”我一想，敌人要想从我口中了解他们所要的情况了。但我不含糊地说：“见到过。”敌人问：“你看到过飞机场的飞机吗？”我说：“我只路过飞机场，走过的地方有高高的围墙，有军队站岗，是不能让我们看到里面的情况的。”敌人还问我：“崇明县有没有工厂？”我说：“有。”他问有什么工厂？我说是纱厂。他问：“你有没有进去过。”我说：“我们是农民，到工厂里去做什么呀！”敌人说：“这个厂大吗？”我说：“大的，听说有 100 多人在里面做工呢。”

敌人一看，时间差不多了，就要我回到休息的帐篷里去。我想上午这场戏演得不错，敌人不会看出我是说谎。我通过回答我的家庭情况，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强盗和美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中国的残酷罪行，难道不是有过许许多多的这样的事实吗？

我估计下午可能敌人不会来找我了，后来果然没有要我再去，这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就结束了。一连几天，我都没有被敌人叫去，反而感到与敌人这样的斗斗倒也是有兴趣的。后来一个朝鲜人来到我们的小帐篷，他不像美国人是拿着卡片来找人。他走到帐篷里先叫一个年纪比较轻的姓张的战俘跟他去，又对我说：“你也一同去。”我们跟着他到铁丝网的一端，那里只有一个四角方方的帐篷，帐篷里设着三张桌子，有三个朝鲜人在审讯战俘，原来是南朝鲜李承晚政府派出来的情报机构。三个敌人有二个问的是我们志愿军的被俘人员，一个问的人民军的被俘人员。叫我们的朝鲜人是一个大约有 50 多岁的老头，与我同去的青年人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我坐在靠门口的地方。他问了我们二个人的姓名，接着他自己先向我们介绍，说他也是中国人，说他父亲过去同日本人在大连的海关工作过。他自己是生在中国的，也在大连海关工作过。你们中国抗战胜利后，把我们海关人员留下来工作，我们领的薪金较多。我在乡下买了一些田地，后来进行土改了，我怕农民要斗争我，因为我不再是海关职员了，农民可以把我作为地主斗争了，我就逃到朝鲜来。现在战争打得这样厉害，没有办法生活，只得找点工作做。因为我是中国生的，中国话都会讲，所以把我弄来这做工作了，不过是骗点工资养家小，你们不用顾虑，在我这里可以随便一些。我也是中国人呀！他说是姓“金”，叫他金老头好了。我听了之后，觉得这是个“老奸巨猾”的人，想用这一套来麻痹我们，以便让我们讲出他所需要得到的真实情况。

敌人自我介绍之后，就问与我一同去的小张，我听了一会儿，才知道他是几年前被我某部俘虏的解放战士，这次被俘前是当班长了。下午审讯结束时，我告诉他既是班长，是干部了，敌人问

时可要考虑，对敌人有利的情况不要说。我还说：“他是敌人，不必老老实实说真话。”这个张班长对我当时的态度是好的，他说他不大会说话，说得不对的地方要我给他指出来。

第二天，当这个金老头问到小张时说：“张先生，你倒说说看，你们为什么要到朝鲜来打仗？”小张说：“这个问题我也说不大清楚。”敌人就转向我来了，说：“杨先生，你说说看，你们为什么要到朝鲜来打仗？”我心里想：这个老头要了解的是政治问题，本来我想不能向敌人说真话，问到这个问题，我何不借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们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立场呢？并想到这个敌人虽有一套手段，我也可以迷惑敌人。于是我就说：金先生，我也说不好，我只是在我们连里的指导员上课的时候听过这个问题。指导员说：“朝鲜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发动的，美国军队到朝鲜，是对朝鲜的侵略，朝鲜人民受着战争的灾难。中国是朝鲜的邻邦，朝鲜人民有难，我们就应援助。志愿军到朝鲜来作战，就是帮助朝鲜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的战争，这就叫‘抗美援朝。’我们指导员还对我们说：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目的，不单是想占领朝鲜，还想把整个朝鲜作为美帝侵略中国的跳板，我们中国人民就不能过太平日子，所以我们要到朝鲜来参加战争。这就叫‘保家卫国。’”，金老头听了，连连说：“杨先生讲得真好，我要好好的写出来，今天我不问你们了，恐怕还写不好呢！”

以后几天，金老头又问我说：“杨先生，你们中国人到朝鲜来打仗，朝鲜人欢迎不欢迎？朝鲜人的态度怎么样？”我借此机会，又说了许多真话，宣传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的军民关系。当金老头问我为什么朝鲜人民会对中国军队这样好的时候，我除了再次说明我们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又重点宣传了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金老头又一次说我讲得好，我说这是指导员给连里上课时讲的，我认为指导员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真理，所以特别记得牢。

后来金老头竟向我诉起苦来了，说他回到朝鲜之后生活困难，

不得不找点工作做。我乘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我说：“你们的待遇怎么与美国人不一样呢？我看美国人是吉普车来来去去，中午回去吃饭休息。你们三个坐的车不好，中午带饭却不回去休息，我看你们吃的也不够好。”金老头点头承认我的看法。

有一天，我发现这几个南朝鲜人竟和战俘做起买卖来了。是两个被俘人员把敌人才发的衣服脱下来，卖给帐篷里的一个所谓审讯战俘的“官员”，但不用货币，而用美国香烟交换。我觉得奇怪就问金老头：“这种俘虏穿的衣服拿去有什么用？”金老头说：“主要是我们维持不了一家人的生活，香烟每天一包是发给我们招待你们的，你们有的抽几支，有的不肯抽，你杨先生就没有抽过我给你的烟呀。我们把多出来的烟换了衣服拿回去，到市里洗衣店一洗，就能把背上的字洗掉，这就有人要买这种衣服了，也可以补充家里用用。”我听了感到这完全是实话。当时的朝鲜人，就连这种人都养不活一家人，可想而知，一般的老百姓是更困难的了。我想想又好笑又有点可怜。我说：“你如果那时不回朝鲜，土改时主动把买的土地交给农民，自己仍在大连海关工作，当职员，是不会吃苦头的。”金老头说：“那时候就是怕把我当作地主，就逃到这里来了。”有一次，金老头告诉我说：“这几天可能前方打得很激烈，釜山市住满了许多伤兵，美国人把老百姓强迫赶到海岛上。”我想他这些话总不会是造出来的，回集中营也告诉了一些被俘的难友。

又一天，这个帐篷里另外一个朝鲜人在讯问一个志愿军被俘人员时，我听到他在了解江苏省主要发生的疾病。被讯问的是一个江苏人，而且他也被讯问了好几天。我想敌人问这些情况，说明李承晚集团也在准备随着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立即就走到他的桌子旁边对他说：“你问这些情况有什么用？你们朝鲜人想跟美国人到中国去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是美国停止侵略朝鲜，你们朝鲜得到独立，而且达到和平统一，到那时由于同我们中国是友好邻邦，要到中国去倒是很方便的了。”这个朝鲜人听得面红耳赤，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中午，在帐篷里打扫卫生的小伙子（是人民军的被俘人员）拿着一张南朝鲜报纸来给我看。我虽然不认得朝文，但朝文中有许多是中国字，只要细细看，也能看懂大致情况。原来小伙子是要我看朝中方面已经开始与美方进行谈判了，我即向他表示感谢，并与他握了手。我们这些行动，帐篷里的三个所谓审讯官员都不加干涉。我在一时兴奋下，竟哼出《金日成将军之歌》的调子来。那个专门审讯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的南朝鲜人就对我说：“你这是《金日成将军之歌》。”我反问他：“你也会唱吗？朝鲜人是人人都会唱的。”他没有回答，但也默认了，我心里感到非常痛快。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敌人设置的审查我们战俘的审查机构呀！

在这几天中，我虽然被敌人俘虏，被拘留在战俘集中营，但我仍然是革命军人，仍然是共产党员，仍然可以与敌人进行不同方式的斗争。在敌人的审讯室里，也可以教训敌人，敌人要想得到的东西，我可以一点不给，却可以利用敌人审查我的身世中，揭露日本法西斯和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因此我的情绪比较好，总想找机会与美国人再较量一番。

没过几天，我们有一大批人被敌人押上用篷布遮盖得严严实实的汽车，敌人枪上装着刺刀，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我们，驶进停在港口的登陆舰上，让我们下车上船，一直运到巨济岛上去了。

（徐益生）

### 女战俘营的歌声

在釜山市东南一隅那些高低不齐的土坡上，圈围着十几个大小不等的铁丝网。那就是美军用来关押朝、中被俘人员的战俘营。

在那林立的战俘营中有处编号为第七收容所，那里关押着朝中女性战俘。被关押的多数是人民军女战士，少数女军官，也有部分依旧穿着民族衣裙的游击队员。特别要说明的是在她们中间还有位中国小妹妹——原志愿军第一八〇师卫生员小丫同志。她

在那里和朝鲜姐妹们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共同对敌斗争，历经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日日夜夜，结下了鲜血凝成的国际友谊。

中国战俘们都十分感谢朝鲜姐妹们对小丫同志的关怀、照顾，也倍加赞赏她们那革命的乐观精神，敬佩她们那永不屈服的斗争意志。凡是路经那一铁丝网的战俘无不引颈探望，看看她们那美好的身影。身处海岛的战俘们也常常打听着她们的消息，张泽石被关在囚笼里还时刻惦记着这个同乡小妹妹。吴春生也曾想了解那个一度相识的朝鲜姑娘，是否被俘也关在这里。7号收容所对门的“5号”和“7号”毗邻的“11号”的战俘们得天独厚，他们可以经常关注着她们的生活起居。看她们早上跑步练操，下午队列行走，尤其是还可以经常听到她们的优美动听的歌声！

朝鲜民族本来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我们很难忘却入朝后第一次看见穿着艳丽衣裙的小姑娘们，在那冒着硝烟的树林里唱着歌打秋千的令人惊讶情景。敌人刚撤走不久，远处战争的炮声还能听到，春天刚刚来到这块苦难的土地上，而小姑娘们从山里刚回家，竟又将绳子吊在树上荡起秋千了！多么乐观坚强、善良勇敢的民族！这样的民族，铁丝网岂能锁得住她们的歌声！怪不得我们那位小妹也变得“能歌善舞”了。

张泽石每提起他被俘后到达釜山当天路过女战俘营，听到她们四声部合唱《春之歌》的情景就激动不已。他以为那不是从铁丝网里飘出来的，而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仙乐！监狱中飞出的向往春天的歌声，曾深深触动了他对自由、爱情和光明的渴望！她们的《春之歌》激励过多少四周的战俘们啊！

小丫记得 1951 年 8 月 15 日，朝鲜大姐姐们为了庆祝她们的祖国光复日而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人民军军歌》……那天她嗓子都唱哑了！敌人扔了好多毒气弹，也未能阻止那雄壮的歌声飞向四方。她也第一次懂得了敌人是多么害怕她们的歌声！从小丫教会了她的朝鲜难友唱《东方红》、《志愿军战歌》……女战俘营又响起了中国歌的歌声。

吴春生记得 1952 年 3 月中旬，当他和杜大举、李炽等战友被美军宪兵以“宣传共产主义”罪名抓出第五收容所时。在大门口，忽然听到对门女战俘营里喊出了“反对虐待战俘！”“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他们抬头看见小丫，和众朝鲜姐妹站在铁丝网前向他们挥手致意。她们又随即唱起了“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歌声是何等强烈地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啊！

臧根旺更是终身难忘。1952 年 3 月底，当第 11 收容所发动夺权斗争，众多战俘冲出帐篷，几百人围坐在靠近公路的铁丝网前安静地绝食，要求敌人将他们送出第 11 收容所。正当他们在凄风苦雨中艰难地坚持时，又是小丫带领了朝鲜战友喊起了口号，唱起了中国革命歌曲：《走，跟着毛泽东走！》、《解放区的天》、《我们是民主青年》等等！歌声强烈地鼓舞了正处在饥寒交迫中的战俘们，更激励了那些尚在犹豫不决的众多战俘们，鼓起勇气一阵风似的冲出了帐篷参加静坐绝食队伍中来。使绝食斗争的人数猛增到 613 人，占了第 11 收容所的多数。当时，臧根旺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情，竟孩子般地大哭起来。好半天，他站起来向女战俘营高喊：“谢谢你小丫战友！谢谢你们了！朝鲜姐妹们！”

40 年过去了，我们依然怀念着那些同生死共患难的朝鲜姐妹和她们的中国小妹，她们的歌声依然常常萦绕在我们的梦魂之中  
(张泽石 吴春生)

### 成立“抗美援朝同盟会”

关于釜山地区伤病战俘对敌斗争的核心组织——“抗美援朝同盟会”，理应由原一八〇师炮兵主任郭兆林同志来写。因为他从被俘到遣返，大部份时间都是釜山地区我被俘人员对敌斗争的组织者、领导者，也是“抗美援朝同盟会”主要发起人。

他舍生忘死做了大量工作，为釜山地区的对敌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最有发言权。但是他在 1988 年 8 月因病过早的离开了我们，只好由被俘后在釜山仅住了三个多月的我，根据自己知道

的情况代他写了。

1951年12月我受伤被俘后被送到釜山伤病战俘第一收容所，被抬到一间帐篷里。有一些战俘三三两两来到帐篷里看我，有的可能出于好奇，看一下就走了，有的想打听前线的情况。我团特务连警卫排长关永德同志进来一看是我，等人们走开后，向我简单地介绍了一所和釜山各所的敌我情况，使我对釜山各战俘收容所的形势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在第一所停了约6个多小时，敌人又把我从一所送到三所（第三收容所也是美军收容关押从前线下来的负伤战俘的）。到三所首先和我接头的是我团三营八连一排长贺宗付同志，他自五次战役第二阶段负伤被俘后就关在这里，对三所的情况比较熟悉，并较全面的向我作了介绍。通过他的介绍引见，使我认识了在三所组织领导我被俘伤病人员进行对敌斗争的刘振荣、尹一、邢善卿、段天强、周管玉、王文平、汪尽、王奋其等各个革命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和对敌斗争的骨干分子。并了解到原一八〇师作战科副科长王化英同志在三所领导被俘伤病员开展对敌斗争事迹。后因在斗争中暴露，他被美军当局抓走，送到巨济岛战俘营去了。

当时三所各个地下组织的名称有：党团小组、爱国小组、爱国同乡会、“七·一小组”等多种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各种组织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一支坚强的战斗队伍，已是当务之急。

当我正要通过工作和协商，把三所各个革命地下组织统一起来时，正好郭兆林同志派陶均善同志，通过横贯三、六两所的一条约1.5米深的脏水沟，偷越过三、六两所间隔的铁丝网来到三所，找我去六所共商釜山地区对敌斗争大事。我当即随陶一起到了六所。

到六所我向郭兆林同志汇报三所各革命组织活动情况，并谈了我想把三所各革命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战斗整体的想法。他很高兴地说他也想到这个问题，请我来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着郭兆林同志向我介绍了釜山地区各收容所的对敌斗争情况。他说：釜山各所都有一批领导骨干在各所建立了各自的核心组织，如：“五·一、七·一爱国同盟”、中国人爱国同乡会、毛泽东青年团、中共地下党支部、爱国主义小组等，并以各组织成员为骨干，领导和组织我们的被俘人员，进行着不屈不挠的对敌斗争。其中一所有韩月季、曹友（赵璧）、关永德；十一所有臧根旺、徐寿田；五所有杜大举等。还有如韦光明、王化英、杜学贤、李维文、潘积善等同志，尽管被敌人先后强行抓走送巨济岛战俘营，但他们为釜山各所开展对敌斗争，培养了大批骨干，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他说：为了适应今后对敌斗争的需要，必须把各所的大小革命组织联合起来，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因此，我想在釜山成立“抗美援朝同盟会”，以此来统一釜山各所各个革命组织的名称，做为釜山地区领导我被俘难友开展对敌斗争的统帅部。他把经过深思熟虑写成的《抗美援朝同盟会会章》草稿，交给我过目提意见。我阅后完全同意，并建议尽快召开各组织代表会议，正式成立“抗美援朝同盟会”。

1952年1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各革命组织的代表会议，在第六收容所召开了。出席这次会议的只有三、六两个所的11名代表，其他各所代表因敌人监管很严，无法前来出席。会议由郭兆林同志亲自主持，他向与会者讲了釜山地区对敌斗争形势和成立“抗美援朝同盟会”的必要性、可行性。指出今后的任务是，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团结和领导我全体伤病战俘，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为反虐待、争自由、坚决回归祖国斗争到底！

会议一致讨论通过了《抗美援朝同盟会会章》。会上选举产生了“抗美援朝同盟会”总委会，成员有：郭兆林、张合顺、张治山、刘振荣、尹一。还有未出席会议的一所韩月季、曹友。十一所的臧根旺、徐寿田等同志也被选为总委委员。

我被选为总委副书记，郭兆林同志被选为总委书记。“抗美援朝同盟会”一经成立，就充分发挥了它的工作职能和积极领导对

敌斗争的作用。

为了将这次重要会议的决定传达到各级收容所，我们首先是利用各种机会，如看病、转所（即不同病号对象分转外科、内科、传染科等）、去各所抬大粪等，将会议精神传至各所，立即得到各所各组织的支持、承认。他们纷纷表示愿在“抗美援朝同盟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起来加强对敌斗争！我们按照总委的统一布署，各所在内部先后成立了“抗美援朝同盟会”分委会、及其下属的支委会。对外则以所为单位，公开组成大队及其下属的中队、小队、班组，并内外对口，把分委建在大队，支部建在中队。这就保证了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战斗性，增强了战斗机制，为开展对敌斗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952年4月，敌人要在战俘营搞所谓回国志愿“甄别”，同盟会便领导釜山各收容所进行反“甄别”斗争。这在釜山是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对美军虐待、扣留、屠杀战俘罪行揭露最深，打击最重的一次斗争。

当时美军为了达到长期扣留战俘，破坏朝鲜停战谈判的目的，造谣志愿军被俘人员“不愿回国”。提出对战俘进行非法的去向“甄别”，要战俘进行所谓的自由选择，愿回大陆的回大陆，愿去台湾的去台湾。

为了粉碎美军的“甄别”阴谋，揭露他们扣留战俘的罪行，表明在釜山各收容所的志愿军伤病战俘坚决回归祖国的决心，“抗美援朝同盟会”总委决定在釜山各所，立即全面掀起反“甄别”要求无条件遣返全体战俘的斗争。总委对开展这场斗争的敌情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对思想、物资、组织、指挥工作和斗争的战术、技术、政策、策略等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制定了反“甄别”斗争的计划。当时“总委”提出的战斗口号是：团结起来，反对甄别，坚持斗争，坚决回国。会后各分委立即进行了布署，并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资上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在“抗美援朝同盟会”统一指挥下，全釜山各中国战俘收容

所沸腾起来了。第三收容所在严词拒绝了美军管理当局的非法“甄别”后，很快在所内升起我们的五星红旗，并书写大字标语，组织队伍游行示威。我们坚持升了三天三夜红旗，不顾美军残忍地对我们断粮、断水，直到用坦克、机枪进行血腥镇压。战友们以伤残之躯与敌人搏斗，为保卫红旗，捍卫自己回归祖国的权利献出了生命和鲜血！

第一收容所的难友们为反对强行“甄别”，坚持了五天五夜英勇卓绝的绝食斗争，迫使敌人放弃了对他们的“甄别”。

第十一收容所的战友们在“甄别”前夕，为争取大多数难友能摆脱叛徒特务的白色恐怖统治，坚持回归祖国，经过艰苦斗争，夺取了该集中营的内部统治权，创造整个中国战俘集中营唯一胜利夺权的战绩。该收容所 80% 以上的难友胜利会师在“602 回国支队”。

其它人数较少的收容所的中国战俘也都在“抗美援朝同盟会”统一领导下尽可能地给予了第一、三、十一收容所的大规模斗争以巨大支持。

1952年4月中旬，巨济岛“602 回国支队”正式成立后，组建了中国战俘统一的地下党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根据总委会决定，釜山“抗美援朝同盟会”并入“共产主义团结会”。郭兆林同志被选为总委会常委委员，继续负责釜山地区“团结会”的领导工作。在总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斗争，与岛上的斗争遥相呼应，直到1953年4月绝大部份伤病战俘先期遣返回国为止。

（张合顺原志愿军一八〇师教导员）

### 结核病房里的斗争

1951年11月间，美军俘管当局要从巨济岛“86”抽调一批战俘到釜山去做苦力。靠联队部书记长郭乃坚暗送消息，又帮我们填写了花名册，我们第一大队部的全体人员（不包括新任大队长贾忠林）和五大队部三大队部的部分人员便混进了那100多人的行

列里，到了釜山第十一收容所。和我同去的有军大同学刘英虎、王铁龙、李炽、罗厚根，川大学生边世茂、随校学员杜大举，师部机要科干事魏善洪和一大队部的两个小通讯员。

到了那里，刘英虎去了第二收容所，边世茂留在第十一收容所，他们都仍担任翻译工作，其余同来的人都到了第五收容所。那里是个“病俘休养所”，住的多是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中的患者，其中有排病房里全是肺结核病人，叫我们到里来就是专为他们服务的。

在初步“入乡问俗”之后，知道这里是以“医疗为主”，少有政治活动，比起第十一收容所还松宽些，才放下了心。在途中王铁龙就说过，我们到了新的环境一定要接受在巨济岛“86”的教训，再不能“清高”了，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出头露面”尽力去掌权。我们都同意这位大学长的说法。也真是天随人愿。那里“所部”（收容所的队部）的朝鲜俘虏官们并不想干涉我们的“内政”，要我们自己成立领导班子，自己管自己的事。于是，我们几个便以“能给美国人通话”的绝对优势，马上取得了“中国服务大队”的全盘大权。杜大举当了大队长，他是我们的“行政长官”。吴春生被公推为代表，常常“代表民意”去和美军俘管当局打交道，李炽做了个中队长（稍觉遗憾的是，另外两个中队长的位子被两个“可疑人物”占了）。除了这个“台上的”班子，另外我们还有台下的幕后指挥者王铁龙和魏善洪（党员）。当俘虏官只是个“必要手段”，“便于展开活动”才是主要目的。我们当时有两条不成文的行动指南：一是团结自己人，二是孤立、打击敌人在铁丝网里的代理人。后来又外加一条：联合病患者共同奋斗，确保全体人员回国。我们知道，跟我们一起从“86”来的难友们都是坚决要回国的，尽管对收容所的几个人不太了解，谅他们也翻不了天。只是对那里的广大病人的政治面貌不太清楚，这样既影响着我们的服务工作，也不敢去跟他们联合。所以一开始我们便把主要精力用在了解那里的朝鲜病人身上。

我们要求大家每个人都要承担起双重任务：既要做好自己的



服务工作，又要团结好病人，遇有情况及时汇报。然而一开始“结核病菌”的威胁却使不少同志缩手缩脚，不要说去跟病人谈心交朋友，就是到病房去送饭也是来去匆匆，生怕沾上病菌。甚至有的同志带着大口罩到病房，都不敢深呼吸，每天换个新口罩还总觉着不保险。于是我们就做了些有关卫生知识的教育，很快大家的顾虑也就消除了。当然，干部带头这一革命部队的老传统在这里就很有必要了，我们几个，每人都要承包一个帐篷，用实际行动给大家做出榜样。并且，每天晚上在“碰头会”上互相交流经验，各谈自己的收获。

我这个“代表”，自然要比别人更加深入群众才行。所以我要求自己每天早、晚都要串遍各个病房和他们亲热地打打招呼。一天，见一个帐篷里行军床上放着五线谱的歌曲，帐篷上挂着铅笔速写画像，还有几个人在看书，我想那一定是个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于是便一边扫地一边漫不经心地哼着歌曲，看他们的反应——我唱《阿里郎》、《道拉吉》，他们有人为我拍着节奏。我唱俄罗斯民歌《伏尔加纤夫曲》，他们有人便随我唱起来，有用朝语的，也有用俄语唱的。大家越唱越起劲儿，简直象个“国际合唱队”了。这样，我便成了他们的熟人，这个病房也就成了我的“责任田”。

我不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点感情上的融洽，我要了解他们真正面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个冒险的念头在鼓动着我。在几次接近之后，我终于壮起胆子唱起了《金日成将军之歌》来。全没想到，只唱了个头竟会叫他们那么吃惊，像是突然发了个警报。帐篷两端的人跑出去观风，近处的人拍拍我，指指外边说了声“叛徒”。当时我不禁有些发窘，稍愣了愣，见没人反对，也没人欢迎，虽觉得有些没趣，但还是压低嗓音唱完了第一段。待到歌声一落，除了他们那会心的微笑，还得到一片“乔塔”（朝语“好！”）的赞声，我心里就有了底。叛徒的阴影遮暗了大家的乐观情绪，却使我增加了敌情观念。后来我察觉到，这里的朝鲜病俘们也在小心翼翼地考察着我哩！

一次，我在他们那里听到有人用“国语”说了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尽管说得生硬，我还是听懂了。便立刻对他重复了二遍并加了下半句，“现在开始广播”，算是凑了个全句。一时间，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都争着要学会这句话，有的要我给他写出来，有的还用朝文、俄文注上了音。从那以后他们那里有几个人便积极地学起中文来，有的原来就有点儿古文底子所以学得很快。不久，我们彼此就可以用中文进行“笔谈”。我们谈朝鲜战局，谈“和谈”消息，谈回国后的打算，也谈社会主义远景……与此同时，我在他们那里也学到了许多知识，特别是在绘画和音乐方面。他们之中有三四个是艺术学院科班出身的，而且造诣很深。可惜，我和他们相处的时间太短。通过这一阶段的活动，我们有个共同的感觉，都觉得这里的朝鲜人之间好象都是互相通气的。很可能有个什么组织在领导着他们，在指导着他们的行动。同时我们还觉得人家并不完全相信我们，我们所接近的不是他们的“核心”，至多是个“外围”罢了，他们的秘密对我们是有所保留的。当大家讨论到下一步行动“计划”时，有人认为不能太性急，更不能“太暴露”。多数同志则认为必须大胆创造条件，尽快地取得他们的信任，以便紧密地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更有效地打击敌人，保护自己。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形成任何“决议”。没人倡议要建立一个什么组织，确定一个行动“纲领”，更没有一个说了算数的人，自然大家仍是你吹你的，他拉他的。做为这些中国人之中的“领导主体”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在那里再一次暴露了自己缺少斗争经验的弱点。

就我个人来说，当时已感觉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寻常的时刻。决不能再象过去那样“飘若浮云”了，必须更加踏实地工作，时刻准备着去经受更严峻的考验，这样，自己才不愧为一个真正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

两个月来，我们和朝鲜病人的思想完全沟通了。大家象生活在一个快乐的大家庭里，可以说到此为止，那是被俘以来最轻松

## 红旗在收容所上空飘扬

1951年5月，张殿祥受伤被俘后，即被押送到釜山第三伤病战俘收容所。

这是釜山地区人数较多的一个收容所。当时有我志愿军伤员700多人，朝鲜人民军伤员300多人。敌人对我们这些伤病战俘，并未给予较好的生活照顾和认真的治疗。每餐仅半碗饭，穿盖的是一身美军旧军衣和一床旧军毯。在治疗上简单粗糙，有的难友甚至成了美军实习医生刀下的牺牲品。在这里与其它中国战俘营不同的是，政治环境稍好些，毕竟很少有战场投敌叛国分子会受重伤送到这里来。那时敌人派遣特务、叛徒去实行内部反动统治的重点，是巨济岛上“72”那个近万人的中国战俘集中营。加上在三所的朝鲜人民军难友被俘早，他们组织严密，对敌人派进来的叛徒很警惕，不止一次进行了赶走叛徒、反控制的斗争。因而我们内部的成分相对较好，只是我们的大多数伤病难友，尚处于身心极为痛苦又前途未卜的惶恐之中，情绪十分低沉。

1951年7月以后，敌人采用欺骗宣传，威胁利诱，精神折磨和人身摧残等手段，加紧推行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的罪恶政策。有的人开始动摇，形势趋于恶化，不少难友警觉起来，认识到必须组织起来跟敌人开展斗争。起初是自发的，各自暗中成立了“七一爱国主义青年团”、“党团小组”、“爱国主义小组”、“爱国同乡会”等多种组织。不久，就有级别较高的营级干部王化英（化名王小三）站出来，动员大家联合起来，把收容所建成巩固的回国阵地。他说：“不把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最可靠的人手里，就无法生存，我们回归祖国的愿望就不能实现！绝不能让叛徒、特务来控制我们，把我们收容所也变成巨济岛上的‘72’战俘营。”

在王化英的领导下，第三收容所开始形成了统一的领导核心。当时领导人还有刘振祥、杜立身、王大森、赵久荣等同志，张殿祥也参加了领导核心。斗争骨干有周光宇、叶志宣、吴俊杰、潘

积善等战友。

我们首先把大队、中队、小队的领导权都抓在自己人手里，并推选了张殿祥担任“战俘代表”，代表全所战俘去和美军管理当局开展说理斗争。然后，我们在内部开展了宣传组织工作，增强难友们的回国信心，壮大我们的斗争力量。我们在“七一”“八一”“八·一五”“十一”这些革命节日里组织了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大大鼓舞了难友们的爱国热情，也引起了敌人的惊慌，加强了对我们的镇压。一开始敌人派遣特务、叛徒装成伤病员进入我们所，秘密发展“反共抗俄青年救国团”。他们向敌人告密，抓走了王化英、赵久荣、魏积善等战友，给我们斗争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未能动摇我们的根基。不久，教导员张合顺即来到三所主持领导工作。

1952年2月，敌人为了彻底控制第三收容所，从釜山第十一收容所押来了38名伤员。有的用担架抬着，有的扶着双拐，他们来后即分到各小队。这些人不爱说话，谁也摸不清他们的政治态度。幸好，当时釜山各收容所已在1月中旬，成立了釜山统一指挥中国战俘对敌斗争的组织：抗美援朝同盟会。郭兆林任总委正书记，张合顺任总委副书记，各收容所的地下斗争组织都统一成立了同盟会分委会。这时我们得到总委会传来的秘密指令：那38名“伤员”都是敌人派来三所夺权的叛徒、特务，要我们采取坚决措施将他们赶走。

我们进行了周密的准备，组织了所有能行动的“同盟会员”参战。在一天深夜，我们一声令下，同盟会员们有的拿着拐杖，有的抽出床头的横棍，向38名尚在睡梦中的叛徒发起了攻击。大家带着仇恨与鄙视挥舞棍棒，拳脚相加，打得这群走狗头破血流。最后，这些叛徒都挣扎着向铁丝网的大门口跑去，向门口的美军卫兵求救，由看守的美军接走了。紧接着，我们又协助收容所的朝鲜难友，做好了将隐藏在他们中间的叛徒组织一网打尽的准备。那些朝鲜叛徒，见势不妙，在我们要动手之前，在李承晚伪军的接

应下，全部翻铁丝网逃了出去。

在“三所”，我们还积极和朝鲜战友们一起做了暴动越狱去找南朝鲜游击队的准备，一旦和谈破裂，敌人要向我们下毒手，就联合起来行动。为此成立了朝中战友统一的“联川司令部”。我们积极捐献仅有的衣物、军毯去卖给李承晚军人，筹集购买武器的资金。仅我们“三所”一个分委就筹集了 100 多万元伪币，后因这支李承晚监守部队全部换防而中止。

1952 年 4 月 11 日上午，釜山美军当局，突然通过广播向全体伤病战俘宣布：“联合国军总部近日内将派人对所有中国战俘单独谈话，进行甄别，依其本人之真正志愿而将两种信仰不同（指坚持遣返祖国大陆和要求去台湾的）的战俘分别看管……”与此同时，美军当局在三所外面约 100 公尺远的地方搭起帐篷，准备着手进行甄别了。我们根据同盟会总委会的指示在美军当局广播后，公开表示全部要求遣返自己祖国的意愿，反对美军当局对战俘强行非法的“甄别”。同时在内部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和准备，根据不同的伤势情况，按战斗建制将所内全体伤病战俘组成一个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个纠察队。4 月 16 日，我们把驻在“三所”内的美军当局派遣的行政管理人員和医务人员赶出三所，然后用漂白粉以朝、中、英三种文字在铁皮房顶上书写反对甄别、抗议美军当局屠杀战俘的大幅标语。利用医务室的白布、红汞、奎宁制成 8 面五星红旗，和一面朝鲜国旗升起在九间铁棚房子上面。美军当局大为恐慌，开来了大批武装包围了“三所”。我们立即派出代表与美军当局谈判，要求他们立即撤走包围“三所”的美军武装部队，撤去准备进行非法甄别的帐篷。向板门店和谈代表转交我们坚决要求遣返祖国的伤病战俘名单，但美军当局未予答复。

“三所”的红旗升起，标语刷出以后，由于地势较高，远处的釜山市内也可看见。美军当局通过广播“命令”中国伤病战俘“降下国旗、涂掉标语，否则将采取武力行动”云云。但“三所”的中国伤病战俘置之不理，而是在内部继续进行政治动员和战斗

准备。当天晚上，美军当局切断了水源，停止了粮食和药品供应，企图以此来压垮所内中国战俘的斗争。断水断粮更激起了所内中国战俘对美帝的仇恨。纷纷表示要与敌人决一死战，“与其饿死，不如拼死”！大家克服伤病所带来的困难，自觉地投入备战。有的修筑工事，有的用担架上的铝管制成戈矛，有的自制汽油弹和燃烧瓶，有的把劳动工具十字镐和铁锹木棒之类也收集起来当作武器，同仇敌忾、斗志昂扬的战斗气氛笼罩着整个“三所”。

断水断粮断药三天以后，我们的战友沈××因伤势过重得不到及时治疗，加上饥饿和干渴的折磨而不幸死去。难友的牺牲，更激起了全体伤病战俘的愤怒。我们把烈士的遗体停在门口铁丝网边，并写上大幅标语“他在美军当局断水断粮断药三天以后死去，要求国际舆论界主持公道！”这一来，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注意，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很多外国记者，纷纷在营门外铁丝网边对着尸体和标语拍照。美军当局非常尴尬，于是耍了一个花招，在停水断粮的第四天，委托两名瑞士籍的国际红十字会代表，以美军当局代表的身份与“三所”的战俘代表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如下协议：

美方尊重“三所”中国战俘要求遣返祖国的意愿，不再对之进行去向甄别；立即恢复粮水及药品供应，并对断水断粮断药表示歉意；同意所内中国战俘为死去的战友举行追悼会；同意向报界披露这一事件的经过。

战俘方面同意在协议生效后，立即降下国旗，平整工事，涂掉标语，并让美方将死者埋葬。

双方代表在《协议书》签字以后，美方即派车将尸体运走。可是半小时后，又通过广播宣布“国际红十字会无权代表美军当局，他们与战俘所签协议无效。”美军当局这种出尔反尔的欺骗手段，更加激起我们的愤怒。我们决定向“抗美援朝同盟会”总委会请示，请求准许我们举行暴动：首先夺取所外相距 200 公尺处一个美军连队的枪支，然后尽可能将队伍带到山上打游击。暴动时间

定在 5 天后的凌晨一点，由于敌人监视极为严密，我们一面尽力与总委联系，一面积积极准备。我们对内进一步进行了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采取自报公议和组织批准相结合的方式。根据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选出人员组成一个 30 人的“突击队”，一个 50 人的“第一梯队”和 50 人的“第二梯队”，此外还有一个 20 人的“纠察队”和 20 人的“救护队”，并选定了突破口，进行模拟演习。这时附近“六所”的中国伤病战俘给我们以极大的支持，他们的粮、水、药品还在照常供应，就把大部分粮食在夜间通过两道铁丝网和一道污水沟给我们偷运过来。其他各所的朝中伤病战俘也在远处用歌声和口号声支援“三所”，特别是女战俘营的歌声更是嘹亮，我们的小丫同志几乎是整天站在铁丝网边对着“三所”的方向呼喊和歌唱。

计划暴动的前一天下午，我们自己降下了国旗，做战前的最后准备。不料这时所内朝鲜伤病战俘中出现叛徒外逃，向敌告密。美军当局抢先出动了几乎一个团的兵力并配以十几辆坦克包围了“三所”，并通过广播限“三所”的伤病战俘在 5 分钟内出去接受“甄别”。5 分钟过去了，没有人出去，又过了 5 分钟，直到过去一个小时仍无人出去。于是美军就以坦克开路，派遣一个排的兵力冲进“三所”。我们奋起反击，突击队员用自制的“武器”打伤两个美国士兵并缴获了两支步枪。其余的美军士兵狼狈逃出“三所”，坦克也随后退了回去。敌人的士兵负了伤、丢了枪，指挥官恼羞成怒，在间歇了短时间后，又向三所发起了第二次进攻。首先用机枪、步枪向所内中国战俘猛烈扫射，同时投掷手榴弹，当场打死打伤近两百名朝中战俘。杨廷华等 35 人壮烈牺牲！由于饥饿和伤病的折磨，在美军强大火力攻击下，剩下的 180 多名中国伤病战俘已完全无力反抗。美军当局仍然继续对我们投掷了大量瓦斯弹，使我们个个眼睁不开，呼吸困难，呕吐不止，不能动弹。最后美军士兵用刺刀押着我们走出第三收容所的大门。大门外面，美方用漂白粉在地上画了两个箭头，一边写上“到台湾”，

一边写上“到中国大陆”的字样。这 180 多名英勇不屈的中国战俘披着破烂的衣衫，满脸烟尘，移动着艰难的步伐，互相搀扶着，坚定地朝着写有“到中国大陆”的那条光明大道走去……

“三所”的反甄别斗争结束了，不久，我们被送到巨济岛“602 回国支队”。我们的这次反甄别斗争虽然死伤不少同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它以实际行动揭穿了“不愿回国”的谎言，有力地支持了板门店我方和谈代表坚持全部遣返的正义立场，极大地鼓舞了釜山地区乃至巨济岛朝中战俘的斗争意志。它在朝中战俘斗争史上写下了既悲壮又光辉灿烂的一页。

（张殿祥 张合顺）

### 铁一般坚强的集体

1952 年 4 月初，敌人召集釜山各战俘营代表开会，说是要对战俘进行单独甄别。在此之前，我们已从秘密渠道得知：和平谈判又恢复了，在对战俘如何遣返的问题上，敌我双方互不相让，从而使停战协议不能签字。第一收容所远离其它战俘收容所，消息全凭秘密渠道。我们还从秘密渠道得知：有些战俘营的叛徒特务加紧反共活动，强迫战俘在去台湾的请愿书上签名，甚至给战俘身上刺字，写反动口号，让他们无颜回国。由此看来，敌人可能要对我们进行进一步审查，强行将一些战俘送往台湾。

在这关键时刻，地下党支部（书记韩月季，组织委员关永德，敌工委员曹友即赵璧，宣传委员王洪度）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粉碎敌人的“甄别”。首先我们派曹友代表告诉敌人，我们第一收容所的全体战俘坚决反对“甄别”，一致要求回大陆。并且向敌人递交了书面抗议，但是敌人坚持一定要“甄别”。

根据这个情况，我们与第三、第六收容所取得了联系，决定和敌人公开斗争。我们首先进行思想动员，向大家指出，这场斗争是对每一个战俘的考验。希望全体同志能够经受住这一场血与



火的考验，忠于党、忠于祖国，做好牺牲的准备。经过动员，大家同仇敌忾，群情激昂。许多人向我们表示要以鲜血和生命捍卫祖国的荣誉，让党组织在斗争中考验他们。还有些人说，如果他们牺牲了，请组织把他们的情况汇报给祖国……大家决心和美军斗争到底。我们听了以后，对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充满信心。

为了公开和敌人斗争，我们把全体战俘编成了一个大队，关永德担任了大队长。下面设了几个中队，由斗争性强的同志担任中队长。还专门设立了纠察队，由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组成，每人都准备了武器（木棒、匕首、石头等）。我们还制作了几面五星红旗，画出了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的像。

1952年4月15日，第一收容所的中、朝战俘同时和敌人开展斗争。我们的纠察队员天不明就在铁丝网内站上了岗，守住了大门口不允许敌人进来。我们还在铁皮房上刷写了大标语，这些标语是：“坚决反对甄别战俘！”“反对虐待、屠杀战俘！”“反对侵略朝鲜！”“毛主席万岁！”“金日成万岁！”这些标语是用中、英、朝文写成的。

天亮以后，我们在房顶上升起了几面五星红旗，全体战俘在铁丝网内进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军“甄别”战俘。游行队伍前面举着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的画像，战俘们跟在领袖像后，边走边喊口号。游行队伍后面，化妆成的美国总统杜鲁门手拉李奇微、李承晚等抱头鼠窜，志愿军战士用鞭子在后面赶，这些人前胸后背都用中、英文写着名字，战俘们表演得维妙维肖。我们一公开斗争，敌人惊恐万状，立刻调来许多部队和坦克，把铁丝网团团围住。我们离市区比较近，所以，许多外国记者赶来拍照，老百姓也来看热闹。我们全体战俘面对敌人的枪炮，毫不畏惧。按照事先的计划，游行完了以后，集中到大门前，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我们召开了“反对甄别大会”。战俘们从容不迫的走到前面揭露美军“甄别”的阴谋，控诉了美军虐待屠杀战俘的滔天罪行。讲完后，我们高唱革命歌曲：《走跟着毛泽东走》、《解放军进

行曲》，高喊口号：“坚决反对审查！”“毛泽东万岁！”“打倒美帝国主义！”

这天，我们有组织、有秩序的抗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敌人没敢镇压。下午 3 时，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来了，让我们降下红旗，不要开会，说第二天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复。为了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们第一天的斗争就结束了。在我们刚开始大张旗鼓的准备斗争时，一个公开叛变的伙房小队长见大势已去，溜出了铁丝网，再也不敢回来。从这一天开始敌人就断绝了粮食、药品的供应，妄图用饥饿、伤病来征服我们。我们利用一切机会鼓动大家，不要被敌人吓倒，准备迎接更严峻的斗争。

第二天早上 7 点，我们又开始进行抗议游行，升国旗，喊口号。这时敌人露出了吃人的面目，向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战俘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十多人。我们一边由救护队员把伤员和烈士的遗体抬回来，把他们的血衣排在铁丝网上，用来揭露美军的暴行，一面继续在大门口向敌人进行抗议。在这针锋相对的时刻，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姗姗而来，要和我们进行谈判。当时，我主张不出去。曹友说：“为了揭露敌人的阴谋，我出去和他们谈判，你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领导到底。”这位我们刚刚吸收的共产党员大义凛然的走出铁丝网，结果一出门就被敌人扣留了。后来曹友说，敌人把他做为“战犯”关押起来，吃了不少苦。

敌人的失信，更进一步激起我们的义愤，使我们的斗志更坚强。为了和敌人斗争到底，除了纠察队继续站岗以外，其他人可以在房里保存体力。

第三天，我们没出去，敌人却搞开了攻心战。在铁丝网外摆了许多饭食，并用架在铁丝网内的大喇叭向战俘喊话，煽动战俘往外跑，叫嚣：“不要受共产党当官的控制”。并说：“无论谁跑出铁丝网就可以吃到东西；在铁丝网里是死路一条。”在敌人煽动面前，大多数人立场坚定，但也有个别战俘，怕我们继续坚持下去受到敌人的镇压，产生了动摇，讲怪话。有几个战俘受其影响，在

夜里偷偷爬出了铁丝网。出去后，敌人问：“你们出来干啥？”

“我们是为了吃饭。”

“你们要到哪里去？”

“我们要回中国。”跑出去的几个人回答。

斗争结束后，敌人又把他们放了回来。

我们发现了这些情况，立即采取行动，把个别讲怪话的人找来，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警告，他们才不敢乱说了。另外，我们派出纠察队员用石头把敌人的喇叭都给砸坏，不让敌人进行煽动。为了鼓励大家的情绪，我们指挥大家唱革命歌曲，用歌声来和敌人进行斗争。并向敌人提出口头、书面抗议，抗议美军无理扣押我们的谈判代表，坚决要求美军放回我们的代表，坚决反对“甄别”战俘。曹友被扣押后，我们又决定让关永德做我们的代表，和敌人进行交涉斗争。

第四天，有些重伤员在饥饿中死去了，我们活着的人都饿得眼睛发黑。这时，敌人又要和我们谈判。关永德在铁丝网内和敌人谈判，坚决反对“甄别”战俘，坚决要求放回代表。敌人仍不同意，双方仍在较量中。敌人又进一步恶毒地将我们的水断了。

为了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到各房间去看望伤员，鼓励伤员们为了回到祖国坚持斗争下去。不少伤员不顾敌人停药后伤口感染，甚至生蛆，拍起手来，表示坚决斗争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为了坚持下来，我们把敌人发的破皮鞋全部都集中起来，放在大锅里煮得软一些，给大家吃，让大家增加一些体力。皮鞋吃到嘴里全是油漆味，但大家都把它吃下去了。有的人饿得没办法，还把包扎伤口的棉花，带着脓血甚至肉蛆吞进肚里。渴得受不了了，就互相挤出点尿来喝下去。

第五天，敌人又派红十字会代表来谈判。他们的条件软了一些，说不对我们第一收容所进行单独“甄别”了，集体“甄别”一下就行了。但我们坚决反对，我们告诉他们，审查是对我们人格的侮辱，我们都是志愿军战俘，理所当然回中国，没什么可“甄

别”的。谈判又没有结果，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了，面对这铁一般坚强的集体，敌人不敢再较量了，怕大批战俘死去，在国际上不好交待。到第八天，敌人宣布，第一战俘收容所不“甄别”了。我们以巨大的牺牲赢得了反“甄别”斗争的胜利。

（韩月季 王洪度）

### 美军重围中的夺权斗争

第十一收容所，是釜山伤病战俘的来往中枢点，出岛入院都要经过这里，到各处去做苦役的人也要从这里抽调，这里经常聚集着千余人。由于该所人员变化较大，情况比较复杂，所以美军当局对该所控制得特别严。当板门店“和平谈判”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大批的美蒋特务也就悄悄进入战俘营了。他们唆使那些投敌分子、叛徒在铁丝网内横行霸道，强迫战俘刺字、写血书到台湾，其目的是为了阻止战俘回国，以此损害我们伟大祖国的尊严。他们在铁丝网内组成大、中、小队的“行政”统治机构，大队设有大队部、正副大队长、及杂务帮凶、警备队、审讯室、吊打组，中队设有审讯室、刺字组，小队和班长以上都是他们帮凶，因此战友们都称他们为狗腿子。

白天，铁丝网内有大队警备队，四方巡逻，八方查看，他们不准普通战俘交头接耳。这里的人们失去了说话的自由，到厕所要报告而且只准一人，不准成群结队，违者就要受到打、爬、吊的刑罚。大队部还克扣小队人员粮食，小队长、班长明目张胆地可以吃满碗饭，中队长、大队长可以任意享受战俘营里的特权，大队部还常到厨房把罐头拿来做为狗腿子们的夜餐。而一般战俘却每天每人只有半碗饭度日。

中队还设有“宣传员”分到各小队“宣传、讲课”，来咒骂我们的党和人民政府。实在令人气愤！

1951年8月初，臧根旺（化名刘家平）开始在釜山第十一收容所成立了名为“51、71”的地下组织。最初只有一个小组，后来

发展为支部，而后便渐渐扩大成了总支。他趁外出服劳役的机会到第三收容所和郭兆林(化名李老汉)、王化英(化名王小山)取得了联系，接受了他们的领导。1952年1月中旬，领导决定把釜山的所有分散的地下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抗美援朝同盟会”。郭兆林为书记，张合顺任副书记；王化英、韦光明、杜学贤(化名为杜立旺)、李维文(化名李国棠)、臧根旺、徐寿田(化名徐厚仁)为总委委员。臧根旺兼任第十一收容所分委书记，徐寿田为副书记。后来他们又在第十一收容所和人民军战俘营共同组成了地下行政组织“联川司令部”。第十一所为中国第一支队，建立了支队司令部，主要领导人有臧根旺、徐寿田、赵久荣、潘积善、杜学贤等。

“为了保密，我们的活动灵活多样，有机会在哪里碰着就在哪里商议。二人以上商议的，就可以作为行动决议，即可互相传达。我们的斗争策略是发展会员，扩大力量，反迫害、反虐待、反饥饿、与敌斗，孤立最反动的叛徒。会内规定发展3人为组长，发展到10人为支委，以单线联系，不准互通人名，以免出现叛徒告密。

由于环境险恶，我们的组织工作不得不十分慎重。四个多月时间，才发展了30多名会员，加上外围所团结的同志共有70余人。

板门店谈判的焦点——“战俘问题”即将达成协议，美军战俘营当局要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据敌军岗哨士兵透露，美军将在4月上旬进行“甄别”。我们得知消息后，首先分析研究了当前形势，确定了对策，一定要戳穿敌人的阴谋，使敌人扣压战俘的计划不能得逞，一定将斗争赶在前边，坚决反对“甄别”。想到我们就要进行一次公开的面对面的对敌斗争了，大家的心情振奋！工作非常紧张！当时，臧根旺趁外出做工的机会偷来敌人雨衣，用汽油把胶皮洗刷干净，成为洁白的绸子，又将自己忍冻省下的衣服，通过南朝鲜士兵换来了红颜色，找来些奎宁药片，经过洗、染、缝制，一面鲜红的国旗出现了。

为了迎得斗争的胜利，每个会员都在积极准备武器。共产党员赵久荣混进做苦工的队伍里钻到敌军仓库里，窃取 U·S 刀子 5 把，用带子绑在大腿上带了回来，发给同志们以作对敌斗争之用。并克服困难，制作各种对敌斗争的武器。原五三八团三营通讯员宋子华趁出去做苦工时窃来敌人的汽油，用罐头盒做成汽油弹。有的同志用帐篷杆子钉上钉子，有的同志则拣些石块放在枕头下当做对敌斗争的武器。等待时机成熟，一声令下就可立即行动。

徐寿田在秘密通知石金成、秦廷楷准备武器时，被敌小队长马占奎（马是战场上的投敌分子）发现，当即被押到小队，要徐寿田说出组织了哪些人，老徐断然拒绝。叛徒马占奎上前对老徐扬手就打，当时老徐忍无可忍，猛力给予还击，一下子把他打倒在地。老徐当即振臂高喊：“同志们起来干！冲破敌人的迫害，共产党万岁！”但因敌人的压力太大，控制很严，大家又无思想准备，无人起来响应。这时马占奎喊来四个班长，把徐按在地下毒打一顿，致使老徐脸被打青、腰受伤。第二天马占奎还不死心，在吃饭时，将老徐架到众人前按到地下，以四肢爬地，腰部腾空长达十几分钟。最后威胁说：“只要你们再敢活动，我就要你们的命！”

要“甄别”的消息，使第十一收容所的叛徒大为惊慌。俘虏官们加紧了“写申请到台湾”、“刺字表决心”等一系列的叛国勾当。“刺字”，首先从大小俘虏官开始，不刺者，罢免官职，接着就是遍及各小队了。并扬言，谁不刺字就打死谁。3 月的一个晚上，小队长马占奎，强迫一个姓岳的同志（名字不详）刺字，岳说：“我是共产党员，宁死也不刺字”。敌了为了杀一儆百，将岳押到中队部，在夜深人静时，用尽惨无人道的手段将岳处死，并当众宣扬说：“这就是不刺字的下场。”

当时，“同盟会”研究决定了两件事：一、在敌“甄别”前进行夺权，将反动统治机构全部推翻，处决首恶分子；二、配合板门店谈判，揭露敌人迫害战俘的罪行和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

3 月 29 日，我们就开始布置：以牛吉英、宋子华、秦廷楷等

同志为捍卫“同盟会”核心组赤卫队；张孝廉、张金利、朱政权、樊维成、毛相龙为突击队；赵久荣、彭建章、王铁龙、尹建昆为控制叛徒头子基干队。集合地点为伙房一侧。规定口号是“青年”，暗号是“两个指头”，时间为夜间10点。同志们接受了任务无不兴高采烈，斗志昂扬，都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时间一到，马上行动。臧根旺、徐寿田、赵久荣、周安溪等同志首先冲出来，高喊：“凡是愿回大陆的快跑出来，免遭迫害！”。这一喊不要紧，整个铁丝网内的营地沸腾起来！各个帐篷的爱国同志不顾敌人阻止蜂涌而出。

秦廷楷听到外面有人喊“回大陆”，他马上把一尺多长的木棍藏在袖筒里，正要出门，却被门边的狗腿子王治青挡住。秦廷楷立即抽出棍棒将王治青打倒在地，跑了出来，在后面追赶他的狗腿子们，看我们人多，也就不敢再追了。

“战斗”打响后，人越来越多。这时由舒元良和程志远两个同志指挥着大家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是共产党人》，歌声划破夜空，直冲云霄，真是越唱越带劲！此地此时唱革命歌曲不仅觉得痛快，而且是对敌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我们对一些害怕敌人不敢出来的人，高喊：“只要你们过来，既往不咎。回大陆的快来吧！”

狗腿们缩在帐篷里，头都不敢伸出来，手持棍棒的狗腿把守着门，监视小队里的人员不准乱动，紧张的气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美军岗哨慌了手脚，在岗楼上“哈罗！哈罗！”地打电话。不到十分钟，美军的坦克轰隆轰隆地在前开路，跟着就是头戴防毒面具的全副武装的士兵跑步冲来，很快就包围了铁丝网。这时我们已有70多人团结在“同盟会”核心组周围，大家编成一个中队，派周安溪担任代表兼中队长，张孝廉当翻译，任命了小队长以上的干部。

那几天晚上特别冷，大家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衣服，实在是难

以忍受。天上又下着毛毛细雨，风也不停地刮着，一个个冷得直打哆嗦！战友们只好三三五五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放哨的战友更是辛苦。我们手提棍棒，在风雨中全神贯注地监视着敌人的动向，确保大家的安全。苦难是暂时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就是光明前途，大家情绪无比兴奋，彻夜难眠。有的同志便讲起了刘胡兰、太原战役、晋中战役等故事来鼓励大家，美军看我们没有越狱的举动，也就按兵不动，只在外面看守着我们。

在这艰难的日夜里，隔路相望的女战俘营的小丫同志和朝鲜姐妹们也冒着风雨在声援我们。她们放声高唱革命歌曲向我们致意，歌声响遍了整个釜山的十几个战俘营，歌声涌进同志们的心窝，温暖了受冻的躯体，激励了坚持回国的斗争意志。大家无不激动得流出了热泪，有的意忍不住抱头痛哭起来！那是多么令人感动的场面啊！一些被困在各帐篷里的难友们为歌声所感动，也拼命冲出了狗腿子的控制，纷纷跑向我们这边。最后我们的人数已增加到 617 人。感谢小丫战友和朝鲜姐妹们啊！当时的臧根旺熬得两眼通红，满嘴起泡，仍在坚守自己的岗位，领导着那里的斗争。

三四天来，敌人对我们仍然施行恐怖镇压。我们采取书面抗议，由周安溪代表向美军当局递交一份抗议书，其内容：

1. 要求美军当局遵守日内瓦公约，不虐待战俘；
2. 驱逐台湾派来的特务；
3. 禁止牧师在战俘营“传教”；
4. 坚决要求将我们同叛徒们分开居住。

这个书面抗议美军当局根本不作答复。一连几天我们还是继续提口头抗议，唱革命歌曲，并用木板、废纸写标语：“坚决要求驱逐台湾派进战俘营冒充战俘的特务”，“抗议美军当局虐待战俘”等大幅标语，把它们挂在铁丝网上。

同时，我们又派出黄炳忠为首席代表和反动分子进行谈判，“谈判”三天没有进展。第五天下午，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瑞士人出



现，经协商双方才达成“分家”的协议。分家后，我们安排了新的领导体系，继续新的斗争。

后来，臧根旺、李维文、潘积善、张孝廉等同志被敌宪兵队审讯，要他们承认是“暴动头头”，他们没有一个承认的。最后只得又把他们送回来。我们在摆脱了叛徒特务的控制后，又做好防止美军来强行瓦解分化我们的准备，巩固了那里的回国阵地，直到 1952 年 4 月来到了“602”。

（徐寿田 臧根旺）

# 巨济岛上的腥风雨

## 岁月淹没不了的记忆

在关押中朝战俘的巨济岛上，“72”这座被美远东军司令李奇微将军称誉的“模范”战俘营，却是迫害战俘的魔窟。40年过去了，岁月积尘淹没不了我对72集中营这段苦难生活的记忆。

我是1951年9月从釜山押送到巨济岛的72集中营的。我们一行20多人，可一个也不熟悉。一进营内就像落入国民党的壮丁营。四处可见国民党的党徽，眼前那些俘虏官俨然一付国民党军官的神态，处处设有岗哨，有的还手握棍子。这一切出乎我在釜山想象的情况，顿时心里一阵悲凉。

进入营内碰上的第一课题，就是逼迫签名去台湾。到达的当晚，我们被带到第一大队，编入一个中队。我们饥肠辘辘，吞下半碗饭刚回到睡铺上，就被叫起来集合到大队部签名去台湾。我趁列队时，假装解手离开。第二天，天刚亮，我便被叫起带着被毯和饭碗转移到后面的一个帐篷小队里，这真是一个大队两个天地两样对待。前面一排是简单的铁篷子，住的是所谓已签名去台湾的，后面一排是雨布搭的布篷子，住的是“不愿签名去台湾的”。睡在

铁篷可宽松多了，睡在布篷里却挤死人。十几平方的帐篷睡七八十人，象干柴棍铺在地下，要一头一人互相把双腿交叉在肚胸上才能睡下。提到吃，美军当局配给每人每天一磅以大麦、豌豆有时是大米的主食。可是当官当职吃大碗（即吃饱），铁篷的人吃中碗（即吃满碗），而我们住布篷的人吃小碗（即半碗）。菜是轮不到我们的，幸运的时候，咸汤里飘着几片萝卜叶子。

最初，行动的限制还不算严，除不许靠近铁篷外，准许在自己的天地里活动。允许在靠厕所附近空地晒太阳聊天，容许串篷子打牌消遣，但这种“自由活动”的好景不长。随着集中营控制反控制的斗争，叛徒特务们变本加厉在营地强迫签名刺字的同时，加强了对我们的控制。不准串篷子，甚至不准出帐篷，解手也要请假，这种生活上的虐待，确实叫人难以忍受。时间一长，一些意志薄弱的人为求得一时苟安违心地签了名。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被压得消沉迷惘，浑浑噩噩用每周发的一两包烟卷进行赌博混日子。我这个解放后参军的知识分子看到这一切，不能不感到惶惑。更何况我是一个人在部队转移时负伤被俘的，在这里连一个能依靠的熟悉同志也没有，在釜山虽然结识几个能心心相通，心向祖国的难友，可后来又分开了。

正当我感到孤独苦闷的时候，突然碰上原在二野军政大学同中队的同学晏棣，真是喜出望外。记得当时我们装着不认识，只相互交换一下眼神，避开人后我们都来不及问入朝被俘经过，我便急促问他可曾见到黎子颖，我告诉他在釜山碰见了张长惠（都是军大时同中队的同学）。隔着铁丝网交谈中，他告诉我因看到战士队情况糟得很，他和黎子颖两人报成军官，在“72”的军官队。晏说：“四大队是军官队，在我们一大队对面。除星期天全联队集合做祷告，平时连人影见不到。”那时我是多么希望见到他们，因为他们是我心中唯一可靠的依托。我深信我们这批在重庆解放时参军的学生，尤其是在军大的同学是赤诚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的。我的到来，晏棣十分高兴，不久在一次调整中我们编在同一小队，编

班时我们挤在一起，从那时起我和他头并头睡在一起。

我从晏棣那里，了解到我们被俘人员的成份复杂，有不少人是投诚起义合编过来的原国民党官兵。集中营里那些出头露面的附敌分子，大都是战场上叛变投敌的，这些人为虎作伥，动不动就要打人，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特别心毒手狠。我们互相叮嘱要小心谨慎，那时他化名叫陈黄，我化名叫吴加明，我们都称是刚参军的初中生，连队文化教员。，我嘱咐他对任何人都不要透露我是大学生，怕的是引起人们注意。他比我早来，结识了一些好同志，在别人聚集赌博时，我们便凑在一起聊天。我那时发挥有点文化的长处，编串水泊梁山打富济贫，反贪官造反的故事，有时也聊点逢年过节家乡风土人情，也吸引过一些听众，其用意，我们彼此心照不宣。当时我只是想争取多一些人心与祖国联在一起，好互相关照。

初到时，由于知识分子的自尊和矜持，一次二次都拒绝签名，曾引起叛徒们的注意，我被传讯到警备队进行盘问。我事先准备好回答，可谁能证明我所说的呢？也碰巧警备队中有一个是我在军大学习时的炊事员，入了团调到连队当兵，他证实我是新参军的学生。因此开始时敌人把我作为争取“教育”的对象，没有寻衅给我苦头吃，也没把我十分放在眼里。

我当时的处境，开展斗争是比别人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但由于受党的教育时间短，缺少实际锻炼。上战场时，除想到有可能负伤或牺牲，从未想到会当俘虏，不懂得监狱、集中营也是革命者的斗争场所。被俘后，只是想到当了俘虏，不能背叛党，背叛人民，不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处在叛徒特务控制下，虽然想摆脱受压迫的困境，却缺乏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意识和勇气，希望有个党员领导干部来领头。

正好这时杜岗参谋长暗地组织“回国小组”，联络心向祖国拒绝签名的同志起来反控制和叛徒们展开斗争。

记得一天晏棣告诉我：“你看见没有，那个脸上有伤疤的人，

是咱们部队一个团级干部。”我说：“我早就猜到了。”他接着小声说：“他正在组织拒绝签名的人成立回国小组，那个隔天串到我们小队里来打牌的人，在暗中联系。”我问他联系上了没有，他说：“联系上了，我并提到了你。”过两天，他告诉我，那人传话说正需我这样能说几句英语的人，叫我暂不要接触，到那天行动起来时，出面与美国人交涉。可惜后来计划落空了。

由于军官队我们一部分同志反控制斗争取得胜利，在“72”对面建立了自己的回国阵地——“71”集中营。“72”的叛徒特务们提高了警觉，加以“回国小组”组织不严密，在敌人的高压下终于暴露。后来听说好些战友吃尽苦头，杜参谋长遭到毒打，担任联络的王同志也被迫刺了字。（这个同志后来在济州岛“十·一”升旗斗争中英勇牺牲。）

这大约是我到“72”不过两月发生的事情。从此叛徒们加强控制，不许串帐篷，不许与别小队的人接触交谈，即使与本小队的人交谈，也暗中有人监视告密。我们听不到一点真实情况，只从当官的口中漏出四大队发生“打架”，一部分“肇事的人”被押到铁丝网关起来，后来杜岗被营救到“71”也说是被美军当局“逮走了”。幸好我们小队的小队长、班长这批叛徒没发觉我们与回国小组有联系，我、晏棣、赵长和、李克、王根生等仍平安生活在那个小队里。

叛徒特务加强控制的同时，政治上的迫害也加紧了。听反动课时间增多了，听了课要讨论发言，对签名去台湾表态。每当这时，就有许多双眼睛注视着我，晏棣他们事事都在看我行事，我绞尽脑汁想法对付。这种情况下，硬顶不行，皮肉吃苦，客观上也起不到好效果，只有对叛徒们诉之以理，对众人动之以情。我装着老实可怜样首先表态说：“小队长，我家有老母，有老婆、孩子（实际我连对象还没找到），我不能去台湾。”针对他诱骗，说什么“签了名就可出铁丝网”、“反攻大陆就可回家”。我说：“反攻大陆要等啥子时候，再上战场打死了回啥家嘛。”叛徒们觉得话不

投机，也只得申斥说：“你不签就是了嘛，说那么多干啥！”无形间我成了队里难友们的航标，叛徒们也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

当时板门店谈判已进入到战俘遣返问题，但我们被封锁得一点也不知道，就连集中营外面的、里面的情况也封锁得很严。长期精神上生活上的折磨，在悲苦无告的绝望中，不少人随大流签了名。特别是过了 1952 年，美国将军李奇微视察 72 战俘营后，叛徒们又进一步掀起签名刺字活动，并制造谎言说，快出铁丝网了，台湾已派船来接了。签名刺字的人逐渐增多。叛徒们在发动签名刺字的过程中，发现我们小队是“老大难”，特别是我们这个班，换了几任班长就是攻不下这堡垒。他们试行分化，把我们拆开，采取个别威胁、利诱，果然个别人动摇签了名。为了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总设法把我调开。一次派我一个人由叛徒领着去打厕所，在帐篷里又发动一次签名，等我转回时，李克告诉我：“陈黄签了(晏棣的化名)。”我马上责问晏棣，他惊慌找到小队长说，他刚才听错了，他不到台湾，小队长气急败坏地骂他一顿。这一来，我可脱不了干系，被叫到警备队。这算第一次触到皮肉之苦，挨了一顿。最后被迫写下：“以后规规矩矩，遵守规定，如有破坏行为，甘受惩罚”的保证书。并立即把我调到军官小队。军官小队是由隐藏身分被清查出来的各类干部组成的。

在军官小队我只呆了一宿。原因是我与六十军侦察营长张治山借抽烟接火说了话。情况是这样：我到军官队没人理睬我，见众人三三五五聚集玩牌，唯见斜对面一个人低着头，缩卷身子在角落抽闷烟。我估计是个领导干部，便假借接火抽烟，想表白一下自己的心愿，说了一句：“一个知识分子，当他认识到真理的时候，他会坚持真理的。”小队长发现我还在搞串连，把我又调到另一小队。

这小队队长很坏，我一去就想给我一个下马威，找岔子整我。借我解手回帐篷迟了一步，抽出棍子准备打我，幸有釜山认识的

一个人出来讲情，才幸免。没两天仍弄回原小队。那时我给人总是一付学生面孔，所以别人对我总显出几分同情怜悯。叛徒们为了讨好人，白天装着一付通情达理的样子，夜里便露出狰狞面孔，常在夜深人静之时拖我去受刑，罚跪在罐头盒上，或双手抱头让他们拳打脚踢。记得 1952 年春，叛徒把我和李克夜间带到铁丝网边，剥去我们的衣服趴在地上，正值春寒料峭，寒气刺骨，突然传来一阵歌声：“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和“团结就是力量……”歌声从“71”那边飘来，顿时象一股暖流遍全身。这歌声告诉我，我们并不孤立。我相信黎子颖、张长惠等战友一定在那里。敌人的毒打越加增强我坚持到底的决心，叛徒们赶忙把我们叫起，穿上衣服带回帐篷里。

现在回忆 1952 年“四八”甄别前的一段日子，也不知当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叛徒谭兴东，这个无耻的家伙充当教员上反动课污蔑我们党，叛徒把我们拖去跪在台下作“靶子”，让人向我们吐口水，一次下来，满头都是痰。特务李大安在我们半碗饭里撒沙子，甚至在我们喝的咸汤里撒尿。这种非人的折磨，也曾使我产生拼了的思想，但我又一想这样等于白死，真正的敌人是背后的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叛徒们造谣说台湾要派人派船来接，我对晏棣说，万一被挟持上船，我们要趁有人观看的时候，一面高喊：“我们不到台湾，我们要回大陆”一面跳海以示抗议。

当豁出去的决心一下，就什么也不觉可怕了。在“四八”甄别前几天，全大队聚在一铁篷里又搞一次集体签名盖手印。当宣布不愿签名的退出时，我立即站起来向外走，接着一些人站起来跟在我后面，等我们跨出门，警备队员握着棒子便劈面打来。我当时提出抗议：“你们说自愿，叫不愿签名的退出去，怎么又打人？”他们被我问住，便停下手来，一个个问：“你以前签过名没有？”凡是以前签过名现在拒签的便连骂带打。我当时免于遭打，却成为考虑处置的对象了。

当天，我们被集中在一个帐篷里。铺位分为两排，我受到

“优待”，铺位特别宽，够几个人躺的，并派有专人在身旁持棍守卫。与我同排是曾签名刺字的人，我对面一排是李克、晏棣、王根生、张治山等未签名的人。当夜对我只是些小动作，有个别家伙故意来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是四川人，便“赏”我两耳光。问原来是干啥的？我回答是学生，也“赏”两耳光。我身旁的守卫，不许我动，只要有一点动静，棒子就打下来。这一夜我几乎没法睡觉。但第二天夜里，李大安来了，他一只手提着用线穿着从刺字人身上割下来的肉，一进门便问：“哪些人是刺过字的？”叫人把衣服脱开，一边说：“刺的字不能叫你们带回去。”随后就动手用剃须刀挨个割这些人身上的肉，并让众人看他当面行凶。当晚被割肉的难友中，有的咬着牙、不吭声，也有的忍不住痛，发出呻吟或惨叫声。这个恶棍行凶完，经我面前出帐篷时，恶狠狠地瞟了我一眼，那晚，气氛确有几分恐怖！

在这几天中，我在被押着去领饭和解手时，暗中窥察，感到营内有些异样，日常的一些活动停止了。叛徒们平时那种趾高气扬的得意劲消失了。人们脸上的表情显得平静。铁丝网周围的喇叭不停地广播，虽然叛徒们不停敲打铁筒干扰，但也模模糊糊听到：过两天要进行个别谈话，到台湾、回大陆将根据自愿把我们分开。我心想总算熬出来了，眼前只不过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估计叛徒们不敢再对我们下毒手，不会出现国民党败退时，重庆歌乐山渣滓洞那样的大屠杀。可是象李大安这类残暴的凶手，对别人的报复，仍有可能。但一想到即使轮到自己也算大限到，得到解脱。心里反而镇静下来，直到了4月8日晚上，头脑也是很清醒的。

4月8日晚上，大约午夜一点钟，我们被带到大队的门口，先上了绑。接着李大安提着棍子过来，叫嚣“不忙带走，让我每人赏几棍子！”这时一大队长李××算是天良还未完全泯灭，忙对李大安说：“联队附，这些人刚才我已经捶过了。”李说：“那就减半一个一棍。”然后押解到“战俘学校”(C. I. E.) 上反动课的大礼堂。



夜显得特别静，空气好象凝固似的。我排在头，一进礼堂，眼前出现这样一幅景象：礼堂内只有正中一盏灯发出微弱昏暗的灯光，使人感到阴森恐怖，地上趴着东一堆西一堆的人，周围站着持棍的打手，象是一群魑魅魍魉。台上那鬼影分明是王顺清，只听他叫：“一大队的带到这里。”我们被带到靠讲台边，一个个被操倒地上趴着。约一分钟，突然有人喊出震撼人心的口号：“毛主席万岁！”我心一震，接着一阵棍棒声。同时身旁的打手用棒杵着我的头威胁说：“你喊，打死你。”他们似乎慌了手脚，聚集在台上窃窃私语一阵子，最后，由王顺清传出话说：“明天甄别，跟我们去台湾的，把腿翘起来。”凡是翘了腿的便被从地上提起来，我身旁的打手用脚踢我说：“你翘不翘。”连问两声，我侧头看左右的人都站起来了，便也就翘了腿，被提了起来。接着王顺清下令，各大队把人带回去。回到帐篷里，大队政训员（我两次进警备队都是他审问，他曾诱导我说：“你们这些学生跟着共产党跑，究竟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进帐篷来对着我咬着牙，哼了两声，吼声说：“吴加明，我恨不得挖你心！”我埋下头不作声。后来王根生说，他当时替我捏一把汗。

挨到天明开始“甄别”时，从一大队开头，我们排在队伍后面，靠近礼堂边。昨晚被杀害的林学逋、阳文华的尸体就挨在我们身边。“甄别”进行中不断传来“抓住他，打”的吼叫声。面临这样的情况，摸不准今天究竟怎么回事，能不能出得去。当晏棣掉头望着我，我没有表示，他向我摆手，我也没作表示。真断不定这一关是吉是凶。直到快轮到我的时候，一块石头打在我的背上，这等于提醒我犹豫不得了，只有拼命一冲了。当我看见戴有“M. P.”字样钢盔的美国宪兵时，便拿定主意，出不去就抱着美国宪兵腿喊：“我要回国……”我一进“甄别”的帐篷，主持谈话的人先说些什么，我没认真听。当他问我愿去台湾还是回大陆时，我斩钉截铁地说：“回大陆！”他仔细地看了一看我，递给我一张卡片说：“你出去，对直朝大门走。把卡片交给美国兵。”我出了

帐篷，三步当两步走近大门前。一个美军宪兵站在中央，接过我手中的卡片一看，忙把我向门外一推。我出了大门，见有一辆卡车套上布篷，一个美国兵示意我从扶梯上去，我踏上扶梯回头向“71”那边张望，他把我操进车里面，并骂了一声“god damn 混蛋。”我上车一看怎么寥寥无几，晏棣、李克、王根生他们一个也不见。我急了，心中好后悔，为什么刚才不通过面部的表情给他们鼓气。到了回国战俘营“602”，与黎子颖、张长惠会面时，提到晏棣我心中好愧。盼到第二次甄别，李克、王根生、赵长和他们都来了，可晏棣仍未出来。李克告诉我：“那天回到一大队，陈黄(晏棣)不断说，吴加明呢？吴加明呢？(我的化名)他急得快哭了。他被叛徒们挟持着，这次甄别时一前一后紧跟着，他怕是出不来。”

回国后，我一直感到终生遗憾的是：我对不起晏棣，我扔下了他，如果他被挟持去台湾或折磨死去，那是我的罪过。40年风风雨雨过去了，但愿他能顺应时势，在海外幸存下来。

写这段回忆，触及到我几十年没向人透露的隐疾。组织上可能因我在72战俘营中的那段表现，审查结论的后面写有一句：“……积极参加对敌斗争，斗争中表现勇敢。”的评语。我扪心自问，我能算勇敢吗？我与在济州岛“十·一”升旗，勇敢献身的人相比，能不汗颜么！

唉！过去的应该让它过去，但愿我的子孙及我们的后辈，不再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吧！  
(吴均度)

### “72”魔窟中的经历

1951年5月，我不幸在五次战役中因患重病而被俘。住了三个月战俘医院，尚未恢复健康就被送到巨济岛72战俘营一大队十小队。

那时叛徒们已经掌握了战俘营领导权，在广场上升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旗，整天对干部党员进行毒打、体罚，一片白色法西斯

恐怖笼罩着战俘营。联队、大队设有警备队充当叛徒们的打手，不准战俘两人低声谈话，不准串帐篷。强迫我们天天唱反动歌，上反动课。说台湾马上派人来接管，要枪杀一批共产党员等等。

一天，九小队一班班长李木生给大家读《自由天地》小报，报载国民党李弥兵团残部在云南边界活动，李即说：“反攻大陆了”、“在云南登陆了”。我就过去告诉李：“班长，云南并没有和海相接。”我随手摸了一个石子在地上画了一个中国地图，并讲给他哪些省份沿海，哪些省份和外国接近，讲了云南的位置，画出了朝鲜半岛的位置。说：“咱们现在的巨济岛是与釜山隔海相望。”李木生很惊奇地说：“这些知识你都知道，你是什么文化程度？”我说：“我是大学生（实际不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能推算未来的事呢。李弥是国民党兵团司令，被解放军赶到云南和缅甸交界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你我都知道国民党那么多军队都不战而降，这是人心所向，现在蒋介石退到台湾靠美国的第七舰队保护，哪有什么力量反攻大陆呢？”这一席话，说得李木生无言以对，内心很佩服我，就问：“你说咱们能到台湾去吗？”我说：“根据朝鲜战争的性质，不同于国内的国共战争，咱们的去向，现在谁也说不来，各人都要慎重自己的行动，不要被别人利用自己。”李木生直点头，认为我讲的话很有道理。

没几天，我小队文书被调釜山审查，经李木生推荐我担任了小队文书。我便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借登记花名册时，对党团员说：“要坚定立场，不要跟坏蛋走。战争是不会长期打下去的，板门店已从7月份开始停战谈判。一旦停战实现，我们就可以回到祖国去。”对有顾虑的同志就讲：“朝鲜战争有特殊性，五次战役失利，指挥上也要负责任。自古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要看被俘后个人的表现。”经过启发、教育，同志们改变了消沉情绪，形成了准备回国的气氛。同志们在议论中说：“咱们文书可能是个连的指导员，反正是一个共产党。”

在我掌握同志们的思想情绪后，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核心组

织，以便更有力领导被俘人员向敌人斗争。这时，我听说军官小队中有个团参谋长叫杜岗。我便派联络员谢国钧去和杜岗联系，汇报我小队开展工作的情况。杜岗同志立即指示：“成立回国小组的总支部，各小队设支部。总支部设在你们小队，由你们文书史振荣担任总支书记。”谢将这一指示告诉我后，我即找杜请他另选良才。杜岗果断地讲：“我是代表党委意见派你为战俘营回国小组总支部书记的，你已具备这一条件。”并说：“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出主意，想办法领导群众的人。同志们对你反映很好呢！”原来五三八团一个排级干部曾告诉他说：“十小队文书是个党员，正动员大家坚持回国呢。”杜并向我介绍了赵国玺同志，要我们细心大胆地工作。当我接受这一任务时，彻夜未眠，想怎样能担此重担呢！我草拟了一个简单的纲领，大概是：1. 高举爱国旗帜。在被俘后这一特殊的环境中坚定立场，开展向敌人斗争是抗美援朝的继续；2.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扩大组织，最大限度地孤立叛徒。坚决回到祖国去；3. 以秘密的单线联系，利用同乡、熟人进行串连，组织回国力量，建立有力的核心。我随即指定两个临近的小队负责人：九小队是吴玉泉（山西永济人），八小队是李在岐（山西平遥人）。当时，与我直接联系的难友有谢国钧、姜朝仕等人。

谢国钧是四川人，是个苦大仇深的战士，在五次战役中腹部受伤被俘。在战俘医院治疗中，由于手术马虎，腹部一尺长的刀口缝合后受了感染，痊愈后象条大蜈蚣长在肚皮上。他身材矮小，年龄比我大几岁，身体消瘦，被允许每天可以到外边晒太阳，较为自由，也不易引起敌人注意。我安慰他回国后一定会得到很好的治疗。他表示坚决回国。我叫他当联络员，他表示坚决听我的分配，多次和杜岗联系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并串连自己认识的同志参加回国小组。他的同乡罗元清也做了很多工作，在敌人痛打我后，他还在生活上给我很多照顾。

姜朝仕同志是个青年团员，被俘后遭到敌人毒打并被强行刺

上了“反共抗俄”字样，从外小队调入十小队后。我得知这情况，便对其进行安慰鼓励和给予生活上照顾。但他思想上仍背有包袱，在全小队都在议论“和谈成功、回祖国去”时，他却沉默无言。一天，我对他讲：“我可以帮你把字改刺一下。”他问：“刺什么字？”我说：“我们是抗美援朝战士，目前蒋匪特务横行，我们唯一任务是灭蒋。我帮你改刺成‘抗美援朝’这也是我们行动的纲领。”他不加思索地说：“那很好。”于是，在 1951 年 10 月我就帮他改刺了字，并任命他为十小队负责人，但后来被敌人发现，他挨了顿狠揍。

不久，敌人假惺惺地把《日内瓦公约》战俘待遇之规定发给了战俘每个小队一本。我即抓住这一公开文件，对其中的战俘在押期间的的生活与政治待遇，尤其是停战后双方立即全部释放对方战俘，并遣送回国的内容向战友们大张旗鼓地宣读，讲解条文的含义，从而鼓舞大家回国的信心。同时敌人又给战俘发下明信片，动员战俘向家乡写信，以示他们民主。我便借机写了一张“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我是这样写的：“秘书长，当我们看到日内瓦战俘待遇之规定后，心里很高兴，十分盼望能付诸实施。究竟何日能实现这一诺言，这恐怕是一个没有谜底之谜吧！？”落款“中国战俘”。我利用各大队轮流看电影之机，找小段（陕西光县人）投入“战俘信箱”。当警备队员将这个明信片递给联队长王顺清后，王看了未作声，即交给副联队长李大安。李文化程度低，当念到“没有谜底之谜”念了几遍不解，还骂句“他妈的，还什么谜不谜的，我一定把这小子抓住狠揍一顿。”王顺清笑了笑说：“六个大队都看了电影，要在这 7000 人中找到写信的人谈何容易？算了，我们不送出，它能起什么作用。”这一情况是联队部卫生员小李告诉我的。他在一个夜晚由他的同乡陪同找到了我，说他早就想和组织取得联系。我除鼓励他坚定回国信心外，并布置给他有情况火速告诉我。

敌人发的《新闻天地》杂志是香港出版的。有一次上面突出

报导了李弥残部想越境逃往台湾被缅甸当局缴械扣禁在金兰湾战俘营里，他们在墙壁上写着：“一条命、一颗心，要回到台湾去。”王顺清认为这正是他们学习的楷模，便在 72 战俘营的墙上照样写出大幅标语。我立即给同志讲：“李弥是国民党部队被缴械后都不能到台湾去，何况我们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能到台湾去吗？我们属国际战俘，停战后一定要交换回国。”不管是敌人反宣传或者从釜山带来的和谈消息，我都不失时机抓住具体内容教育、启发同志们的回国信心。

斗争形势发展很快，很多好同志遇见我都隐蔽地伸出大拇指。不久，军官大队部份军官又经过斗争到了“71”，成立了回国战俘营。我们也想冲出阎王殿去到“71”，我着手挑选身强力壮、斗争性强的同志成立敢死队。在美军海边仓库被放火烧光后，李木生也产生了烧毁大礼堂的念头。李木生原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班长，解放后编入我军。被俘后，曾想混个俘虏官生活能优裕些，虽未如愿，但不甘心，故在当班长期间，常常出面给战俘们作反动宣传。自从我与他谈话后，他也决心回国。他总觉得初期表现不好，想做一件突出事情表明自己是真心拥护共产党的。他准备了几瓶汽油，想烧毁那座令人憎恨的大礼堂。这事他向我讲后，我说现在的中心任务不是对敌人破坏，应积极扩大回国阵地。如过早暴露势必遭来敌人严格控制，对我反而不利。他没真正理解我的意思，擅自去向杜岗请示，不幸，被敌发现，遭到毒打。在审查李木生的第三个晚上，杀人魔王李大安把我叫去，我深知这是敌撬开了李木生的嘴将我供出。我假装镇静和敌争辩，李大安亲自对我进行残酷的敲骨击髓，打伤我双脚内外踝骨，接着又专设刑场，将我打昏后再泼醒，使我躺倒月余不得痊愈，多亏战友们关心照顾。他们对杜岗则采取活埋恐吓手段，将杜岗用毛巾堵住了嘴，拉到挖好的坑前，推下去，盖了几锹土又拉上来问：“你都组织了哪些人？”杜严词说：“你们讲民主吗？对我多次毒打，杀害军官是犯法的！”他们再次推杜下坑，比上次多盖了几锹土。这时，王顺

清来了，说：“把这个老顽固送到宪兵司令部枪毙算了！”后来在“71”的战友们发动了强大斗争的要求之下，美方被迫将杜岗送到71回国战俘营去了。从此，杜岗脱离了危险，我们却失去了最大的精神支柱。这就是敌人所谓的粉碎了共产党的一次暴动事件。

过了几天，叛徒又对我说：“你多亏有老牧师为你说情，才饶了你，但必须刺字。”我说：“你们把我打成这样，等我伤好以后再说。”叛徒说：“不行，要不马上刺大字，你看到我们给李凤祥刺的吗？还要比那大！”我说：“让我考虑一下，明天给你们答复。”我一夜未眠；心想：如坚决不刺，势必会被敌刺上又大又黑的反动字，不如应付一下。第二天，我爬到姜朝仕处叫他替我刺，将字写小些，模糊些。当我将右臂袖卷上时，姜迟疑了，因当时敌人刺字都在左臂上。我说：“留下左臂刺‘抗美援朝’。”

在1952年4月“甄别”那天，我就拼死要求回国。到“602”后，我即改刺成“坚决灭蒋”，并在左臂上刺了“抗美援朝”。洗去了“72”的叛徒们抹在我心头的耻辱，从此，我便更加积极地投入了赵佐端政委和杜岗参谋长他们领导的回国斗争。

（史振荣）

### 86 战俘营的反变色斗争

凡是从86战俘营里出来的战友，都难以忘却我们在那里坚持反变色斗争的300个日日夜夜！

1951年6月，86战俘营刚建立时，那里的人们可以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毫无顾忌地串帐篷寻知己，传递和谈进展情况。在2大队部里，原五三八团2营营长马兴旺可以威严赫赫地指着身为大队长的白佩鸣的鼻子厉声呵斥：“你算个什么东西！”同时他的小通讯员杨永成，也仍然可以在众多听众的热烈欢迎下，用他那优美动听的童声演唱《王大妈要和平》。比起当时已经被白色恐怖笼罩着的72联队，我们真是活在“自由天地”了！

在美军的战俘集中营里，这种“自由”当然是爱国者们反变

色斗争的成果。而这场斗争在第十一收容所第一个“中国大队”成立时就开始了。

1951年6月中旬，五四〇团文化教员“中国大队书记长”郭乃坚在“军大”同学阳文华的建议下，利用“职权”清除了那个当众说了声“娘的，都不干，俺干。”就当上了“大队长”的变节份子王某人。保举了“军大”同学王怀麟当了“中国大队”的第二任大队长，同时也为“袍哥”头头应祥云“求”了个副大队长的职位。这就巧妙地完成了一套战俘营里“改朝换代”的程序，安定了那里的“大局”。保证了爱国力量在这个大队当家做主。

不几天，原十二军的“俘管队长”兼翻译高子（化各高化龙）被押送到我们大队，但任了大队翻译，更加强了我们反变色斗争的力量。

经过两次具体事件，高翻译就在大家心目中树立了威信：一次是他与克扣战俘食品罐头的美军讲道理，被那个美军恼羞成怒打了一顿，还打断了半截门牙；另一次是这个中国大队1000余人被押送巨济岛途中，他见南朝鲜士兵任意对难友们搜身夺取财物，便邀另一位翻译冯泽群一道向船上的美军军官提出抗议，美军只得制止了那种“有碍联合国军体面的行为”。

这个中国大队先是到达岛上第85战俘营，随即又迁入新建的第86战俘营的。那就是“86”的第一批中国战俘——86战俘营一大队。也是“86”的奠基石。当时“袍哥大爷”应祥云把王怀麟挤跑当上了大队长，阳文华在郭乃坚、高化龙支持下立即担任了大队副，并就势把一批有头脑有能力的爱国知识青年，他的军大老同学吴春生、李炽、罗厚根等安排在大队、中队担任书记、文书等职，逐步夺取了实权。基本上左右着这个大队的“政局”。两三天后，高化龙和郭乃坚以及杨洪、王青华等几位书记就把行李搬到大门口东侧美军管理人员白天办公的帐篷里，由于白天美国人在这里发号施令，掌握着全营地的被俘人员的生活起居，出出进进的行动，因而这里实际上是营地的“最高权力机关”。



一天上午，这个大铁丝网里押进来一批人，他们队容整齐，行动拘谨。其中一人跑步出列进入办公室，面向郭乃坚立定、敬礼之后，竟高喊一声“蒋总统万岁”。接着，又以正规军人方式报告：“大队长白佩鸣前来报到！”

好家伙！这怎能不叫郭乃坚心惊肉跳呢？单是那班子“袍哥”们就够对付的了。现在又冒出了国民党来，怎么得了！不过，郭乃坚毕竟是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他不动声色地从容地还了礼，问清了人数，并给他们命名为“第二大队”，安排了驻地，俨然以一个上级领导人的身份打发了那个姓白的。

下午又进来了一批，也是 1000 多人，完全是一群“散兵游勇”的样子。高化龙陪着美军士兵忙了好一阵子才点清了人数，给他们分了帐篷，使他们安定下来。稍停，一个人进到办公室来悄悄对郭乃坚说他是一八〇师的炮兵参谋，姓赵。又说他们那批新来的人里，还没有组织领导……郭乃坚立刻明白了他的来意，问他是不是党员，那人点头应是，并说“郭主任”了解他。真叫人喜出望外，终于有个共产党员干部出面了！郭乃坚立刻随他到了他们的驻地，当众宣布，“赵同志”就是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并要求大家要象在部队里一样“一切行动听指挥”。

第三天又进来两批人。他们都已有了自己的建制和各级政治态度尚不明朗的领导班子。郭乃坚给他们指定了驻地，挨次命名为第四、第五大队。

营地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人，可真够热闹的了！互相之间少不了有这样那样的摩擦和一些吵吵闹闹的事端发生。

美军总管决定在这里成立联队部。郭乃坚毫不犹豫地当上了“书记长”。美军总管要高翻译兼当联队长，他却推举了“袍哥”头子应祥云当联队长。

应祥云十几岁就在国民党杂牌军里混，由于身材瘦小，体质不佳，受不了行伍之苦，便出川“下江”，闯过上海大码头，学开过汽车。解放后，日子过得还可以，抗美援朝期间前线急需汽车

司机，他应征到了朝鲜。不久“苦”与“死”吓破了他的胆子，无奈，就开车投降了敌人。实指望在“联军”面前会大受优待的，岂知美国人把他和别人一样不问青红皂白就关进了铁丝网里。幸而“四川兄弟”们义气为重，凭他几句行话就折服了众人，被奉为“大哥”。他决心在战俘营里闯闯这个“国际码头”，占个“地盘”，以便少受些饥寒之苦。

他承认共产党没有亏待他，他也决不去坑害共产党。所以当时高化龙、郭乃坚和一些青年知识分子都认为利用应祥云这股势力去抵制白佩鸣那一反动势力是再好不过了。

应祥云当上了联队长，阳文华也顺理成章地当了联队副。接着又成立了“维持全营秩序”的警备队(P.G.)，应祥云把他的兄弟们全都编了进去。以后各大队也都成立了自己的警备队(P.G.)，名义上归联警备队领导，实际上则是一种权力的割据，对他们是一种牵制。

那时下面的各大队都有点“各自为政”，彼此很少联系，对应祥云也是阳奉阴违，特别是实力雄厚的四大队长代玉书，和铁杆国民党二大队长白佩鸣，最叫应祥云头疼，总觉得他们早晚会对他来个“取而代之”。这样，就使得应祥云不得不争取人心，尽可能给广大难友们以相对的活动自由，他指责过白佩鸣，不要把国民党那套军阀作风搞到这里来。他常以“救世主”自居，动不动就对那些好“犯上”的小队员说：“你嫌这里不好，可以到‘72’去嘛！”

在那种政治气候下，第86战俘营的确有过短期的相对“和平”、“安静”和比较“自由”的生活。大多数难友已经摆脱了被俘初期的那种混乱状态，抢饭打架的事没有了，怨天尤人、骂大街的人也少了，不少人克服了痛苦消沉情绪，恢复了元气，共产党的歌声不时能听到了，喊过“蒋总统万岁”的白佩鸣也只得装聋作哑。

过了一段时间，六大队来到“86”营地，形势更有好转。该

大队的党员干部和爱国知识分子在釜山就已经控制了各级领导权，到“86”营地后就更加积极活动起来，孤立了从东京受训回来的大队长王福田。王福田带来的几个亲信也只能随大流当个老实俘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六大队到这里来的有几个“风云人物”，其中当首推化名“李彦”的马兴旺。

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英雄营长，被俘后仍是本色不减，面对险恶不畏不缩，勇敢斗争。他在釜山受金日成大学的一位大学生的启发，很快认清了战俘营里的形势，主动站出来在被俘人员中维持秩序，当了大队长，建立了以“自己人”为主的领导班子。不料被叛徒告密，暴露了干部身份，被敌人调到美第八军情报部(G—2)审查，“大队长”的位子被白佩鸣占据了。待审查结束，回到第十一收容所，得知那个大队去了海岛，很是懊恼。幸而见到了师部宣教干事化名“金甫”的张城垣，得以换了卡片，复改为战士级别，隐蔽在小队里来到了“86”。他放下行李，就去找白佩鸣算账，训斥他胆大妄为，警告他必须老老实实。当天晚上，他的小通讯员杨永成就主动找到他汇报了“86”的情况，向他转达了师直炮兵主任郭兆林的指示，要他把全营地的青年团员们组织起来，开展斗争。此刻他高兴极了，这可是他被俘以来第一次听到的上级指示啊！小杨还告诉他，这里还隐藏着两个营级干部：一个是一七九师的张金苏营长，一个是二十军的徐益生教导员。第二天老马就去约见他们两位，交换了一下“86”的形势看法。随后他又去串帐篷寻找自己的老部下，造访了联队部，走访了几个大队，坦率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热情地鼓励那些“在位的”知识分子们把好各自的岗位，利用手中的“权力”保住“86”的大好形势，巩固住这块回国阵地，和已经变了色的“72”对着干！他可能是那里最早敢于大胆信任青年知识分子的被俘营级干部。

当有人反映，阳文华在下面秘密调查共产党员，他有点儿不相信，可又不能不防备。他自信凭着他“老侦察”的眼光，只要和阳文华见上一面，就能看到他的心底。于是他把阳文华“请”到

了伙房小队的帐篷里，开始了“侦察”谈话。

“阳文华同志，你是咱师部的报务员么？”

在铁丝网里能有党员干部当面称呼自己是同志，这不能不使阳文华肃然起敬地郑重地回答了一声“是”。

“听说你在秘密调查共产党员，有这回事吗？”

“不错，有这回事。”

“目的是什么？能说给我听听么？”

“当然可以。”阳文华稍一迟愣，又说“不过，说了不一定能使你满意……我就是为‘调查’而调查，没别的。”

很明显这位年轻人是在撒谎！且未等对方开口他又用挑战的口吻反问一句，说：“调查有罪吗？”

如果换了别人也许此刻就要动火了，可是，马兴旺一点不动声色。他似乎已经听出阳文华的话里有话。而且从他的目光里已看到了几分责备情绪。此刻，他反而更放心了。对这位俘虏官有了好感。觉得在众多的党员干部不愿出头露面的时候，能有这样的有心人在设法摸清党员们的底细……这是多么难得的呀！然而马兴旺是位老练的军事干部，并不急于向他交底，仍是以攻为守地说：“那么，你考虑过这事的后果没有？”

“死到临头再说吧！”

他们谈话简直是在打哑谜，幸而他们都是“灵犀一点通”的人。阳文华感觉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而马兴旺也更加坚信大力支持年轻知识分子是没错的。

杨永成对老马说，四大队的青年团员们已自动组织起“弟兄会”，打起“患难相助、不忘爱国”的旗帜来积极开展活动，不少党员干部参加了“弟兄会”。对此，老马很感兴趣，认为像四大队那样，建立自己的“武装”是集中营里的斗争方向，他打算抓好这个“点”带动全营地。他便将共产党员朱政权派到四大队帮助工作。朱按老马指示劝说“弟兄会”的大哥代玉书在大队里禁止体罚，取消俘虏官吃“大碗饭”的特权，多多争取群众。老马

并亲自到了四大队和代玉书推心置腹地面谈。对这位“义军”领袖大为称赞，并鼓励他好好干。老代深为感动，不仅在本大队取消了“大碗饭”，并且废除了“职员”们的一切特权，为全营地树立了榜样。一、五两个大队的大队长、“弟兄会”成员王刚、岳大宏积极响应，都在本大队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从此，第一第五两个大队和四大队靠得更紧了，行动也日趋一致了。

代玉书原来是个使人望而生畏的“袍哥”，他以自己的行为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在营地是一位颇有威望的“乱世英雄”。这与马兴旺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然，对这位“大哥”影响至深的还有赵明智、耿基增、时占魁这些党员干部。

马兴旺不仅鼓励小通讯员杨永成在全营地放开歌喉，尽情地高唱革命歌曲，他还经常到各帐篷去鼓励那些歌手们的表演。在应祥云、阳文华和郭乃坚被调出审查的阶段，联队副王福田趁机到处叫嚣不许再唱共产党的歌曲。老马听说，大为震怒，立刻找到他当面质问：“谁敢说让大家唱共产党的歌曲？难道要共产党的部队唱国民党的歌曲吗？听说你手下还有人敢偷偷调查党员干部。问问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想不想回国，还想不想活了！”

马兴旺尽管文化程度低，但他肯动脑筋，丰富的阅历使他见多识广，他有见微知著的目光，又有临危受命的无畏精神。所以，他到哪里，哪里的斗争形势就会有起色。可惜，他在“86”只停留了40来天，就被“神秘的美国人”菲利普跟踪而至，随后将他这个“校级军官”调离了。

39年后，笔者有幸和他在成都相遇，他对当年“86”的“失利”仍耿耿于怀，曾自责地说：“我那时也有些右倾，没有尽快地建立个党的组织，使那些孩子，那些学生娃娃没有个明确的依靠！”

六大队的书记长是张城垣（化名金甫），他来到“86”虽然晚了一步，却是“书记帮”里最活跃的一员干将。他的“副业”常常是多于“正业”的，他平常不是到各大队去“联络感情”，就是到联队部去“汇报工作”，要不就是到“诊所”找朝鲜医生去“看

病”。书记的事务多是由门培英、何雪泉、周灿行他们去应付着，其实他在六个大队的书记之间起了横向联合的纽带作用。他消息灵通，时刻注视着铁丝网内外的形势变化，监视着叛徒们的动向，及时发出讯号，发动群众共同对敌。他掩护马兴旺，紧跟马兴旺，而后他又自觉地接替了马兴旺，他和马兴旺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在马兴旺被调出审查的前一天晚上，有人说王福田要把老马打一顿才放他走，金甫便及时把老马送到了第一大队保护起来。马走后，他实际上担起了领导“86”的反变色斗争重任。

安保元也是随六大队来的。他在釜山第十一收容、十收容所做过翻译，在那里他结识了张泽石、林学逋，和马兴旺、金甫同过事。来到这里，金甫支持他到联队部去，高翻译很欢迎这位山东老乡来做他的助手，美国人自然也希望能多一个翻译，便利工作。只有王福田曾别有用心地说：“你到那里也好，有什么动向及时通知我。”岂知这位川大学生既不爱政治，也无意于军事，只想“科学救国”。1948年他为了再考清华大学没随父母到台湾去，当了俘虏仍是念念不忘“清华”。别看安保元平常是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其实他是泾渭分明的，在“86”他只和马兴旺、金甫、高化龙、张泽石、郭乃坚说心里话，很少和别人接近。1951年10月9日为反对升国民党旗“打架”前他总觉得自己是个被领导者，“正经事”由别人去做。“打架”后失去了依靠，他才觉得担子的沉重，只得鼓起了勇气。尽力去做些“分外”的事了。

还值得一提的是“86”的“翻译官”们曾经做过出色的敌工工作。因此，在“86”的美军管理人员中，有几个下士官对战俘产生了同情心，这对当时“86”内的“政局”也不无影响：

1 带领抬粪队的黑人泰勒（TayLor）。战俘们常跟他开玩笑，叫他“王八”，他不恼，只是笑着回敬一句：“你王八”；有人用粗话骂他，他就说：“不明白。”其实，他是明白的，只是不愿反唇相讥罢了。因为他早就跟安保元学了许多中文了。

2、波多黎各人鲁意斯（Louis）。他把杨永成看做是自己的小弟

弟。“打架”以后，小杨的处境危险，他就把小杨送到了“71”去。

3、墨西哥裔的赫南代斯(Hernandez)更是令人难忘。在紧急关头安保元求他设法把联队部的书记王青华、杨洪和小通讯员张世金送到“71”去。他不仅把事办成了还能保密到底。

最后应该提一下罗根上尉(Captain Logan)。他军衔虽不高，却是个老资格，是个喜欢戴高帽的人。他常常为他管辖的战俘营里争取些物质利益，搞些卫生设施什么的。

他们都不干涉战俘营里的正常活动，乐意接受战俘提出的意见。所以，金光铄医生才能巧做手脚使郭兆林、金甫、高化龙等在紧急关头“因病住院”，夏天拒绝穿红色囚服的斗争才得以在他们的暗中支持下取得胜利。

现在回顾起来，那时的“86”之所以能保持“红色”有三股力量在保护着：首先是党团员们自动组织起来，团结群众，开导那些回国有顾虑的伙伴，都来参加对敌斗争，共同保卫这个爱国的大集体。他们的活动一般都是谨慎的，秘密的；其二是那些有正义感和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们，他们使用各自的文化武器，占领了“合法的岗位”，尽心尽力地掩护着党员干部，保护着爱国难友，巧妙地利用叛徒特务与管理人员之间的矛盾，联合各派爱国力量共同抵制反动势力的入侵，抑制了叛徒们的活动。他们表面上“为敌人工作的”，有人称之为“书记帮”，如翻译、书记、文书、卫生指导员、各部门的管理员、医生等大大小小的俘虏中的“职员”，也有少数带“长”字头衔的俘虏官。再就是代玉书所领导的“弟兄会”。开始他们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兄弟不受欺负，随便起了称号，占下地盘显示江湖义气罢了。那时他们有个会规：“患难相助，不忘祖宗。”后来，在一些共产党员影响下，明确了政治方向，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在本大队拥有了大批会员，还吸收了其它大队的骨干分子参加。会员的成分也有了变化。他们之中既有地道的“袍哥”，也有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连排级干部，很快便成了一个坚持回国的战斗集体。他们敢于斗争，疾恶如仇，

专和叛徒们作对。事实证明，在“86”的历次斗争中，他们都是冲锋陷阵的好汉，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们那杆“聚义厅”上的“杏黄旗”已经染成了红色。

遗憾的是，当时“86”的主要领导人，较多地把希望寄托在和谈成功、战俘遣返上，对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没有及早建立一个领导核心，把这三股爱国力量紧密结合起来，更有效地将反变色斗争推向有统一组织和领导的高度！

1951年7月中旬， “72联队”全面“白色化”以后，美方将其矛头转向了“86”，于是“86”的形势开始变化。首先是美军随军“牧师”伍培礼(Woodberry)进入“86”来“传教”了。

这个老狐狸的确狡猾，他进来出去都是十分警觉。记得头几次来“传教”，广场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像观猴似的围着他凑热闹，还有说风凉话。可他既不生气也不泄气，仍是一本正经地在那里表演着他对上帝的“虔诚。”日子一长，居然有人“信教”了，后来就多了起来，再往后他就敢钻到帐篷里去秘密活动了。开始并没有引起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多大的注意。

在他“秘密”活动没几天(7月下旬)， “86”的三位最高“俘虏官”应祥云、阳文华、郭乃坚就被调往釜山进行审查；显然这是敌人试图以“偷梁换柱”用“自己人”来“管理”“86”的一次重要行动。

得知应祥云要被调出审查的消息，当晚，高化龙和安保元就抓紧时间研究对策。他们都认为“联队长”不能空着，必须马上填补一个“灰色人物”。在人选上，安保元提出了第三大队长张恒，高化龙也认为合适，当即就定下来。第二天一大早，通过应祥云的推荐，美军上尉说声“OK”，新任联队长便走马上任了。待到王福田闻信赶来时，木已成舟，但美国人还是安排他当联队副，挤进了“86”联队部，当上了二把手。

为了对付敌人的第一次进攻，高化龙、安保元和联队部其它难友采取了“孤立法”使王福田在联队部成为“多余”的人，他



和谁也说不上话。他曾想把六大队一位“华大学生”拉到联队部当翻译。高化龙听说那人曾给驻南朝鲜台湾大使馆写过反动文章，便在“试用”之后对美军上尉说：“他还是以当大队翻译为宜。”就把他给打发回去。王福田在联队部受孤立，到下层更是不受欢迎。他除了和白佩鸣、程立人等一丘之貉凑在一起，常常龟缩在六大队部里，很少到联队部去“办公”。

大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一天，美军总管告诉高化龙要各大队推举出各自的候选人，准备参加全联队的“spokesman”（代表）的竞选。看来美国人是想在战俘营里挂上一块“民主”的遮羞布！我们决定利用这次机会鼓舞士气，为了竞选，“书记帮”都动员起来了。金甫串遍了整个营地，到处游说，终于使大家统一了口径，最后以绝对优势取得竞选的胜利，一大队的“自己人”肖树君当选为第一任联队总代表。这是一次爱国力量的大检阅，对白佩鸣那一小撮反动分子则是一种莫大的威慑，对新任联队长张恒也是一种制约。这引起了伍培礼“牧师”的关注，何况前几天美军管理当局在“72”推行战俘穿红色囚服毫无阻力，而在“86”竟推行不下去。这件事也显然促进了敌人必需完全控制“86”的紧迫感。

8月2日，在“72”被称为“活阎王”的联队副李大安被派到“86”当联队长，随他来的还有30来名“保镖”。他们一来就钻进了二大队白佩鸣的帐篷，伺机行动。这是一次露骨的夺权行为，不能不引起“86”爱国力量的极大震动。高化龙匆匆赶到四大队，对代玉书说：“李大安来，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来了！”那些平时看来吊儿郎当的“弟兄会”员们迅速果断地采取了行动，代玉书不愧为“义军”的首领，他深知李大安当上联队长的后果。在共产党员赵明智、时占魁、耿基增的支持下，他于当晚指挥弟兄们包围了二大队部，由曾德全、陈致君等武艺出众的好汉将李大安叫出来痛打，这个活阎王被打得连爬带滚跑出“86”哀求美军将他送回“72”。这次反变色斗争以胜利告终，就连王福田和白佩鸣也吓得求“牧师”大人将他们转移到“72”去避难了。

敌人当然不会甘心失败，几天后，就在大家欢庆胜利之际，代玉书以“肇事犯”罪名被敌人抓走。尽管赵明智这个老侦察员义不容辞地担起了代玉书留下的担子，但已严重地削弱了“弟兄会”的力量。

李大安被打跑了，六大队长王福田、二大队长白佩鸣被吓跑了，这应当是爱国力量在“86”夺取全联队内部控制权的最好时机。如果这时候在“86”有一个核心领导和全联队统一的地下组织，当机立断将各大队各级俘虏官，联队警备队队长、特别是将“牧师”辛苦经营的特务据点“C. I. E.”学校的大权拿过来，“86”绝对是另一个局面。当时我们只知道为打跑李大安拍手称快，还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没有人出来建立统一的地下斗争组织，而敌人却开始加紧发展统一的“反共抗俄同盟会”了。

李大安打跑后，伍培礼“牧师”来传教的次数明显增加。“听传教”的人也越来越多，“校长”程立人也不务正业，忙于在“教友”中发展“反共抗俄同盟会”。与此同时，一个神秘人物周演达也来“86”担任了联队警备队长，原来那些应祥云的袍哥弟兄失去了头头，多数都跟着周演达干了。不久，“反共抗俄同盟会”完全控制了联队警备队。于是“C. I. E.”学校增设了“政治课”，公然由联队警备队派人命令各大队轮流去听反动课。

从8月初到9月中，仅仅一个多月，“86”的大好天下就乌云笼罩。而我们的“书记帮”大多数虽有爱国热情却缺少斗争经验，郭乃坚于9月中回到“86”，虽然官复原职，但这时他个人已难以左右局面。“书记帮”其他人也只是各自为政努力控制自己“势力范围”不变色罢了。联队部的老高老安这时也只得眼看敌人暗中活动日益猖狂而没有更多办法，“弟兄会”据说自代玉书抓走后，也在日益分化，赵明智他们在忙于加强内部团结而无暇多顾。

9月中原来的联队副阳文华回来也已丢失了官位，虽然仍跃跃欲试，但没有了联队副的护身符，活动余地也不大了

9月中倒是从釜山来了个英文翻译张泽石，现在知道他是领了赵佐端政委的指示来“86”协助金甫开展斗争的，这位搞过学运和敌后武装斗争的地下党员来后即担任联队部翻译。他利用这个身份一方面在联队部很快和老郭、老高、老安三位“同事”建立起感情，一方面和金甫一起“走访”了一大队、四大队、五大队、六大队结识了那里的地下党团支部时占魁、赵明智和“弟兄会”的王刚、岳大宏等领导人。金甫和他打算尽快把“86”的三股爱国力量联合起来，阻止“86”形势进一步恶化。但看来为时已晚，到了10月初，我们尚未联合好，敌人已经准备公开亮相了。

这期间，程立人曾把张泽石请到“C.I.E.”学校去“赴宴”，逼他表明政治态度，邀请他“入伙”。张泽石巧妙地用“请老兄去问送我来‘86’的美国人就可知究竟”来回答了这位“反共抗俄同盟会”头子。

10月上旬，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板门店美方代表急需“中国战俘大都不愿回国”的证据，伍培礼也就送来国民党旗叫程立人、周演达他们在“中华民国国庆”日“双十节”升旗，以便拍下“86”中国人升了青天白日旗表示要去台湾的照片，送到谈判桌上去。

消息传来，“86”的爱国力量忍无可忍了。金甫、张泽石、时占魁、赵明智他们研究，决定以四大队“弟兄会”的力量为主，在10月9日晚突袭联队警备队夺走国民党旗，并争取一举将叛徒们抓起来赶出“86”。

这就是著名的“86”夺旗斗争，但敌人亦早有准备。

10月9日晚，美宪兵司令部的武装已做好随时出动的安排，当我们正与联队警备队搏斗，并已夺走国民党旗的关键时刻，美军亲自上阵，开来了坦克和一个连武装进入了“86”，制止了中国人的“内战”。随即命令全部回到各自帐篷，然后让警备队员（P.G.）们，按照他们事先已摸清楚的名单，将“86”的主要斗争骨干100余人逐个抓进小监牢毒打，并以“暴动份子”罪名将其中

81 人关入宪兵司令部小监狱。除金甫已通过朝鲜医生提前转去“64”医院外，张泽石、时占魁、赵明智和“弟兄会”的中坚分子皆被抓走。经过这次斗争，“86”元气大伤。高化龙于打架当天走了，安保元后来呆不下去，也设法离开了“86”。“书记帮”里的骨干吴春生、王铁龙、李炽他们也经郭乃坚帮忙，趁釜山要“中国劳工”之机去了釜山第五收容所。仅郭乃坚仍坚持在当他的联队书记长，尽自己力量去保护一些斗争骨干。

“86”终于变了颜色！

时过 39 年后，有几十位当年的老首长老战友，在成都相聚了。他们流泪，他们拥抱，深情地追忆着往事，从由衷坦率的话语中渗透着多少难以排遣的遗憾呀！

大家谈来谈去，认识到历史有它的偶然性、更有其必然性。“86”的变色因素多着呢，不能怪哪几个人！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在战俘营里敌人的力量远比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战俘大得多！而我们都已尽力参加了那场伟大的爱国斗争。当时留在“86”的难友们也并未停止反变色斗争，广大党团员、爱国知识分子、“弟兄会”员都在继续以各种方式跟敌人“对着干”！不少人在敌人残酷折磨下，仍然拒绝刺字、写血书，因而才会在“四八甄别”时，仍有 3000 多人挣脱敌人控制，来到“回国支队”。应该说我们被俘后自始至终是坚持了反变色斗争的，是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的！

（吴春生）

### 监狱里成立党团支部

1951 年 10 月 10 日，美军将我们 81 名“中国战俘暴乱份子”抓进了巨济岛美军宪兵司令部监狱。我们是在“86”反对叛徒在“双十节”悬挂国民党旗的斗争中，在美军直接支持下被叛徒逮捕和毒打的“86”部份斗争骨干。

我们已成为“刑事犯”，将面临美军“C. I. D.”（刑事侦查部）的审讯；而更为严重的是，这次斗争后我们的政治面目已完全

暴露，在“刑满释放”后，将被送往“72”或送回“86”被当成“死硬派共党份子”而“严加管束”。不仅个人将受到残酷折磨，而对敌斗争亦将失去一批可贵的骨干。

形势十分严峻，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将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考验！

鉴于原地下党团组织已打乱，必须重建领导核心。于是三名共产党员——时占魁（五三六团二营六连指导员，化名张德）、赵明智（五三六团二营参谋，化名曹明）和张泽石（五三八团宣教干事）共同商量决定成立狱中党团临时支部。吸收钟骏骅（五三八团卫生员）、周灿行（一八〇师文化教员）为支部成员。推选时占魁为支部书记，赵明智为组织委员，张泽石为宣传委员，钟骏骅、周灿行共同负责青年工作。当时的成员还有袁朝模、任时弟、曾宝元、王世富、郭信贤、王宏兴等青年团员，占 81 人的 20%还多。

经支部研究认为：被关押的难友都是经过斗争考验的革命战士。我们有的人虽不是党团员，但都热爱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回国意志坚定，党团组织没有必要继续对他们保密。而且在监狱这个小天地里也无法保密，倒不如向大家公开，以明确和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带领大家向敌人开展坚决斗争。

当晚，支部成立大会在狱中室内召开。帐篷朝北的一方贴着一面自制的纸质党旗，难友们都面向党旗席地而坐。赵明智代表临时支部宣布：“中共狱中临时支部成立大会正式开始”，宣布了党团临时支部委员会名单。然后由宣教委员张泽石代表支部讲话。他首先面向北方，面向祖国，面向党旗行了军礼，神情庄严地说：“敬爱的党中央、敬爱的毛主席，您的战士在远离您的孤岛上，在美帝国主义的魔掌中，就像离开了母亲怀抱的孤儿，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您，……”他的讲话被激动的感情咽住了。群众中发出了唏嘘的抽泣。他强忍着泪水继续说：“我们虽然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但我们忠于您、热爱您、思念您的心情比任何时候都强烈。面对敌人为迫使我们背叛您而施加的种种阴谋，我们将无所畏惧。生

为共产主义奋斗，死为共产主义献身。今天，我们在监狱中组织起来，决心团结大家，为维护祖国的荣誉、党的尊严，继续和敌人坚决斗争，不惜血洒异国土地。我们怀着必胜的信心！伟大的祖国和光荣的党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和坚强的后盾。”同志们听到这里都抬头朝北眺望，浑身充满了斗争的力量。接着他说：“敬爱的党，请您放心吧，您的儿女决不玷污共产党人神圣称号。今天，我们在党旗下宣誓”。支部成员都庄严地举起了右手，随即全体同志也心情激动地举起了手。接着他带领大家齐声宣誓：“头可断，血可流，革命志向永不丢！海可枯，石可烂，回国红心永不丢！”

然后，支部书记时占魁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斗争任务。他强调说：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不论敌人玩弄什么花招，施用什么残暴手段，我们 81 个人都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宁死不去叛徒统治下的集中营，争取创建一个我们自己管理的回国集中营。同时，他在会上，充分地肯定了“86”的“弟兄会”在历次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称赞它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下成立的革命组织。它团结了爱国战友，打击了叛徒特务的嚣张气焰，挫败了美蒋特务多次妄图变“86”为“72”那样的白色战俘营的阴谋。现在，它已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使命。我谨代表支部正式地宣布解散“弟兄会”，今后统一在支部领导下对敌斗争。原“弟兄会”领导人岳大宏、王刚等在会上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支部解散“弟兄会”的决定，服从支部的领导。并将一如既往地坚决勇敢同敌人展开斗争。最后大家一起激动地低声唱起了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歌声载着 81 名爱国志士的心声、伴随着强劲的海风，越过监狱的铁丝网飞向北方……

（时占魁 周灿行）

## 海边“苦役联队”

西码头是一个重要港口，巨济岛上 12 万名中朝战俘及 2 万名美、韩军看守部队的军用物资和生活用品都要从这里进港。

美军战俘拘留当局为了集中劳力就近到港口装卸和搬运物资，专门成立了一个有 1500 人的第 70 战俘营，称为“70 联队”，即苦役联队。这个联队，是美军战俘拘留当局把“72”和“86”里的所谓“不稳分子”、“共产党的死硬派”清理出来，专门集中在这里，以便严加管束。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能对共产党人实施苦役折磨，另一方面又可消除在“72”和“86”的心腹之患，使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实现扣留战俘并把战俘运送到台湾的阴谋。

为了进行严密控制，美方特务系统禁止已登记过是共产党干部的战俘进入“70”并任命战俘中的败类魏四喜担任“70”的联队长。魏四喜原是“72”国民党 63 支部书记长、军官大队长，他带来了两个大队长、八个中队长以及 100 多名爪牙和打手。

我们这些久在“72”和“86”备受政治迫害和残酷折磨的难友们，在初到“70”时，认为现在离开了“72”和“86”，精神上就解脱了，干任何苦役也不怕。所以，当“72”和“86”的张城垣、韩子建、姜瑞溥、阳文华、曹学良、伍元庭、李先元、毛德贵、陈劲文、陈敬轩、李作庸、陈建华、李大才、夏茂青、顾万永、李崇庆、杨克强、沈宗绪、刘树云等难友在“70”重逢时，大家激动得热泪盈眶，互相拥抱着久久说不出话来……

由于敌人用强迫劳动的手段来虐待我们，使我们认识到没有自己的组织和动员集体的力量，是难以同敌人抗衡、摆脱困境的。我们聚集在一起进行反思，总结出被俘后没有在苦难中奋起，没有以勇敢的精神、坚韧的毅力统一组织起来，而被敌人各个击破，以致遭受到挫折和失败的痛苦教训。大家一致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爱国知识青年立即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于是很快组建

了以张城垣为书记、韩子建为副书记的“70”中共地下党团支部，由韩子建兼任组织委员，门培英任宣传委员，李开全任保卫委员，张光普负责青年工作。各委员分头到各队去进行串联活动，并建立了 10 多个以单线联系的斗争小组。与此同时，派张光普打入由高攀任警备队长的警备队去工作；派龙德智和武元庭打入联队部去工作；派陈劲文和张辉宗打入大队部去工作；派夏茂青和陈敬轩打入各中队部去工作；指定门培英负责做争取高攀的思想工作。

经过张城垣、韩子建同大家一起研究之后，提出以《日内瓦战俘公约》为武器，建立自己管理自己的内部组织，组织广大被俘难友伺机夺取“70”的控制权。同时还确定了一批政治上坚定可靠的同志担任大、中、小队的领导。

在夺权问题上曾发生过意见分歧：少数人认为只要敌人不进行政治迫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下去。多数人认为不能放过现在的有利条件，应加强组织活动，应向朝鲜人民军学习，尽快夺权。地下党团支部根据多数难友的意见，制定了夺权的方法和步骤：届时由警备队派人通知敌小队长以上人员到联队部开会，联队部内外由担任警备的自己人守卫，许进不许出，待敌到齐后，由地下党团支部负责人训话，宣告他们只能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然后由警备队将他们看管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就在各个帐篷开会，当众宣布大、中队新的领导干部名单，并由他们主持各小队干部的民主选举工作。

夺权前，我们除了从伙房偷出美军用来切面包的小刀 30 多把作为斗争武器之外，还告诫魏四喜，要他认清形势，悬崖勒马，不准做任何反共叛国活动，不准升“中华民国”国旗，不准唱反动歌曲，不准清查联队内的共产党干部，不准打人，不准虐待俘虏。魏四喜一伙人迫于形势，一方面答应了上述条件，但另一方面仍暗地里不断进行其罪恶活动。

在地下党团支部的领导下，大家满怀信心地积极行动起来，为实现夺权做好各自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一、广泛传播敌



报纸上登载的有关和谈进展的消息，用以鼓舞难友们要求回国的斗志，使越来越多的难友团结在地下党团支部的周围；二、努力做好对回国有顾虑的人员的思想工作，启发他们的思乡情绪和爱国思想；三、打入警备队的同志，利用其“职权”，教训那些反动分子(包括小队长)，要他们认清形势，老老实实，不许欺压战俘。例如有一次，我们在码头做工，有一个败类头戴国民党军帽徽，嘴里哼着反动歌曲，被我打入警备队的一个同志一巴掌打掉他的帽子，并狠狠训斥了他一顿。这件事给当时服苦役的难友们教育很大。

3月初，地下党团支部布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条件也已成熟，于是便积极筹划立即夺权。

7日晚，张城垣与韩子建召开了有门培英、姜瑞溥和张光普等人参加的秘密会议，决定8日晚上10时夺权，宣布了由阳文华任联队长，李开全和代玉书任大队长，姜瑞溥任战俘总代表，张辉宗任书记长，并强调严格保密。

8日下午，张光普向警备队队员中的骨干分子进行了思想动员。当时，张光普的心情异常激动，心想只等天黑下来，自己到空场上吹响那“一长两短”的哨音，就可以把联队部的大小官儿调到联队部帐篷里去，那时代玉书就会带人冲进会场制服他们，实现大家梦寐以求的夺权理想……

然而，就在当天晚上7时，意外的情况发生了！警备队队长高攀匆匆忙忙跑来对张光普说：“外面都在传说今晚要暴动，美军战俘拘留当局已知道了这件事，已派武装部队进入了营场，你们赶快作准备吧！”张光普顾不上详细询问，马上抽身跑去找张城垣和韩子建汇报。经过他们商量研究，为了不使敌人以制止暴动为借口，将大批骨干分子抓走，而且事情已经暴露，于是作出暂时停止夺权的一切活动。

美军进入营场后，马上集合全体战俘，指使叛徒认出张城垣、韩子建、李开全、姜瑞溥、续公度和阳文华等6位难友。并强行

把他们押进“72”战俘集中营，实行隔离监禁，而门培英在难友的掩护下，幸未被认出。

张城垣等领导骨干被清除出“70”联队后，地下党团支部的领导班子暂时解体了，同下层组织的联系也中断了，一时斗争处于低潮。

当时，“70”联队内的敌人认为共产党员已被清除出去了，万事大吉，加上板门店谈判有了新的进展，我方代表已同意先行交换愿意回国的战俘，因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斗争处于低潮，但以门培英为首的难友们又站了出来，收拾残局，重振旗鼓，继续斗争。其主要骨干有赵国玺、龙德智、张辉宗、陈劲文、刘牛堆和曹学良等人。

我们首先检讨了前一阶段夺权泄密失败的教训，然后确定了下一步的斗争策略：避开同反动分子正面交锋，将斗争活动转入地下。巩固现有斗争力量，将直接联系的，包括警备队在内的100多人一律实行单线联系，把大量的组织活动转变为切实的宣传活动。其重点是：巩固回国信念和提高回国信心，积极开展策反工作，教育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要站稳立场，及时掌握敌人动向，利用合法身份打击敌人、保护好人。大力开展攻心战，分化瓦解敌人，建立回国统一战线，不断扩大回国人员的队伍。张光普利用与高攀的同乡关系，主动争取高攀站在回国队伍这一方面来。我们通过刘牛堆和仓库中一位朝鲜族翻译的联系，不断了解到板门店和谈进展情况。据此进行形势教育，辅之以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教育，并结合个别谈心活动，忆往事，怀念家乡父老兄弟，借以巩固难友们坚定要求回国的立场。

魏四喜一伙在我们夺权斗争失败之后，加紧了去台湾的宣传活动。他们四处动员用写血书的方式表示不回大陆的决心，并在全联队搞了一次“去台湾”的签名活动。但这份为数不多的“名单”，幸好落到了龙德智、伍元庭、陈劲文和张辉宗手中，没等送出去，他们就把“名单”销毁了，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由于我们不间断地开展回国宣传活动，使大家的斗争情绪又趋于高涨。原先在“72”被迫刺字的难友自觉地忍受着切肤之痛，克服困难，用普通刀片割去了自己身上的反动字迹。在3月底的一个深夜里，卫生员李先元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用剃刀把伍元庭、张辉宗等难友身上刺的字割掉。奇迹出现了：虽然伤痛使他们原本虚弱的身躯更加虚弱，然而他们那黯淡的眼睛竟然明亮起来。他们要维护人的尊严，要用残留在肉体上的伤痕控诉美帝国主义虐待战俘的暴行，宁肯站着死也决不跪着生，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誓死返回祖国，绝不到台湾去的决心！

4月初，我们从美军报纸上获知和谈有重大进展，趁大家在议论纷纷之际，我们的宣传工作也逐渐转为公开，明确提出“回国光荣、去台湾可耻”的口号。

7日，美军战俘拘留当局在“72”联队召开了由中国四个战俘营联队长参加的会议，宣布了“四·八甄别”（即战俘自由选择去向）的命令。魏四喜回来后，恐慌万分，急忙召集他的爪牙布置如何在“甄别”时阻止大多数战俘回大陆。

当时高攀把这个消息通报后，我们立即大张旗鼓地开展宣传工作。我们对难友们说：“祖国正在积极营救我们全部回国与家人团聚”、“我们是炎黄子孙，要有民族气节，坚决回祖国去”、“我们的亲人都在眼巴巴地盼望着我们早日回家团聚”。对那些思想上有顾虑，特别是被刺了字的难友，我们的宣传工作则做得更细致。我们反复耐心地对他们解释说：“刺字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谁也不愿意刺，是坏家伙强迫你们刺的，它只能暴露敌人的凶残，而不能阻挠我们回国的决心。我们在战俘营的不幸遭遇，祖国人民是同情的，被迫刺了字也会得到祖国人民的理解……”经过我们细致的思想工作，许多难友打消了思想顾虑，纷纷表达了自己愿回祖国的决心。高攀原来认为自己当过警备队队长，对不起党对不起祖国人民，回国后没脸见人，思想顾虑很大。经过门培英耐心做思想工作后，他放下了思想包袱，不但坚决表示要返回祖国，

而且答应要积极配合我们工作。

8日上午，美军开来一辆广播车，在“70”联队门外反复广播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言人对遣俘问题发表的声明(即四·六声明)。张光普对门卫美军士兵边讲英语边打手势，让广播车开进营场内，使全体被俘人员都能听清广播的内容。当大家听到声明中“交换双方应迅速释放并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战俘，这种合理主张绝不因我方被俘人员在拘留期间，曾有一部分人在臂上刺字或写下某种文件或作其他类似的行为而有所改变。我们深信这些行为绝非出于他们的自愿，不应由他们负责，我们完全欢迎我方全体被俘人员回到祖国的怀抱”的内容时，90%以上的战俘都激动得流出了喜悦的眼泪……

听完广播后，警备队的队员们就积极行动，按照地下组织的指示，在夜间收缴了伙房的刀具，并驱散了一些由败类召开的不利于回国的活动。那些曾被集中在广场上听伍培礼“传教”的人自动解散了，而魏四喜一伙却急得团团转。

10日，在70联队门外搭起了帐篷，8时开始甄别。高攀对大家高声说道：“我是警备队长，我坚决要求回国！要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没错！”人群中响起欢呼声。接着他立即指挥大家唱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难友们激动地流着热泪，纷纷走向“甄别帐篷”，坚决地喊出了：“我们要回祖国，反对去台湾！”的口号。

两个小时以后，“70”联队1270名难友经过“甄别”后到了“602”回国战俘集中营。由于“70”联队没有遇到什么阻力，绝大多数难友都讲出了自己的心愿，90%的人都坚持回国。对比之下，“72”，有7000人，由于敌特及警备队的阻挠和血腥镇压，甄别时只有700人冒险表达回大陆的愿望来到“602”。

“四·八甄别”后，魏四喜被撤了职，带上他的100多人回到“72”（后来魏四喜在向北朝鲜空投中被俘，于1958年被我华北军区判处死刑）。

我们到达“602”回国集中营后，立即组成“602 回国支队”四大队，由门培英任大队长，高攀任副大队长。以后我们又到了巨济岛第八战俘营，编为六、七两个分营场。1952 年“十·一”升旗斗争中，七号营场首先升起了五星红旗，敌人把他们当作“最顽固的共产党堡垒”，集中火力进行残酷的镇压。原 70 联队中的斗争骨干大都参加了“护旗突击队”，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结果有 65 人为国捐躯，109 人重伤致残，300 人流血负伤！

1953 年 7 月，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后，经过在战俘集中营长期的艰苦斗争，我们终于回到了盼望已久的祖国母亲的怀抱。

（门培英 张光普 张辉宗）

### 火烧美军仓库

巨济岛的美军“仓库”设在距海边码头东北方向约 2 公里的海湾边。这个“仓库”有两座木结构、薄铁板装钉的库房，分“主库”“副库”。每座库房长约 250 米，宽约 35 米。“主库”存放装被服和肉类罐头的“木箱”。还设有美军专用“仓库”（称小仓库），长约 30 米，宽约 15 米，用木板密封，战俘不准进入。据说，小仓库内存放粮食、豆类、蔬菜、罐头。主库两侧设有堆放物资的露天平台，平台长约 200 米，宽约 15 米。副库一侧是露天物资堆积场。仓库总面积约 7000 平方米。

1951 年夏，我们被关押进 72 战俘营六大队。那时，我们几个小队文书比起一般战俘多少有点“自由”，常利用到码头干搬运苦活的喘息间隙聚在一起闲谈，各抒己见。一位广东人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内没有“自由”，另一位四川老乡王荣生发言反驳。我同意王荣生的说法，观点一致使我们结成了好伙伴。那时，我们俩都只有十六七岁，都是高中学生参军，有些“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劲头。

为了真正的“自由”，我和王荣生共谋，赶到海边出工寻机逃离战俘营，设法偷渡过海找游击队。由于美军监视太严，无法行

动。不久，我和王荣生又结识一位“志趣相投”的好同志徐渊，我们三人常在一起偷偷重温昔日在革命大家庭时的温暖生活，畅谈家乡父老兄弟，热烈庆祝西南大解放的欢快日子等振奋人心的往事，我的心情逐渐开朗起来。

可是，战俘的命运是悲惨的。1951年8月份以后，72战俘营乌云乍起，掀起了政治大迫害的风浪。先是大搞三清查，清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强迫战俘在手臂上刺“反共抗俄”的反动标语，叫嚷“反共”之声甚嚣尘上，一片白色恐怖！牟小队长先后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强迫战俘“刺字”，我强忍挨打受罚的痛苦，拒不刺字。徐渊利用大队书记职权把我调出六小队，到十一小队暂避迫害。不久，我向王荣生谈看法，若按战俘营现况演变下去，我们等待回祖国大陆就不可能，只有建立组织起来反抗斗争，否则，我们必遭其害。王荣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徐渊在大队部认识人多，接触面广，由他在大队里发展组织，我们俩人可在各自的小队里把一些没有“刺字”的同志组织起来。于是，我们开始发展组织，遇到的困难较多。我在小队里发展了李国忠、吴宝金、薛文义、李伟、徐金禄等9人，组成“回国小组”。但要动员更多的同志参加组织就困难重重了。王荣生同样受阻，对我说：“小队里发展人不行，他们出工可以吃饱饭，还能偷食仓库里的罐头，人有饭吃就不想斗争，怕闹不好连罐头也吃不上。”这事直接和去“仓库”做工有关，我自然地想到朝鲜人民军战俘破坏仓库的事（割坏皮鞋、衣服等），便暗自下决心烧掉“仓库”。我对王荣生说：“他们为了能吃饱饭，不参加组织，我去把仓库烧了，美国人就不会让六大队去仓库。大家照老样吃半碗饭，他们就参加组织了。”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我对王荣生说：“我不抽烟，去搞火柴，汽油不合适，你去搞来给我。”烧仓库的事太严重了，我们相互一再告诫：这件事，只有我们两人知道，决不能告诉第三者，连好朋友徐渊我们也没有告诉。自此我们很少见面，我仔细冷静思考如何放火烧仓库。

首先要搞清仓库内的情况。为此，我放出要到仓库偷食罐头的烟幕。10月份起，我频频出工以便熟悉琢磨，记住各条小道和初选“点火”地点，还注意记录各类巡逻队从美军宪兵司令部到仓库内巡逻的时间和规律。这段时间里，王荣生弄到了“火种”：一盒跟皮鞋油盒一般大的美军烧罐头的酒精盒，一张折叠式插满十支的纸质火柴，先后交给了我。我对王荣生说：“以后我们见面时，互不讲话，装作不认识。”我还告诉他：“晚上，你上厕所时，看到天红了，就是我成功了。要是我没回来，就是牺牲了。你一定告诉部队首长和我的亲人。”

情况已搞清，火种已具备，我感到一阵轻松。1951年12月16日晚，轮到我们小队去仓库做工，我从容不迫带上“火柴”、“酒精盒”，随着队伍到了仓库的铁丝网大门。我藏好火柴、酒精盒，避过门卫美军的搜身检查，进入仓库。我被分在主库内做工，我一边搬运物资，一边思考：现在仓内人多，放火容易被发现，待到深夜，我再到主库外面去“点火”。

深夜2点钟，夜阑人静，海风凛冽，巡逻美军躲到屋内烤火。美军宪兵司令部的巡逻车照例半小时一趟转着，车上手持卡宾枪的宪兵头戴涂有M.P.的钢盔，全付武装。我抓住时机避开美军监工和警备队员(P.G.)的监视，大胆混出主库房，直去厕所，佯作要解手。我在听到美军宪兵司令部的巡逻吉普车开出仓库后，便急步走上公路，隐在路灯杆下，避开岗楼上的探照灯光。

快！是机会了，我果断地快步穿过公路，跨过排水沟，踏上木板平台，穿过15米长的分类存放“货包”的间隔行道，在主库房沿下的排水沟站住。我迅速取出“酒精盒”打开盒盖，放到“货包”间隙处，再取出火柴点火，“崩”一声闷响“货包”裂开了，窜起火苗。我迅速沿排水沟快步走出200米，进入库内。这时，仓库内，外逃的人群正向我迎面而来，我即混入人群中。

深夜的海风，使火迅速蔓延到主库内，火焰顿时高达约30米。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刹时一片火海，火光映红半边天。急忙赶

到的三辆消防车，尽管取用海水，使用高压水龙头不断地射出强劲的水柱，却如“火上加油”，根本无济于事了。两个排的美军从睡梦中惊醒列队赶来，也只得站在一旁瞪眼观火景。一场熊熊烈火烧尽了主库和主库两侧露天平台上堆放的约 23400 立方米物资。

天明时分，做苦工的队伍被带回战俘营。我满脸黑灰，心情安定，怀着完成任务的喜悦走到厕所旁，在几个装满凉水的半截汽油桶间挤着洗脸。王荣生走过来握住我的手默默地为我胜利归来表示庆贺。

17 日 8 时许，夜间做苦工的战俘全部被押到“72”营内广场上，被命令前后左右拉开距离站成队列。一位美军中校（黑人）和三位身着便军装的亚洲籍人走到队列前，眼露凶光，死死盯住每一个战俘上下打量，察颜观色，审视约 30 秒。随后，由特工人员选定，从队列中拉出了 10 名战俘。这 10 人中有两人和我同一个小队，我记得一个叫余德海，他们二人被押走后，再也没有回小队。

18 日 11 时许，第二次审查。全部接受审查的战俘集结在广场上，按次序被带到新搭起来的帐篷内审查。我被叫到帐篷内，被美军推到办公桌旁，特工人员问我的姓名、年龄、被俘日期、地点、战俘编号等等，登上战俘卡片并按了手印。事后我分析：这种审查的目的，在于核对战俘登记卡片，以求从中找出混入战俘中放火的人。

19 日 8 时许，第三次审查，我走进联队部的一间办公室接受审查，特工人员提出三个问题：“什么地方起的火？”（桌上放着仓库草图）“仓库起火时你在哪里？”“路灯是在起火前灭的还是起火后灭的？”我不慌不忙一一回答。特工人员相视一下，主审人叫我出去。

三次审查后，普遍性的审查结束了。巨济岛美军总管肯定对他们未能抓到“纵火犯”而遗憾！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即使抓住了我，又怎能扑灭得了几万名遭受虐待、奴役的战俘们心中反抗的怒火！

（张光普）



# 「死亡之岛」上的回国阵地

## 中国战俘的第一个“红色集中营”

1951年10月初，板门店谈判桌上，双方代表正在为停战后是否无条件全部遣返战俘而激烈争辩，僵持不下。巨济岛上中国战俘营内，“要求去台湾”和坚决回归祖国的斗争也日趋白热化！

在已被敌人严密控制的72战俘营，早在8月5日就强行召开了“拒绝遣返大会”，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美国星条旗和联合国旗。紧接着在营内掀起了强行刺字、写血书的高潮，对一切敢于反抗的战俘实行残酷镇压。美方对关押着我们700多名志愿军军官的第四大队更为“重视”，抓走了当时组织斗争的领导人。派遣大叛徒王友敏、魏四喜、王家悌等人掌握全大队各级行政领导权，配备大批警备队员（P.G.）作为打手，使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实施白色恐怖专政，企图瓦解我们的斗志，镇压我们的反抗，遏制我们对其他战士大队的影响。

在岛上另一个较晚成立的中国战俘营—86集中营，敌人也加紧了“以俘制俘”的行政控制；强化了对该营近万名战俘的分化瓦解和反动统治，镇压战俘们的反对去台湾、坚持回大

陆的反抗斗争。10月9日晚，该营的难友们为了反对叛徒们在10月10日升青天白日旗，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以爱国“弟兄会”为主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夺旗斗争。随后，遭到了美军的直接镇压，80多名斗争领导人和骨干在被毒打后作为“刑事犯”，押往美军宪兵司令部小监狱。共青团员王绍其在这次斗争中壮烈牺牲。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何粉碎敌人强迫我们去台湾的阴谋？怎样维护祖国和党的尊严？我们“72”军官队坚持回国的同志们忧心如焚！在出去解手都受到敌人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大家连碰头商量的机会都没有。直到11月初才有了转机。

11月2日，一位自称是随军记者的美国特务菲力浦前来“72”，直接到我们军官队把孙振冠、魏林、陈吉庆“请”到一个专设的审讯帐篷进行“采访”，搜集他感兴趣的“中共战俘的心理状态”情报。于是，这三位同志立即抓住中午休息无人看管的这一“敌赐良机”，紧急磋商斗争方针，最后决定采取老孙的提议：以“反压迫、争自由、坚决要求遣返祖国大陆”为号召，以“撤销叛徒特务统治，民选大队各级领导，实行民主管理”为内容，发动群众签名，直接提交美军管理当局。并以此聚集力量，必要时武力夺取领导权。他们回到大队后把这一决定秘密通知了其他斗争骨干，大家马上开始行动。狗腿子们风闻洋大人对他们三人很客气，也不敢像原来那样凶狠地监视他们了。他们便趁机分头串联，征集签名。人们躲在厕所里或借深夜微弱的路灯，在那些写有“反对迫害”“要回祖国”的纸片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涓涓小溪汇成了洪流，经过几天的活动，签名的人数就达到了200多人。原来一些有悲观情绪的难友，在这一形势的推动下，也下狠心流着泪，签上了名字。第二天，被敌人从四大队调往联队“文娱小队”的张济良知道了签名活动，也急忙告诉四小队的彭林、骆星一，他们一起偷偷回到四大队签了名，还带去一些纸和笔。一份份签满难友姓名的香烟纸、手纸、水泥袋纸，纷纷从各个渠道汇集到孙振冠等同志手中。他们白天把这些签名珍藏在贴胸的内衣

里，感觉到众多战友们那片赤诚火热的爱国之心，晚上怕敌人抢走就将其藏在掏空的帐篷杆子下面。

11月5日，叛徒们觉察了这一签名活动，十分惊慌。他们找到魏林、孙振冠、陈吉庆等三人分别进行威胁，强令他们停止活动，被他们严词拒绝。魏四喜皮笑肉不笑地对老孙说：“张游（一个曾靠拢我们的变节者）已告诉我名单都在你那里，还是老实交出来吧！都是战俘，有本事出了铁丝网再逞英雄嘛！”老孙指着他的鼻子说：“姓魏的，你算说对了，都是战俘，你算哪路英雄！名单有的是，不给你又能把我怎么样？”这位“大队副”恼羞成怒，带着一帮人将老孙的铺位翻了个底朝天，但什么都没找出来。于是，叛徒们又在各个中队小队搜查。

十一小队的薛山娃从骆星一那里得到一截铅笔，一张从圣经上撕下来的纸片，在该小队征集了史定一等13位难友签名。在交给营级干部韩洛夫时，不幸被中队长发现，韩立即将那张名单吞进肚里。尽管薛、韩两人都遭毒打，却始终未供出签名难友。薛山娃还重新签了一份名单直接交给了孙振冠。

11月6日，惶惶不安的大队长王友敏趁老孙等三人又去接受菲力浦“采访”，他命令全大队集合并在四周布满手提狼牙棒的警备(P.G.)队员，然后，阴沉着脸说：“兄弟一向主张民主、人道，尊重大家的个人意志，也充分理解大伙盼望早日自由的心情，但你们不要上共党份子的当。跟着暴乱份子跑，只会自讨苦吃。”难友们互相用眼神交流着对这位俘虏官的蔑视与鄙视之情。当魏四喜宣布散会时，马兴旺突然站起来说：“我有意见要讲，我们是要回祖国大陆的，我们决不去台湾！”一时间，全场鸦雀无声，只有魏四喜发狂地喊：“马兴旺，反了你啦，别瞧你是个营长，老子今天要收拾你！”叛徒们紧跟着向老马逼近，难友们也立即向老马靠拢，对叛徒们怒目而视，一时空气凝固了。王友敏看看众人的脸色，急忙下令：“都给我回帐篷去，这事以后处理！”

当晚，黎子颖、何平谷等同志着手起草了“坚决反对美方利

用叛徒在战俘营内实行恐怖统治，强迫战俘背叛祖国”的抗议书。难友们用两张雨布在厕所边上搭起一个人字棚，彭林又拿来一个破木箱当“桌子”，吴孝宗在凄风苦雨之中，在难友们的保护下写完了这份中国战俘的第一封《抗议书》。

11月7日，刚吃过早饭，就响起了集合哨音和“快，快，快出去集合”的一片喊声。当我们走出帐篷，发现操场四周都站满杀气腾腾的警备(P.G.)队员，铁丝网外面也密布着美军的岗哨。魏四喜命令各中队长，将本中队被刺过字、被迫写过血书签名去台湾的，都带到中队队部集中看管。然后把我们这些未刺过字的“死硬派”赶进二中队部的帐篷。只听魏四喜在外面高叫：“现在算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了，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想上台湾，又有几个要回你们大陆？”一时间，悲愤的气氛笼罩着我们，人人怒目而视。孙振冠见时机已到，立即站起来大声说：“同志们！战友们！是时候了，站起来同他们干！这样的日子我们还没受够吗？他们喊的什么民主，什么人道，统统是放屁！”

帐篷里爆发了热烈的掌声，一个叛徒掀开帐篷门帘伸进头来张望。老孙看了他一眼，接着说：“是狗就趴下去，是人就站起来！”那个“狗头”立即缩回去了。老孙激动地喊：“战友们，团结起来，他们要敢动咱们，我们就还手，绝对不留情。”紧接着有人起了个头，帐篷里响起了整齐、洪亮的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多少人热泪滚滚，这是被俘后第一次放声高唱自己的国歌哪！

帐篷外面响起了坦克的隆隆声，士兵跑步入营的脚步声，几个美国军官在联队长王顺清、大队长王友敏陪同下掀门而入。“Who is the leader?”（谁是头头？）领头的美军官问王顺清，王友敏赶忙点头哈腰地指出了孙振冠、魏林、陈吉庆、梁宗正等4人。他们立即被带往联队部。马兴旺激动地挥手说：“走，咱们都到操场上去支持咱们的代表。”大个子黎子颖第一个站起来往外走，我们都跟着涌出了帐篷，集中蹲坐在操场中央，叛徒们马上就将我们

包围起来。随即王顺清又陪着美军军官来押走了马兴旺和黎子颖，气氛更加紧张起来。魏四喜狐假虎威地对着我们叫喊：“怎么样？都看见了吧！他们这一去，是死是活难说。你们还想造反？都给我马上滚回帐篷去！”

“我们要见我们的代表！”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句。接着又有人喊：“不许扣留我们的代表，把代表们送回来！”

王友敏挥手让大家静下来，假笑了几声说：“兄弟奉劝大家不要跟着孙振冠他们闹了，宪兵司令部警车已经停在大门口，胳膊终究扭不过大腿嘛。他们几个为首的肇事犯马上就会送去蹲监狱，兄弟不愿你们也去受皮肉之苦。好汉不吃眼前亏嘛，还是回帐篷去吧！何必让美军进来用刺刀赶你们走呢！……”

场子里静了下来，人群中开始有个别人站起来来回走。这时，曾经当过小队长的彭林站了起来对王友敏说：“我想说两句！”王友敏连忙高兴地说：“好，让老彭说几句。”大家以惊讶和怀疑的眼光看着彭林，心想：“难道他是混进来的奸细？”只见彭林转身对着大伙儿，涨红着脸大声叫道：“大家不要走，我们这是争取最低限度的信仰自由，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难友们震惊了，王友敏脸色一下变得铁青，魏四喜则狂叫：“好你个彭林，有种的，你给我站出来！”叛徒们也喊叫起来：“把他拖出来！”“揍他奶奶的！”

“不许打人，他有什么错？”难友们紧紧围住彭林对叛徒们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彭林激动地唱出了：“团结就是力量……”大家立即挽起手来，齐声高唱：“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与此同时，在联队部 6 位代表正与美军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舌战：

“谁是头头？”联队的总管美军克斯( Case) 上尉恶声恶气地问。

“我们都是。”代表们不约而同地回答。

“你们为什么闹事？你们不服从管理，我有权利惩处你们。”克斯上尉威胁说。

“我们是为了维护《日内瓦战俘公约》，维护人的尊严。真正闹事的是你们那些俘虏官。”孙振冠指指站在一旁的王顺清、李大

安他们。“他们打骂战俘，贪污给养，强迫战俘去台湾，还想集中起来把我们干掉，你们怎么不惩处他们？”

上尉瞪着眼，哼了一哼。

“你们说什么战俘都要去台湾，这不是事实。谁不想回到自己的家乡？不信，你就把全联队的人集合起来，让我讲十分钟话，然后让他们一个一个回答，看看到底有几个人想到台湾！”老孙坚定而又自信地说。

他们当然不敢这样做。

上尉没有正面回答，又问：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按日内瓦公约精神，让我们自己选举负责人。不许国民党特务迫害战俘，不许强迫战俘去台湾！”

黎子颖从口袋里掏出昨晚写就的抗议书交给克斯上尉。在上交之前，黎子颖对上尉朗读了抗议书最后几句：“你们美国不是标榜人权和自由吗？我们要求停战后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是我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希望你们尊重我们的选择。否则，一切后果由你克斯上尉负责。”

美军上尉脸红筋胀，十分尴尬，考虑片刻后说：“这不是我管的范围。你们可以派一个人回去，告诉他们，谁愿意就跟你们走。”

这时节，已是破釜沉舟的紧要关头，代表们一商量，决定不放弃这个机会。

当代表们回到“四大队”门口，看到不少难友还聚集在操场上和叛徒们对峙着。有的人以为代表们被带走就再也回不来了，脸上露出焦急的神色，看到代表，有人就喊：“放他们回来了！”叛徒们刚才还在那里洋洋得意地抽着烟，摇着棍棒，晃来晃去。当他们看到代表们回来时都愣住了。

孙振冠在大门口站定，对难友们高喊：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到我们这边来！”

院子里片刻沉默。

突然，“哗一”的一声，像潮水一样，在军官队大门里的人们蜂拥着冲出了大门，飞跑着，一个接一个地聚集到了一起。

叛徒们慌了，急忙挥动起棒子大声嚎叫：“回去，回去。谁再敢出来就打断他的腿！”可是，没人理他们，难友们还是不断地朝大门口冲来。

美军和特务们这才感到情况不妙，赶忙动起武来，对冲出来的人连踢带打，并连声喊叫：“快关门，快关门！”

就这样，四大队有 140 多人冲了出来。许许多多未冲出的难友，声嘶力竭地喊：“等等我们！等我们出去！”

李大安在院子里指使特务们大打出手，棍棒一齐落到急着要出来的难友们的头上，许多人倒了下去。难友们倒在地上，仍抓着铁丝网向我们呼叫着，哭喊着！冲出来的难友们怒气冲天，齐声高喊：“开门，开门！”“不许狗特务行凶！”附近其它大队的难友们纷纷围到铁丝网跟前，向我们张望。特务们大声吆喝：“看甚么看！都他妈跟我滚回去！”

整个集中营都震动了。

美军怕事态闹大，急忙把冲出来的 140 多名难友送往对门的 71 联队。我们昂首挺胸，高唱着《解放军进行曲》，列队走出了那个“阎王殿”！我们的歌声第一次飘荡在巨济岛上空：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

从不畏惧，决不屈服，勇敢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听，风在呼啸军号响，

听革命歌声多么嘹亮。

.....

歌声伴随我们跨进了 71 联队的大门。“71”的朝鲜战友们在小铁丝网里向我们挥手，鼓掌，唱歌，高喊：“志愿军同志好”。

当我们回头看到那些没有冲出来的难友们，正不顾特务的棍棒，依然扑在铁丝网上，含泪眼看着我们时，我们又十分难过！在这里虽没有战场上的飞机大炮的轰鸣，但同样有生与死，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无数生命和灵魂在为祖国顽强地搏斗着。

兴奋的心情过去之后，我们冷静地总结了这次行动。虽然我们这些人摆脱了被叛徒特务控制的 72 战俘营，但还有更多的难友们仍在魔鬼的蹂躏下痛苦地挣扎着。我们本来的计划是掌握整个“四大队”，然后扩大战果，夺取“72”的控制权，但没有如愿。我们面前的斗争道路还很长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学会在艰难险恶环境里进行斗争。

一到“71”，我们立即成立了“中国大队”，重新建立了党支部。魏林、孙振冠、顾则圣、马兴旺、李喜尔、陈吉庆等同志任支部委员，并由黎子颖、何平谷等一些青年难友组成了青年团支部。

情况摸熟后，老孙又通过到伙房抬饭的机会，在伙房里见了朝鲜人民军战俘营“地下党总委”派来的老郑同志。他向老郑介绍了我们冲出“72”的经过，老郑十分高兴地说：“劳先生很钦佩你们的斗争行动，要我代表他向你们表示慰问。希望我们今后进一步携起手来，共同斗争，粉碎敌人的‘自愿遣返’的阴谋。今后，还要扩大影响，使更多的难友靠拢我们！”同时还谈了当时的和谈形势。我们听了老孙回来后的传达，心里太高兴了。

之后我们又详细地研究了下一步斗争方案。党支部提出了“团结、斗争、学习”的口号，健全组织，开展学习，在公开同美军当局较量的同时，向公路对面的“72”的难友们开展宣传工作，动摇叛徒们的控制。

隔了三天，11月10日，时占魁、张泽石、曹明、钟骏骅、周灿行等81人也来到了“71”集中。他们就是86战俘营那次夺旗斗争中，被美军当局拘捕的战友！他们在美军宪兵司令部监狱成立了党团支部继续开展斗争。在30天刑满之前，考虑到“72”与



“86”两个战俘营内部政权均已变色。经支部研究决定由张泽石以英文起草一封致岛上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的《备忘录》，表示坚决不去 72 战俘营，也不回 86 战俘营。《备忘录》中说：“如果美军当局强行将我们送往这两处，那你们只能将我们的尸体抬进去！”为了表示郑重和决心，81 人全都刺破手指，在《备忘录》上盖了血印。11 月 10 日离开监狱前，他们又作了周密的应急准备。当他们在戒备森严的武装押送下，来到了“72”和“71”两营门之间。眼看“72”的大门打开了，押送的美军少尉挥手要他们向右转进“72”去，在这紧急情况下，他们按预定的暗号，大家手挽手抱成一团，一下子坐在地上。同时张泽石则以英语向押送的美军少尉交涉，重申了他们致美军总管《备忘录》中的态度，并警告他说：“如果你要下令硬拖我们进‘72’去，我就命令我们的人集中全力攻击你，咬也要把你咬死！”美军少尉听了吓得退了两步，赶快下令押送的 20 余名美军士兵举枪把这 81 名中国战俘团团围住。该少尉在“72”用电话请示了他的上级以后，摊开双手，对张泽石说：“你们胜利了，进‘71’去吧！”于是，这 81 位战友排成四路纵队昂首挺胸向左迈进了“71”！至此，巨济岛上两个中国战俘营内在斗争中形成的两支队伍胜利会师，共建回国阵地。

“71”战俘营这块中国战俘的回国阵地，被难友们称为“巨济岛上的小延安”。它是巨济岛上乃至釜山地区坚持遣返的中国战俘心向往之的一块根据地。以后，陆续有赵佐端、杜岗等领导干部和其他同志 30 余人，经同志们的营救和他们本人的努力，从釜山或岛上各战俘营，来到了这里。从而更加巩固和壮大了这块回国阵地的力量。为日后拥有 5000 人的“602 回国支队”以及更后的“第八战俘营回国支队”的建立和巩固，在组织上和干部配备上作了充分的准备。它在中国战俘的斗争史上无疑地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马兴旺 陈吉庆）

## 刺刀丛中的“课堂”

1951年5月我被俘时才15岁。那时我是一个半文盲，政治上也很幼稚，被俘后真是又痛苦又害怕！害怕从此再也见不着在苦水中把我拉扯大的母亲，又为失去了组织依靠而痛苦。幸好我在被押送巨济岛后，被分在“86”的4大队。在那里我得到了赵明智、代玉书这些老大哥的关怀、爱护，在他们带领下，我参加了反对升国民党旗的斗争。又和他们一起坐牢，一起到了“71”这个中国战俘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虽然在“71”仅仅半年，我似乎一下就长大了！那段岁月对我一生影响很大，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使我激动不已……

在集中营维系生存的口粮极少。美军当局只按每人每天一磅提供，还说什么经医学专家测定，这数量完全能满足人体营养的需要。但到战俘碗里只有半碗饭和不足50克的蔬菜，根本吃不饱。在“71”，为了给战友们添一点营养，曾德全、李志红等战友曾冒着生命危险，躲过美军的探照灯和游动哨，往返爬过8层铁丝网，从美军给养仓库中扛回成箱的罐头，为战友们改善生活。但得手的机会不多，由于口粮缺少，战友们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体质遭到极大的摧残。

可是维系政治生命的精神粮食，在“71”却十分的丰盛。针对美蒋特务的毒化宣传，党组织先后进行了“树立革命人生观”、“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美帝本质”、“中苏关系”等教育。教材来自孙振冠、顾则圣、张志强、李国儒、黎子颖等人的共同记忆和整理，上课时间在每天中午12—14时，美军管理人员午休时进行，晚上讨论。通过学习，清除了美蒋特务散布的流毒，补上了革命军人“不幸被俘后该怎么办”的一课。统一了认识，焕发了革命精神，增强了斗争意志。在此基础上，党组织提出了：“把集中营变成抗美援朝战线的一个阵地”，“在斗争中洗刷耻辱，在耻辱中争取光荣”的斗争口号。主动地不间断地向美军当局发起“反虐

待、反屠杀、反扣留”的斗争。从这里我们体会到，多掌握一分革命道理，就多一分对敌斗争的力量。

除统一组织上课外，赵明智（化名曹明）、张泽石、黎子颖、吴孝宗、杨守让、马有钧、谌志农、周灿行、余国范、彭林、袁朝模、张长惠、吴求用等同志经常聚集在一起，聊天漫谈。内容是古今中外，天南地北无所不包，在聊天中谈坚持气节、坚持革命、坚持回国。由于他们见多识广，谈吐风趣，深入浅出，好些在上政治课时理解不深的问题，都能在这里加深理解。假如把政治课比作精神粮食中的“主粮”的话，这样的聊天漫谈就应该说是多种多样的“副食品”了。他们所谈的一切对我都是那样新鲜有趣，富有极强的吸引力。

张泽石以他翻译的有利条件，常将敌人报纸上得到的消息，给大家讲前线的战况及和谈的进展。讲他在清华大学的地下斗争及到四川组织游击队迎接解放的故事，讲他在石家庄朱总司令亲自给他一片西瓜的情景。每当此时，从他那眉飞色舞的神态中，可以想见他引以为自豪的心境。赵明智讲保尔、牛虻，讲他在老区的经历。当时因为国民党的封锁，领导上经常派他到国统区搞医药给养，有时要急于得手，就免不了犯点纪律，回来还得背上点处分。黎子颖是一位“老夫子”，他从《诗经》、《楚辞》讲到殷夫的《血字》，从苏武、文天祥讲到叶挺将军，一篇“正气歌”他几乎全能背下来。我喜爱诗词的癖好，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余国范是话剧演员，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特长，绘声绘色地渲染明末诗人夏完淳、“钢铁战士”张志坚和刘胡兰烈士等英雄人物，使听的人真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感觉。谌志农讲鲁迅的作品，从中引伸出做人的骨气：“切不可别人给你左脸上一耳光，你再把右脸伸过去。”吴求用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他甚至可以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整章整章地写出来供我们阅读。其余的人都各有套数，都是我的老师。他们讲的都是健康向上的内容和人类文化的精华，绝不讲消极颓废的内容和文化糟粕。“留心处处皆学问”，我从中得

到了不少的教益。当我听了苏武和李陵的故事后，我就想：“屈服于敌人的暴力或利诱都是非常可耻的，不仅要遭到国人的唾骂，也要遭到敌人的鄙视。”当我背诵奥斯特洛夫斯基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从中更坚定了我走正确人生道路，同时保尔、牛虻那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困难的刚强毅力，为事业献身的牺牲精神，无不给我们以强烈的感染。我仰慕 14 岁投身反清斗争，17 岁慷慨就义的少年英雄——夏完淳，而从张志坚、刘胡兰一生一死中又体会到生的价值，死的意义。他（她）们同我国从古到今仁人志士的爱国精神、民族正气一脉相承，是国家的灵魂，民族的脊梁。还有我学到的那些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李清照）、“英雄生死路，恰似壮游时”（夏完淳）、“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每当我们吟咏这些掷地有声、气贯长虹的千古绝唱时，灵魂得以净化，斗志更加昂扬。《诗经》中一首《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使我们认识到古时的战友情谊（即袍泽情谊），尚且能做到在困境中推衣让食，患难相助，顺境中“肥马轻裘与君子共”。难道我们革命战士还不能有胜于他们的团结友爱精神吗？平时我常咏唐诗，如“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等。这样的篇章，激发我多少眷念故土的爱国情感和男儿豪气。

同时他们还辅导我学文化，让我把学习的体会用随感或日记的体裁写出。黎子颖、吴孝宗、马有钧、杨守让、周灿行、袁朝模、何平谷等人常常为我批改作业。偶尔我也写点演唱材料，由

曾是文工队导演的骆星一修改了，为了防备敌人搜查，一般都随写随烧。

尽管学习条件异常困难，但同志们千方百计想办法。没有纸，利用做苦工时拾的水泥袋纸，没有墨用锅烟熬水代替，没有笔用罐头皮剪砸成笔尖，有时还学岳飞沙盘练字。

张泽石同敌人打交道多，不时搞回一支、半支铅笔送给我。我十分珍惜，用得短到不能再用了，还舍不得丢，郝智根替我做了一个马口铁管子接上使用。有一次赵明智做苦工时拾到一个本子，他将本子送给我，并在扉页上写了：“小弟弟：智慧永远爱着战士”。这个小本子我舍不得把它烧掉，经常为保藏好它而犯愁。在“71”半年的学习生活对我提高很大，可以说是终身受益。1954年5月7日，我归国后，在写给母亲的信中有过如下的记述：“这样的学习，增强了我对敌斗争的力量。使我在苦难中仍能挺起胸膛，在黑暗的岁月里没有迷失方向，它让我更认清了敌人凶恶残暴的本质。使我变得更勇敢坚强，在这段曲折的人生旅途中，除了在我心灵上留下对敌人深刻的仇恨外，没有感到是痛苦，更没有感到是悲伤。”

在集中营历次斗争的危险时刻，之所以战友们都能不顾个人安危，前仆后继，争相赴难，精神粮食起了很大的作用。

（钟骏骅）

### 铁窗内的追悼会

1951年11月，为了缅怀死者，激励生者，“71”党组织决定，为在“86”反对升国民党旗而光荣牺牲的青年团员王绍其同志举行追悼会。

会前战俘们积存了几天手纸，用来扎纸花，布置灵堂。干部队和朝鲜队的战友也送来他们省下的手纸，并送来了红汞、紫药水、奎宁片代作颜料。在心灵手巧的赵明智同志的设计调度下，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灵位前呈放着朝鲜战

友送来的苹果等祭品，灵位两旁是花圈和三副挽联。挽联的上款写着：王绍其同志永垂不朽，下款分别写着：“71”战士队敬挽，“71”干部队敬挽，“71”朝鲜队敬挽字样。中国队的挽联是纸质的。

战士队挽联写的是：

斗争奠基石 英雄留青史

干部队写的是：

拼掉六尺英躯 奠定斗争基石

洒尽一腔热血 写出光荣诗篇

朝鲜队送的挽联是用绷带布拼成，用奎宁染黄，以中朝两种文字写的。内容是：

与敌搏斗 光荣捐躯 精神不死

顽贼将歼 胜利在握 英名长存

这副饱含着国际主义情谊的挽联，会后赵明智将它缝在钟骏骅的衣服夹层里，准备带回祖国，直到 1953 年 8 月回国前夕，敌人扒掉他穿的衣服，才连同国旗一起强行抢走。今天想起来还觉得非常可惜。

追悼会在美军管理人员下班后的傍晚举行。干部队推选马兴旺为代表参加悼念，张泽石担任追悼会主持人。首先全体肃立，向烈士灵位默哀。紧接着唱起了由张泽石作词，骆星一谱曲的挽歌：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在苦难的日子里。

你的鲜血，

染红了异国的土地。

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

在敌人的刺刀下，宁死不屈。

你壮烈牺牲的事迹，

我们永不能忘记。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仇恨要我们来洗清。  
今天，我们立下誓言：  
誓死为你复仇，  
踏着你的血迹，  
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祖国和人民将永远追念着你！

这悲壮的歌曲，唱出了我们这些身陷囹圄的海外儿女的耿耿忠心，唱出了对烈士深切的怀念，同时也激起了对敌人满腔仇恨，挽歌还没有唱完，大家已泣不成声。

接着，赵明智介绍烈士生平事迹和英勇牺牲经过，时占魁致悼词，马兴旺代表干部队，我代表战士队先后讲了话。大家高度赞扬了烈士的斗争业绩和牺牲精神，声讨了美蒋特务的血腥罪行，表示了要和敌人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

追悼会只开几十分钟，但其意义是无限深远的。激发了同志们对烈士的深切怀念，加强了对祖国向往的深情，坚定了大家对敌斗争的意志。  
(周灿行)

### 两百人镇住三千人

“71”回国阵地自建立起，美军当局就视它为洪水猛兽，称它为危险分子集中营，时时想软化或者拔去这根眼中钉、肉中刺。1952年初，敌人为了对付坚持斗争的朝鲜战友，调来了约3000名被叛徒控制的朝鲜战俘。他们秉承美军的意图，处处与我们作对，借故和我们起摩擦。他们还将坚持革命的朝鲜难友弄到我们附近的帐篷内拷打、火烙。惨叫声和烙肉的焦臭味，阵阵传到我们帐篷中来，有时他们将残害致死的朝鲜难友的尸体，故意摆在我们铁丝网外。对此，同志们无不义愤填膺，地下党组织决定，对朝鲜叛徒的挑衅，要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鉴于人员的悬殊，我们要百倍提高警惕，白天和晚上都增加了“岗哨”，严密监视他们的

活动。每天早晚还增加了两次用朝语合唱《金日成将军之歌》、《人民军进行曲》等朝鲜歌曲的活动，以回击敌人的寻衅，鼓励朝鲜难友起来斗争。

1952年3月中旬，这批人组织了一次反动的化妆游行，肆意丑化、侮辱毛主席和金日成将军。见此情景，当时在室外活动的李喜尔、董勤荣、陈吉庆、时占魁、王福海、韩一定、南阳珍、岳大宏、王云山、王刚、郝安生、丁先文、薛山娃、陈其武、张昌辉、郭信贤等数十名同志怒不可遏，大家自发地用石头、土块猛地投向化妆的游行队伍。这一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那些家伙抱头鼠窜，整个队伍也乱了阵脚。室内的战友也马上出来增援，齐声高唱朝鲜歌曲，两百多人严阵以待，准备迎接他们的反击。经过我们正式向美方管理当局抗议后，这些人没有敢轻举妄动，还派出代表向我们道歉，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情，只要求我们现在不要唱歌。看来，我们歌声的威力不亚于石头、土块。从那以后，他们态度上老实多了。对此，地下党认为他们有可能是施放的烟幕麻痹我们，以便组织偷袭，动员大家每人准备一件武器（所谓的武器就是用带刺的铁丝拧成鞭子，废弃的帐篷杆等），作应急之用。好几天晚上全体同志都和衣而卧，枕戈待旦。由于我们同仇敌忾正义凛然，敌人始终没有敢动手，美军当局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

两百人镇住了 3000 人，听来是个奇迹，其实也很简单。我们两百人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俗话说：“一人舍命，万夫莫敌。”何况我们两百人都是敢于舍命的呢！

1952年春天，为了增强战友们仇视美蒋的感情，“71”的战俘们编演了一台活报剧——“蒋家班垮台”。这个营场的 200 余人，是美军眼中的危险分子，看管上特别严格，待遇上又格外的低劣，演剧的服装道具根本谈不上。演出时我用纸板做了个大乌龟戴在“蒋介石”头上，其余“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头上也如此化妆，只是比“蒋介石”顶的那个略小一些。不料想蒋宋孔陈



的打扮气坏了铁丝网外配合美军站岗的南朝鲜士兵，他认为我们丑化他们国家的灵物在故意侮辱他们的国家。因为南朝鲜人把乌龟看成是很有灵性而长寿的生物。南朝鲜的国旗是八卦旗，徽记就是乌龟，钞票上也印上这个物件，就象金圆券上印蒋介石头像一样。但碍于带岗的美国大兵正饶有兴趣地看我们的演出，他们也不便发作，只好怒目视之罢了。

我们是经常骂李承晚的，但这台戏确实不是骂他的，李承晚士兵们为此生气，完全是一场误会。（钟骏骅）

### 巨济岛上升起的第一面红旗

每当我看见五星红旗在蓝天下随风舒卷，我的思绪不禁又回到了40年前。祖国啊，你可知道您的忠诚儿女曾在异国的孤岛上，在密密铁丝网内，在敌人枪口下，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缝制和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

那面红旗是1952年4月8日，在巨济岛“71”战俘营升起的！二百多名爱国志士用这面红旗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忠诚，用这面红旗来激励被监禁在人间地狱的难友们冲出阎王殿，回归祖国，用这面红旗来反对敌人对中国战俘强行所谓“去向甄别”。

4月7日，“71”的地下党支队决定要在战俘营升起第一面红旗时，我们是多么兴奋！全营场248人都行动起来了。为赶制国旗，准备旗杆、旗绳而动脑筋想办法，大家都期待着升旗的庄严时刻到来。

只有一天时间，集中营内什么都缺少，制旗的面料从哪里来？心灵手巧的曹明同志想出了好办法。他用敌人发的雨布，在加热的油桶上脱胶，得到了一块白色尼龙绸。没有颜料怎么办？不少人争着刺破手指把血往布料上涂抹，但血干后就变成了黑红色。最后还是用红汞和奎宁作颜料，染出了红绸黄绸。在缝制国旗时，大家都争着动手，那怕缝上一针也好。很快一面色彩艳丽的五星红旗就制成了，美中不足的是旗的中央有个补丁，那是套头雨布的

领口痕迹。准备旗杆的战友也开动了脑筋，用几根废水管和帐篷杆子，接成了一根约十米高的旗杆。没有滑轮，就用铁丝圈代替。结果，只用了一天多的时间，一切就准备就绪了。当几位领导来检查时，他们是多么高兴，表扬大家说：这面旗的产生是革命精神和群体智慧的结合，是爱国主义的高度体现！于是，详细安排了第二天早上升旗的具体分工：选了一组身强力壮的战友负责凌晨竖起旗杆和升旗后护旗；确定了我和钟骏骅两个“小鬼”担任升旗员。记不得是哪两位战友把自己比较新的衣服交给曹明，请他替我们改制出两套合身的志愿军军装、军帽，曹明还在军帽上缀上红五星。我和小钟都为担任升旗员而欢欣雀跃！年长的战友对我们说了不少鼓励的话。黎子颖临升旗前还对我们说：“你们不要怕，大家会保护你们，假若你们真的倒下了，第一个补上来的就是我！”曹明教我们：“要机灵点，情况有变化就赶快隐进队伍中来。”

1952年4月8日黎明，迎着海面射来的万道霞光，三个空柴油桶被抬进广场中央，紧靠一起，随即将旗杆立在桶中间并填满泥土砂石。我们迅速列队在旗杆下，我和小钟被“抬”上了大柴油筒，肃立在旗杆下。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了。赵政委站出来，只说了句：“同志们，请不要忘了：我们的国旗是由无数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决不能让它在我们手里变了色！”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他向我俩挥手示意升旗。马有钧同时站出来指挥唱起了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国旗在雄壮的歌声中冉冉升起。我一面往下拉着旗绳，一面唱歌，一面止不住热泪涌流。我想起了故乡嘉陵江的滚滚流水，想起了妈妈送我参军的情景，想起了被俘后种种苦难……红旗升到顶了，我转过身看见所有的战友们都已是个个泪流满面，仰望着在蓝天下高高飘扬的红旗！她傲视着对面“72”营场旗杆上的美国旗和国民党旗！她如一团熊熊烈焰向敌人鲜明地显示了我们坚贞不屈的回国意志！

敌人恐慌了，巡逻的美军士兵高声叫骂着，激烈地比划着手

势命令我们降旗。岗楼上的哨兵，发疯般地摇动着电话机向司令部报告。中国战俘营建立以来升起的第一面红旗太使他们震惊了！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我们全体战友都留在广场上准备随时迎接敌人的镇压，保卫我们无比珍贵的红旗！

对面“72”的难友们也被惊醒了，有些难友不顾一切钻出了帐篷向铁丝网跑过来，望着那面他们似乎已阔别多年的国旗，落下滚滚热泪。更多的难友是停立在帐篷附近默默地向国旗行注目礼。随即，“72”营内到处响起哨声，警备队（P.G.）队员们手持警棍，慌乱地四处奔突，狂喊着：“进去！进去！都给我滚回帐篷！”“谁看共匪的旗子就打死谁！”铁丝网边上有两位难友不愿离开，一个被乱棒打倒在地来回翻滚，另一位被两个警备队员（P.G.）反剪着双臂硬往回推，但他仍转过那满脸是血的不屈的头，朝着国旗高呼：“我要看，打死我，我也要看来呀！”

40年过去了！朝鲜战场上的滚滚硝烟早已荡然无存，当年巨济岛上战俘营里的刀光血影，战俘们的反抗怒吼斗争歌声也都早已消失在太平洋的万顷波涛之中。然而在死亡之岛上升起第一面红旗时的种种情景却至今仍萦绕在我的梦魂里。（何平谷）

### 通红的铁条烙在胸前

1952年元旦前夕的一个早上，十多名如狼似虎的徒手美国兵闯进釜山一号收容所（即战俘医院），逐个帐篷清查，嘴里还不停地骂着，把一些病未痊愈骨瘦如柴的伤病员从床上拉下来。一个南朝鲜的汉语翻译对大家说：“快收拾好东西，带上碗筷，送你们到巨济岛去。”听说去巨济岛，被拉出的20多人都紧张起来。我们中不少人都是从岛上来的，那里的中国战俘营大都被坏人控制了。特别是被叛徒特务王顺清、李大安之流控制的“72联队”，更是一座活地狱，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在那里拉屎撒尿都要报告，互相之间不准交谈，每个人都要在身上刺反动字样……否则，轻则挨打、受罚，重则遭秘密杀害。

在釜山虽然得不到认真的治疗，生活上也受虐待，但这里没有叛徒特务的迫害。只要避开美军耳目，人们可以自由交谈，传递前线胜利消息，交流对祖国的思念！一些战友还组建了“爱国主义小组”，坚定大家的回国意志。在“小组”成员的关心下，原来消沉者振作起来，软弱者勇敢起来。在这里战友们都很团结，尽管在异国他乡身系牢笼，但难友之间仍然体会得到集体的力量和温暖。而现在却又要把我们押回巨济岛了！

在押往巨济岛的军舰上，张福庆找我们商量对策，商量结果：坚持不去“72”“86”。我们20人一定要团结一致，争取到“71”去。我们早在医院时就听说“72”、“86”有200多难友经过拼死的斗争，单独关押在71战俘营。在那里，都是坚持回国的同志，他们可以自由地唱祖国歌曲，公开喊打倒美帝的口号，都说那里是岛子上的“小延安”。经过周密研究，决定由张福庆、吕杰、刘思亮分头做组织动员工作。由我起草一份声明，递交美军当局，坚决要求把我们移送到“71”，坚决拒绝去“72”、“86”，若不满足要求，就全体绝食抗议。我们20人都在声明上签了名。在我们到达巨济岛“61”战俘转运站的当天上午，我们将声明送给了美军管理当局。中午，一个美军上士前来回复，说他的上司已同意我们的要求，下午就送我们去，大家不必绝食。对此，我们半信半疑，总觉得胜利来得太容易，可能敌人是玩的欺骗花招，要做最坏的准备。我们商定：假若要我们去“72”，大家就坐下不走，一定要团结，要有斗争精神，即使失败了，也给“72”的难友一点震动。

不出所料，敌人完全是设的一个骗局。当天下午我们被送到“71”和“72”的两道大门之间，下车后蹒跚地走向“71”时，一班武装的美国兵包围了我们，硬逼我们去“72”，还用枪托打我们。我们坐下不走，并高呼口号，抗议美军的暴行。这时“71”的战友们也集合唱歌喊口号声援我们，“72”不少难友也走出帐篷观看。但他们很快被特务们驱赶回了帐篷。这样，僵持了半小时，

“72”大门突然打开，从场内跑出来几十个警备队员（P.G.）。他们4个人挟持我们一个，硬是强拉硬拽把我们拖进了72联队。

警备队员（P.G.）们把我拖进一间石头垒的厕所里，有个家伙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不愿进来，现在怎么样，先让你尝尝滋味。”接着拳脚棍棒没头没脑地向我打来。我早有思想准备，咬住牙，不吭声，看看敌人除了这一手还有什么能耐。开始我还觉得疼，后来就昏了过去。当我醒来时，已被拖进一个帐篷，被扔在地铺上。一个十分凶狠的声音在说：“你们看清楚，哪个要再顽固下去，他就是样子。”原来是一个俘虏官中队长在恐吓其他难友。他见我醒来，恶狠狠地警告说：“你等着，我们还要好好的跟你算帐！”说罢，扬长而去。

当晚，我又被架到大队部。这次李大安亲自出马了，大队部里，除他带来的警备队员（P.G.）外，还有大队部几个特务。李大安一见我就拍着桌子说：“你这家伙吃了豹子胆，专跟老子作对。”说着，当胸就是一拳。他接着说：“你没去釜山时，我就注意你了。夏天换衣服时有个本子你还记得吗？”我当然记得，在那个笔记本上我写了一些怀念祖国的话，但我没有吭声。另一个俘虏官说：“你年纪轻轻，看来也是个知识分子，竟这样不识时务。”李大安打断他的话道：“少跟他废话，这次这么干是谁的主意，谁领的头？”我不作声。“不说，我也知道。你看看，这是什么？”他拿一张纸向我扬了扬。那正是我起草的那份声明。他指使身边的警备队（P.G.）队员，把我按在地下，一阵棍棒加身。我仍咬紧牙关，不叫出声来。另一个警备队（P.G.）队员抓着我头发，把我从地下拉起来。李大安让他们剥掉我的上衣。“你挺硬，让你来点好受的。”他顺手从炉里抽出一根烧红的铁条，先用通红的铁条点燃烟，接着就当胸狠狠地烙了我两下。那钻心的疼痛，使我全身颤抖起来，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我在昏迷中听到李大安朝我冷笑着说：“今晚我们先认识认识，以后老子还要叫人在你身上画画花，写写字（指刺字）。下面我还要找张黑子算帐！（指张福庆同志）”他让

警备队(P.G.) 队员先把我带走。本来我想今天他要对我下毒手，早已豁出去准备一死。看来李大安还不愿意让我死去，他要慢慢地折磨我。

后来，在“71”难友的营救下，美军当局被迫把我送到了“71”。在“71”受到了战友们的热烈欢迎和亲切慰问，领导表扬了我的斗争精神。我忍着被烫烙的伤痛，这时却忍不住落下了激动的热泪。

(唐耀)

### 拚死奔赴“小延安”

我是 1951 年 7 月份由釜山伤病医院转送到巨济岛 72 战俘营的。

1951 年 8 月初，我去“72”医务室看病时见到杜岗参谋长，他给我递个眼色，在不被人注意处说了短短一句话：“团结同志，不签名，不刺字，坚持回祖国。”这几句话给我增添无穷力量和坚定的信念。回小队后，我便跟难友们议论板门店和谈消息，大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非常激动的心情。我感到许多难友都盼望和谈能早日成功，渴望早日回到祖国怀抱。当时在敌人的白色恐怖控制下，大家不敢明着表态，只有利用去厕所、干劳役等避开监视的空隙时间，才能说几句知心话。由于缺乏领导，没有斗争经验，办法不多，力量单薄，敌人一天比一天凶残地逼迫大家签名、刺字。有的同志因为受不了毒打，被迫在身上刺了字，此时想回国又有难见祖国人民的顾虑。

我和陈六山等同志的“回国小组”，是听从杜岗参谋长的指示而坚持了不签名不刺字的。我们几个同志在受尽敌人残酷毒打之后，感到与其被叛徒打死还不如拼命逃到对面“71”去。那里天天传来《东方红》的歌声，是自己人控制的战俘营。

1952 年 2 月初的一天，那天刮着昏黄的大风。美国兵从各个帐篷驱赶战俘去出苦工，好像是有什么紧急事，也不用小队和警备队的安排，只要见人就往外赶。我和陈六山等人趁势乱跑，抢

先到大门口去，等待着列队走出“72”战俘营，上车到海边兵舰上去卸货。我想：“今天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即使死在美国兵的枪口或刺刀下，战友们也会知道我为什么死了，祖国也会知道我的死是跟敌人斗争而死，决不再回“72”去死在叛徒李大安的屠刀下。决心下定，便把死亡抛于身外。在卸货时，我扛着箱子走不快，美国兵在后面用枪托捅背，大皮鞋踢屁股，嘴里“巴力、巴力”（快、快）的喊叫着。我全身似乎麻木没有知觉，耳朵也听不见吼声，专心想着如何才能冲进“71”。到了休息时，我便公开大胆地向大家宣传板门店谈判就要签字的消息。问：“同志们是愿回国还是回‘72’等死？若愿回国今天就得向敌人拼死斗争，咱们一齐到‘71’去。那里有咱们的首长会爱护咱们，有许多真诚回国的同志勇敢可亲！”这时，许多同志慢慢来到我跟前。有的同志说：“小曹，你说咋办？我不怕死，跟你去‘71’一同回国。”我说：“到了下车时听指挥。”

我和陈六山等同志分头准备，让同志们每人拿一件自卫东西，如木棒、石头等，我二人各拿根木棒做拼死掩护。下午收工后，我们到了“72”和“71”的大门口之间下车。天上仍刮着黄风，押车美军穿着大衣挟着枪，冻得缩着头。“71”正好开着大门往里送粮食，门口的卫兵也冻得挤进了岗屋里。下车后，我立即指挥同志们直往“71”战俘营内冲，喊了声：“谁挡就和谁拼！”我和陈手持木棒掩护，美兵持枪阻挡，我和陈边抵抗边往“71”内冲，冲进“71”约20多人，敌人也增加兵力往外拖人。冲进的同志，胳膊挽着胳膊紧紧拥在一起，任敌人怎么脚踢、打、拉也拖不动。美军急忙增加10余名美国兵武装进入“71”，用枪托乱打，将我打昏往外拖。这时“71”的同志们一起出来，围住我们并和美国兵讲理，美军见势不对才不得不放下我们灰溜溜地走了。等我醒来时，正躺在杜岗参谋长的怀抱里，看到我们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巨济岛上的“小延安”，我禁不住热泪汹涌，心里喊道：“祖国，您的儿子回来了！”

（曹学良）

## 楚囚南天望北归

### 万里征战报国仇

1950年12月的一天晚上，军组织部长刘显谋突然打来电话说：“要你披甲上阵，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命令已下去了。我想我怎么不知道呢？明天得问一下。第二天我问教导团团长张兴同志：“有调我的命令吗？”团长答：“已来了好几天了，我给压下来了”。我心里清楚，我们团部的几个干部团结得很好，他决舍不得让我走。团长又说他不同意让我走，想到军部找一找军政委。过了几天，师部的一位领导路过我团，问我：“老赵你真的打算去吗？”。当时感觉有些奇怪，怎么能提出去不去的问题。朝鲜战场的情况也听了不少，美国鬼子飞机大炮多，意味着打仗的实质也是打钢铁，也就是说战争是很残酷的。当时我想：抗日战争过来了，解放战争过来了。回忆起抗战初期一块参加革命的战友，不少人已牺牲了，他们的面孔仍历历在目。现在去抗美援朝，轮也该轮到我了，无非是挂彩、牺牲。受党的长期培养教育，对党的命令只有服从，况且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祖国和人民让我出国抗美援朝，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回想起上级对我的历次调动，从来都是服从命令，不讲价钱。



我到军部报到后，就下到一八〇师五三八团。到团后，部队已在准备出发。团长庞克昌给我介绍了情况：部队到四川成都后与起义部队合编，因此层层都有起义部队军官，上至军师团，下至营连排、团直参谋处、后勤处都有起义军官。连队自解放山西太原后，一直打到四川成都没有补充新战士，老战士基本上打完了。一些骨干也调到地方各县搞地方武装去了。所以说连队百分之六、七十都是解放和起义战士。武器方面，在国内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就落后于敌人，全国解放后有些调整，这次要与美国鬼子作战又远远落后于人家。当时我想：“对这次战争的艰巨性还真得做好思想准备！”我到团几天之后即出发北上，从广汉坐汽车，到宝鸡后改乘火车经过一天多时间到达河北省沧县泊头镇。到这里进行了武器调整，都换上了苏式武器。下级干部对苏式武器并不感兴趣，因苏式武器太笨。在此期间，对部队进行了抗美援朝伟大意义的教育，同时批判了一些错误的思想言论，如“唯武器论”“恐美思想”，又分析了敌人远距离作战运输线长，供给困难，他们士兵都是少爷兵，只能远距离作战，不敢近距离作战等弱点，以提高部队的必胜信心。

团以上干部又到天津开了一次会，周总理讲了十年建设规划，邓小平同志讲的基调和别人讲得都不大一样。他一再强调不要轻敌，困难要估计多些，不要求胜心切。总的感觉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是实事求是的。

出国前，上级命令团以上起义军官都留下，动员我团副团长（起义军官）也留到后方。

天津会议后，部队迅速北上到鸭绿江边的丹东市，准备出国参加第五次战役。

我团是1951年3月21日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过江即是新义州。一进入朝鲜，满目凄凉景象，新义州已被飞机炸成一片废墟，公路两旁炸弹坑比比皆是，沿途不断遭敌机袭击，好在人没受多大损失。但白天部队不能行动，因为制空权在敌人手中，我

们只有晚上在仅有的几条公路上，战斗部队和各类运输车辆齐头向前移动。

部队到前线马上就进入战斗，这就是第五次战役，时间是4月22日黄昏。据后来材料看，这次战役投入力量最多，企求速胜，以彻底转变形势。战役开始后，进展很不理想，因后勤供应的限制，只有及时结束战斗。30日宣布战役第一阶段结束。我们团在这个阶段战果不大，但损失也小。

又整顿了10多天，补充了一周战斗的弹药和粮食，到5月16日又开始了五次战役第二阶段。

开始时，前进得比较顺利。我们追，敌人退，一直追到春川以南，我们部队每人随身带了一周的粮、弹，敌人对我们也摸透了。后来才知道敌人采取的是“磁性战术”，边打边退，一直到我们无力前进时，敌人才开始进攻反击。

### 壮士不幸作楚囚

5月24日，我们一八〇师不幸被截断在敌人后面。此时我们部队由春川以南撤到江北山上，师与志司、军指挥部都联系不上了，撤又不敢撤，打又打不了，部队也没吃的了，就这样犹豫了一天。白天又不能移动，眼巴巴地看着两翼敌人的坦克汽车赶上我们，一直超过我们，这时才意识到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与军指挥部也联系不上。下午，师指挥部郑其贵师长、吴成德主任主持召开了师指挥部会议，研究对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突围。这时敌人炮也打得少了，但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在向前运动。当时决定我们团由团长、参谋长带二营和一营在前面打，打出个缺口，让后面部队与师指挥所、师直、团直通过。

晚间战场上一片寂静，敌我双方都在黑暗中运动。我与政治部主任张启在团直属队，前面有特务连一部分，团直属队后面是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主任吴成德和师指挥所同志。当行进到一条沟里时，前面有人发现与先头部队失掉

联系，返回看后面也找不着师首长了，这时才知道前后都失掉联系了。张启同志意见：赶快往回返，找到失掉联系的岔道口。返回时又碰到团副参谋长杜岗同志，一起返到岔路口，当时前后只有十多人了，怎样走，谁也不熟悉这里的道路。杜岗同志指出一条路，我表示同意，就按杜指的路线走，只要晚上走出这条沟，过了公路，再过一条河就可到鹰峰山。我们知道这座山是最高的，关键是今晚要突出去，谁知又撞进一条没路的灌木丛林。下半夜，敌人突然发起猛烈炮火，堵住去路，当即进行隐蔽。敌人的炮弹炸得碎石弹片横飞，我被震昏，失去知觉。当我清醒过来时，天已拂晓，又下小雨，我发现手脸有血迹，检查一番是手受了伤。周围已看不到一个战友了，事后听好多同志说，当时他们都认为我被炮弹炸死了。到黄昏前，沟内始终没发现敌人，我一个人在崎岖的灌木丛林中向前行进，想找几个同志，以便接近沟口，晚上突围。不料隐藏在树林中的敌人，突然窜到面前，把我包围起来。在这突如其来的霎那间已经来不及抵抗，就这样我被俘了。

刚被俘时心想一切都完了，像我这样的干部被俘，怎么向祖国和人民交待，只有争取和敌人拼，或者出逃。

敌人连打带推往山下送，走不多远就遇到我团的一个侦察员石××。我们出国时，每个人都剃了光头，唯只有侦察员允许留长发。他和我一块往前走，沿路他挨打最多，敌人认为留发者一定都是当官的。在这种情形下，我告诉他骨头硬些，不要乱说，敌人看我们说话，就吼叫推打不让我们说话。

到山下，看到有几百人坐在一起，有我团参谋薛天林、杨树滋、管理员杨培富等同志，当时感到这次战役我们损失不小。我告诉周围几个同志，我叫王芳，是司务长，同志们都往我身边靠拢过来，紧紧地围着我。当时我心想敌人很可能让战俘服劳役，那时能搞一个大爆炸与敌人同归于尽，就算革命到底了。转念又想，我到团里时间短，一般战士和下级干部不认识我，好隐蔽，只要能隐藏个把月，我把力量组织起来再跟敌人拼就好办了。想来想

去都是围绕一个死字，如何死！

当天晚上又移到不远的一个收容所，这里人就很多了，敌人临时用铁丝网圈起一块平地。我曾想晚上设法逃出去，而敌人看管很严，根本无法外逃。

第二天送到水原时，那里已先后集中有千余人，我身边仅有杨培富、马鹏年排长。从这里又乘火车往釜山送，这时周围已集中了我团直十余人。我告诉同志们靠拢些，在大闷罐车上，布置团参谋处队务股长张蜀俊(他年纪大些,平时很正派)介绍“苏武牧羊”故事，同时叫杨培富等人与其他团的难友联系，组织力量。

沿途敌人给我们被俘人员吃的是一些不熟的米团子，吃着有怪味，和猪食一样。我告诉同志们，敌人想折磨死我们，我们不能轻易死。当时主要思想是积极组织力量，了解情况，寻找机会和敌人作拚死斗争。

到釜山开始进行登记，登记人员都是人民军被俘的人员。这些人一般是爱国的，听到他们不断介绍一些情况，鼓励难友们逃出去找游击队。当时想：最好是找关系逃走，还听说人民军被俘同志有的坐船逃到了北朝鲜；另一个想法是组织力量找机会和敌人拚，拚死了也光荣。

6月16日突然通知要上轮船，看样子是一艘军舰，但往哪里去谁也不知道。大家全坐在甲板上，有一、二百人。在釜山时我们已经有意将联系人都坐在一起了，我和几个骨干研究分析，可能一是送某个岛屿，另一个可能是送到台湾，为蒋匪作炮灰。到台湾后定是九死一生，怎么办？当然我这样的干部到台湾定会打入死牢。我和几个骨干商量：船行到下午可能驶往上海方向，我们就夺枪暴动，劫船逼敌人向中国开。同志们都同意我的意见，然后进行分工，当时分了几个组，打前舱、后舱、中舱。记得负责打前舱的是我五三八团侦察排长马鹏年，打后舱是五四〇团指导员李喜尔、杨培富，五三九团的教导员李明等同志打中舱，每个人再组织些战士。当时我的中心想法就是：不成功则成仁，若暴

动不成，就同归于尽。

战场上失利被俘，我知道同志们心里老不服气，总感觉这次战役是指挥失误造成的，大家总希望再有机会拿上武器和敌人干。虽然被俘了，只要有人出来领导指挥，同志们是会坚决服从的。

可惜，当时在船上没一个人会英语，无法了解情况。船行了约两个多小时即靠了岸，这就是巨济岛，劫船的计划落空了。

### 图圉难灭革命志

下船后，全体人步行到“72”号集中营，进入军官大队。一个大队长问：“谁是营长？”没人应声。又问：“谁是连长”也没人应声。

当时虽然都报是军官（排以上干部），但大多数原职务都没暴露，若承认自己职务岂不是自己暴露自己，那后果是什么很难设想。当时也不知他问职务是什么意思。

当天，有我团先来军官大队的干部告诉我：大队长孙振冠是三野一个教导员，第二次战役被俘的，上海人，是知识分子。不久前才团结了一些难友将原来的叛徒大队长魏四喜赶下了台，夺取了军官大队的领导权。副大队长张福庆是六十四军一位营长，也是好同志。还有一位叫刘光的是连长，他经常与战俘营的一些叛徒进行辩论。我进一步布置杨培富、马鹏年等同志明察暗访继续了解情况。

第二天晚上，孙振冠突然到我睡的铺上，躺在我身边小声地简单介绍了他的情况（此时我在敌人面前身份还没暴露），还讲了些最近军官队的情况。他说：“现在坏家伙活动猖狂，您要注意。”当时我对岛上的斗争形势一无所知，对他也不大了解，没有表示什么具体意见，但我感到了他善意的关切。我想：只要条件许可先把“自己人”组织起来再说。

我随即把我师几个团的骨干组织起来。五三九团由李明负责，五四〇团由李喜尔负责，五三八团由指导员周全光负责。此时，战

俘营中传说前个时期有个团领导隐瞒了身份被枪毙了，因此我作了准备，一面准备让敌人随便处置，一面交代工作。总的负责人是教导员李明同志。

这是我被俘后最初发起的组织，虽然很散，也无明确的斗争方向，但难友们都表示愿在我的领导下跟敌人干到底。表达了生死与共的难友深情。

我6月16日到岛上。18日即被叛徒出卖，19日就与军官大队大队部的主要负责人一起被美军押送进“肇事犯监狱”里，这是一次明显的“反夺权斗争”。美军管理当局决不甘心由“共党分子”掌握集中营内部控制权。当叛徒们告密中国军官大队的“俘虏官们”是“共党分子”，并且又来了个团政委时，他们就以“肇事犯”名义将我们抓走，以便让叛徒们重新掌权。

“肇事犯监狱”就在岛上，用铁丝网围起一块地方，里面有二个帐篷，住有20多人。大都是人民军被俘同志，中国人就是这次被扣的我们7个人(孙振冠、张福庆、刘光、王洪达、刘思亮、鲍占林)。人民军中有朝鲜的道委书记(相当于省委书记)朴相显，还有师参谋长李学九。总的都是敌人认为指挥闹事的“赤色份子首领”，先后被敌人抓来的。

我们几个人到这里后，成立了党小组。每个同志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并进一步研究了中国战俘营的情况，确定了对策。其中一条是尽快“生病”到医院去，争取与中国战俘营同志取得联系。我也曾到医院找过，但很不容易，因都不认识，难以取得联系。不料想在这里竟然见到了朝鲜难友的最高领导，他们都是美军仁川登陆后被俘的，都急于了解前线形势。听我将前线情况给他们介绍后，都非常高兴，树立了必胜的信心。我和孙振冠还向朴相显同志汇报了中国战俘营情况，一起研究了战俘营的斗争形势，并决定争取中朝战俘营斗争步调一致。老朴告诉我们：朝鲜战俘营基本上已掌握在自己人手里，都已组织起来，还告诉我们岛上正积极准备在9月份搞一次暴动。他提出：希望我们将整个中国战

俘营的斗争领导起来，今后多方面取得联系。这使我更加明确地意识到应站出来领导全体中国战俘的斗争。这要感谢朝鲜战友的提醒。这一次与朝鲜战友最高领导人的会晤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的！特别是朝鲜战友们力争掌握战俘营内部控制权，有组织地领导难友们开展反迫害、反背叛的斗争策略对我们很有启发。

当时巨济岛上大约有人民军被俘人员 10 余万人，志愿军被俘人员有两万多人。

我们在这里被关押的一个月中，多次分析志愿军战俘营的情况，深感我被俘人员的成份不如人民军被俘人员纯洁。日本投降后朝鲜没打过仗，人民军部队基本上都是老战士。而我们部队这么多年一直打仗，老战士基本打完了，大量补充解放战士和起义战士，部队层层都有解放和起义战士。甚至有敌人特务潜伏在我们部队，如原来军官队的大队长魏四喜就是北平解放起义的一个连长。他曾将国民党党证订在衣服内，在战场上投敌，将他的党证交给敌人。还有 72 联队的李大安，在丹东当过国民党警察，后又混入我东北军区运输团入朝，在前线驾车投敌。这些人都成了替敌人镇压、残害战俘的“铁杆汉奸”。

我们预计中国战俘营的斗争将十分艰苦。

第一次公开较量。

一个月后，当敌人将我们“释放”回“72”时，叛徒们已经在美军当局支持下控制了 this 战俘营，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警备队”，用以镇压战俘的反抗斗争。

当天晚上新任大队长王友敏向我们宣布：除了上厕所、吃饭外，每天只能坐在自己地铺上，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等戒规。真没想到才离开一个月，情况就大变了！大家都不敢自由说话，甚至见面连点个头也不敢，胆大的还敢使个眼神。我们团直属队指导员周××这时见了我，连个眼神也不敢使，此人不久就叛变了。我非常生气，心想，一个老同志、共产党员怎么会这么经不起威

胁呢？

敌人一经知道我的身份，便肯定我是一个绝对危险分子、死硬共产党员。他们除公开派一伙警备人员，每天拿着棒子在营场巡逻外，还安排一些败类整天盯着我，怕我有什么活动。难友们也不敢接近我这个“危险份子”了。看样子他们不会让我在这里呆下去，估计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暗中害死我，另外也可能再将我隔离起来。我决定加紧活动。一天，大队长王友敏在“训话”时威胁说：“有人在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煽动暴乱！兄弟奉劝一句，还是别自找倒霉为好。”实际上我只是对周围的同志讲了些板门店和谈情况而已。我想这种高压局面必须扭转，不能让敌人把我们整垮。当时我已无法和孙振冠他们取得联系，便决定自己出面，公开号召，与这些叛徒进行斗争。我想：与其让敌人把我暗中整死，不如以死抗争，并以此唤起大家！

第二天中午，我利用吃饭前混乱，突然走了几个帐篷，找了几个骨干同志，告诉他们，下午我要公开号召，和这些叛徒进行斗争。

到下午大约 3 时左右，我看见总是有人盯着我，心想恐怕今晚也过不去，绝不让他们暗中整死或捉走我。于是下决心，立即出面亲自号召。我突然走出帐篷站到院中间，大声喊：“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党员干部站出来，赶走坏蛋王友敏！……”正喊着，警备队与王友敏一起围过来，把我抓住。王友敏吓得满头大汗，好多同志都在帐篷内探着头向外张望。叛徒们当即把我推了出去，押到联队新建的一个小隔离帐篷内，接着张福庆、刘光、南阳珍等人也被抓了进来。在被押着路过小铁丝网大门时，我见联队副魏四喜正站在小铁网外面观看，我骂了他一顿，他气走了。这时来了一个负责管理“72”的美军军官，他看了看，对“警备队”任意抓人毫无制止之意！

在隔离帐篷内我们做了充分准备，抵抗叛徒对我们的残酷毒打。第二天下午，突然来了几个警备队员，进来就要我们趴下受



打。我们骂了他们一顿，把他们骂走了。接着来了十几个叛徒，一进来不分青红皂白，一拥而上，有推的、有按的，先把我和张福庆同志轮番毒打一顿，一直把我们打昏了过去。他们边打边嚷道：

“你们这些死硬共产党，在大陆你们斗争我们，分我们土地，今天该我们跟你们算帐。”有的喊：“你们不敢打，我来打！”咬牙切齿，对我们充满阶级仇恨。我紧咬着牙根，心想：“只要没打死，等9月份岛上暴动时再跟你们算帐！”

这第一次较量，由于敌人控制太严，而我们的同志事先又没有充分思想和行动准备，没有达到赶走叛徒夺回控制权的目标。但总算给了在白色恐怖下的难友们一个震动：“人心未死，党心还在！要起来斗争！”

在这个小隔离所住了约十余日。8月中旬，突然通知我到釜山审查。全大队200余人一同去到釜山第十收容所，我们被关押在专门审讯战俘的美第八军情报部（G-2）的小铁丝网内，轮流听候受审。叛徒王顺清（后来担任“72”联队长）当时正领着一批狗腿子看管我们，并协助敌人从战俘口中榨取军事情报。我自知肯定是审讯的重点对象，心中倒也坦然：“无非是再过一道鬼门关罢了！”不料想敌人尚未提审我，却有自己人偷偷送信给我：“请速去医务室诊治你的腹泻病！”我装病跑了几趟厕所后，被允许到医务室看病，在那里见到了张泽石同志。他是我团的见习宣教干事、清华大学的地下党员，当时他在那里担任大队长。他一见我眼里就闪出泪光，把我领到一位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军医面前，用英语说了几句话。那位军医朝他会心地笑了笑，开了张“病毒性痢疾”的诊断书，我立即被送往专治肠胃病的第三收容所。泽石在送我离开第十收容所时对我说：他将尽快到第三收容所看我，那时再详细给我汇报和请示工作。

约一周后，他果然带着掏粪队到第三收容所见了，谈了他所了解的战俘营敌我友情况，以及他组织的“爱国主义小组”的情况，还带来了一份“爱国主义小组”章程，并将第三收容所他

发展的“组员”姜瑞溥介绍给我。张泽石同志的表现使我很感动，并使我在思想上改变了一些对知识份子的传统看法。

我表扬了他的主动斗争精神，要他多了解敌人的动向，多团结自己同志，同时加强和朝鲜难友的联系。并对他的“爱国主义小组”章程提出一些原则性意见，主要是要注意保密性，防止叛徒破坏。他高兴的走了。

釜山第三收容所，在8月中旬我去的时候，内部控制权已掌握在我们自己人手里。釜山各伤病战俘收容所是中朝难友同住的，朝鲜难友们来得早，又较早地组织起来赶走了战俘中出现的叛徒，控制了内部。在中国伤病战俘大批到来后，他们积极寻找和动员我们的党员干部出来建立地下组织，开展反迫害反背叛斗争和抓内部控制权。我师炮兵主任郭兆林，团组织干事徐寿田等同志已经团结了不少战友，打下了基础。他们在十多天前的“八一”建军节，组织了300多难友举行纪念集会，并结合“争温饱、反饥寒”斗争绝食一天。显示了我们的爱国力量，鼓舞了难友们。

我到这个收容所，首先见到老病号周流。他是我们的好同志，他介绍了这里的情况。对每日来住院的患者，都是他先去了解动态后我们研究对策，人民军医生的政治倾向，他都调查得比较清楚，也作了不少工作。

当时我想，我已在岛上暴露，回岛上不能公开活动，因此想以釜山医院为阵地，团结教育一批同志，为出院后到岛上能有一批斗争的骨干。我通过泽石同志让薛天林（团训练股长）、韦光明（五四〇团组织股长）也“生病”调到医院，我们同时做工作教育在医院的患者，同其他收容所的同志取得联系等等。后来又与郭兆林、徐寿田等同志接上头，王化英也来到第三收容所，我们几个同志每天碰头研究情况与对策。在这里的几个同志自然形成一个组织，周流多负责了解情况，他每天饭后就到各帐篷串联，碰到新进医院的患者一个个地了解动态，作思想工作，多争取一个坚持回国的也是我们的胜利。对那些思想反动的一般采取教育，作

些爱国主义宣传并指出其投敌的危险性等……

我从 1951 年 8 月中旬到 12 月中旬，一直被关押在釜山第三收容所。难友们很关心照顾我，千方百计掩护我，使我避免了敌人的迫害，深深地感觉到在苦难中战友之间的深厚感情和温暖。但我的内心却很不平静，很不安！我惦记着巨济岛上“72”战俘营里战友们，惦记着关押在“72”、“86”近二万名我的难友们的处境和斗争。

这期间，不断有从岛上送来的重病号或伤势复发的重伤员，或在斗争中遭叛徒毒打致残的重伤员。他们不断带来岛上两个中国战俘营里发生的种种情况，使我了解岛上中国战俘营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

看来，自从 1951 年 7 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美方即在战俘问题上大做文章，力图制造战俘不愿回归自己的祖国的假象。因而在战俘营中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来强迫战俘们背叛自己的祖国，包括进行欺骗宣传，人身折磨，政治陷害，和残酷镇压战俘们的反抗。而其主要手段是通过派遣叛徒特务进入战俘营内，直接担任各级俘虏官及建立其“警备队”，以武力控制住战俘营，实行白色恐怖统治。这个时期的“72”战俘营已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战友们一次次的反抗都遭到了残酷镇压！在“86”中国战俘营里，叛徒特务们力量相对弱一些，但美方也在千方百计支持他们加紧活动。8 月初，美方曾将“72”的联队副，这个两手沾满战俘鲜血的叛徒李大安送往“86”去担任联队长，被那里的爱国力量打跑了。美方又派出曾在“72”大显身手的美第八军随军牧师、特务伍培礼亲自进入“86”，以他“传教”的学校为据点，抓紧网罗“86”的变节者、动摇者，加紧发展其反动组织“反共抗俄同盟会”，逐步夺取各大队及联队警备队的领导权。“86”营内的战友们正在奋力与特务叛徒们进行着十分艰苦的反控制反变色斗争。

了解到这些情况，我坐不住了。多次和郭兆林、王化英等研

究怎样支持巨济岛上的这场关系到大多数中国战俘命运的大搏斗。我提出过自己立即出院再回到岛上去直接领导斗争，大家认为我的目标太大，去了只能再次被抓起来，根本不可能和战友联系。研究结果，认为只有加强釜山各收容所对内的组织宣传工作和对敌斗争，巩固这块回国阵地。同时，选派一些未暴露的骨干去岛上增强那里的斗争力量，特别争取多派一些同志去“86”。

8月下旬的一天，张泽石又一次来见我，说第十收容所的难友已不多，他主动提出想到岛上去投入更大的斗争。我立即表示支持，并要他力争去“86”，到那里后立即跟我师宣教干事张城垣取得联系：“就说是我派你去和他一起抓‘86’的斗争，他正在领导那里的地下组织。”泽石不久就要求美方将他送往“86”担任了那里的“联队部翻译”，我们后来又陆续派了一些同志去岛。

这时候，我已深感有必要像朝鲜难友们那样在战俘营建立统一的地下组织，统一领导全体战俘的斗争。他们有较多战俘营已控制在自己手里，还能在李承晚军队中的地下党支持下与营场外面联系。中国战俘营却没有这样的条件！

9月间，釜山第一、二、三、四、六各伤病收容所相继成立了“中共党团支部”、“抗美援朝同盟会”、“爱国主义小组”、“回国小组”、“中国人自治管理会”、“中国人爱国同盟会”等地下组织，并相继开展了“打坏蛋”、“反对派警备队(P.G.)进入收容所”以及“反饥寒、争温饱”等斗争。

1951年10月1日，釜山各收容所在统一领导下集体绝食一天，以抗议美方对中国战俘的虐待和纪念自己的国庆节。这是釜山地区中国战俘的第一次统一行动，显示了中国战俘统一斗争的力量。敌人则一方面对我们各次斗争进行镇压，一方面加紧了对我们内部组织的破坏和分化活动。

不久，传来了巨济岛“86”战俘营的消息，巨济岛的战俘为反对叛徒在“双十节”升国民党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斗争。原计划夺取全集中营的控制权，赶走叛徒，但在美军直接干预下失

败了。一些同志被打死了，众多斗争骨干被美方抓走，关到“肇事犯监狱”。这使我很不安，惦记城垣、泽石等同志的下落，并为留在“86”坚持斗争的同志们们的安全而担心。

11月中旬，又听到“72”军官队通过签名斗争有100多位战俘冲出了“72”，在“71”建立了一个“回国战俘大队”，不久后“86”的那批战俘也从“肇事犯监狱”胜利到达“71”。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巨济岛上我们也有了一个回国阵地。我真想到那里去和同志们一起就近了解“72”、“86”难友们的斗争，给予尽可能的支持。

12月20日早晨，醒来时，不知什么原因，来了两个野蛮的美军宪兵，叫我走。当即将我押到船上，送往巨济岛，关进61战俘营。关押我的这个“小监狱”是在该号一个小铁丝网内设的一个小帐篷，里面全是人民军的战俘，中国人只有我一人。这里24小时内都有叛徒看守着，每个人坐在铺上都不能动，不准说话，常常遭到棍棒敲打。

61战俘营是为登记转送釜山来的人设立的，这里有一个中国小队，也由朝鲜人统管，都是美国管理当局选的最坏的人掌管。战俘经过这一关是很难的，没有一个不挨打，不受酷刑的。

约一个月后把我由小监狱交到中国小队。当天下午，判徒们将队伍集合起来教唱反动歌曲，我坐在那里冷笑，把他们激怒了。叫我唱，我说不会唱，他们将我拉到队伍前，几个人压住我狠打。当时我心想：打是你们的自由，但唱反动歌曲，我死也不唱，这是被俘后第二次遭毒打。宁可被敌人打死，也不向敌人屈服。

遭毒打后，我就病倒了，未参加他们的任何活动。几天后遇到了樊子英，他是部队指导员，还有一位排长记不清他的名字。他们的政治立场态度都很坚定，我趁机和樊商定：力争去“71”，敌人若将我们送“72”，他负责联络力量。争取在每个礼拜六，败类们上课时，我出来号召再争取团结一批回祖国的难友起来跟叛徒们斗。没过几天，敌人果然要将我们几个人送到“72”。我们当即

提出抗议，终因人少力薄，被敌人拖进“72”。后来71联队的同志们发现了我，他们耽心叛徒杀害我，多次向美军当局交涉、抗议，才把我要到“71”，终于在2月23日脱离了“72”。

### 众志成城斗敌酋

来到“71”这个岛上的“小延安”，又见到了朝夕想念的孙振冠、魏林、杜岗、顾则圣、李明等众多“72”军官队的战友。还见到了张泽石他们从“肇事犯监狱”来的一批“86”的同志们。他们热烈地欢迎了我，要我担任“71”党支部的领导工作。自“71”回国阵地建立，并成立了正式的共产党支部之后，战俘营斗争便由小型的分散的斗争走向集体的、有目的、讲策略的斗争。这是因为我们形成了以一部分老党员为核心、以部队中层干部和爱国知识青年为骨干的坚强的斗争阵容。对内部同志则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坚定胜利信心和培养热爱祖国的情感，形成了一个民主、自由、团结、活泼的充满革命友谊的战斗集体。在党支部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很有气势的斗争：游行、示威、抗议绝食；通过书面和口头交涉，不断揭露敌人扣留被俘人员的阴谋；通过唱歌、喊口号、喊话，向对面“72”的难友们表示声援，鼓励他们在白色恐怖下坚持革命意志，坚定回国信念！

1952年4月8日，美方对战俘开始进行所谓遣返志愿“甄别”。为了力争更多的中国战俘回国，党支部进行了紧急部署，立即以“71”全体人员名义向美方管理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由我方最高级别军官去“72”、“86”向中国战俘宣读朝中方面的《告被俘人员书》；美方必须将战俘营内各级俘虏官和警备队调出加以看管以保证战俘们能在毫无威胁的前提下接受甄别，自由表达其回国意愿。美方不仅无理拒绝我们的合理要求，反而支使叛徒特务们在“甄别”前夕，对“72”、“86”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屠杀，林学逋、阳文华等人被剖腹挖心或吊打致死。

为了支援“72”难友的反抗斗争，号召广大难友回归祖国，在

4月8日晨，即“72”“甄别”当天，我们升起了巨济岛上第一面五星红旗，高唱国歌。

为了能尽早到达回国战俘的集结地，迅速整顿和建立起回国支队，“71”的200多名战俘于当天下午通过“甄别”到了第“602”战俘营。从此近6000名坚持回国的我被俘人员陆续集中到了“602”，成立了中国战俘的“回国支队”，开始了战俘集中营斗争的新阶段。

中国战俘“回国支队”成立之后，我们立即成立了中共回国支队临时党委会。我被选为总书记，副书记和委员们多是原“71”党支部成员，皆系我部队中经过前一阶段严酷斗争考验的连以上干部。他们不仅在战场上表现了成熟的指挥才能，在集中营斗争中也表现了非凡的领导艺术，在群众中具有很高威信。在临时党委的领导下，迅速建立了“回国支队”的各级行政组织和管理机构，基本上恢复了部队建制。同时根据战俘营的实际情况做了一些改变，如部队那套作战部门取消了，加强了外交、敌工、保卫、宣教、文工、机要秘书与通讯联络等部门。

难友们脱离了叛徒残酷统治来到“回国支队”，其欢欣鼓舞之情，可以想见，而对于今后可能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斗争任务却想得很少，充满了盲目乐观情绪。为把大家引导到迎接新的考验和斗争的方向上来，党委首先研究了当时最急迫的任务，即在全“回国支队”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问题。大多数同志都认为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并与党中央和志司党委都失去联系的特殊条件下，我们最好是建立一个实质上是共产党而名称上不叫共产党的战俘营地下党组织，以领导难友们开展这一场特殊的敌后斗争。但究竟取什么名称？我当时想：第一，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方向不能变；第二，现在回国支队6000人被俘前在各个不同部队，被俘后又在各个不同战俘营，原来各战俘营的各式各样地下组织在敌人残酷统治下也互不通气，只有团结一致才有统一组织的可能。在我们手无寸铁又面临强大敌人的形势下，团结

就是生命！于是我建议将地下党组织命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当时得到绝大多数委员们的同意。

在“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成立大会上，我被选为总委书记，孙振冠、魏林、杜岗为副书记，常委为顾则圣；委员有马兴旺、王化英、门培英、张城垣、李喜尔、许如刚、李明、陈吉庆等同志。大会通过了共产主义团结会的会章，它基本上和党章一致，只是根据战俘营的特殊情况稍加增改。大会决定在各大队建立团结会的分委会，各中队建立支部等。大会还确定了：团结、学习、斗争为团结会领导全体同志去完成的三大任务。

团结会的分委、支委都是选拔经过斗争考验的排以上党员干部来担任。他们大都是工农出身，跟着党经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锻炼，对党的感情很深，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血流汗对祖国真是赤胆忠心，他们是团结会的骨干和基石。团结会总委会还成立了“工作室”，调来一批爱国知识青年做机要秘书、通讯联络、翻译外交、宣传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工作。这些小青年很可爱，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和革命人生观，因而斗争勇敢、主动性强、善于克服各种困难。

“共产主义团结会”的建立和发展，为我 6000 战友反抗敌人的分化瓦解与残酷镇压，坚持革命意志，胜利返回祖国做了组织上的保证，起了决定性作用。

“共产主义团结会”成立之后，立即带领全体战友开展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斗争。追悼在“四八甄别”中壮烈牺牲的烈士们，并通过声讨大会，游行示威，绝食抗议，举行大型演出和张贴大幅标语漫画，升起五星红旗等形式，揭露和声讨敌人强迫扣留战俘所犯下种种罪行。

1952 年 5 月 7 日，朝鲜战友在“76”战俘营一举抓获巨济岛战俘营总管美军杜德准将，召开了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我回国支队派出了孙振冠、张泽石、黎子颖、柳一等 4 位同志参加了代表大会。朝中战友与杜德进行了谈判，杜德代表美方管理当局



公开承认了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罪行，消息传出震惊了世界，有力地揭露了美方制造的“多数战俘不愿回国”的谎言！

这一系列斗争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同志，引起了敌人的惊恐！新任战俘总管波特纳将军执行美方当局的命令，对战俘实施强行镇压的报复，开始了“波特纳恐怖时期”。6月10日，敌人对“76”朝鲜战友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血洗“76”，造成死伤500余人的大血案。还将我方代表孙振冠、张泽石关进最高监狱，后又关进“战犯集中营”。

1952年6月17日，敌人通知中国战俘全部迁住济州岛。全体战俘集中到海边的“70”战俘营，准备登船押送济州岛。团结会总委会考虑敌人刚对“76”进行了血腥屠杀，为保存力量，不搞大的斗争行动。我想敌人可能将我们和朝鲜战友分开，也可能将我们6000人分割隔离，以加强分化瓦解和进一步动摇难友们的回国意志，实现强迫更多战俘去台湾的阴谋。

第二天，敌人的广播车突然大喊大叫，要我出去，我们决定不予理睬。我们估计敌人在“杜德事件”、血洗了“76”以后，一定要在岛上搞全面镇压。我作为战俘营主要领导人，在中国战俘营又很活跃，敌人随便编个罪名，即可处罚。

敌人的广播车整天在营场外面叫喊，我们仍不予理睬。趁此机会我召开了总委会，研究可能发生的问题，如何巩固内部？如何加强各级领导力量，以迎接敌人的进一步迫害和压力。经讨论决定增补总委会和分委会委员组成四套班子防止敌人分割，并加强秘密通讯联络工作以保证统一领导。我没想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主持召开总委会议。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6月30日，敌人将武装部队开进营场，向营场内打瓦斯弹，逼迫战友们到海边集合。让叛徒从一个个通过的人群中辨认，终于将我认出，临走时，我和同志们挥手告别。

## 铁窗望尽山河在

我随即被送到巨济岛上的“最高监狱”。这个监狱是用石头筑的，是专门扣押特殊犯人的。每天睡觉、起床都是头顶上的卫兵监管，起床后不准再睡，每天只放风半小时。我进去后没有任何人提问，当天下午突然听到隔壁有人在敲，避开头上的卫兵，在板缝间互相问话。才知道是血洗“76”战俘营后被抓到这里来的，他是我刚被俘后，到岛上认识的朝鲜人民军的一位师参谋长，朝中战俘代表团团长李学九。他会说简单的中国话，告诉我孙振冠等4个中国代表也关在这个监狱里，可惜敌人不让我们见面，我是很想念他们的！

在这单人监牢里，我脑子不停地思考着，朝鲜战争和谈已经处于僵局，战局怎样发展很难估计，我们的命运和战局紧密相联。敌人有可能屠杀关在监狱里的人，我既是中国战俘营的“魁首”，随时有牺牲的可能。背靠着木板墙，想念着祖国、亲人，我心中默念着：永别了亲爱的祖国，可爱的家乡！永别了，亲爱的妻子儿子！永别了，亲爱的双亲！永别了，亲爱的战友！每当我想到战俘营中已经组织起来的这几千人，敌人永远别想打烂、拖垮，就无限欣慰，无限为之自豪。我只希望在敌人公开杀害我时，我能喊几声“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以死来激励战友、鼓舞斗志，那就死而无憾。

过了几天，经常在岛上活动的美国人菲利浦（他会讲标准的北京话）来到监狱，好像专来看我的。他首先问我：“这里打人不打人？”我问他：“你们为什么将我扣在这里？”他说：“因为你级别高。”我说：“这是什么理由？”他说：“因为你们中国战俘营闹得太厉害。”我批驳了他，和他辩论一番。第二天他托美国卫兵送来了两本书：《百家姓》、《千字文》。

7月10日敌人突然把我押送到海边的军舰上，上船时看到了我们的同志。在敌人眼中，我是最“危险”的人，所以我只能向

同志们摆摆手，互相对望，这是莫大的鼓舞，同志们也放心了。后来才知道 6000 战友为营救我，拒绝上船，除非见我一面才走，大家为我吃了好多毒气弹。

在军舰上，我仍以“犯人”的身份关在一个小禁闭室。

上船时，不少同志都看见了我，晚上大家耽心敌人会杀害我，向敌人提出要看看王芳（当时我化名王芳）。否则全体向敌人示威，唱祖国歌曲、喊口号，扰得敌人不得安宁。迫于无奈，敌人最后答应派代表去看。大概半夜时分，敌人把我押到军舰的平台上，总代表魏林和翻译高子代表战友们简单说了几句话。“同志们都要求看你，你还好吧？”我向同志们表示谢意，问同志们好，劝同志们休息。这场斗争，我们胜利了。

船到济州岛营场时，抬头一看，好大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周围有多层铁丝网，里面又分隔出 10 个小铁丝网，四周岗哨林立，戒备森严。

下船时我被单独先押下去，三个美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押我走在一条小街上，虽然我被几经折磨，但我是共产党员只要一息尚存，我仍要斗争。

到营场后，敌人突然送我到四号营场，我没想到敌人敢把我送回四号去。往营场走的过程中，几个号的同志都看见了，大家自发地面向四号营场唱歌喊口号“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此起彼伏，有的将船上舍不得吃的罐头，通过卫兵送过来。看到这个自发的欢迎场面，我心头一阵热浪涌来，感谢同志们对我的爱护和尊敬。更深地感到了难友们对党的一片深情，因为他们更多的是把我当成了“党”的化身！我决不能辜负难友们对党的期望啊！我想到我们刚到济州岛，对敌人还不完全了解情况，不应过早暴露，过份刺激敌人。我请同志们停止欢呼。

果然不出所料，下午，敌人又将我押到海边新围的小铁丝网内，下大雨，或海水涨潮时，铁丝网内都是水。第二天我提出抗议，敌人又从大本营里押来了张济良、王绍恭。

此时板门店谈判仍处于僵局，敌人在“杜德事件”后对我们施行报复，我关在这个小铁丝网内，远离了战友，只有靠张济良用英语向卫兵宣传我党政策、拉家常和了解情况。每天下午、晚上，可以听到大本营同志们唱歌，他们把要告诉我的事，编成歌曲，或用口号喊话来告诉我，慰问我。在这里大约住了两个多月，敌人在我关押的附近重新修建了一个用石头砌成的新监狱。这个新监狱面积大约有 50 平米，中间隔开，外面场地有 30 多平方米，也是两面分开。我们这一半叫做“战犯监狱”，关押的是我们几个人。几个月以后，魏林、杜岗（两个团参谋长）、王化英（师科长）、骆星一（宣传干事）也先后押到这里，共有七八人。后面一半关押的是“临时犯人”。我们在室内南墙上方打了一个洞，打洞也不容易。我们几个同志人顶人，利用石头缝，用石头打，晚间，张济良主动和美国卫兵拉家常，有声音敌人也不太注意了。这样打开一个小洞，白天还得用石头堵住，晚间打开一是通话，二是我们每天要节省些饭，用雨布裹成卷，送过去。这一重要通道，敌人始终也没有发现。

所谓的“临时犯人”，大多是在强迫劳动过程和美国兵打架而抓到这里来的，也有实际是营地为派人送信的，故意和敌人打架。一打架，就被抓进监狱，营地里有什么事，要求我们决策的问题，都是通过出狱的同志们送回去的。营地里以顾则圣、马兴旺、李喜尔、张城垣等人组成第一线指挥部，大家很尊重我们，大的方面，始终和我们商量，因为几个主要领导，都关在这里。

在这期间，就统一思想教育，形势教育，我们提出要点送回去，由张城垣组织同志编写教材。还曾建议派朝鲜战友外出与游击队设法取得联系。有关加强保卫工作、进一步纯洁组织、处理坏人，以及大的斗争活动，如 1952 年十一的国庆活动等，都是经过我们研究决定的。

“十·一”国庆节怎样庆祝？被俘的战友们极端仇视敌人，对敌人的虐待、屠杀恨之入骨。祖国的国庆日，敌人不让庆祝是很

显然的。美帝在世界上大肆宣传自己是民主自由国家，却对我们要求信仰自由害怕得要死。为了向全世界人民表达我们的回国意志和暴露敌人的野蛮残暴，剥去敌人的“民主自由”外衣，我们决定纪念“十·一”国庆日。

“十·一”国庆日，我们正式通知了管理当局，当天上午十个号的同志一起升起十面国旗时，敌人即用坦克飞机大炮毒气来对付我们。七号营场分委韩子建、李维文指挥组织 100 名突击队员护旗，被敌人开枪开炮打死 56 人，打伤 109 人，造成了轰动全球的惨案。烈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祖国的尊严，他们的血没有白流。

这一屠杀血案传出后，第二天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我方代表通过外交途径向美军提出严重抗议。

在种种压力下，美军不得不同意我们为烈士开追悼大会、送花圈、扫墓，美军管理者也不得不向死难烈士致哀。

“十·一”对敌斗争，对我们这已经组织起来的几千人是一考验和检验。我们这些在战场虽然没牺牲的军人，却在这次集中营斗争先后牺牲了 60 余位烈士，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我们的斗争，使美军当局头疼不已。一位战俘曾从美方战俘营总管办公室的纸篓里捡回几张破碎纸片，（这是给经常外出工作的同志布置的任务）经翻译后，是一份报告发言底稿。上面记有美战俘营司令官白劳德将军、联军司令部后勤部海伦少将在战俘营管理机构尉官以上军官会议上的发言。其中有这样的内容：……由于赤色战俘营的暴动而牵制大量的联军兵力，并在国际舆论上造成了麻烦，构成对联军后方的严重威胁。他们有可能同铁丝网外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并组织大规模的暴动，因此，必须对他们使用武力，不惜消灭其中最顽固的赤色份子……。

随着朝鲜战争形势的发展，敌人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各集中营战斗集体，利用叛徒，大量扣押各号实际领导人。原来在海边修的石头房子已远远不够用，因此敌人利用已废弃的机场新修了

一个能关押百余人的监狱。1953年2月18日，我们有60余人被转移到机场监狱。这里距大营场约1000米远，喊话听不着，但能互相看着。此时由黎子颖、何平谷、郝智根等同志又编了密码与大本营取得了联系，以后称之为“王芳密码”，重新勾通了我们和大本营的联系。这些知识青年凭着对党和祖国的一片赤诚，发挥了高度的智慧，在通讯联络工作中、宣教工作中、外交敌工工作中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60余人被扣，对整个营场工作是有些影响。但各号班子有几套人马，马上即可补上，各号的学习、斗争都还是照常进行。

机场监狱这60多人，大都是营地的骨干，我们利用这一时机，开办一期难得的学习班。专门成立了支部领导学习，对大家进行形势教育，共产主义前途教育等。分析了前线军事斗争形势，板门店谈判形势，战俘前途可能出现的局面，甚至考虑到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敌人大屠杀。

到1953年5月11日，板门店谈判比较顺利，敌人将先后抓来的大多数同志与我隔离，仅留了九人即敌人称谓的“战犯”。我们被关押到飞机窝里边，将中间门锁上。这两三个月，基本上和营地里同志失掉联系，外面的情况主要靠张济良和美国哨兵聊天，探听些消息。有的美国兵还偷偷将他们看完的报纸送给我们，我们从中分析研究形势，了解谈判进展。

8月中旬，我们被送到巨济岛和孙振冠、张泽石二同志一起关押。9月5日中午，我们被转移到汶山一个大庙宇内。隔着无数层层铁丝网，突然看见由美军军官陪着祖国慰问团的成员来看我们（回国后才知道是以李德生同志为团长组成的慰问团），给我们送来祖国人民的慰问信，大家看着祖国的慰问信，十几个人哭成一团。这几年每天在地狱魔窟中煎熬，饱受迫害虐待，今天能看到祖国亲人，大家泣不成声。代表团告诉我们明天即可回到祖国怀抱。

9月6日，坐上美军汽车直奔板门店。沿途歌声嘹亮，悲喜交

加，远远就看到“祖国怀抱”四个大字。车刚停下，欢迎的人群，各国记者呼地一下围了上来。车上的同志们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祖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声接连不断，欢迎的人群喊着“王芳、王芳”。同志们将我们一个个扶下车，车上车下哭泣声汇成一片，祖国啊！这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下车后，杜平将军扶我一直送到消毒更衣室，我们重新穿上了志愿军新军装，当即送到开城。在开城见到了原一八〇师吴成德主任及留在开城的同志们，他们是上午遣返的，大家畅谈归来的感受，及沿途和敌人斗争的情况。

祖国对我们这些在战争中受难的儿女们倍加关怀，吃饭一律按中灶待遇，基本上按原级别发放津贴，并把我们留在开城协助解释代表团工作。

我们回到祖国的是 7094 人，还有 1.4 万余人没能回来。大多数人是被敌人毒刑拷打强迫下，在身上刺有“反共”字样，而无颜回来。也有少数人做了不少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最后走到了自绝人民的道路。在解释过程中，我们解释代表仅接触了千余人，由于敌人的种种破坏和干扰，造成解释工作难以进行，最后不得不终止。有 424 人冒着生命危险，冲破特务控制回到祖国。

我们这几千人大多是战役指挥失利而被俘的，为什么在不幸被俘后，能够重新组织起来，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呢？因为我们都有颗强烈的爱国之心和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正像刘白羽同志所说的“通过这一切，写出了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万丈光芒。”这句话讲得恰到好处。没有坚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就不会产生出民族灵魂的英雄主义。

刘白羽同志又说：“我 1953 年在朝鲜前线接触到这一题材，我就觉得是惊心动魄的。”老作家碧野将 30 年前在板门店采访志愿军战俘的材料一直保存到现在。他曾说：庆幸的是这批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丢失，自己虽然花甲之年也要饱蘸浓墨，讴歌志愿军战俘的巨幅画卷。他们是烈火中炼出来的金刚。

我深深地怀念着那些壮烈牺牲在釜山、巨济岛、济州岛的战友们，在这篇回忆文章结束时，我想起 40 年前写于济州岛的一首小诗：

万里征战报国仇  
壮士不幸作楚囚  
铁窗望尽山河在  
卫我神州愿断头  
我们都是祖国最忠诚的儿子！

（赵佐端 原志愿军一八〇师五三八团政委）



济州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 党的核心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

1952年4月8日开始，美军当局对我被俘人员进行了全面的强迫“甄别”。4月8日下午，71战俘营的254名同志全部被转移到602战俘营。后来从“72”、“86”两个战俘营在“甄别”中拼死冲出来的3800名难友，以及由“70”出来的1270名同志，也都分别在8、9、10号三天被押送到“602”。4月11日到6月5日，从“61”和釜山伤病战俘营的难友都陆续来到了“602”。至此，我6000多人汇集到一起组成中国战俘的“回国支队”。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同志们组织成为一个整体，一支能坚持战斗的队伍，是当务之急。

当时，以赵佐端为首，以“71”战俘营的党支部为核心，又吸收了各战俘营的主要领导，组成“602”战俘营内临时地下党委会，着手组建该战俘营内的政治、行政、后勤等组织。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特点，进一步巩固斗争阵地，我们预计今后斗争形势与任务，将比以前更为复杂而尖锐，斗争的规模将会更大。我内部的力量与外部情况已有所变化，从以往的斗争实践考验看，有些共产党员未必都坚强，而广大群众中出现了不少英勇顽强的好同志。所

以建立一个适合当时情况又能适应斗争形势的地下革命组织，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

对此，经过了短暂的酝酿和讨论，考虑到跟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已被完全切断，又处于敌后残酷斗争的特殊环境中，最好是建立一个实质上是共产党但名称不叫共产党的核心组织。赵佐端提出了取名为“共产主义团结会”的建议，得到了核心成员的赞成和通过。这样，正式作出了决定，时间是 1952 年 4 月 18 日。这为今后对敌斗争和对内的团结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同时宣布，其它种种组织停止活动，其成员符合条件者，重新吸收到共产主义团结会的组织中来。

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的第一届委员是：

赵佐端、孙振冠、魏林、杜岗、顾则圣、王化英、马兴旺、门培英、张城垣、陈吉庆、李喜尔、许如刚、李明、郭兆林（名誉委员、釜山地区总领导）。常务委员会委员是：赵佐端、孙振冠、魏林、杜岗、顾则圣。委员分工：赵佐端为书记；孙振冠、魏林、杜岗为副书记；顾则圣为常委；（其余同志为委员）。并决定：李喜尔负责保卫工作；李明（后陈吉庆）负责组织工作。张城垣负责宣教工作。

在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领导下，下设共产主义团结会分委会，共产主义团结会支部委员会（即大队设分委会、中队设支部委员会）。分委会设委员 7 至 9 人，支部委员 3 至 5 人，均设书记、副书记。先后担任分委书记的难友是：徐寿田、李明、贾耀先、韩月季、王金方、张合顺、韩洛夫、门培英、韩子建、王化英、杜学贤、徐益生、王兴文、许如刚。在济州岛第八战俘营共组建了 11 个分委，41 个支部。

总委工作组和机要室：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为开展斗争与日常工作设立了工作组和机要室。工作组组长：张城垣；机要室秘书：黎子颖、唐耀、吴孝宗、何平谷、张昌辉；翻译：张泽石、高子；通讯联络：钟骏骅、张光甫。

共产主义团结会成立后，有的同志因后到，特别是在 1952 年 7 月移至济州岛后，不少委员被敌扣留，以后陆续增补的有：贾耀先、张合顺、王金方、韩月季、杜学贤、徐益生、侯光甫、韦光明、韩洛夫、韩子建、王兴文、张治山、张雷峰、张福庆、李全有、刘福生、何永国、孔繁堂、冯及良、杜立身、原来福等人为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委员或候补委员。

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最低纲领为和平遣返。就是朝鲜谈判可能达成协议，双方进行战俘交换，和平遣返回国。

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最高纲领为自己解放自己。就是朝鲜谈判可能破裂，战争继续进行，敌人可能对战俘进行屠杀，或者转移别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组织暴动，不惜任何代价，冲出铁丝网，转入山区打游击，尽可能与朝鲜游击队取得联系。

在共产主义团结会的章程中，规定了入会的条件与会员的权利义务。总之，共产主义团结会的会章，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根据共产党的党章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根据战俘营具体特点制定的。比如发展会员的条件，会章规定除了具备党章中规定的党员条件外，还需经过集中营斗争的严格的考验。

共产主义团结会确定的任务、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向。共产主义团结会向全体 6000 名难友提出了团结、学习、斗争三大任务。这个任务的提出，得到了全体同志的响应和拥护，并在一系列的斗争实践中得到了贯彻。

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斗争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以日内瓦国际战俘公约为武器，抓住有利时机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斗争方法上采取机动灵活、多种多样、大规模的、小规模、不流血的、流血的、书面的、口头的、隐蔽的或公开的多种形式，每次斗争都是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而且要根据敌我双方形势与板门店和谈进展情况来决定我们的斗争步骤，才能取得斗争的效果。

共产主义团结会一经成立，就发挥了它积极领导斗争的作用。

从 4 月 18 日成立之日起到 7 月 3 日，共产主义团结会领导了纪念牺牲烈士的追悼大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五四青年节，参加扣留美军杜德将军的斗争，游行示威，抗议美军无理枪杀我王化义的斗争，升旗斗争，庆祝中国共产党生日等各次斗争。每次斗争取得了胜利，都进一步鼓舞了我内部的斗争信心和决心。共产主义团结会更加明确地向 6000 名同志提出：要执行总委会的决议，坚决完成团结、学习、斗争的三大任务。

1952 年 6 月 17 日，“回国支队”全体同志被敌押送到海边“70”战俘营，准备移往济州岛。这是美军管理当局害怕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和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的联合斗争，故采取此分割、瓦解的措施。我们针对敌人的这一阴谋，总委会及时进行了研究和部署。

首先，对全体同志进行思想教育：不管转移到什么地方，坚持回国的红心不变，要把在巨济岛上斗争的五星红旗，插到济州岛上去。各连队都进行了团结教育，普遍地进行了谈心活动，打破顾虑，消除隔阂。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胜利，团结是我们的生命的道理，从而进一步达到内部团结和巩固，以适应新的情况。

在组织准备上，作了四套干部的准备；由赵佐端提议，总委领导的接替人是魏林、杜岗、孙振冠。孙被扣后经总委会决定，顾则圣为总委副书记，并决定顾则圣为“回国支队”的政治部主任，以加强内部思想政治工作。还决定马兴旺为党委会常委。后来又两次增补了 8 名总委副书记。

在内部的保卫工作上，作为调查摸底，进行了严密布置，采取了防范措施，防止在新的情况下，出现动摇叛变分子。这一系列工作，为坚持在济州岛上的斗争，打下了牢靠的基础。

自 1952 年 7 月 3 日起，我们 6000 名同志，前后分两批被敌移往济州岛，成立第 21 战俘营，后改为第八战俘营。敌人对我们采取了进一步的分化瓦解措施。从铁丝网的设置上看，完全证明

了这一点，外面是用 4 层铁丝网圈起来的，我们称之为大铁丝网。在大铁丝网内，又分 10 个小铁丝网，每个小铁丝网，是用两层铁丝网圈起来的。小铁丝网内，编成从一到 10 个号，每个号之间的距离约 100 米，只能看到，不能联系。在大铁丝网外面，设有 10 座 10 多米高的岗楼，每个岗楼监视着一个小铁丝网。岗楼上设一挺重机枪，子弹上膛，对准每个号约 600 名被俘人员，真是严阵以待，有一触即发之势。再从敌人兵力部署上看，对我们是十分小心谨慎的。步兵约一个团，坦克 11 辆，飞机场停着战斗机，海军舰艇的炮口，对准着我们，真是如临大敌！

根据这种形势，总委会进行了周密研究，分析了敌情，确定了对策，大体上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必须建立灵敏巧妙的通讯联络系统，实行统一指挥是保证斗争胜利的首要条件。因此，总委责成贾耀先、李喜尔、唐耀、何平谷、吴孝宗等人着手编制密码，用手势发报的办法，取得了分号之间的联系。并要求各号选择政治上可靠的同志担任机要和收发报工作。经过一个短时间的训练和准备，于 7 月 14 日，集中营之联络方法及密码正式起用。

这种联系方法，对我们领导全体难友在短时间内统一行动起来，取得斗争胜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对此，敌人曾多次进行破坏和干扰，但我们千方百计，始终保持了下来，直到遣返回国时为止。除此之外，我们还利用抬大粪外出和外出领粮之机，传递字数较多的文件和教材，也起到了很有效的作用。

为保证集中营的领导不致中断，及时配备和调整各级干部。敌人为了分化瓦解我们的队伍，经常利用叛徒来认出我们的干部而将其扣押起来，这对我们团结内部，坚持回国斗争，威胁很大。所以，我们预备的四套后备干部，随时可以接替使用。总委副书记孙振冠于 1952 年 5 月 7 日杜德事件参加朝中战俘代表团，离开后即被扣走，总委会书记赵佐端于 1952 年 7 月 11 日，也被敌人无理扣走后，就由副书记魏林、杜岗来接替领导。不久，魏、杜两

人又在 9 月底被敌扣走，随即由顾则圣担负起集中营领导责任。为了加强各分委的领导力量，及时平衡和调整干部，如总委委员贾耀先曾调到一号和六号任分委书记，总委委员许如刚曾由五号调到七号任分委书记。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指挥，将领导中心选放在第八小号内。将总委委员马兴旺、王化英、杜岗、顾则圣、张城垣、李喜尔、陈吉庆等人，通过抬大粪之机换到八号来，这样能够集体研究，进行统一领导。最初，我们总委的主要成员都被分割到各个小号内，虽然通过手势发报可以联系，但毕竟困难很多，所以想了很多办法，才把这些同志弄到一起来的。由于有了指挥中心，干部可以调整加强，才保证了斗争的继续性和统一性。我们每进行一次斗争行动，各号之间步调都是一致的，而且行动十分迅速，弄得敌人昏头转向，无奈何于我们。

我们的斗争行动能如此统一神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分委的同志都能坚决执行总委会的决议和指示，可以说，做到了不折不扣地执行。各分委成员都具有高度的党性，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总委的指示，因此，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

我们还特别重视对外交人员的选择和配备。在“602”集中营时，总委就决定孙振冠为支队长兼代表。（后因被敌扣走，由魏林同志为代表）张泽石为翻译（被敌扣走后由高子接任），黎子颖为秘书（负责对外写抗议书对内记斗争大事记）。到了济州岛后，因分成十个小号，故各个小号内均配备一名代表和一名翻译，这些同志都是斗争勇敢，政治坚定的，他们为坚持回国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如何加强内部思想政治教育，不断提高大家的觉悟水平，增长斗志，坚定回国信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从共产主义团结会成立的第二天起就摆到了议事日程。在斗争的三大任务中，就提出了组织学习的任务，在总委成

员的分工上确定张城垣负责宣传教育工作。他挑起了这个重担，在吴均度、吕杰的协助下，日日夜夜认真地思考编写教育提纲和教育材料，并及时地转发各号，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明显，功绩显著。

我们先后进行了形势教育，革命气节教育，人生观教育，美帝本质教育，中苏友好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教育，中共党史教育，历次节日教育，回国教育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政治思想教育，使大家树立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高尚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能有抛头颅，洒热血，亦在所不惜的英勇行动！在无数次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就是这种精神的真实写照。集中营斗争中许许多多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反映了我们中国人民的伟大和尊严。

做好内部的保卫工作，是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共产主义团结会刚成立时，就确定总委委员李喜尔负责整个回国支队的保卫任务。后来，在1952年4月26日，贾耀先来到了“602”集中营，该同志原系六十军一八〇师的保卫股长，总委会决定吸收为总委会委员，分工与李喜尔共同负责保卫工作。以后到济州岛第八战俘集中营时，因工作需要，前后调到一号和六号任分委书记。故内部的保卫工作仍由李喜尔一个人负责，直到遣返回国为止。李喜尔始终和领导核心的几位总委领导在一起，全心全意地扑在保卫工作上，大胆细致地独当一面，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各个小号内都配备了保卫干部，建立了保卫工作组。及时掌握人员的思想变化和个别分子的动态，严惩了出卖同志、出卖祖国利益的叛变分子，从而维护了我们坚持回国的整体利益。并且严格贯彻了保密工作。对总委成员一律不得出头露面，尤其是对副书记以上的成员，要绝对保密，不得泄露。对分委成员也要做到尽量隐蔽，以防叛徒出卖，造成损失。对机要人员和密码本的保存，都有严格的要求。对全体同志都进行了保密教育和提高

警惕性的教育，对此项工作，总委经常进行研究确定方案，从而保证了内部的巩固，为取得斗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加强内部的组织工作，不断吸收新生力量，充实壮大干部队伍，起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是关系到完成斗争任务的关键。

此项工作主要由总委委员陈吉庆担任。陈吉庆坚决执行总委的决议，遵照会章和组织路线，积极发展会员，不断壮大了队伍。经 1952 年 4 月至 1953 年 8 月止，前后发展的会员共有 2000 多人。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勇敢坚决，带头执行总委的号召和决议，在斗争中真正做到了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政治和文化学习中起到了带头作用，成为团结、斗争、学习中的模范。

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还十分重视文化学习和立功表彰工作。

从 1953 年 1 月起，总委会就发出了关于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重点是消灭 500 字以下的文盲。这个指示一经发出，各号的分委会，立即传达贯彻，并想方设法，克服在学习中的各种困难。至 1953 年 6 月 30 日的统计，已消灭了 500 字以下的文盲 60%。学习前 500 字以下的文盲 3700 人，学习后减为 1300 人。从这一点看，我们这些被俘的同志，生活在魔窟里，还充满着对生活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准备着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祖国怀抱时，继续为建设我们美好的祖国而贡献力量。

为了不断鼓励和提高斗争意志，总委非常重视表扬鼓励，立功评模的工作。在每次斗争结束后，总要进行总结和表彰工作，如在 1952 年 10 月 1 日，为了纪念我们伟大祖国的节日，开展了升旗活动。当十面五星红旗飘扬在济州岛上空时，敌人颤抖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开始了，敌人用各种现代化装备的武器，一起对准了我赤手空拳的同志。枪声、炮声连成一片，但我们的同志，并没有被敌人所吓倒，而且用石块和木棒，打垮了敌人三次冲锋，赢得了时间，我们的红旗能在空中飘扬，是同志们鲜血换来的。

战斗结束后，56 名同志勇敢地牺牲了，有 109 名同志负重伤。他们是为捍卫祖国的尊严，为了配合我方当时在板门店的谈判，为



了彻底戳穿美帝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为了在政治上维护祖国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死的。所以，他们虽死犹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为了纪念和表彰这些同志，总委会发出了指示，召开追悼会来纪念牺牲的烈士们，并开展立功评奖工作。七号营地的全体同志，被总委批准，分别立了大功，授予特等功和斗争英雄称号。他们的事迹，将永远载入光荣的史册。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产主义团结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前后领导了大小斗争数十次，运用了符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和方法步骤，有力地配合了板门店的和平谈判，揭露了美帝国主义强迫扣留战俘的阴谋，维护了祖国的尊严。

1953年8月，朝鲜停战实现，我们6000“回国支队”的难友被遣返回国，脱离了苦海，重见了光明。

至此，共产主义团结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宣告结束。而它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异国战俘集中营的地下组织，在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创建的革命业绩，亦将作为不可磨灭的一页载入党的光辉史册之中。

（顾则圣）

### 与叛徒变节者的斗争

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处于白色恐怖下的我地下党组织，往往因内部出了一个叛徒或丢失一份机密文件，就遭到严重破坏，使革命斗争受到难以估量的损失。而在敌人的战俘集中营里，我志愿军被俘人员对敌斗争的地下党组织所处的环境更为恶劣，斗争形势更加残酷严峻！

那时，我们被关押在异国孤岛上，处境甚至不如上饶集中营和渣滓洞白公馆。我们绝无可能和狱外取得联系，争取上级党的领导与革命群众的支持，面对的敌人也非国民党而是美帝国主义。美军对我们的囚禁看管远比国民党监管的力量强大、手段严密。美国特务的情报手段也更狡猾阴险，美国中央情报局、远东情报局、

第八军情报部都在战俘营设置了派出机构，如：美国第八军总部情报处(G-2)、反情报队(C.I.C.)、刑事调查部(C.I.D.)、平民教育部(C.I.E.)等特务机构。他们还派出了高级老牌特务到战俘营进行直接指挥操纵。其中最著名的有飞利浦(Philip)，伍培礼(Woodberry)，布鲁克斯(Blooks)。这些人都是曾经于解放前指挥和参与国民党镇压我党的地下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中国通”。除此之外，他们还从台湾调来不少特务，伪装成战俘进入战俘营。知名的有“国防二厅”的张弼等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美方对战俘实施了生活虐待，欺骗宣传，精神折磨，人身摧残，政治陷害和残酷镇压(详见本书《综述》一文)使一些意志薄弱的战俘逐步从动摇变节到完全背叛。加上一些本来就是潜伏在我军的特务、兵痞、流氓，在战场投敌后为表现其“忠诚”而更加为敌卖命。他们在战俘营内发展“国民党六三支部”、“反共抗俄同盟”等反动组织，成为敌人在战俘营内镇压战俘的得力工具，使得战俘营对敌斗争更加严峻尖锐。

我战俘营的最高领导人，团政委赵佐端刚被押到“72”军官大队，即被叛徒出卖，从此受到严密监视与孤立，极难开展领导工作。团副参谋长杜岗曾以战士身份藏身在“72”一大队秘密领导斗争，也被叛徒出卖受到残酷折磨。当“86”发生大规模夺权斗争遭美军直接镇压失败后，也由于叛徒们事先掌握了“黑名单”，我地下组织领导及骨干几乎被一网打尽。“70”的夺权斗争，在即将发动前两小时，主要领导人因叛徒告密而被敌人抓走，导致了斗争失败。正是上述这些在被俘初期各中国战俘营自发的、分散的对敌斗争中的血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在战俘集中营对敌斗争中保卫保密工作的特殊困难性和极端重要性，并认识到斗争中工作的重点是防范叛徒、特务份子的破坏。

1951年11月上旬，共有200多名同志经过艰苦斗争先后从“72”“86”突破敌人的法西斯统治，来到“71”建立了巨济岛上中国战俘的第一块回国阵地。战俘营的对敌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

的阶段，我们的保卫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有领导、有组织、有策略方针的新时期。在党支部领导下，我们认真总结了前一阶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加强保卫工作。我被任命为专管保卫工作的支委，成立了保卫工作组。确定了当前保卫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保护领导核心不被敌人认出抓走，对敌斗争计划不被暴露，保证内部队伍的纯洁，防止出现新的叛变事件，制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还成立了纠察队。党支部还决定将对外秘密联络工作及敌工工作统一交由保卫委员负责。

在党支部教育下，大家都能真正做到：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除了从事外交斗争的同志外，党支部成员及各级领导均对敌人保密。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暴露组织、出卖同志。

为了恢复赵佐端、孙振冠早在 1951 年 6 月就已与朝鲜难友领导人建立起的联系，我们保卫工作小组曾先后派出南阳珍、薛山娃等以辣椒粉腌烂眼睛等十分痛苦的办法，装病前往巨济岛战俘医院与朝鲜劳动党战俘营地下党沟通了联系，交流了情报，确定了中朝战友统一行动的斗争计划。其中包括准备于 1952 年初秘密组织巨济岛 10 万战俘大暴动的计划，后因形势变化而中止。由于保密工作严密，不但我们来往的信件从未落入敌手，敌人毫无觉察，在我们内部也仅局限于少数领导知情。

1952 年 4 月 8 日开始，美军在巨济岛对战俘进行了血腥的“志愿甄别”。我 5000 余名坚持回归祖国的同志，冲破敌人的白色恐怖会聚到“602”战俘营，成立了中国战俘“回国支队”。从此战俘营的斗争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我们的保卫工作从此开始走上领导更加成熟，组织更加健全，制度更加完善，策略上更加巧妙有效的新阶段。“回国支队”成立了地下党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我担任总委会保卫委员，全面负责保卫工作。我们首先建立了系统的保卫工作组织：各大队的分委会都设有保卫委员，分别由韩子建、侯光甫、王洪运、王宇天等担任；各中队的“团结会支部”设立了支部保卫委员，各小队的“团结会小组”设有小

组保卫员。为配合“团结会”的保卫工作，在行政上成立了有 300 余人的纠察队，由许如刚任队长、刘光和王福海任副队长，负责护旗、除奸、监视营场外敌人动态等保卫任务：

这一时期，为了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血腥罪行，我们“回国支队”进行了空前频繁的游行示威、绝食、升旗等大规模斗争。保卫工作在以赵佐端为首的总委会领导下和各级保卫干部的努力下，无论是内部的巩固工作、保密工作，以及与人民军战友的联络工作都做得很有成绩。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朝鲜劳动党战俘营地下党决定扣留美军巨济岛总管杜德准将之后，通过我们建立的联络渠道事先得到了他们的通知。我们根据总委的部署，举行了绝食斗争，迫使杜德于 5 月 6 日亲自前来“602”谈判。并给予他一个印象，只要他亲自出马表态，即可平息战俘的绝食斗争。我们还将与杜德谈判的情况及他的警卫人员警戒情况，立即通过邻近的“604”朝鲜战俘营的秘密渠道，上报给这次行动的“总指导委员会”，支持朝鲜战友进一步完善了活捉杜德的行动计划。他们于 5 月 7 日，一举实现了扣留杜德这一震惊世界的英勇壮举。迫使杜德召开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公开承认美方强迫扣留战俘的罪行。

“杜德事件”后，波特纳准将接任杜德的战俘营总管职务，强化对战俘的监管与镇压。我们于 1952 年 7 月被押往济州岛并被分割成十个营场加以隔离，还单独监禁了总委书记赵佐端，阴谋以此削弱我们的反抗斗争。

面对新的严峻形势，总委会及时采取了应变措施：各营场分别成立新的分委会，总委会分别集中到五号与八号营场实行统一领导分片管理。利用各种机会变换人员，调整干部。保卫机构也相应做了调整，各分号营场（又称大队）的分委会、支部、小组都配齐了保卫委员、保卫员。各分委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是：一号魏善洪、二号冯景良、三号史振荣、四号王宇庆、五号田方保、六号原来福、七号赵年智、八号杜鲁、九号侯光甫、十号赵久荣。各

大队还成立了由保卫委员直接指挥的有 30—50 人的纠察队，负责站岗、巡逻，对外监视敌人动向。对内保卫领导干部和执行除奸，对外负责收取、传递文件、观察各营场通讯联络信号及时通知，并掩护机要人员收、发报。纠察队是各营场保卫工作的一支中坚力量，全都是在严酷的斗争中经受过考验的好同志。他们不但很好地执行了各分委领导交给的保卫任务，还是一支敢拼能打、不怕流血牺牲，在历次斗争中一直战斗在第一线的突击队！在 1952 年 10 月 1 日那次可歌可泣的升旗的斗争中，七号营场在与前来镇压的美军英勇肉搏中，共伤亡了 170 余人，其中牺牲的 65 位烈士有一半以上是纠察队员！这些出色的保卫战士，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的不只是一面五星红旗，而是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和革命部队的荣誉！烈士们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在战俘集中营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也确有少数意志薄弱的人经受不住长期考验而产生了动摇情绪，个别人甚至完全失去了回国信心而叛变投敌。在我们每次为反对敌人强迫扣留坚持回归祖国的重大斗争之后，都曾陆续出现过利用外出劳动，看病之机，甚至爬铁丝网叛逃的叛徒。尽管叛变的人数极少，但危害却极大。敌人立即利用他们在全副武装的美军保护下，进入该营场去指认并抓走他所熟悉的领导干部和斗争骨干，给我们的斗争造成很大损失。

面对这一情况，我们采取了一系列保卫工作措施：1. 加强对总委及分委领导人员的隐蔽。让他们分散住宿，常变换住地，并派纠察队员保护。他们一般不在群众中公开露面，必需出面时亦不介绍身份而只称代号（我们主要领导都编了代号如顾则圣为“洪流”，我的代号是“丹东”）。我们还用撕毁战俘登记卡及模糊卡片上指纹等办法以混淆敌人耳目。2. 对总委分委主要领导都进行四个梯队配备，万一有被抓走隔离监禁的，立即由后备人员接替领导岗位。3. 规定一切对外联系接触，均由总委、分委中主管外交、敌工的同志及各营场中经过斗争考验的有文化的同志，以“代

表”、“翻译”身份出面与敌周旋。4. 配合宣教工作加强内部的气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形势教育等。在气节教育方面，我们除统一编印教材分发各分委进行外，还组织各营场的文艺队把“苏武牧羊”、“刘胡兰”、“钢铁战士”等剧目排练演出。后来“钢铁战士”的主题歌成了我们每天必唱的歌曲。

与此同时，加强了防叛除奸工作。首先对全体成员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分析，做了“依靠”、“团结”、“巩固”三种对象的排队。对已暴露出悲观动摇情绪的“巩固对象”，由各级保卫组织派专人加强对其教育，防止意外。纠察队也加强了巡逻防护，不给予这类人与敌人接触的机会，预防叛变发生。而对叛变祖国、出卖同志、证据确凿的叛徒，我们则不畏艰险、不惜代价的坚决予以铲除。例如对向敌人告密，并带领美军抓走我数十名干部的李小广（被敌人单独保护在大铁丝网外的一个小铁丝网内），我们曾先派陶均善将其打死（未死），后又派侦察排长段辛未、副连长刘春明两同志再次去除奸。虽然李小广未被打死，段辛未因此被敌人杀害牺牲，但对叛徒起了极大的威慑作用。李小广也再未敢作恶，其他叛徒也不敢再带敌人来抓我们的领导。

在济州岛第八战俘营里，我们的保卫工作还有一个重大任务，即保证已经被分割成十个小营场的统一集中指挥领导。当时，总委会要不断向下传达形势，通报敌情，布置斗争计划，发放大量政治与文化学习教材，以及随时了解各分号的思想、工作、斗争情况。各营场相距 100 余米，我们既无远距离通讯工具，又处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之下，敌人还经常派出整排、整连的武装突击检查。我们相互间的一切联络通讯都必需绝对保密！总委会决定在总委及各分委成立秘密通讯联络小组，统归保卫委员领导。小组成员都是经过严格审核，选拔立场坚定，有文化、能力强的同志担任。总委会的机要秘书唐耀、吴孝宗、何平谷兼任了总委通讯联络负责人。他们发挥了高度的革命责任心和斗争才智，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非常困难的任务。

首先我们利用各营场每天都要到海边倒大粪，来去都要在固定地点休息的机会，把应交换的文件放在用水泥浇制的与海边石头大小颜色区分不出的空壳石头中，再把口封好放在休息地各营场固定的交换位置，基本上可以保证当天至多隔一天就能收到文件。其次我们又发现敌人每天往各营场送粮食的汽车可供利用，我们把敌人的汽车变成我们的通讯工具。文件装在假石头中，放在汽车下边不易发现又不易掉出去的固定部位，由各营场的纠察队在粮车到来时取出交给机要人员，这比抬大粪时交换在时间上又快了一些。为了使文件在交换途中不致被敌人发现泄密，总委会的机要秘书唐耀、吴孝宗、何平谷等人编了一本毫无规律的只有我们自己才懂的密电码。即把常用的 3800 个汉字随心所欲地排出次序，用 4 个阿拉伯数字套在一个汉字上，类似电报局的电码。隔一段时间又把 10 个阿拉伯数字中的 3—5 个数字随意用英文字母或各种形式的符号代替，形成不规则的 2 次密电码，保证了通信和保存文件的安全。在一年时间内大量交换文件和保存文件从未发生过失密。偶而有一、二次“投石”文件落入敌手，但敌人无法破译出，而我们的密码代号又迅速更换了。我们的机要秘书都是好样的，由于所有往来文字都必须使用密码，他们从早到晚，日夜忙碌，最初译电离不开密码本，不久就可以不要密码本进行翻译。换了新码后不几天，他们又牢牢地记忆在脑子里。记得我们回到开城时，总委带回的各种密码文件不下 10 万字。唐耀、吴孝宗、何平谷等人把带回的密码本放在一边，只凭记忆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内，正确无误地完成了翻译工作。

斗争形势千变万化，一些文件要紧急传递，为此，我们又借助军舰旗语联络的办法训练组建了“手势联络”组。利用全身的各种姿势组成 10 个动作，代表十个阿拉伯数字，以 4 个数字为一组，代表一个汉字，形成了第三次保密联络码，专门用于“收、发报”联络。使用这种联络办法不但保密而且迅速，即使被敌人岗哨发现，他们还以为我们的报务员在锻炼身体！此外我们还发明

了一种更快的通讯方法，就是通讯组的一些同志经过练习，借用一条绳子把装着文件的空心石头投到另一分场，另一营场再用同样办法传到文件应去的地方。采用这两种办法大大加快了文件传递的速度。例如，距我所在的五号营场最远的一号，一份文件交到我手中需要通过二、三、四号到五号接收约需二个多小时，而用投石通讯一个小时就够了。联络战线上工作的同志们在这条切不断的联络线上，用敌人译不出的密码通讯，为确保联络畅通和机密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战俘营的保卫工作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敌工工作，主要是从敌人那里搞情报。在两年多的战俘生活中，我们一直是在异国孤岛上完全与世隔绝，要想及时了解战场形势和板门店谈判情况，我们只有设法从敌人那里获取。这个重大任务我们交给了从事“外交”活动的张泽石、高子、张济良、安保元、曹友、边世茂、冯策群、方向前、刘英虎、罗厚根、李炽、杜大均等总委及各分号的“翻译官”们。这些同志使用自己的外语才能，既在与敌人的谈判斗争中协助我们的“战俘代表”义正词严地用英语和美方管理人员展开舌战，也和战俘营内一般美军管理人员“交朋友”，从他们口中套取情报。有时还能搞到美军军报——《星条报》。在巨济岛时，他们还利用南朝鲜伪军较穷的特点，用自己和难友们捐出的御寒衣服，甚至毛毯向站岗的伪军偷偷换取报纸。到济州岛后基本上是美军站岗了，断了这个来源，便发动到美军军营打扫卫生的难友找报纸，有时一天能弄来好几份，也有时几天弄不到一张报。后来美军发现他们的报纸常不翼而飞，警觉起来了，我们便很难看到报纸了。只能主要靠“翻译官”们的本事，尽管美军当局千方百计封锁消息，在我们这些“外交战士”的机智勇敢的努力下，我们对战争形势，和谈发展情况，战俘营敌我势态的基本状况是一直掌握着的。

这些“外交战士”，还包括一些会日语、朝语的同志，如郭乃坚、吕杰等。他们在做收集情报工作同时，还积极开展了对美、伪



军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们利用各种接触机会与美伪军士兵“拉家常”、互相交换有关家庭、故乡的生活风土人情。根据对方的好奇心，或介绍我国的名胜古迹，或介绍新中国的成就，逐步发展“友谊”，提出如果战争结束双方都还活着的话，欢迎他们来中国做客，互相交换通讯地址等等。不少美伪军士兵在交谈中表示了厌战、怕战情绪，于是我们一些心灵手巧的同志如赵明智、张辉宗、湛志农、何平谷等又精心创造出“俘虏优待证”或“通行证”送给他们，嘱咐他们好好保存，一旦再上前线可以用它们来投诚并获得我志愿军的优待。这些美伪军士兵深表感谢，有的就送报纸，有的谈他们在上甘岭伤亡如何惨重，我军如何英勇。这些消息对我们都是十分有用的。

1952年“十一升旗斗争”之后，总委会根据当时战争与和谈发展形势的严峻，决定在继续坚持“团结、学习、斗争”三大任务的同时，做好“在必要时自己解放自己”的准备，以对付敌人对我们可能进行的大屠杀。包括秘密武装自己，与济州岛汉拿山游击队取得联系，在适当时机配合前方攻势，举行大暴动，冲出战俘营，在济州岛约200平方公里土地上与敌人周旋，尽可能多地拖住敌人的后方部队等。这一工作是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只在总委及分委中动员分工。

为此我们曾派朝鲜族副连长尹根培、排长孙继红两同志在外出做工时，逃跑去汉拿山找游击队，又秘派一部份骨干利用到敌人仓库或上船搬运物资时，盗窃敌人枪支及破坏铁丝网的工具等。这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先后窃取敌人手枪一支、老虎钳20余把。这些枪支工具一直未被敌人搜走，内部也仅有极少人知情。我们派出的尹、孙两同志没能在汉拿山找到游击队，在饥饿疲劳折磨下终被敌人抓获毒打后重新押回营场，当时仅极少人知道他们外逃的任务。那些枪支工具直到1953年停战后，我们离开济州岛之前，才根据总委指示，由各分号的主要领导亲自监督深埋于地下。由此也证明我们各级保卫部门的保密工作是非常出色的。

40多年过去了，回忆这段艰苦卓绝的敌后斗争中保卫工作的种种动人情节，想起战友们在保卫工作中表现的机智勇敢与大无畏精神，想起我们那些在保卫工作中为国捐躯的烈士们，真是思绪万千！我们的革命部队、我们的祖国儿女是何等优秀！这更增添了我们对祖国未来的信心，也更加激励我在有生之年去为祖国的富强而奋斗到底！

（李喜尔）

### 祖国——在我们心中

1952年4月，美军当局对中朝战俘进行所谓“去向甄别”之后，我们6000名志愿军被俘人员冒着生命危险集聚到巨济岛602回国战俘营，至1953年8月，在中共战俘营地下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下，对全体被俘战友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宣传、思想教育、文娱活动和文化学习。我当时是“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分管这项工作的委员，40年后的今天，以一个当事人的身份，重新回忆那场令人难忘的斗争，总是百感交集，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在战俘营敌特控制时期，拘留当局企图解除我们思想武装。在进行人身迫害的同时，千方百计的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欺骗宣传。对我被俘人员进行了很多反动灌输，歪曲了很多历史事实，为他们的侵略行径辩护。一些人的思想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毒害，对敌斗争观念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集中到“602”以后，我们对6000战友进行了思想摸底。当时的思想状况是：

1. 积极分子，约占50%。这部份同志政治和文化基础好，革命觉悟高，大都经过解放战争战火的熏陶或监狱生活的考验，不怕牺牲。他们目睹美军在朝鲜和在战俘营的暴行，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对敌进行斗争，回国意志坚定。

2. 中间分子，约占40%。这些人热爱祖国，对党的感情较深，但有等待交换思想，对拼死来到“回国支队”后，还要开展对敌斗争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主动性较差。

3 还有极少数人，尽管回国心切，但害怕斗争。被俘后又有

些错误，对回国有顾虑，因而思想波动较大。在严重斗争关头，有动摇叛变的可能。

根据上述思想情况，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作出了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的决定，指出要斗争就必须有共同的信念作政治基础，必须进行坚定革命信念的再教育。

记得，总委关于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的指示开头有这样的一段话：“回顾我们在反动集中营的白色恐怖时期，不少同志在敌人的屠刀下，横眉冷对，正气凛然，铁骨铮铮，舍生取义，正因为他们有着共产主义坚定的信念。信念从哪里来，它不是头脑中固有的，信念是社会经验的综合，是个人修养的成果，思想认识的结晶，它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因此人要树立正确的信念，就需要学习，需要灌输，需要修养，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灌输社会进化史、现代史，才会明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才会知道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从而树立坚定的革命信念。”为此，我们利用自己管理自己的大好机会，建立了基层和中层的宣教工作系统，每个支部分管教育的委员大部份是原部队的连级干部，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正面教育，进行了革命气节、革命人生观、社会发展史、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思想教育。首先着重解决对抗美援朝的正确认识，解决在集中营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该不该和敌人斗，能不能斗及敢不敢斗的问题。“602 回国支队”建立初期，结合当时反对美军当局强迫扣留战俘，反对甄别的斗争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增强民族自尊心，讲明爱国必须回国。同时利用斗争间隙，坚持了每月一次形势教育。指出敌人在战场上打不下去，在谈判桌上也捞不到什么，朝鲜战争必胜，回国有望。但必须坚持斗争，生命不息斗争不止，在斗争中为祖国争光，在斗争的胜利中回到祖国去。

“回国支队”被移拘到济州岛后，根据当时板门店和谈拖延的形势，按照总委提出的团结、学习、斗争三大任务，我着手拟定了一个为期一年的政治教育计划。即：军史教育、美帝本质教

育、中苏友好教育、革命人生观教育、坚定革命信念教育、社会发展史教育。除军史学习一个月，社会发展史学习 3 个月外，其余都规定时间为两个月。按照教学需要，在唐耀、吴均度两个大学生协助下，先后编出政治教育材料约 35 万字，教材通过“土电台”（手式与自编密码）抄发到各营场。各营场共产主义团结会分委教育委员组织以中队为单位，坚持每天两次政治课和一次政治讨论会。在教学中联系实际，不断地把人员的现实思想摸清楚，加强教育的针对性。各营场宣教干部组织知识份子参与备课，通俗易懂地搞好基本理论的灌输，帮助战士掌握一些基本问题的观点和分析认识的方法，积极引导大家探讨问题，互相交流思想，达到了互相启发共同提高的目的。

开展认识美帝本质教育，主要是进一步批驳敌人的欺骗宣传，讲明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重温历史上帝国主义侵华史，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的卖国史，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百年来侵略我国的历史事实，激发爱国主义情怀和对敌人的仇恨。记得教材上从 1839 年美国海军统领基尔尼率舰队在中国海面耀武扬威，到 1857 年强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的中美天津条约。从 1900 年美国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到抗战胜利后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以及美国的侵略武力已经侵入我国领土台湾，飞机扫射轰炸我东北边境城乡，海军炮击我领海商船等无数事实，证明它是我国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教材上还结合我们入朝后目睹美军在朝鲜狂轰滥炸野蛮屠杀朝鲜人民强奸朝鲜妇女的事实，联系敌人在审讯中要难友提供家乡地形地物的事实证明美军侵略朝鲜，是走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老路。美军占领朝鲜，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从而认清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本质。教材上还列举了我们亲眼目睹美军中白人欺侮黑人以及虐待战俘和支持特务迫害屠杀战俘的事实，揭穿了敌人所谓“保护人权”、“民主自由”的虚伪性。提高了同志们的阶级觉悟，懂得了支援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就是保家卫国的正义行为，在战俘营同敌人斗争，也是抗美援朝

斗争的继续。

“革命人生观”教育和“坚定革命信念”教育以及“坚定斗争勇气”教育，着重指出一个正直的人和革命者对人生的态度和品质。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应在险风恶浪的环境下，坚定牢固的爱国主义思想，坚定共产主义革命信念。我们为革命而坚持斗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 5 亿多祖国人民是我们坚强的后盾，我们坚持革命信仰心向祖国不违背国际公法。相反，敌人不执行日内瓦战俘公约，进一步证明了敌人的侵略本质及其道义上的弱点。当时我们提出了“反迫害争自由、反屠杀争生存、反扣留争回国”的口号，为此目的，不仅要和美军当面斗，和叛徒特务斗，而且要同自己头脑中的软弱思想斗，同妥协分裂倾向斗。

由于板门店和谈一再拖延，在部分领导人中增长了急躁和拼命的情绪，我们适时地进行了树立长期斗争思想和斗争中不怕死也不轻生的教育。记得我们在教材上提出了革命首先不怕死，然后争取晚死和不死，活一天就同敌人斗争一天，一天不死，一天和敌人势不两立。在当时环境下，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性，只要不是胆小鬼就得随时准备牺牲。共产党人不怕死也不轻生，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教材上同时指出：死！对于怯懦者来说，具有无比的威胁力量，然而在英雄面前，它却是那样地简单平常。死！对于革命者当然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但是怎样才能活着，怎样才能面对屠刀打掉屠刀创造条件改变环境，巩固活的阵地为党继续工作，是一个更严峻的考验。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就决定这场斗争必须要有意志的斗争智慧的斗争，和唇枪舌战的斗争相结合的综合战术。需要有勇气，需要有头脑，需要有忍耐。教学中讲述了刘胡兰、张志坚、赵一曼等英雄，不论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不曾动摇过这个信念。为了这个信念，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也无怨无悔。经过教育，进一步提高了 6000 人和敌人斗智斗法的思想认识，在斗争中运用了一系列巧妙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既表现了共产党人誓死革命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

表现了炎黄子孙惊人的智慧。

在思想教育中，紧紧围绕住爱国主义和强调发扬民族气节。我们引导大家回忆敌人用各种残酷手段，造成恐怖气氛，强迫人们改变信仰，使不少败类，出于求生的本能放弃了做人的尊严做出了背叛祖国和人民的事。我们提出了坚持斗争，做祖国的优秀儿女的口号，讲历史上坚持民族气节的英雄故事，发扬民族自尊心，坚持对敌斗争为祖国争光做民族的好儿女。

当时 6000 人中，共产党员约 2900 人，共青团员 1000 来人。由于频繁的战事，许多人并没有受过多少共产主义的理论教育，另外还有 2000 多人是在一两年后才参加我军的原国民党官兵，其中不少人来自剥削阶级。但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大家都相信共产党比国民党好，相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真理。特别是目睹美帝国主义对朝鲜人民的侵略暴行之后，爱国之心更加强了，这种爱国之心是我们 6000 难友忍受苦难拼死斗争最基本的动力，我们将激发战友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思想教育的核心。

祖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我们在集中营受到异国人的统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更深地理解了的一个概念。那时候凡是从祖国带来的一针一线，一双胶鞋或拣到的一个“中华牌”烟盒，我们都当作祖国的象征，对着它表达对祖国深沉的爱，都会引起我们想念生养我们的亲人和故土。因而我们除规定《国际歌》、《国歌》和《歌唱祖国》是每天必唱的歌曲，还常常收集展览被俘后幸存的祖国物品，加深对祖国的感情和认识。记得集中营内有些干部战士从敌人搜身后保存下来的祖国军服，已穿了近两年，破了很多洞，都舍不得扔掉，后来把它改成志愿军军帽一直戴到回国。1953 年夏天，济州岛四号营场难友外出做苦工时，从垃圾箱里拣到一张 1952 年 2 月 16 日上海《解放日报》，这是我们被长期关押在与世隔绝的集中营里看到的唯一的一张祖国的报纸。我们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我立即将报纸上陈丕显同志的讲话和文章抄下来用土电台传给各营场组织全体学习，并把报纸分成

两半分别在十个营场组织传阅，再三指示各营场“注意爱护，不要损坏”。由于每个人都想看一看、摸一摸，过手的人太多了，传到最后，它已磨损得不像一张报纸了。这件事情使我终生难忘。

为了防止战友们消极等待回国和跟敌人拼命雪耻思想意识的再度出现，保持在革命部队所培养的集体意识、斗争意识、自我牺牲意识，除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外，搞好宣传鼓动，增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鼓舞斗志是当时共产主义团结会工作的重要一环。主要通过办报、歌唱等形式调剂自己的精神生活。

战俘营的环境险恶，条件非常差，我们经过多方筹备，1952年8月1日出版了战俘营的第一份报纸《消息报》。我担任主编、唐耀同志任编辑，到1953年8月3日共出版了145期。通过各种通讯手段发到各营场，供大家时事学习的资料。每期1000字左右，登载3条到20条简短的新闻，有前线战况、国内、国际和板门店谈判的消息。消息来源是设法弄到敌人的报纸（主要是美军《星条报》）译成中文后，经过分析改编的。如上甘岭战役后，敌人把上甘岭叫做“伤心岭”，经过分析证明当时美军伤亡惨重。由于敌方新闻报导比较自由，一般新闻还是有参考价值的。战俘们都为中朝军队越战越强而欢欣鼓舞。

济州岛10个营场40个中队不少还出过自己的壁报，内容除转抄《消息报》外，还表扬本营场本中队团结、学习、斗争三大任务中的好人好事。

快板、金钱板说唱是当时宣传鼓动的主要形式。战友们结合文化学习，普遍学会了写快板，以写作快板来代替语文写作。如四号营场600多人，在1953年4月到6月的3个月里，写了近百个快板词，有的发表在壁报上，有的利用每天吃饭的时间向大家“广播”。快板有各种各样丰富的内容，有表扬也有批评。有一次因为唱歌，敌人向我们掷毒气弹，他们就写道：“遇毒气、胆要大、千万不要心惊怕。应当学习刘金才，沉着胆大有骨气，毒气弹投来没落地，他冒险抓起又向敌人投回去。王小全，用手巾去遮别

人的眼，自己忍熏不言语，还给大家鼓勇气，阶级友爱最要紧，毒气只能加仇气。”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经写道“无论是歌，无论是诗这都是炸弹和旗帜。”如何突破情绪上因监狱生活环境的狭窄而产生的窒息气氛，唱歌是个好办法。一唱歌就仿佛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立刻同广阔的世界沟通起来。在釜山、巨济岛和济州岛的回国战俘集中营，战友们慷慨激昂的歌声，形成了独特的斗争形式。尤其是在朝鲜战俘的集中营，常常有千人大合唱，一个营场的歌声停了，另一个营场又跟着唱了起来，敌人开枪镇压也制止不住。在济州岛我们进行过 5000 人合唱《国际歌》和《东方红》。我们规定凡是有 5 个人以上的集体乘车到港口码头做苦工或路过市区村镇时，以车为单位用朝语高唱《金日成之歌》和《志愿军战歌》，以扩大政治影响。各营场每天早操和开饭都要集体唱歌，每逢革命节日或游行示威都是从歌声中开始和在歌声中告终。人们的精神在歌声中修复、健全、坚强，不管敌人怎样疯狂，中国战俘的歌声不是枪声可以镇得住的。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歌声，而是反对敌人虐杀的怒吼，是对无耻敌人的嘲笑，是坚决回归祖国的庄严宣誓。

1952 年 7 月 16 日，济州岛七号营场 500 多人因齐唱《团结就是力量》等歌曲，美军当局就向人群施放毒气弹和喷射硫酸，致使 112 人受伤。当年“八·一五”为支持朝鲜战友纪念自己的节日，8 月 15 日济州岛 10 个营场进行歌咏比赛。敌人出动全付武装以十辆坦克包围，并向我所在的八号营场广播威胁“唱歌就杀”，八号营场值星中队长李风基站出来高喊：“敌人害怕唱歌，那我们就越要唱！”在他的指挥下 600 名战友们自豪地挺起胸膛，唱起了“可爱的中国，是我们的家园，坚决回去，死也不变，不给仇敌当奴隶，不背叛自己的祖先。”敌人穷凶极恶，投掷大量毒气弹和震荡手榴弹，浓烟裹着血雾，歌声仍在继续，其他 9 个营场的 5000 名战友为声援八号营场也都同时高唱起来。

歌声已成了被俘战友们“是战俘不是囚徒”的生命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任何时候都以歌声来激励战友和反击敌人。1952年9月18日，八号营场两个中队300人在外做苦工时，因在工地上集体唱歌，被敌人惩罚性地圈在露天工地两天两夜不给吃喝，并用刺刀刺伤4人，战友们最后还是在唱歌。

朝鲜停战协议生效后，遣返回国途中，我们的歌声从敌人的码头轮船火车和汽车上一直唱到板门店。在巨济岛和济州岛回国战俘集中营担任过警戒站岗的美国兵都学会哼唱“走走走，跟着毛泽东走！”

搞好文化娱乐活动，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调剂自己的精神生活是战胜敌人蓄意虐待和饥饿折磨，改变牢狱生活的窒息气氛的有效措施。“602回国支队”建立后，总委提出加强文体活动，调剂生活，鼓舞斗志，使自己将来回到祖国成为有用的人。1952年4月中旬，“602回国支队”首先建立了文工队，吸收了各单位推荐来的原在部队搞过文艺工作和爱好文娱活动的50人参加。队内建立了音乐、美术、戏剧等专业小组，配合当时的对敌斗争，进行演出节目、张挂标语、漫画、大唱革命歌曲等活动。“杜德事件”后，敌人将中国战俘移至济州岛，改变了在巨济岛一个大集中营集中关押几千上万名战俘的办法，改由每个小集中营关押五至六百人。为了粉碎美军当局“分而治之”的阴谋，共产主义团结会在10个小集中营建立了严密的地下组织，同时很快组织了10个各约30人的宣传队，文艺队伍达到344人。参加演出的并不限于文工队员，自1952年8月到1953年7月一年中，有900多位战友参加过演戏，有300多人学会拉胡琴，有200多人学会认识简谱。各文工队一共创作了《可爱的祖国》、《三大任务》、《挽歌》、《造谣筒不听它》、《革命斗志永不消》、《十月一的红旗》等22首新歌曲。1952年8月，美国特务机关利用营场的喇叭进行反宣传时，九号营场文工队长吴春生和导演高子合作谱写了《造谣筒不听它》的歌曲，通过秘密通讯法很快传给十个营场，5000多战友全部唱起来，后来釜山集中营的战友也都会唱起这支歌。1952年10

月 1 日七号营场因悬挂祖国五星红旗死伤 100 多人的大血案发生后，九号营地的莫非和高子谱写了《十月一的红旗》。这首悲壮激昂的战斗歌曲，激励人们反抗敌人的暴行。济州岛各回国集中营的文工队一年来共演出了大小节目近千个，其中多数都是自己创作的。如《不屈的人》、《硬骨头》、《生死朋友》、《华尔街之梦》等 200 多个歌剧和话剧。仅十号营场（伤残战俘大都集中在此）的文工队半年就自编自演大中剧目 40 多个，1952 年国庆节编演了《杜德垮台》，春节又编演了《今昔相比》等大型话剧，将解放前中国人民的悲惨生活和解放后新中国各方面欣欣向荣的景象加以对比，进行革命教育。各营场文工队还公演了革命传统剧目《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铜骨铁筋》等。有 6 个营场的文工队还演出了京剧《打渔杀家》。各营场基本上都是一周演一次节目，文工队员以大地作舞台，以星星月亮和铁丝网为背景，用敌人监视我们的探照灯作灯光，用硬纸板罐头箱作道具。演员与观众同是患难与共的战友，常常是观众中走出演员，演员走两步又成了观众，大家席地而坐，忘了四周居高临下的机枪。观众与演员所扮演的人物一同欢笑，一同落泪，感情的交融与和谐，恐怕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剧场都难以找到。

在岗楼林立与世隔绝的铁丝网内，战俘们连基本生活用品都无法保障，哪里还谈得上文娱器材。但是，我们 6000 多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是巨大的，他们就地取材，用各种代用品制成了军棋和象棋，大鼓小鼓，军号和胡琴等管弦乐器。文娱器材仅胡琴每个营场就有 50 多把，九号营场有 90 把。不料想我们这些文娱器材成了使敌人害怕的“武器”，敌人来搜查时使用刺刀刺穿我们的鼓，打碎乐器，抢走胡琴，有时挖地三尺寻找我们的剧本。不管敌人怎样疯狂，都不能丝毫动摇文工队员们为战友演出的决心。在腥风血雨的集中营里，没有书、没有报纸、听不到祖国的广播，看不到祖国的电影，精神上的饥渴，其痛苦并不亚于身体上的饥饿！文工队员们在斗争中磨炼了意志，成长壮大；不仅起到了调

剂精神生活鼓舞革命斗志的作用，而且自身得到了锻炼和发展。开始只有 40 人识简谱，后来发展到 200 多人，有演出水平的演员培养出 100 多人。九号文工队队员何瑞被俘前在部队是个班长，参加文工队一年来他的表演特别出色，并学会了识简谱和几样乐器。

文工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只是演大戏，而且经常深入小队及时将战友中团结、学习、斗争的典型事迹，通过小演唱或快板、山东快书及时表扬。我们还不断组织群众性文娱活动，如下棋、打扑克、讲故事。动员知识分子回忆所读过的长篇小说，曹友忆写的《保尔柯察金》故事以及六号组织忆写的《三国演义》等大型小说的手抄本，在全集中营传阅。

在“602”集中营，曾举办过漫画美术展览，吴春生和张辉宗、肖大国是当时集中营有名气的画家，每次游行示威他们就画出领袖像和大幅漫画，他们先后画了《我们有祖国》、《如此神甫》、《血腥甄别》、《钢铁战士》等漫画，画中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对敌人的仇恨。这些画开始在集中营内部展览，后来向外挂在铁丝网上，吸引了各国记者来拍照，连敌人士兵们有时也驻足欣赏。

经过半年的对敌斗争与政治学习，战友们的革命信念进一步坚定了，也都深深知道，敌人一定要失败的，重返祖国只是时间问题。大家憧憬着返回祖国后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因而迫切要求学习文化。革命战士不仅要战胜武装的敌人，还要战胜无知和愚昧，把敌人的集中营变成文化大学校。为此，共产主义团结会决定从 1953 年元月起，开展为祖国学习文化的运动。根据总委这个决定，我着手组织了对全体战友的文化摸底，并制定了文化教育实施方案。

济州岛十个小集中营，在共产主义团结会分委的统一领导下，建立了文化学习委员会，中队建立了教学指导组。各营场按照不同的文化程度编为识字、初小、高小、初中和朝文 5 个班次。为了对敌斗争的需要，中学程度人多的营场还设立了英文自修班。地理、历史课本按照总委制定的教学方案和教材提要由各小营场组

织编写，有的进行互相交流。根据环境需要，语文课本重点编写了革命气节故事，地理和历史课本也突出了爱国主义精神。

“为祖国而学习”的口号激励着每个战友，粗大伤疤累累的手握起了笔，把对祖国的爱凝聚在一笔一划上。晚上休息了，很多人不肯睡觉，在敌人铁丝网的警戒灯光下默默不语的学写字，有的人在被窝里背诵课文。

战友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克服了缺乏文具的种种困难。把雨布当黑板用，用麻带扎成刷子蘸煤烟水或牙粉水写字，从敌人的垃圾堆拾些破纸破水泥袋作学习本和练习本，用罐头盒剪成钢笔尖，用破布煮成颜色水，或者用烟筒里的煤烟化水以及挤出野草的绿汁当“墨水”，学珠算用的算盘是用水泥捏成的。搞不到纸的人，利用木棍在地上练习生字，有的人把一些难记的生字写在手臂和大腿上，以防止敌人突然搜查抢走练习本。

战俘学习文化，是日内瓦战俘公约明文规定的权利。美军当局不但不给被俘人员学习的方便，而且用尽办法来阻挠破坏。美军每次进营场搜查时，常捣毁学习器具，抢走黑板，一查出有中文的纸片，便视为“暴动”文件，任意抓走战俘进行隔离毒打。不管敌人如何阴谋破坏，直到朝鲜停战签字生效返回祖国的前夕，济州岛和釜山回国战俘集中营的文化学习，始终如饥似渴地进行着。大家一致决心要用学到的知识，为亲爱的祖国创造新的荣誉。各营场曾分别召开了祝贺学习模范大会，被选上的模范学员，每人都得到一枚用铁片和彩色油漆制成的奖章，特等模范与对敌斗争中的功臣一样记大功一次。

1952年4月26日，共产主义团结会接受朝鲜劳动党集中营指导委员会的建议，“坚持锻炼身体，以战胜敌人的摧残阴谋，加强军事体育训练，以适应战争形势下或和平后回国的需要。”“60%回国支队”建立后非常重视体育，尽管大家衣食不足仍每天坚持上早操、跑步和做军事基本动作训练，还大力开展跳木马、跳高、跳远、拔河、翻杠子、田径赛、跳障碍等体育运动。1952年8月

到 53 年 7 月，有的营场举行了多达 5 次运动会，每次 3 至 5 天，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制做一些小旗子或节省一些锅巴送给胜利者当奖品。

回顾那一段回国战俘集中营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们克服了种种的困难，取得了那么大的成绩，我深深感到，咱们部队文化政治工作传统的可贵！部队中爱国知识份子的可贵！（张城垣）

### 打不垮的钢铁队伍

“共产主义团结会”成立后，总委责成李明和我去做组织工作。当初以李明为主，到济州岛后，他调往二号营场任分委书记，组织工作便由我全面负责，直到回国。现在想起来，那付担子何等沉重！

602 回国战俘营刚刚建立，近 6000 名战俘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斗争从各中国战俘营汇集这里。大家来自不同的部队，不同的地下斗争组织，在原来的战俘营，在叛徒特务的控制下互不通气，甚至互不相识，只是因为都要回国才到了一起。总委会要我努力把组织工作做好，说这是能否完成新的艰巨的斗争任务的关键。好在那时我年轻，心想：“这回总委会成立了，有了正式的党的领导，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战俘营组织工作的特点与任务。

我在部队做了多年的组织工作，但战俘营的组织工作却大不一样。在这里我得不到上级组织部门的各种指示、材料，在部队时组织是公开的，这里无论组织的建立和发展都是秘密的。在部队时吸收党员、考察干部，可以进行多渠道、多方面调查，必要时还可向地方有关部门调查。战俘营却没有这种条件，不用说个人档案，有的战友单独被俘想找点旁证都办不到。在部队时使用、调动干部，可以从容研究、全面考虑，在战俘营严峻斗争环境下却难以办到。另外，在部队发展党团员，提升干部主要看该同志的出身成份、在战场上的表现、组织和指挥战斗的能力以及在部

队的资历等等。在战俘营，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武装斗争已转为政治斗争，公开斗争已转为地下斗争。被俘后个人的政治道路要自己独立做出抉择，而且要在敌人的欺骗、利诱、残酷折磨与白色恐怖下做出抉择，单靠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不够的。这里需要的是基于一定政治素质和文化素养的革命人生观、历史观，强烈的人格自尊心与民族自尊心和祖国人民的忠诚，战俘集中营严峻的政治考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些出身较好的指战员被俘后不知所措，一度消极悲观，有的甚至在敌人压力下丧失气节，步入歧途！相反，一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或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知识青年，却表现了坚定的政治态度，灵活的应变能力和勇敢的斗争精神。他们在我们的外交、敌工工作中、宣传鼓动、通讯联络、文化教育工作中都有着很好的表现！这就要求我们做组织工作的，必须尽快改变传统观念。根据新的环境、形势、条件来建立和发展组织，来选择和使用干部。使我们各级组织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不断吸收新生力量，不断壮大斗争骨干队伍，并使之起到先锋模范作用，以保证战俘营的反虐待、反迫害、反敌特控制、反背叛、反强迫去台湾的艰巨斗争任务取得胜利。

回国战俘营的党组织建设。

“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核心是原“71”的党支部，该支部是在巨济岛“71”回国营地建立后第二天，即1951年11月9日组建的第一个包含了我被俘人员中团营干部的党组织。成立时，书记为魏林、副书记孙振冠，委员有顾则圣、刘光、陈吉庆、李喜尔、南阳珍。后赵佐端、杜岗等团级干部来“71”后，则由赵佐端任书记，魏林、杜岗、孙振冠为副书记。

“共产主义团结会”成立时的基本成员来自各中国战俘营原来的地下斗争组织。即巨济岛原70、71、72、86等战俘营以及釜山1、3、5、6、11等收容所各地下党团组织、爱国斗争组织，经过严格审查后吸收的会员。

1952年4月11日，赵佐端在巨济岛602集中营召集原“71”

支部成员和各集中营的对敌斗争领导人 13 人开会，即第一次中共巨济岛集中营地下临时党委会议。成立了临时党委会，其成员是：赵佐端、魏林、孙振冠、杜岗、王化英、顾则圣、马兴旺、张城垣、李喜尔、陈吉庆、李明、许如刚、门培英。会议推选赵佐端任党委书记，魏林、杜岗、孙振冠为党委副书记，李明为组织委员，张城垣为宣教委员，李喜尔为保卫委员。

会议讨论筹建统一的地下党组织和统一公开的行政管理组织。会议确定建立“602 回国支队”，孙振冠为总代表兼支队长，张泽石为总翻译与对外联队长。确定杜岗、顾则圣负责全支队行政建制整编队伍和后勤生活管理；确定张城垣为临时党委工作组长，协同李明、陈吉庆、李喜尔等同志负责全支队政工与党组织的筹建；责成张城垣起草组织章程。确定了 5 个大队的负责人，负责各大、中、小队的行政组织的建立。支队并筹建文工队、纠察队和炊事队及医务室。

1952 年 4 月 18 日，赵佐端在 602 集中营主持第二次临时党委会议，参加者除第一次 13 人外增加徐益生、徐寿田、韩子建、杜学贤四人，会议通过了“共产主义团结会”为战俘营内地下党组织名称。会议建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以取代原临时党委，会议还通过了组织章程。确定了建立机要、组织、宣传、保卫、敌工、各级业务系统和各分委机构，确定了对敌斗争策略和内部工作指导方针。

1952 年 5 月杜德事件后，敌人对战俘进行分散管理，602 集中营 6000 余人被移拘于巨济岛海边第 70 集中营。赵佐端于 6 月 19 日在此召开了第 5 次总委会议，讨论对付敌人分化巩固回国阵地的具体措施。确定支部、分委、总委，各组成四套后备班子，由于孙振冠已被敌扣走，增补了顾则圣为总委副书记，增补韩月季、韦光明、张合顺、杜学贤、贾耀先、王金方、韩洛夫为委员。讨论决定 6000 人被移拘到济州岛后分押情况下的机构设置。根据当时敌人将 6000 人分两批迁移的形势需要，决定建立两个总委领导

部。以杜岗、顾则圣、王化英、杜学贤、张城垣 5 人为一个领导部，以魏林、马兴旺、李喜尔、李明、陈吉庆 5 人为另一个领导部。7 月 14 日，6000 中国被俘人员全部被移拘于济州岛第八集中营，该营又分隔为十个营场，分散拘留（每个营场 500 多人）。杜岗、韦光明被拘在六号营场，顾则圣、杜学贤、张城垣、王化英 4 个总委领导被拘在八号营场，魏林、马兴旺、李喜尔、陈吉庆 4 个总委领导被拘在五号营场。为了统一领导，总委决定八号营场为总领导部，五号营场为指导部，分管西片 4、5、9、10 四个营场。迁往济州岛前，敌人扣留了赵佐端后，魏林即代行了总委书记职务。1952 年 8 月 30 日魏林被扣走，杜岗代行总委书记职务。

1952 年 9 月 30 日，杜岗被扣，总委副书记顾则圣立即代行总委书记职务，唐耀任总委机要秘书（在八号），又将一部份原部队的营连级干部的总委委员分别调整到各号分委担任正副书记。1952 年 10 月中旬，总委会进行了一次补选，提出候选人名单。由各分号分委投票选举，按票数多少，补选了 4 名总委副书记，以应付“十·一”斗争之后，敌人不断清干的严峻形势。4 名副书记为：韩月季、马兴旺、韦光明、杜学贤。

1953 年 7 月 3 日，顾则圣和大部份委员被扣，总委领导又进行了新的补选，选举韩月季代行总委书记职务，贾耀先、徐益生、张城垣、王金方为总委副书记。新的总委班子领导了朝鲜停战前后，战俘交换过程中的对敌斗争，以及对祖国人民控诉敌人暴行的组织工作。确定张城垣兼任“中国被俘人员控诉美军虐杀暴行委员会”主任。

1952 年 7 月至 53 年 7 月，“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委员马兴旺、王化英、韩子建、韦光明、徐寿田等人先后被扣到赵佐端所在的小监狱，为了保证后继有人，总委先后进行了三次增补。除去上述增补的副书记外还有：贺永国、侯光福、孔繁堂、马景良、杜立身、张金苏、王兴文、李全有、张福庆、原来福 10 人为总委委员，截至回国前，“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委员累计总数为 34 人。



赵佐端等总委领导被扣到济州岛西北角小监狱后，我们秘密派出了机要通信人员，通过“土电台”同他们取得了联系。赵佐端仍不断地对坚持在一线工作的新总委作原则上的领导，起了核心作用。

“共产主义团结会”济州岛各分委会成员名录①

一号营场：分委书记徐寿田，后贾耀先，副书记：刘东方、周流，委员：李凤林、赵子贤、魏善洪、张银根、王明生、黄长富、岳凤歧、张永和、朱正权。

二号营场：分委书记李明，副书记：冯景良，委员：张相、胡辛志、吴明义、梁贤、张居林、王子钦、樊立贵。

三号营场：分委书记韩月季，后王金方。委员：王金贵、赵兰庭、崔元奎、王阿一、薛天林、陈玉礼、史振荣、李成胜、姜瑞溥、张吕辉、郭乃坚。

四号营场：分委书记张合顺，副书记南阳珍、张雷峰、邢茂德。委员：王守庆、黄丙忠、曹友、刘振荣、王玉明、牛根兴、王全喜、杨国海、李士清、韩万一。

五号营场：分委书记韩洛夫，副书记：刘光、张福庆、王洪运，委员：黎子颖、孔繁堂、吕杰、李国儒、吕治国、苏九良、田方保、张芮。

六号营场：分委书记贾耀先、后门培英，副书记：原来福、许茂成，委员：宋怀安、李万清、王来福、徐绍堂、刘俊杰、冯国治、李兴龙。

七号营场：分委书记：韩子建，后许如刚、孙德其，副书记：赵年智，委员：时占奎、张殿祥、李维文、王官虎、王登国、杜立身、王木森、马占成、李相荣、赵国玺、王福官。

八号营场：分委书记王化英、后杜学贤、何永国，副书记：孟

① 因当时调动频繁，又事隔多年，记忆可能有不准确之处。各分号公开对敌联系的是该号“代表”，由 1~10 号“代表”是：朱正权、程明哲、姜瑞溥、曹友、边世茂、冯国治、杜大举、王文涛、刘振甲、陶钧善。

晓峰，委员：张迎俊、王文涛、杜鲁、陈英、田贵顺、冯梅亭、张福德、许振华。

九号营场：分委书记徐益生、后李全有，副书记侯光甫，委员：杜荣光、周文新、贺秀山、樊子英、卜金尼、高子、吴春生、康德生。

十号营场：分委书记：臧根旺、王兴文，副书记：潘积善、张金苏、孔繁堂、杜立身，委员：陶钧善、赵清基、赵久荣、张孝连等。

1952年4月15日，张城垣根据临时党委的指示起草了《共产主义团结会会章》。全文如下：

### 《共产主义团结会会章》

#### 第一章 会纲

“共产主义团结会”是美军战俘集中营内被俘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战士领导对敌斗争的地下组织。它以中国共产党的纲领为自己的斗争纲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根据集中营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共产主义团结会的具体纲领是：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发挥组织作用，领导被俘人员，为维护党和祖国的荣誉，配合我方军事斗争和板门店谈判斗争，挫败敌人扣留战俘的政治阴谋，坚持回国、坚持革命而英勇斗争。如果和谈破裂，和平无望，随时准备在战争到来的情况下，组织越狱暴动，自己解放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继续奋斗终身。

#### 第二章 组织

“共产主义团结会”的组织制度，严格遵守共产党党章中组织制度的一切规定；但由于处在敌人包围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各级组织应以共产党气节为重，既要敢于冒险、敢于斗争，又必须采取地下形式，在组织上力

求隐蔽，干部力求长期埋伏，组织与会员实行单线联系，组织与组织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不举行全员大会。会的各级组织总委、分委、支部行使部队党委、总支、支部的工作职能，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工作，但鉴于地下环境，会的各级领导成员，除总委可以从分委成员中民主推选外，其余分委、支部、小组领导成员任免一律由上一级组织决定或报定，会员发展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

### 第三章 会员

“共产主义团结会”会员是对敌斗争的骨干，凡承认中国共产党党纲、党章，被俘情节清楚、被俘后无叛党变节行为，立场坚定，斗争积极，愿为实现会纲而献身的，不论其原来是否共产党员，均需一名会员介绍经支委审查通过后报分委批准，始得入会。情况复杂者需报总委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总委可以直接吸收会员。所有会员有参加组织工作过组织生活的义务，有批评和揭发上级错误的权利，会员要发扬中国共产党员三大（骨干、带头、桥梁）作用，执行三大（团结、学习、斗争）任务，坚持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百折不挠执行组织决定，严守组织秘密，不怕拷打，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坚持生命不息、斗争不止，一天不死，一天和敌人势不两立。

### 第四章 纪律

会员纪律有劝告、警告、撤销会内职务、秘密除名四种。会员丧失革命意志不符合会员条件多次教育无效的，报上级组织批准实行秘密开除。为防止意外仍指定专人对其保持形式上的联系和进行教育。会不设监察机构，会的纪律由各级组织中的保卫委员负责。各级保卫委员在同级委员会和上级保卫委员的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

“共产主义团结会”会员发展除坚持经常的组织发展工作外，大的发展在四个时期进行。

1. 1952年4月中旬，建会开始从在白色恐怖时期各个集中营出来的对敌斗争骨干和表现立场坚定的党团员中成批发展会员600余人，这批会员是当时骨干的骨干。绝大多数在组织内和行政上担任小组长，小队长以上的职务。为了保证党的核心领导，建会开始，规定支部委员以上骨干必须是入会的共产党或青年团员担任，总委委员必须是部队连级以上的干部（当时13名总委委员团级干部3人、营级干部5人、连级干部5人）。并确定凡是被俘后表现一度消沉，参加过刺字写血书的以及在审查中有失密行为的一律不准入会，如有特殊表现，吸收入会的需经总委批准。

2. 1952年8月1日前后，从经过巨济岛反甄别和迁往济州岛的反分化斗争考验的战友中成批发展会员500余人。这批会员在纪念“八·一”和“十·一”升旗严峻的对敌斗争中起到了模范作用。

3. “十·一”升旗斗争以后，从要求护旗的第一、二批护旗突击队员中（共1000人，60%是会员），先后发展会员400余人（其中第七号营场发展最多，大约发展100人）。

4. 1953年3月追悼斯大林逝世斗争前后和1953年7月1日成批发展会员300人。

截至1953年7月29日停止发展会员时止，共产主义团结会会员总数为2227人。其中党团员1900人，回国的6670名（包括伤病战俘1030人，不包括经解释回来的424人）归来人员中有共产党员2890人，吸收为会员的有1200人。

回国战俘营的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建设。

“602回国支队”成立后，我们在建立“共产主义团结会”的同时，也建立了内部行政管理系统，以保证有组织有计划地贯彻和完成总委会提出的团结、学习、斗争三大任务。

我们将“602”回国战俘营命名为“回国支队”。支队下属6个

大队，各大队下设中队、小队、班、小组，大队以下相当于部队的营、连、排、班的建制。支队部设有正副支队长、支队代表，翻译、秘书、书记长及支队工作组，统管全支队宣传、教育、文化工作。支队部还设有供给处，主管衣、食、住、用。医务处，主管医务及卫生。纠察队，负责安全警戒。大队部设正副大队长、文化教员、卫生员、文书。

“602”时期行政系统人员名录。

1. 支队部。支队长兼代表：孙振冠（对外为“602”联队代表，“杜德事件”被扣留后由魏林担任）。副支队长：张福庆。翻译：张泽石（对外为“602”联队“联队长”，“杜德事件”被扣后由高子担任）。书记长：郭乃坚（管理全营战俘卡片及生活用品登记）。工作组：负责人：张城垣。宣传组长：吕杰；教育组长：李凤林；敌工组长：张济良；文化组长：骆星一；文工队长：马有钧；后勤负责人：顾则圣；医务处负责人：石金荣；直属纠察队负责人：许如刚、王福海；还有朝鲜翻译：柳一。

2. 各大队大队长人选。一大队（以干部为主）大队长：魏林（兼），大队副韩洛夫。二大队（以原“86”的难友为主）大队长：马兴旺，大队副徐益生。三大队（以原“72”的难友为主）大队长：王化英，大队副杜学贤。四大队（以原“70”的难友为主）大队长：门培英，大队副韩子建。五大队（以原釜山“十一”收容所难友为主）大队长：徐寿田，大队副张合顺。六大队（以原釜山伤病收容所难友为主）大队长：张雷峰，大队副南阳珍。

济州岛第八战俘营行政组织情况。

1952年7月，“回国支队”被移往济州岛第八战俘营，被敌人分割为10个小营场，我行政系统也相应改变。

1. 支队部不复存在。全支队只有“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进行统一领导。仅留有“回国支队”总代表魏林及总翻译高子。后因魏林拒绝向敌总管上校白乐蒙敬礼而被取消代表资格。从此，我“回国支队”总代表及总翻译不复存在，仅各分号有代表及翻译。

2. 各小营场保留大队、中队、小队编制，共 10 个大队。
3. 各大队部增设大队代表、翻译。
4. 原支队部的供给处、医务室、纠察队、文工队，也下放到各小营场分设。
5. 各小营场的领导干部由于敌人不断清干而变化较大。（其名录及变化略）

回国战俘营的行政管理简况。

“回国支队”从建成之日起到交换回国为止，始终是按照我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结合战俘营的特殊情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在生活上我们强调了官兵平等，反对任何特殊化，与反动战俘营各级俘虏官的专横暴戾、贪污腐化，形成鲜明对比。在管理上强调民主管理、互助互爱，各级领导和骨干分子要关心爱护战士，经常开展思想互助生活互助和勉励关怀等活动，以抚愈大多数难友在敌特迫害下所造成的创伤，共同渡过集中营的痛苦岁月。因此，“回国支队”尽管面临美军当局的日益残酷的镇压、分化，斗争十分激烈尖锐，但内部始终团结一致、情绪高昂。难友们在苦难和斗争中建立的同生死共患难的深厚情谊，历数十年而不变！

（陈吉庆）

### 济州岛“十一”大血案

1952年夏天，美方在板门店和谈桌上继续坚持其“战俘自愿遣返”的顽固立场，使和谈再度陷于僵局。

坚决要求回祖国的 6000 名中国战俘被移到济州岛第八战俘营，并被分别监禁在 10 个小营场里。自杜德将军被战俘活捉并承认美方在战俘营犯下的罪行后，新任战俘总管波特纳准将对战俘实行了残酷镇压，经常制造借口断水断粮，投掷瓦斯弹，甚至强迫我们脱光衣服进行搜身。强迫战俘向美军军官敬礼，任意侮辱战俘人格，开枪打死打伤战俘的事件不断发生。“十·一”前夕，报复和镇压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激起了战俘的强烈反抗，群情激

愤，纷纷请战，要求报仇雪恨。“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根据形势，考虑大局，进行了反复研究。鉴于当时板门店谈判桌上，美方代表以所谓“朝中战俘不愿遣返”为借口，坚持其“自愿遣返”原则的顽固态度，决定于10月1日升国旗以庆祝国庆，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的回国要求。为此，总委会作出战斗部署，如美军当局派兵进行镇压则予以反击，不惜流血牺牲，坚决保住国旗。弘扬中国战俘的爱国精神，粉碎美方所谓“朝中战俘不愿遣返”的谎言，支持板门店我方和谈代表坚持全部遣返的正义立场。9月23日，总委会向各分号营场分委发出了《在“十·一”反击敌人的意见和具体安排》。各分号营场根据总委会的部署，分别向群众进行了普遍动员。群众听了以后，积极响应，情绪异常高涨。纷纷提申请、写血书，有个别人甚至要断指以表决心，报名要求参加“突击队”“护旗班”。很多人私下互相交换了在国内的家庭通讯处，抱着“视死如归”的决心。长期以来，部分同志因为“被俘”思想上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他们曾经自觉参加抗美援朝，在弹尽粮绝身负重伤情况下被俘，战俘营中又经受了数不清的屈辱和磨难，他们都没叫苦过，唯独觉得“被俘”的本身就是给党的脸上抹了黑，实在愧对党和毛主席。在巨济岛，“71”回国阵地时，党支部就提出了“在斗争中洗雪耻辱，在耻辱中争取光荣！”的口号。大家都怀着一种对党的“负疚感”，心悦诚服地喊着这个口号去参加各次斗争。这次听了“十·一”升旗斗争的动员后，更是觉得“洗雪耻辱，争取光荣”的机会到了。许多人怀着一种似乎走向祭坛、自觉献身的神圣感，准备着“十·一”那天，在五星红旗下挺起胸膛，英勇地冲向敌人的枪口。一时间，各分号营场内掀起了堆积石头，储存汽油，准备木棒，打制匕首，与自制各种“武器”的备战热潮。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检阅自己的斗争力量，总委会还决定在战俘营外进行“外线反击”，伺机杀死济州岛战俘营总管杜威亚上校及美军管理军官布鲁克斯上尉，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七号

营场的同志。七号营场的同志积极准备，利用汽油桶及皮鞋底上的钢片制成匕首 100 余把，并作了队形演习，准备外出服劳役时寻找机会下手。不幸的是 9 月 26 日，七号营场出现叛徒蔡兴福外逃向敌人告密。9 月 27 日，美军上尉布鲁克斯亲率一营全付武装的士兵，出动坦克四辆，将七号营场全体战俘 500 余人驱至营外广场。然后逐一搜身鞭打，结果搜出匕首 100 余把，被打伤 100 余人。“外线反击”计划未能实现。9 月 30 日上午，美军当局再次利用叛徒李小广认出并扣走了五三八团副参谋长杜岗。至此，“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早期的正副书记赵佐端、孙振冠、魏林、杜岗 4 人均先后被敌扣走。领导力量削弱，形势更加严峻。正值“十·一”升旗斗争的前夕，叛徒不断出现，领导干部不断被抓走，敌人的镇压不断升级，群众情绪因此大受影响，感到苦闷、焦急、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总委副书记顾则圣担起指挥全局的重担。9 月 30 日，顾则圣以总委会的名义，及时向各分号营场发出通知：“杜岗同志被抓走以后，总委会工作照常进行，原定‘十·一’升旗斗争不变，各分号营场应按原计划积极做好准备。”各分号营场分委会接到指示后，立即向群众传达，大大稳定了军心，鼓舞了士气。当日傍晚，顾则圣又于八号营场发来《总委会关于“十·一”升旗斗争的最后命令》，全文是：“‘十·一’升旗斗争如期进行，各分号如有不执行总委会命令，畏缩不前、恐惧动摇者，当与战场上临阵脱逃论处。”这一《最后命令》迅速传达至各分号营场广大群众，大家心中更加踏实，情绪更加高昂，摩拳擦掌，报仇雪恨，完全处于激战前夜的兴奋之中。各分号营场分委会加强领导，深入检查备战工作，突击队、救护队、后勤组各就各位。

估计敌人极可能将七号营场作为镇压的重点，在分委委员韩子建、李维文、赵年智、时占魁、赵国玺、王福海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深入动员和周密准备。纠察队长张玉堂以原纠察队员为骨干，结合各小队评选出的难友，组成了 100 人的突击队和 12 人的



护旗队。突击队负责制止敌人冲近国旗，护旗队负责在必要时将旗降下焚毁，不让敌人夺走！

1952年10月1日，济州岛第八战俘营10个分号营场的5000余名坚持遣返的中国战俘，按照“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的布置，于上午6时正集会于各分号营场的广场上，举行升旗仪式以庆祝国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七号营场率先升起一面五星红旗。信号发出后，紧接着各分号营场相继升起国旗。为了扩大影响，一号营场按计划升起的是一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这十面红旗迎风飘扬，鼓舞士气，激动人心。升旗以后，各分号分委领导在队前作了简短的讲话，阐述升旗的重大意义，并作了进一步的战前动员。号召大家坚决执行总委会的命令，勇敢战斗，保卫国旗，用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祖国的忠诚和坚决回归祖国的决心。讲话完毕，迅即解散，马上进入战斗准备。此时营外敌人慌了手脚，各岗楼上的卫兵纷纷拿起电话向战俘营总管报告情况。半小时后，在隆隆的巨大轰鸣声中，美军当局调来数十辆坦克包围了第八战俘营，约一个团的全副武装的士兵在营外集结待命。不久，空中又飞来几架战斗机，在第八战俘营上空盘旋。接着广播中传来美军战俘营总管杜威亚命令营内战俘迅速降旗的声音。营内中国战俘置之不理。又过了约半小时后，营门口站岗的美军卫兵打开了第八战俘营的大门，11辆坦克发出了隆隆巨响杀气腾腾地驶进了营内通道。随之约两个营的全副武装士兵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手持冲锋枪、自动步枪、手榴弹、各种瓦斯弹、火焰喷射器进入营内分布在各分号营场门口。然后再次通过广播“命令”战俘降旗。营内战俘仍然置之不理，十面红旗照样傲然飘扬在天空。杜威亚上校命令布鲁克斯上尉带队，以两个连的兵力冲入七号营场夺旗。这时七号营场内一片寂静、悄然无声，待美军士兵走到帐篷边时，事先埋伏于通道两边帐篷沟内的突击队员，突然一跃而起冲向敌人。在一片“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喊声中，战俘们将石块、木棒、汽油瓶、漂白粉、滚烫的开水等自制的“武

器”，如雨点般的投向敌人。这突然的反击，显然使美军思想准备不足，打得美军士兵晕头转向。被开水烫着和被漂白粉灼伤的美军士兵，不知道这些中国战俘使用的是什么“新式武器”，惊慌之中不断向冲上来的战俘开枪，边打边退，终于退出了七号营场。七号营场的中国战俘打退了美军的第一次冲锋，但付出的代价是突击队员伤亡殆尽。当然美军方面也有一些人负伤，其中包括一名中尉军官面部被石头击伤。敌人进行了调整，十分钟后第二次冲进了七号营场。这次美军士兵首先使用火焰喷射器烧毁走道两边帐篷，同时投掷大量瓦斯弹，使营内战俘泪流满面，两眼火辣辣地灼痛，难于睁开。接着不停地用机枪向两边扫射，逐步前进。这时，七号营场补充上来的第二梯队突击队员已完全暴露，并无任何地形地物可资利用，加上瓦斯弹的薰毒，战斗力大大减弱。他们仍然凭着一股意志与精神，在全营场同胞的呐喊声中，在各分号营场支援的口号声中，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向美帝讨还血债！”“为死难战友报仇雪恨！”的口号扑向敌人，与敌人争夺枪支展开肉搏。美军士兵被七号营场突击队员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反击行动吓懵了，美军指挥官害怕枪支落入战俘手中，赶忙下令美军退出了七号营场。经过短时间的间隔后，美军在坦克的前导下，第三次冲进了七号营场，并使用轻机枪远距离不停地向战俘人群开枪扫射。这时七号营场内已尸横遍野，血流满地，负伤者比比皆是，幸存者忙于抢救伤员，反击力量大大减弱。敌人的坦克终于冲到场内旗杆下，七号营场护旗队的 12 名战友，奋起与敌人肉搏，以牺牲 9 人的代价挡住了敌人，并迅速降下国旗，用事先准备好的汽油自行焚毁。

七号营场的同志为了保卫国旗，当场牺牲的有高勇、陈建中、邓鸣斌、李大才、王保元、任新、岳温武、马如龙、李玉祥、王如水、赵洪禄、刘金石、马河清、李宗贤、王操元、张树生、陈建化、丁世奎、王旭亭、郭保长等 56 人，后在医院又死去 9 人。负伤的有张子建、阚维高、赵国玺、蔡德荣、史忠水、代玉书、张

辉宗、曾保元等 109 人。总计死伤 165 人。他们以血肉之躯抗枪林弹雨，用鲜血和生命向全世界显示了炎黄子孙不可侮的浩然正气和共产党人热爱党和祖国的赤子之心。这场声势浩大的流血斗争，有力地戳穿了美军当局诬蔑中国战俘“不愿遣返”的谎言，为板门店我方和谈代表就战俘问题的正义立场以有力的支持与配合。

当天下午“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向七号营场分委会发报：“追认死难烈士为斗争英雄，给七号营场全体同志每人记大功一次，给每个突击队员记特功一次。”其他各号营场相继向英雄的七号营场发报表示慰问和敬意。10月2日，板门店朝中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将军为此向联合国军代表团美军哈利逊中将书面提出严重抗议。美军当局对此次血腥镇压屠杀中国战俘的暴行则诬以“战俘暴动”来推卸责任。

10月2日济州岛第八战俘营五号营场，以军官队的名义代表全体中国战俘向美军当局就“十·一”血案提出书面严重抗议，同日，被拘于“战犯”战俘营的赵佐端、魏林、杜岗等人在铁丝网上挂出大幅标语抗议美军当局的暴行。美军上尉布鲁克斯率兵将标语抢走并将赵佐端等人殴打一顿。

10月7日，第八战俘营全体战俘，在10个分号营场内集会追悼“十·一”死难烈士。经过斗争，美军当局被迫同意各号营场分别派出代表齐往马山埔烈士坟前敬献花圈以示哀悼。

“同是青山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他们倒下，不再回来！共和国的旗帜上又增添了血染的风采！

（为本文提供材料的有赵年智、时占魁、赵国玺、蔡德荣、李重庆、张辉宗、李先元、阚维高、管同应等原济州岛七号营场幸存的同志。黎子颖 丁先文执笔）

## “12·12”夺旗斗争

在 1952 年 10 月 1 日的升旗斗争中，济州岛上第八战俘营里的中国战俘，遭到美军的镇压。烈士们血迹未干，美军当局又于 12 月 12 日枪杀了中国战俘范杰，这一流血事件尽管已过去了 40 年，却仍如昨日发生，历历在目！

“十·一”升旗斗争以后，美军当局加强了对第八战俘营的戒备，常常出动武装对各号营场进行突击搜查，搜查的重点就是想获取我们隐藏的国旗。12 月 12 日下午，敌人派出一个连的兵力来到五号营场，把营内 500 名中国战俘全部赶至营外空地草坪上。四周是端着自动步枪，上着刺刀，头戴防毒面具的美军士兵，虎视眈眈地将这 500 多人团团围住。然后由一个美军少校带着十来个徒手的美军上士和士兵进入营内掘地三尺，狂翻乱搜。终于将我们隐藏于石墙内的国旗搜出来了。美军官兵，欣喜若狂，纷纷呼叫，大声吹起口哨来。美军少校将搜出的国旗拿在手中，洋洋得意地向被围困的中国战俘挥动，炫耀他们的胜利。这时，被困在营外的战俘们十分焦急，怎么办？能让敌人就这样把我们的国旗拿走吗？不能，绝对不能！七号营场的同志，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哪怕流血牺牲也要夺回庄严神圣的国旗。五号营场的“共产主义团结会”分委委员们，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暗中移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派黎子颖带队组织力量，在返回营房时，不惜任何代价，从敌人手中把国旗夺回来。黎子颖是五号营场直属中队的副中队长兼宣传队的队长。他接受任务后，潜回原地向准备夺旗的纠察队员做了简短的布置，并吩咐宣传队中年仅十几岁的小鬼，叫他们“听我指挥，相机行事，夺回国旗。”

敌人搜查完毕，我们开始返回营房。营外警戒的敌兵，似乎有“任务完成，平安无事”的感觉，营内美军少校还拿着搜出的“战利品”，一脸奸笑。我们前行的队伍除“沙、沙”的脚步声以外，一片悄然，井然有序。但大家心里都非常紧张，都在盘算着

“如何下手”。两眼也牢牢地盯住营内敌军少校手中的国旗，一个夺旗的方案在我们脑中初步形成。快近营门时，机要组的联络员报务员何平谷、郝智根、钟骏骅、李振华几人大步流星赶上来了，他们好像也要来参加这次战斗。黎子颖心中不禁纳闷起来，他们是大家要保护的對象啊，怎么也走到前面来了？黎子颖不解地看了他们一眼，他们只是神情严肃地向他点点头，没说什么话。转瞬之间，我们已走进营房，刚一走到敌军少校身边时，黎子颖一声令下，大家一哄而上围住了敌军少校。随即范杰、何平谷、郝智根、钟骏骅、杜家兴、李振华和黎子颖等人迅即从敌军少校手中拉住国旗，使劲往我们怀里拖。美军少校块头很大，身高一米九左右，力气也很大。虽然猝不及防，他感到愕然，但还是死死拽住不放。敌我双方像拔河似的僵持起来，虽然时间很短，情况异常紧急，假如外边的敌人一来增援，我们就没法了。这时，郝智根在“拔河”的最前端，他急中生智，低下头狠狠地在敌军少校的手腕上咬了一口。美军少校大骂一声“God damn”（混帐东西），负痛松手。国旗被我们拖过来后，黎子颖拿在手中，拔脚就跑，他边跑边想，怎么办，跑往何处？旁边惊呆了的美军士兵，仿佛才醒悟过来，一个美军上士顺手抄起一把铁揪紧跟其后。美军官兵平时进入营房，按规定是不准带武器的，营外持枪的美军士兵也不好开枪，可能是怕误伤后面追赶的美军上士，因为二人相距很近。黎子颖持旗沿着铁丝网跑了一圈，敌人渐渐追上，他经过厨房时顺手将国旗扔给在旁边的何平谷、钟骏骅，他们两人赶忙将旗帜塞入灶内烧掉，国旗终于未被敌人抢走。黎子颖被敌人逮住，打得鼻青脸肿，押在一边。美军少校举着被郝智根咬伤的手，咆哮如雷。马上下令把进入营房夺旗的 33 人押出营外飞机场边一个土坑中禁闭起来。接着又把黎子颖、何平谷、郝智根三个夺旗中的“罪魁祸首”拉出来押往岛上监狱拘禁。

因为禁闭的地方靠近飞机场，我们称之为“飞机窝”。范杰、钟骏骅、杜家兴、李振华、孙凤歧 30 人，大都是宣传队的小鬼，

也有一些是纠察队队员。天黑以后，敌人仍不放他们回去，晚饭也没得吃，又冻又饿，他们就在露天里依靠身体互相挤挨着抵抗冬夜海边吹来的寒风。

在“飞机窝”四周，有大约一个排荷枪实弹的美军士兵，在强烈的光柱下警戒着。凌晨 4 点左右，美军士兵故意寻衅，不停地向“飞机窝”的人群里丢石头，打伤了我们几个人。“飞机窝”里被困的同志，识破敌人的阴谋，这是敌人在故意制造杀人借口，他们没有还手。但敌人还是向人群开了枪，当场打死范杰，重伤李振华、孙凤歧两人，这显然是美军当局有意制造的又一血案。一会儿，敌人派来一辆汽车将范杰的尸体拉走，将孙、李二人送到医院，其余的 27 人直到 13 日晚 10 时许才被放回第八战俘营五号营场，他们整整被冻饿了 36 个小时。

五号营场的全体同志举行了欢迎会慰问他们，表彰他们保卫国旗的英勇斗争精神。“共产主义团结会”五号营场分委会对范杰的牺牲表示沉痛的哀悼，报请总委会追认范杰为烈士。对带头从敌人手中夺回国旗而被扣入监狱的黎子颖、何平谷、郝智根三人，则报请总委会批准各记大功一次，以表彰他们机智勇敢的爱国主义精神。

40 年过去了，长眠济州岛的范杰同志，我们 6000 战友还在想着你啊！安息吧，兄弟！  
(郝智根)

#### 活捉美军少校布朗

1952 年 10 月 1 日，济州岛第八战俘营升旗斗争死伤 165 名中国战俘的流血事件发生以后，世界舆论对美方如此惨无人道屠杀大批中国战俘的血腥罪行，进行了强烈的谴责。美方赖以推卸责任的借口是所谓“战俘暴动”，但又找不出更多证据为其辩护，美军管理当局一时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10 月 30 日，第八战俘营美军管理军官布朗少校将四号营场战俘代表牟乃荣叫至办公室，采取欺骗的手段使其在一份事先打印好的文件上签字。牟乃荣缺

乏斗争经验，根本不了解文件内容，就冒失地在上面签了字。`回营后，他向四号营场的领导汇报了此事。我作为四号营场分委书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主持召开了分委会进行研究。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牟乃荣所签文件内容很可能与“十·一”血案的责任有关，决不能让敌人利用牟的签字抓到把柄，进行宣传。于是，决定要尽最大努力收回签字文件销毁。但只可智取，不能动武。采取什么办法呢？在会上大家反复研究，想出一个方法：利用布朗少校对牟乃荣的“好感”，将其诱至营场内扣留起来，然后要回文件，释放人质。

根据分委研究的结果，牟乃荣于第二天到战俘营管理军官办公室找到布朗少校，绝口不谈签字的事，只是请他到四号营场视察战俘营的生活。布朗表示愿意去四号营场看看，分委立即作了布置，动员大家打扫清洁卫生，做出一副迎接布朗少校检查的样子。同时以纠察队为骨干，选派得力人员，准备到时捉拿布朗。

11月2日上午9时，布朗少校乘一辆吉普车高高兴兴来到四号营场门口，同车来的还有一个少尉军官。二人一前一后，昂首阔步走进四号营场。在门前迎接布朗少校的是牟乃荣和翻译方向前，他们老远就笑嘻嘻地向布朗打招呼，使其不备。营内战俘和平时一样照常活动，毫无要出事的迹象。布朗放心大胆地跨入营场大门，趁少尉还未跟上之际，营场里守门的纠察队员，突然把门关上。旁边散步的几个纠察队员一拥上前捉住布朗就往帐篷里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布朗吓坏了，他大声叫道：“What's matter?(你们要干什么?)”方向前告诉他：“我们有重要事情与你谈判，一旦谈判结束就放你回去。”布朗只得灰溜溜地跟我们进入帐篷。谈判尚未开始，那位少尉即带来一个连的兵力停在四号营场外面，一副要动武的样子。我立即对布朗说：“我们保证你的安全，但你得先下令叫你的部队撤退。”布朗少校乖乖地站在帐篷门口大声叫营外军队退回去。然后进来一个中尉和布朗为一方，与战俘一方进行了谈判。四号营场的首席代表赵璧直截了当地要布朗少校交

出诱骗牟乃荣签字的文件，他开始抵赖不承认有此事，在牟乃荣对质面前只好承认有此事，但又说文件不在身边。总之，他故意拖延时间。四号营场的同志考虑此事宜速战速决，时间长了不利。于是赵璧便对布朗严肃地说：“你应该赶快交出这份文件，时间长了，我们不能保证营场内愤怒的战俘不对你采取行动！”布朗听了，脸色都变了，连声说道：“OK！OK！”随即令同来的美军中尉军官回办公室去取回原件及影印件。四号营场的同志收到文件，验证无误后，释放了布朗，时间是在当天下午一时，整整4个小时，斗争胜利结束。

这期间，四号营场通过“土电台”向“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报告了这一情况，总委立即下令各分号营场，特别是邻近四号营场的三号、五号及九号等营场支援四号的斗争。他们集合整队，面向四号营场高呼口号、唱歌喊话，客观上形成了对敌人的强大攻势，有力地支援了四号营场的斗争。

布朗被释放后不久，即被撤销了职务，调离战俘营。

我们内部也作了深刻的检讨。从交回的文件得知，上面正是写的“十一血案”系由中国战俘暴动引起，应由战俘自己负责的内容。我们在全营场大会上销毁了这份文件及影印件，并宣布撤销牟乃荣的代表身份，同时给予警告处分，教育大家引以为戒。

（张合顺）

### 我们有一支“柯尔特”手枪

夜幕降临了，北风卷着雪花，簌簌地打在行人的脸上，像刀割一样疼。一队全副武装的美军押着我们这一群衣着单薄的战俘朝海滨走去。我们尽管长期处在饥寒交迫之中，但在坚定的信念，不屈的意志的支持下依然精神抖擞，昂首挺胸哼唱着“向前、向前、向前”的战歌，忘却了寒冷，更没把鬼子兵看在眼里。

海港上遍布岗哨，探照灯来回不停地照射着，整个海港一片通明。在轮船的甲板上、船舱里和军需物资的堆垛旁，我们不停



地背呀、扛呀、抬呀……个个累得疲惫不堪。而美军小头目还在一旁“巴里巴里”（朝语、快的意思）地吼叫着。这时可气恼了几个年轻人，互相传递眼色，想再来次怠工斗争。其中有个名叫王希文，他身材魁梧，行动敏捷，目光炯炯，他把脚一跺说：“龟儿子不叫休息，老子不干了！”转身溜到一边打算找个地方打个盹。没走几步忽然听得从岸上传来一阵洋腔怪调的歌声，待那歌声近了，便见一个美军小官儿蹒跚地走上船来。王希文忙转过身去装作干活的样子。不一会儿，一股刺鼻的烟酒臭味由身后冲来，他知道这个美国军官准是逛过了妓院，喝醉了酒，回船来睡觉。不觉有些恶心，狠狠地吐了口唾沫，骂道：“呸！该死的东西！”他下意识地向着那人的背影望了一眼，这一望不要紧，那人手腕上甩摆着的一件东西差点叫他失声地喊叫出来：“啊，枪！”。

此刻王希文想起“要自己解放自己，要搞武器做好暴动准备”的秘密指示，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激动。他紧紧地盯住那支枪，看准了美军军官的去向，尾随过去躲在了一个隐蔽的地方，仔细地观察着：见美军军官进了一个房间，虚掩了门……不一会就听里面响起了呼噜声。这是多好的机会！王希文便蹑手蹑脚地靠近了房间，顺门缝往里一看，见美军军官和衣躺在床上像死猪一样睡着了，枪就放在他的枕边。王希文本想立刻推门进去，一细想——且慢，别莽撞！王希文回来，找到我和另一个难友悄悄地计谋起来……

夜深了，值班哨兵困乏得打起了呵欠。做工的战俘们此刻反倒精神起来，有的还故意围着监工的鬼子兵问这问那，兜圈子。王希文和我们决定动手偷枪。他特意找到了一件得手的铁器顺原路赶回了那个房间门口，试着轻轻地推了一下门，缩回来……再推一下，门开了。那醉鬼依然鼾声如雷地沉睡着。王希文一手紧握“武器”，屏住呼吸，警惕地望着歪向一边的睡脸，猫着腰一步一步地向着目标逼近……他轻轻地伸出手一下子抓住枪，轻轻地拿了过来。然后谨慎地倒退几步，转身出了房间，急忙走到隐身的

安全地点，紧张到了极点的心才稍放松了些。他急不可待地察看着来之不易的战利品，啊，多好的枪！一支乌亮的柯尔特。然而他又有些犯难了：怎么带回去呢？

王希文急中生智，瞬间就抓住了一个最保险的方案——他立刻动手用绳子把那冰凉的铁家伙吊在裤带上，紧紧地夹在胯下，然后又把子弹分给我们妥善保管。

夜深了，战俘们拖着疲倦的双腿返回了营地，大门口已经不远了，眼看就要被敌兵搜身检查了，这可是个要命的紧急关头啊！王希文，依然镇定自若，从容走在队伍中间。此刻他两腿内侧已磨破了皮，流出了血，火辣辣地疼痛，该是多么难以忍受啊！这时风雪交加，人人冻得发抖，敌兵也觉冷得难忍，似乎有些厌倦，但是检查手续照样一个不漏。轮到王希文了，他咬紧牙关坚持着，稳步走向前去，美军士兵熟练地在他身上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摸了个遍，就是没摸到胯下，多侥幸啊！他一进大门就长吁一口气，暗暗地庆幸：“可过了这一关！”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可是，事情并未了结。天明时，船上那位美军军官醒来一看枪没了，便立刻想到，八成是那些战俘干的。于是，一队凶狠的美国兵持枪冲进了一号营场，将全部战俘赶到了空场上，围成一团，不由分说，又是刺刀捅，又是枪托击，肆意发泄兽性。又在营内遍地挖坑翻土，竟是一无所获，这才悻悻而去。

当晚，“分委”向王希文传达了“总委”给他记大功一次的嘉奖令。战友们无不称他为战俘营里的孤胆英雄！只是由于和谈成功不必再举行武装暴动，这支枪才没有派上用场，而被深埋在济州岛上关押过中国战俘的营地里了。（李 焯）

### 给美军哨兵开“安全证”

济州岛战俘营的美军管理当局对待他们的士兵也是严格控制的。敌人内部有规定：不准与被俘人员讲话、接触，更不能传送新闻、报纸和文具用品等，违者严惩。但是很多美国士兵远涉重

洋来朝鲜，遇上这样的战争都十分懊悔、苦恼，内心十分思家，厌战、空虚、惶恐……

1953年3月至7月，我方被俘人员40多人关押在济州岛第八战俘营的飞机窝小监狱时，搞敌工的同志为了开展工作，经常与铁丝网外美国士兵的流动岗哨对话。开始问问他们的家庭和生活情况；以后给他们讲明这场战争的性质。对他们说：“你们不远万里到朝鲜来扶持一个傀儡，侵略别国领土是非正义的。我们物质条件差，但是士气高，你们虽然装备优良，但未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战场上还是失败多，胜利始终属于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经过耐心工作，有的士兵躲过他们的军官或其他哨兵，为我们偷送美国出版的报纸。通过翻译，了解了前线形势与和谈进展等等，对我们的斗争很有好处。时间长了，竟增加了相互信任。有一天，一位美军哨兵对翻译张济良说：“看来这场战争结束不了，我可能还要上前线，请求你们给开张‘安全证’。”他想，若是在紧急关头遇上志愿军或朝鲜人民军只要交出“安全证”，就可以保住生命。在笔无一支纸没一张的监狱里，用什么给这些士兵制作“安全证”呢？经过黎子颖、童克勤请示关押在一起的地下党领导王芳、杜岗、魏林。他们研究后决定叫我用木片削尖烧出炭黑当笔，用香烟纸背面，给这个士兵书写了“安全证”，并堂堂正正签上“八路”的大名。美军士兵接到后很感激，高兴地悄悄珍藏在内衣里待用。

安全证原文如下：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友

朝鲜人民军友军

美国士兵，自愿投降，请照顾生命安全。

济州岛八路

1953年4月8日

事后，总委会向各营场发出指示，推广这一敌工工作经验，各营场都向敌哨兵展开了类似活动，在交换回国前这段时间，我们共向敌哨兵发出300多个“安全证”和红五星帽徽。（张辉宗）

## 震惊世界的活捉杜德将军事件

### 探照灯下阴森森的蓝光

1952年5月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那一天在南朝鲜巨济岛的战俘营里发生了美军总管杜德将军被战俘活捉扣为人质的事件。而我，做为坚持回国的中国战俘对敌总翻译和总代表之一，有幸亲身经历了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的全过程。

那天黄昏，美军司令部的詹姆斯少校坐着敞篷吉普车来到“602”中国战俘营，要我和孙振冠立即跟他坐车走。对我提的“到哪里去？去干什么？”等问题，他急躁地回答说：“杜德将军召集各战俘营的代表开会，我只奉命将中国战俘营的代表和联队长送去。”那时，对外，老孙是我们“602联队”的总代表，我是联队长，而在我们的内部组织“602回国支队”中，老孙是支队长，我是总翻译。

我和老孙听了詹姆斯的简单回答又惊又喜，看来事态正在按照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党员行动总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劳动党地下党”）的安排发展。我们急忙回到支队部帐篷，拿上“抗议书”、“备忘录”等必要文件上了车。我幸好没忘了随身带上我的“武器”，那本已用破了的《英日字典》。临出营门时，牛元福战友还闻

讯匆忙赶来送给我一枚珍贵的军功纪念章佩在胸前以壮行色。

车子急速地沿着山谷里的公路急驰，海风猛烈吹着低低的乌云追赶着我们，沿途两旁一个又一个集中营内人声沸腾。在暮色中，只见朝鲜人民军战友们排在铁丝网后面，臂挽着臂，有节奏地摆动着身体，高唱着人民军战歌，见我们向他们挥动八角红军帽致意，他们也雀跃着挥手欢呼。看来他们都已经知道岛上发生了重大事件。

快到 76 集中营时，车子慢了下来。公路两侧排满了坦克、装甲车、宪兵和海军陆战队士兵，都是持枪在手，好像准备随时投入战斗。

我们的车子就在两排整齐的刺刀丛中缓缓前进。我忽然感到老孙和我是作为胜利者，代表中国人在检阅特殊的“仪仗队”，不禁下意识地整了整衣帽，更加抖擞起精神。

到了离“76”大门不远的地方，只见几个大探照灯的光柱从对面山坡上集中射向大门内外，照耀得如同白昼。大门边广场上更是黑压压地挤满了各种战车和部队。枪口、炮口都直指铁丝网内。长长的坦克炮筒和无数蠕动着的头盔，在探照灯下发出阴森森的蓝光。一群群戴着防毒面具的士兵在暗中如鬼影般狰狞。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大门之上挂着一个长达十余米，宽两米多的巨幅白色横标，上面用黑色的英文大字写着：“你们胆敢开枪，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那结尾上好大的一个惊叹号！

车子开到了“76”的大门口。下了车，我才看清大门内张灯结彩。上百名穿着自己改制的人民军军装的朝鲜战友们组成两道人墙，正排队欢迎代表们的到来。他们人人手执纸做的朝中国旗和彩纸带。当我们无比兴奋地进入大门后，战友们用不熟练的中国话齐声高呼：“朝鲜—中国！”“金日成—毛泽东！”“热烈欢迎中国战友！”无数五彩纸花、纸带纷纷洒落在我们身上！落在我们流着激动热泪的脸上。我们也禁不住用朝语高喊：“向英雄的朝鲜战友致敬！”“团结战斗！”“打倒美帝！”谁也不管就在我们背后有

无数子弹上膛的枪口！

我们被热情地簇拥着到了专为代表们预备的帐篷内，见到了各朝鲜战俘营的代表和女战俘代表。大家互相热烈握手、拥抱，抢着用朝语、汉语、英语混在一起的“国际语言”互相表达胜利的喜悦和兄弟情谊！“76”的战友们向我们详述了几个钟头前活捉杜德将军的精彩场面。我们一面听他们的讲述，一面想象着当时的情景，深深地被朝鲜战友们的英雄行为所感动！

### 抬粪桶的战俘捉住了杜德将军

5月7日当天，已经是“76”的战友们为坚持要求杜德将军亲自前来谈判而举行示威游行的第三天了。下午一点半钟，杜德终于在一个排的全副武装警卫下，由“76”的美军总管雷边中校和一名副官陪同坐着防弹装甲车来到“76”的大门口，然后隔着紧闭的大门和战俘营代表谈判。杜德两旁的警卫人员则抵近大门，端着冲锋枪做出随时可以开枪射击的阵式。“76”的代表当即指出：“在这种气氛中根本不可能进行谈判！我们不理解堂堂的美国将军为什么害怕手无寸铁的战俘！”杜德左右看看士兵，又朝营内观察了一下，就挥手让士兵们把枪收起靠后站立。仅让他那位手持《日内瓦公约》的随从副官站在身边。于是，代表们严肃地提出了美方战俘管理当局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种种罪行，要求杜德认罪。杜德开始还假装认真地叫副官查阅有关的条文，逐条狡辩。激烈争论的时间长了，杜德不耐烦了。他让副官代他回答，而他自己则掏出指甲刀来修剪指甲，偶尔摇摇头，一副“被委屈”的样子。卫兵们也开始松懈起来，散乱地站在后面交头接耳。

就在这时，一队抬着粪桶的战俘来到大门口等着出门前往海边倒粪。大门打开了，杜德和雷边只得捂着鼻子退到旁边等着清洁队的战俘们离去。当最后一对抬粪桶的战俘刚出大门，突然门内几个身强力壮的敢死队员一下涌出大门包围住杜德和雷边，并全力将他们往大门里推。雷边中校死死抓住门柱回头呼喊卫兵，而

反应迟顿的杜德将军已被抓进营门。在门旁的战俘代表和翻译立即用铁杠插上大门。

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站在门外的警卫竟完全吓呆了。等他们清醒过来持枪冲向大门时，只看见四名战俘抓着杜德，广场上已空无一人了！肥胖的杜德将军极力挣扎着，扭回头断断续续地呼喊：“Save me! Save me!（救救我）”但他哪里挣得脱抓紧了他四肢并抬离地面的四个壮士的铁臂。勇士们就这样将杜德将军飞速地抬走了。

与此同时，在大门上空，立即竖起了巨幅横标：“我们生俘了杜德准将，待我们和他谈判结束，就安全地交还你们。如果你们胆敢开枪，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

门外的美军官兵慌乱已极。不久，警报声凄厉的吼叫起来，坦克、装甲车、宪兵、步兵、海军陆战队全开来了，层层包围了“76”，直升机也飞到“76”上空，盘旋低飞。

但这时由杜德将军签署的命令，由代表送了出来：“我命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确保我的安全，绝对禁止开枪。我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即令怀特上校将代表们接来，并将部队适当撤离76战俘营。”随即杜德又传令将电话接入“76”，由他直接指挥，接着又运来了杜德所需的食物和生活用品，以及召开战俘代表大会所需用品。

“我们总算尽可能地为这位‘特级战俘’，这位‘战俘的战俘’做了妥善的安置！”“76”的代表这样结束了他的介绍。

我们忍不住和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真是开心啊！被俘后一年来还未曾这么笑过呢！

“我在这里生活得像中国的皇帝一样！”

在营内中心广场上专门支起了一座崭新的帐篷，四周站着我们的纠察队员，以保护他的安全。战友们撩起门帘，让我们先进去。嗨！布置得真周到，地上铺了军用毛毯，墙上也挂了军毯来

保温。岛上五月初的天气还有些凉哩！何况杜德将军目前的心情恐怕比天气更凄凉。靠里面又用白布隔出了一个盥洗间和便所，帐篷里还摆上了办公桌椅、行军床。靠床头的桌子上，还有一束插在罐头筒里的野花！在集中营里看见这种陈设真是十分新鲜。这座“将军别墅”比起我们住的囚室确有天壤之别！难怪第二天，当刚被派来接任杜德职务的美第一军参谋长柯尔逊准将，在电话里发愁地问杜德受到的待遇如何时，他竟得意的回答：“您不用担心，我在这里生活得像中国的皇帝一样！”

却说我们进去之时，杜德将军正双臂叠在脑后仰卧在行军床上，大块头的身躯深深陷在帆布里，将军服上衣的钮扣都扯掉了，金色的将军军阶肩章也只剩下几根线从肩旁搭拉下来，显见他在被抓获时曾有过一番激烈的撕挣。杜德这副样子实在有损将军仪容，远不像他昨天在“602”门口跟我们谈判，要我们停止绝食时那么威风了。他虽听见了动静，却仍装着闭目养神，直到我们走到床前也一动不动。

我们互相看了看，老孙朝我向杜德摆了摆手，我会意地笑了笑，便用英语向杜德客气地喊了声：

“喂！将军阁下，我们来看看您。”

“啊！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杜德睁开眼，像是刚知道我们进来的样子，急忙坐起来。说着，有些艰难地把腿移下床，要站起来。

“啊，还是请坐着吧！我们是中国战俘代表，前两天我们见过面的。”

“前两天？是的，你们绝食那天我答应过要解决你们的一些合理要求。”

“现在，我们正等待着您的实际行动呢！我们不希望仍像以前那样，不仅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让您的部下又来向我们扔毒气弹甚至开枪！”

“那是，是我对部下管教不严。”



“但，您看我们的战士对您怎么样？”我指着室内的陈设说。

“是的，我确实看到了你们共产党人优待俘虏。”

“您懂得这点很简单哪！要是您的李奇微将军和杜勒斯国务卿也来体验一下就更好了！”

“是的，你们给我上了很好的一课！”

“您太客气了！好吧，咱们在代表大会上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吧。再见！”

“再见！”杜德站了起来。

我们强忍着，直到走出帐篷才捧腹大笑起来。一个朝鲜战友擦着泪水说：“美国的将军也不过如此，就像你们毛主席说的是纸做的老虎！”

### 从太空传来了祖国的声音

接着，“76”的代表领我们去会见巨济岛“朝鲜劳动党地下党”的总领导人朴相显。他是朝鲜被俘战友中级别最高的，战前曾任道委书记（相当中国的省委书记）。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走进了他住的帐篷。

满头银发的老朴从地铺上站了起来，目光慈祥地看着我俩，急忙走过来，亲切地拥抱了我们。同时用朝语说：“啊，中古东母、急文滚东母！”（中国同志、志愿军同志）然后，用手势请我们席地而坐。我们通过“76”代表和我互用英语转译成汉语或朝语的方式交谈着。他先询问了“602”全体中国战友们的生活和思想状况。然后说：“对于中国战友的英勇斗争我是很钦佩的。我还要当面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对中国战友们的斗争支持太少了！”

我们则对朝鲜战友给予我们的一贯支持和鼓舞表示深切的感谢！老孙说：“这次，在您的直接领导下，朝鲜战友完成了一举活捉杜德这件将载入人类战争史的伟大创举，给了美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给了全体朝中战友以巨大鼓舞！我们将努力学习朝鲜战友勇敢顽强的斗争精神！”

“啊！这次活捉杜德的胜利，你们的功劳也大大的！如果没有你们前几天的绝食斗争，迫使杜德亲自前去谈判，并让他感到只要亲自出面就能解决问题，他还不会到‘76’来呢！这次是我们全体朝中战友共同努力取得的斗争成果！而它又只是整个朝鲜战争中朝中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的一个小小侧面！”老朴同志笑着说，然后又对“76”的代表用朝语说了几句话。“76”的代表向我眨了下眼，低声说：“老朴同志要宴请你们呢！”说完出去吩咐了一下，立即有两位朝鲜战友端上来两盘热气腾腾的白面饺子，这确实使我们大吃一惊！老朴微笑着向我们摊开双手说：“请吧！请用餐吧！你们不要感谢我，要不是同志们抓住了杜德，美军送来了白面、肉罐头，我还不知用什么来招待我的尊贵的中国客人呢！”我们非常感动地吃下这顿终生难忘的美餐。

但更使我们终生难忘的是在饭后发生的事：朝鲜战友们领我们进入秘密的地下室，在一个土台上赫然摆着一台收音机！战友们说明这是他们节衣缩食，用罐头、衣物向李伪军偷偷换来的。老朴用双臂搭在老孙和我的肩膀上说：“亲爱的志愿军战友们，要不是活捉了杜德想请你们来也不可能哪。我们没有什么珍贵礼物送你们，就请你们听一听北京的广播吧！”

天哪！北京的广播！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有听到过祖国的声音了！我们急忙凑近收音机，只听见在飞越长空而来的电波的沙沙声中，突然响起了一个亲切之极的女播音员的声音：“……为了支援朝鲜前线，全国掀起了捐献热潮，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捐献了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多么遥远而又多么亲近的祖国的声音啊！在远隔大海的异国土地上，在敌人的囚牢里，想不到竟能听到祖国母亲的心跳！啊，亲爱的祖国！您是否知道被囚在海外的儿女多么强烈地思念您啊！我们任无声的泪水泉涌般洒在地下坑洞那冰冷的黄土上。

老孙被留下来参加代表团核心领导的预备会议，我走出坑洞

仍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

夜，已很深了，远方，海潮发出低沉的咆哮。在阴森森的锯齿形山脊的上空，透过一团团掠过的薄云，偶尔可以看到北极星在闪烁。我似乎看到祖国母亲正以她慈祥的眼睛，赞许地注视着这些远方的儿女。我不禁回忆起这次为配合朝鲜战友活捉杜德我们所做的一切……

### 中朝战友密切配合

“五一”节刚过，我们派去医院和“劳动党地下党”联系的同志，给总委会带回了重要的消息：为揭露敌人强迫扣留战俘的血腥罪行与破坏和谈的阴谋，“劳动党地下党”做出了决定：活捉敌酋杜德准将，迫使其公开向全世界承认美方在战俘营犯下的种种罪行。我们“602”的任务是立即开展游行示威和绝食斗争，坚持要求面见杜德谈判，解决改善战俘营的待遇问题，并在见到杜德后立即停止绝食给杜德造成一个印象：唯有他亲自出面战俘才会相信美方管理当局的诚意而停止斗争，以便朝鲜战友在杜德前去谈判时抓住他。

虽然我们的代表曾要求把活捉杜德的任务交给我们，但被人民军战友们婉言拒绝了。他们说：“这是一个十分艰巨危险的任务，你们人数较少，又刚集中在一起，力量较弱。更重要的是你们为朝鲜已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能让你们再冒这么大的危险。”

“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立即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传达了这个任务。大家听后非常激动，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并详细研究了行动计划。

1952年5月3日，我们递交了“要求美军当局改善战俘生活条件，要求直接与杜德将军谈判”的致杜德将军函。

5月4日，我们搞了一天游行示威。

5月5日，“602”开始全体绝食，面向公路的铁丝网上挂满了

战俘们的饭盒，运来的粮食、蔬菜被堆放在大门外。除了值班纠察队员和联队部工作人员外，整个战俘营见不到战俘活动。老孙和我多次请博托上尉与杜德将军联系，表示我们不见杜德将军决不停止绝食的决心。当天下午博托通知，杜德同意接见我们的代表前去司令部面谈，我们以代表们安全无保证为由，请杜德将军前来谈判。

5月6日上午，杜德准将带了他的中校副官和一个排的卫兵坐车来到“602”大门外，老孙和我被博托召集到联队部，说杜德将军决定亲自接见我们，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表示：请将军进入战俘营到联队部来谈判。博托说，同样出于安全的原因，请我们到大门口会谈。于是，这次别开生面的“谈判”就在“602”的大门口开始了。

我们站到大门内等着，博托前去将杜德将军接下车。我注意观察这位以前一直只是在书面上打交道的美国将军。他身材粗壮，脸色红润，那副玳瑁框的眼镜使他增添了些斯文。看来这位将军还十分注意外表，他戎装整齐，金色的肩章闪闪发光，很有点气派。跟在他后面手持文件夹和一本厚书的中校副官是个瘦高个儿，相形见绌。他们的卫兵见杜德下车，立即从车上跳下来，排成扇形，如临大敌地持枪卫护着他们的将军。见到这个架势，我和老孙相视而笑，想不到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战俘在铁丝网里竟然会对将军造成威胁！

当杜德和中校走到大门口时，老孙首先对杜德说：“欢迎将军阁下不辞辛劳前来我们602集中营！”听到我翻译之后，杜德微微点了下头说：“我一向是尊重中国人的。你们有何要求？请讲！”

“我们想请阁下亲自视察一下我们的严重营养不良状况和我们的伤病员缺医少药的痛苦处境。我们希望能得到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的、应给予我们的人道主义待遇，而贵国是曾在这个公约上签了字的。”

“我们一贯遵守日内瓦公约，凡公约上规定的，我们在运输

和人员条件紧张情况下，已尽了最大努力予以实现，我请我的副官将日内瓦公约有关规定给你们读一遍。”

于是，那位中校煞有介事地翻着手里那本日内瓦公约，找到有关条文，然后开始慢条斯里地朗读起来，而杜德这时掏出了指甲刀修饰着他那双肥厚多毛的手上的指甲。

我一面听，一面转译给老孙。刚一结束，老孙就说：“显然，我们目前受到的待遇远未达到公约的规定。比如：我们中国人根本不习惯吃大麦，而连大麦也供应不足，每天两个半碗饭所提供的热量，远远不够一个正常人的需要。蔬菜很少，质量极差，肉类更是罕见。如果贵国确有困难，希望通知我们国家！我们相信中国会立即协助你们改善我们这种半饥饿状态。”

杜德听了我翻译的最后几句，脸涨得更红了，不高兴地说：“对于你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异常的食量，我将予以考虑，尽快给予解决。既然你们总是感到饥饿，我认为你们更没有必要采取绝食行动，更增加你们的伙伴们的难受。在改善医疗条件方面，我也将尽快解决。”

“如果将军阁下能认真解决我们的最低要求，我们当然乐于立即恢复进食！”

杜德正色道：“我对自己的话完全负责！”

老孙看了我一眼说：“那么我们愿意相信阁下的诚意，并再次感谢阁下能亲自前来。”杜德满意地点点头，坐上汽车走了。

回想到这里，我更加敬佩朝鲜战友们的谋略和勇气，也为我们中国战俘在活捉杜德这场斗争中做出了贡献而高兴！

我独自回到为代表们准备的帐篷休息。凌晨老孙才回到帐篷，他似乎毫无睡意，兴奋地告诉我，要准备好揭发控诉美军管理当局的罪行。他简要谈了会上关于与杜德谈判的具体内容和如果敌人武力劫持杜德时如何处置杜德的争论。他说：“为了斗争胜利，我在会上根据毛主席的‘有利、有理、有节’的原则，建议在谈判时应强调‘甄别非法’这一条，以强调我们这次行动的合理性。

并建议在敌人动用武力进入‘76’时，应尽全力保存杜德。说明这样做对斗争更为有利，还举了‘西安事变’的例子。我的观点受到‘劳先生’的充分肯定和赞扬。”我听了十分高兴，这也是我们志愿军战俘在“杜德事件”中的有力配合。

### 女战俘的控诉

第一天上午，代表大会正式开始。

会场设在一个新支的帐篷里，布置简单而严肃。在长方形帐篷正中，拼在一起的五张方桌上铺着军毯，周围摆了两排长凳。对着门在大会主席位置上是一把椅子，主席位置后面的墙上并列着纸做的朝中国旗。

17个战俘营的43名代表坐在四周，老孙坐在主席旁，我挨着老孙，三位朝鲜女代表顺序挨着我们。主席正对面的位置是留给杜德的“被告席”。

大会选出了人民军的师团参谋长李学九为代表团团长，并一致推举志愿军的孙振冠教导员为副团长，接着讨论通过了大会议程。

杜德将军被叫了进来。他的步履有些艰难，低着头被领入会场。主席宣布大会第一项议程，要杜德将军听取代表们的控诉发言，并向杜德简要交待了政策：“我们允许你申辩，但要尊重事实。”

于是，各战俘营轮流发言。他们列举了大量确凿的事实，控诉美方怎样迫害、虐杀战俘以强迫战俘背叛自己祖国，并企图扣留大批人民军和义勇军战俘去充当李承晚的炮灰。特别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将战俘秘密运走，做化学战、细菌战和核子战的试验。

敌人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地被揭发出来，列举的事实都是有时间、地点，有真名实姓的。代表们愈揭发愈悲愤，声泪俱下！有的事实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他们遭受的苦难比我们更甚呵！当我听到女战俘代表控诉她们在被俘后遭受的蹂躏，甚至在汉城大街上强迫她们裸体游街时，心中的怒火痛灼着我，真想握紧拳头

向杜德那肥胖臃肿的脑袋上狠狠砸下去！

而杜德，这个曾经忠实执行了白宫罪恶政策的军人，在铁的事实前面惶恐地低着头，他大概是害怕我们充满仇恨的目光吧！我看见他搁在桌上的手不停地发抖。

好几次，朝鲜战友用拳头砸在桌子上质问他：“我们说的是不是事实？”他惊慌地站起来说：“有的我知道，有的确实不了解，但我愿尽力追查。”说完不敢坐下。

大会主席叫他坐下，并说：“我们是共产党人，并不想用你们对待俘虏的手段来对待你。我们尊重你的人格，决不给你任何人身侮辱。但，你也要尊重自己，作为美国的将军，应该是有勇气承认事实的。”

杜德显然有些感动，深深地点着头坐下了。

从上午到下午，控诉大会一直在极为悲愤的气氛中进行。会后，为了更有力地控诉敌人对中国战俘犯下的罪行，在我们要求下，老孙当晚回到“602”将我们的总委秘书黎子颖和朝语翻译柳一接来参加大会。我们连夜做了系统发言的准备，我把发言稿先译成了英文。那本战友们用军毯向卫兵换来的《英日字典》帮了我不少忙。

杜德嘶哑地说：“我有罪！”

5月9日，代表大会继续控诉发言。脸色有些发灰，眼睛大概由于失眠而发红的杜德被带进会场。大会主席请我代表中国战俘发言。

我站起来，扶着桌子，好久说不出话。我似乎又看见了死难烈士们的英雄形象！又听见了他们在英勇就义前的愤怒呐喊！我在内心呼唤着：“战友们，今天我是在替你们向敌人进行面对面的血泪控诉啊！”

我从敌人怎样阴险地在中国战俘营内利用叛徒特务来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谈起，全面系统地揭露了敌人的罪恶行径。

我揭露了美方战俘管理当局如何将王顺清、李大安等战场投敌的叛徒数十人送往日本东京接受特工训练，带他们逛妓院、下馆子以赏奖他们对祖国的背叛，又怎样将这些败类送回战俘营担任联队长、大队长、警备队长等俘虏官；发给他们匕首，棍棒成立起集中营里的警备队，充当镇压战俘的工具；唆使他们使用威胁、利诱等卑鄙手段发展反动组织，以对战俘实行特务控制。又采用罚跪、罚趴、罚饿、罚苦工、吊打、灌辣椒水，甚至将人裸体放在有碎玻璃片的汽油桶里来回滚动等酷刑，用以镇压战俘们的反抗。

我着重指出：尤为卑鄙、阴险的是，美方指使叛徒们用极其恶毒的政治陷害手段迫使战俘不敢回国，诸如强迫战俘检举党团员、干部；强迫党团员写退党退团声明；强迫战俘唱反动歌、喊反动口号；强迫战俘写要求去台湾的血书；直到强行在战俘身上刺下永远去不掉的反动字样等等，无所不用其极！我愤怒地控诉美军当局在强行“志愿甄别”时，又唆使叛徒们来一次大规模血腥镇压，让他们先搞一次假甄别，把一些敢于要求回国的战俘骗出来加以残酷折磨、杀害，造成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以致许多人在真正进行甄别时，不敢表达自己回国志愿。

我的控诉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但也仅是扼要的叙述，一年多来敌人对我们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啊！

当我谈到烈士们为坚持回归祖国而壮烈牺牲时，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和悲愤，忍不住大声向杜德怒斥道：“你，你这个沾满了战俘鲜血的刽子手，你知道自己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吗？你听听烈士们临死前的誓言：‘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你懂得什么叫做炎黄子孙的民族气节吗？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人的信仰吗？你以为镇压和屠杀就能改变我们的信念，就能屈从你们帝国主义的意志吗？妄想！完全是妄想！”

巨大的悲痛和愤怒使我抑止不住年轻人的泪水，我急速转过身去。会场的空气似乎凝固了。那位会英语的贞玉姬同志，双手



捂住脸，眼泪从她的指缝中流出。

杜德在我的整个控诉过程中一直低着头。这时，他撑着桌沿站起来，声音嘶哑地说：“我，我有责任，我，我有罪！”

没有人答理他，会场仍然笼罩着可怕的沉默。杜德有些胆怯地往两旁斜视一眼，又低下了头，等待着新的愤怒的爆发……

老孙站起来对他说：“我们清楚，你作为一个军人，要服从你的政府的命令。对于你犯下的罪行，我们并不认为你本人应负全部责任。但我们希望你能从中真正认识到你的政府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

老孙停顿了一下，平息了一下自己的愤怒又说：“我相信美国人民是反对你们这么干的。你们实际上是要在中美两国人民中间播下仇恨的种子。然而，我深信美国人民是要和中国人民友好相处的，我们希望你能做出一些事来弥补你的过错，并替你的政府挽回一些损失！”

当我将这些义正词严而又通情达理的话翻译给杜德听时，杜德不住地点头。

“感谢代表阁下的这一席话。我想，我将终生不忘这些宝贵的教诲。我愿尽力弥补我的过失。”杜德的声音带着颤抖，我感到老孙的话可能真正打动了她。

下午，代表大会起草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控诉书》和《美方战俘管理当局保证书》。前一个文件列出了他们执行美国政府的战俘政策所犯下的各种罪行，后一个文件写下了应由杜德签字的、美方不再继续这些罪行的保证。

同时大会经过研究，提出了释放杜德的 4 项条件，准备第二天一早送交新任总管柯尔逊准将。4 项条件的内容是：美方停止对战俘的一切暴行、停止搞“自愿遣返”、停止搞非法“甄别”、承认战俘代表团的合法性并予以合作。

当晚，代表团长和老孙还单独跟杜德进行了谈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动员他解除顾虑，能在《保证书》上签字。

三天来，为了配合战俘代表团的谈判斗争，包括中国战俘营在内的各战俘集中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杜德认罪，要求美军管理当局保证代表大会顺利进行。

全体代表默默地看着他

5月10日，一大早我们就给柯尔逊送出了《朝中战俘代表团关于释放杜德将军的四项条件》的公函，等待他的答复。同时举行了《保证书》的签字仪式。

这天，会场内的气氛平静、肃穆。会场外广场上，7000名“76”的战友们整齐地静坐在野草丛生的砾石地上，等待着大会的结果。

大会正要开始，设在会场里的电话忽然尖锐地响起铃声。主席老李拿起电话，我从离得很近的话筒里听到了是要求和杜德通话的声音：

“喂，我是柯尔逊准将，请杜德将军接电话。”

老李示意杜德过来，将话筒递给了他。

“我是杜德，请您指示！”

“啊，杜德将军，您好！我是柯尔逊。”

“您好！柯尔逊将军。”

“您的夫人从东京来了，她要我问候您，她老是啼哭！”

“请转告她：我很好，不必惦念！”

“将军，请告诉我，他们真的没有伤害您，侮辱您？我十分担心！”话筒里的声音有些压低。

“请相信我说的是实话。”杜德看了一眼老李接着说：“我自己原来也不相信他们会尊重我的人格，但现在，事实使我不能不相信这一点！”

“啊，这就好了，上帝保佑您！尽管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还打算扣留您多久？我还应该做些什么事帮助您？”

“我不知道，我想代表大会结束后大概会释放我吧。您唯一

能帮助我的就是让代表大会顺利结束，不要强求他们。”

“唔，好吧！我将一直不离开电话，我准备随时为您效劳。”

“感谢您的关怀！我想我们不久就能见面了。”

“那是我最大的愿望了。好，再见，将军！”

“再见，将军！”

从杜德的答话和口气看来，昨晚代表团长和老孙对杜德的思想工作还是有成效的。我们预感到今天的签字仪式将是比较顺利的，但我们仍然做了还会有一番激烈斗争的思想准备。

我们请杜德听取了《美方战俘管理当局保证书》的内容，并说明允许他提出不同意见。

杜德请求阅读文件全文。仔细读完后，他对某些用词提出了一些异议，认为那种提法有损他的国家的尊严，希望我们考虑修改。代表团长们交换了一下看法，决定尊重他的意见，尽可能做了一些非原则让步。最后他听完了修改稿，点头表示同意。我们便重新誊清了这份后来震惊了全世界的文件，放在他面前请他签字。

杜德将军换上花镜，抽出钢笔，再次仔细阅读文件。读到某些地方，他停了下来，眼睛离开文件，长久思索着。看得出来，他尽管有所准备，然而，思想斗争仍然十分剧烈。他当然很清楚在这样的文件上签字，对他的政府将带来多么难堪的后果，更清楚对他个人的前途命运意味着什么！但是，几天来他听到的、见到的一切，一定也在他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当然他也会权衡拒绝签字的得失。

最后他直起腰来，靠着椅背向前凝视着，又取下眼镜擦着镜片深思着。全体代表都默默地看着他。屋里可以听见杜德粗重的呼吸声，帐篷外面围坐着的 7000 战友也是鸦雀无声，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啊！

终于，杜德将军重新戴上眼镜，把钢笔移向文件签名的位置，停了停，便迅速而熟练地签署了他的全名。然后放下钢笔，如释

重负地往后一靠，闭上了眼睛。我看见他额上沁出了细微的汗珠。

这时，全体代表站起来，鼓掌祝贺代表大会的胜利结束。杜德也站了起来，轻轻地击了一击掌。

正副代表团长和代表们依次走向杜德与他握手。我走到他跟前时，发现他的眼睛是润湿的，我忽然觉得在他脸上新增加的皱纹里隐藏着某种人类共有的东西，不由得紧握他的手摇了摇。我希望他能懂得共产党人的风格和中国人民的心地！希望他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能够有一天为美中两国重归于好做出贡献！杜德似乎理解了我的心情，也握紧了我的手！

紧接着，帐篷外面传来了惊天动地的欢呼声。这欢呼在各个集中营依次传了下去，像春雷一样由近及远滚过荒凉的巨济岛，冲向大海，冲往北方！

当天下午，代表大会在“76”召开了盛大的祝捷会。代表团长讲了这次代表大会的经历和取得的胜利。

老孙代表我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感谢“76”的朝鲜战友们为这一巨大胜利做出的贡献，表示要学习朝鲜战友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他最后说：“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你们的历史功绩！”

在热烈掌声中，我被邀请去唱了一支刚向朝鲜姐妹学会的《朝鲜游击队战歌》，又加唱了《志愿军战歌》。朝鲜三位女代表合唱了《春之歌》，还跳了舞。“76”的同志们表演了活报剧《活捉杜德》等。

观众除了“76”全体战友，还有仅隔一条小马路的“77”的战友，共万余人。连在马路上巡逻的美国宪兵与站岗的南朝鲜军士也津津有味地看了演出。

### 将军离开巨济岛

5月10日中午，我们收到由柯尔逊将军签了名的回函，信上基本同意了大会关于释放杜德的4项要求，并要求立即释放杜德。

当天下午，美方宣布，由波特纳准将接替柯尔逊为巨济岛战俘营总管，由他代替柯尔逊和我们就释放杜德进行最后谈判。

由于我们的斗争已取得胜利，我们和波特纳的谈判较顺利地达成了协议。我方立即释放杜德将军，而美方则尽快将代表们送回各集中营，并保证决不进行任何报复。波特纳在协议上郑重地签字后，我们全体代表愉快地一起欢送杜德将军到达那个曾经在三天前使他胆颤心惊的大门口，并请波特纳在下面的收条上签了字：

今收到由朝中战俘代表大会送还的一名美国将军——杜德准将。经检查杜德将军阁下确实毫无任何受侮辱与受损害的迹象。特此证明！

美军巨济岛司令官

R·波特纳(签字)

1952年5月10日

然后，我们与杜德将军握手道别，送他出了营门。当波特纳扶着他坐上小轿车，车子开动后，他还不无激动地再次挥手告别，离开了他终生难忘的巨济岛第“76”战俘营。

至此，活捉杜德事件告一段落。然而，却远未结束。

首先是美方对活捉了杜德的“76”战俘营进行了残酷的报复。一个月后以重兵血洗“76”，整个“76”变成一片火海，人民军的勇士们以原始的土制梭标，棍棒、燃烧瓶，以血肉之躯相对抗，死伤无数！这是美方在巨济岛最残忍的一次大屠杀！

其次是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我们全体18名正式代表监禁于巨济岛“最高监狱”进行残酷折磨，后又判以“战犯”罪，长期监禁在巨济岛“战犯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遣返回国。

岁月匆匆，风云变幻，然而朝中战俘在“杜德事件”中突出表现的对自己祖国的忠诚与勇气，却将长留在世人心中！

(张泽石)

## 军帽下露出了金发

1951年5月底，在朝鲜战争五次战役第二阶段，18岁的我在随部队突围时，不幸负重伤后被俘。炮弹片从我的大腿根前侧进入臀部，股骨粉碎性骨折。

当我被送往釜山伤病战俘收容所时，伤口已化脓溃烂生蛆，加上身陷囹圄，前途未卜，身心都极为痛苦。幸好，我所在的第三收容所里，一些被俘的人民军医务人员尽力看护我，一些伤势比我轻的志愿军难友也常来安慰、鼓励我，我的心情逐渐平稳下来。不久，我被抬到第一收容所去开刀。给我开刀的是位大个子美军军医，态度冷漠，动作生硬，我很担心他们是在我身上做试验或练手艺。我已亲眼见过有的难友在动手术后，轻伤变重，重伤变残。有一个人民军难友腿上轻伤，却被几个实习医生拉了7刀，生生把一条腿卸了下来而终生残废。当我开了两次刀伤腿仍一点不能动弹时，我就更怀疑他们的用心了。

第三次抬我进入手术室后，我一看仍然是那位大个子军医，心想：与其让他们做试验还不如死了好，便大吵大闹地拒绝上手术台。屋里几个美军医务人员互相嘀咕了几句，一个护

士便走出去带回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军医进来。当这位军医轻轻地走到我的担架前朝我俯下身来时，我才吃惊地看出那是一位身材窈窕的年轻女子，她戴着有中尉军阶徽标的帽子，帽下露出剪短了的金发。一双蓝色眸子和善地看着我，我一时难于把她和这个充满血腥味、药水味的战俘营环境协调起来，不禁安静下来。而更使我吃惊的是她竟用相当熟练、带点上海口音的标准汉语对我说：“让我先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好么？”我真怀疑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一时反应不过来，只呆呆地看着她。她对我吃惊的样子感到满意，有些自豪地笑了笑，又重复问我一次。这下我不再怀疑了，祖国的语言一下就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我向她点了点头，顺从地让她检查。由于伤口离我的生殖器官太近，我难为情地完全闭上了眼，但我感到了她检查伤口时的触摸是那么轻柔，我的疼痛似乎一下就减轻了许多。

她仔细检查完毕站起来对我说：“你的伤口很深，又已经化脓，得先去掉腐肉，消了炎以后才能进一步清碎骨，取弹片，约翰少尉前两次手术是成功的，今天可以开刀清除弹片和碎骨了！”我感动地说：“谢谢你，但我、我有些害怕呀……”说着我看了看站在她身旁的那位不苟言笑的约翰少尉。她理解了我的目光，便转过头去用英语和约翰军医交谈了几句，回过头对我笑了笑说：“今天，我来开刀行吧！”见我高兴地点头同意，她就指挥护士把我抬上手术台，施行全麻后，我便失去了知觉。等我醒来，首先看见的仍是那双友善的蓝色眼睛和她额上晶莹的汗珠，她用镊子从手术盘里夹出一块带血的、比拇指还大的弹片给我看，轻声地说：“就是它把你的股骨击碎了！现在它和碎骨已清除干净。但你要想站起来，还得对股骨做一次修复手术，你先回去养伤吧！”我不知怎么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我不好意思地扭过脸去。又听她说：“你不用担心，我一定能使你站起来！”说完，还拍了拍我的肩头！等我转过脸来只看到她那穿着白大褂的秀气的背影。

这次手术后，我的伤痛大为减轻。大约过了 10 天，我正躺在

帆布床上辗转反侧思念祖国和我的亲人时，她和约翰军医一起来到我的床前，看我要起身，她说：“躺着吧！我们来检查一下你的伤口。”检查完，她说：“你的伤口恢复得相当快！明天可以做修复手术了。”说完愉快地和我告别。这增强了我的信心：“我也许真能站起来！”

第二天，我被送去手术室，她和约翰一起为我动手术。她俯身对我说：“你很想不用拐棍行走吧？”见我使劲地点头，她说：“放心吧！动完这次手术，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我感到鼻子一酸，赶快闭上了眼。幸好他们立即给我翻过身来，戴上吸气罩开始麻醉。等我醒来环顾病房，只见她正靠着墙歇气，雪白的罩衣上有不少血迹。见我看她，她给了我一个充满倦容的微笑，让我放下心来。

### 她鼓励我迈出第一步

这以后，每隔两三天，她就来看我刀口恢复的情况。那天，给我拆了线，她扶我下地说：“试一试能站稳么？”我摇晃着，颤抖着，两手紧抓床沿，不敢离床。她转到我前面说：“能自己站着了，真不错，再往前迈一步。”我鼓了几次勇气都挪不动腿。“啊，勇敢点，跨步，别忘了你是军人！”她不断鼓励我，我真不愿使她失望，终于咬紧牙关，迈出了第一步。但躺了4个多月的身体不听使唤，一下往前倾过去，她立即用双手撑住我的两肩，说：“来，再试一次，别怕！”她的脸离我那么近，我脸红了，便直起腰来，使劲跨出了我的伤腿，竟奇迹般地站稳了！“好，再往前走两步！”于是，在她的鼓励下我终于重新站了起来，迈出了我生命中又一次勇往直前的步伐！她拍着手天真地笑了。如果不是那身美军军装，我真不相信她是个军人，而且是敌人营垒里的军人。等我满头大汗地再次走回床边，她扶我慢慢坐下来，自己也坐在床边，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余光协”（这是我表弟的名字，我被俘后不愿用真名，又怕随便用个假名，自己不习惯露了馅！）



她听后，说“好怪的名字，你写给我看看是哪几个字？”便抽出圆珠笔和一张空白处方笺递给我。我因自小随家父学习书法，便很有气势地写下了那三个字，她拿着端详了一下说：“你的书法真不错，能够教给我吗？”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只说：“你的汉语说得那么好，写汉字肯定也错不了。”

“不，你没猜对。我虽然在中国长大，又是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却一直写不好汉字。小时候没机会练汉字，上大学记笔记又只求快，便顾不上书法了。”

听了她的话，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她的中国话说得那么好，对中国战俘又那么好。

“我可以冒昧地向你提一个问题吗？”我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

“问吧。”她神情坦然地望着我。

“你怎么会变为美国军医呢？”

“去年我大学毕业后，回美国去看望我的生母，在返回中国路过日本时，正逢朝鲜战争爆发，部队需要军医，我便被美军远东司令部留下来参了军，又随军来到朝鲜。”

“你不恨我们中国出兵跟你们美国作战吗？”

“我参军时，根本没想到中国会参战，后来中国人来了，我也恨不起来，中国是我的第二故乡呢。”她想了想又说：“我心里一直有个问题：你们没有飞机和坦克，能打胜这场战争吗？”

“我相信最终胜利将属于我们，因为决定战争胜负最终是人而不是武器，武器是由人来掌握的。你看，我们志愿军出兵后，才几个月就打过了三八线。”

她偏着头，深思地望着我，然后点头表示同意。这时一些难友也围过来想听我们的谈话，我便换了话题说：“我怎么教你写汉字呢？”

“明天我带纸笔来，你给我写几张习字帖，我带回去照着练习，这下业余时间我有事干了。”见我点头表示同意，她高兴地走了，我暗下决心，要教好她书法来回报她。

## 我教她写唐诗

第二天，她果然带来一大叠白纸和一支漂亮的自来水笔，最上面那张纸上写了“葛琪”两个大字，字迹很呆板并太向右倾斜，显然是受了英语草书的影响。她说：“这就是我的汉语名字。我的字也就这样了，你先教我写好自已的名字吧。”我告诉她从一笔一划开始学才练得好字，又耐心地给她示范如何写横竖撇捺点勾等等。她学了学怎么也写不好，就要我握着她手教。这时，围上来的难友们更多了，我便半天也没伸出手去，她奇怪地看我一眼说：“你们这代中国人还讲男女授受不亲吗？”这次，我真的脸红了，便鼓起勇气把着她的手练了一气，直到她掌握要领为止。最后，她请我写张字帖带回去练，我想了一下，便在纸上写了首唐诗：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她从头到尾默念了一遍说：“这首诗，我中学时读过，但今天才真正懂得它的含义，这是一首好诗。”

她抬起头来对周围的难友说：“你们好好养伤吧！等板门店和谈成功了，你们好健康地回去见你们的亲人。”在场的难友们无不为之动容，有的竟唏嘘起来。她环视了一下这群断臂缺腿的伤员，语气沉重地说：“我真希望这是中美两国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最好也是全人类的最后一场战争！”

这以后，葛琪中尉每周都要来一次，交她的“作业”请我改，又再要去一张字帖，同时，也检查一次我的伤口。每次她来时，难友们便热情地围过来向她问好，抢着看她的“作业”，都为她的进步而叫好！她反而不好意思地说：“比起我的教师还差得远呢。”

大约在我动第4次手术之后半个月，葛琪中尉检查出在我的臀部肌肉里有一个硬块。她反复按摸之后告诉我：“看来，你还得再动一次手术。”我一下就蒙了，对手术我真发怵了。她让我自己去摸那个硬块，然后说：“我一直担心你那受伤的肌肉面积太大，

由于淤血而长硬块，尽管手术时，我们尽量做了处理，但还是结了硬块，如果不去掉，将来可能转成肿瘤，甚至恶化。我真不愿给你留下那样的后果。”我立即信任地对她说：“我完全听你的安排。”

第二天，我最后一次上了手术台。由于是脸朝下趴着做手术，为了防止我头垂下来发生窒息危险，她叫一个男护士专为我支着下巴。那天，仍然是约翰当她的助手，在约翰做最后的工序时，她便亲自扶着我的下巴直到手术完结我醒过来。当我再次见到她的满脸汗珠和温和笑容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这次手术后，我完全恢复了行走功能。

这时，美方在战俘营加强了对战俘的虐待、威胁、利诱，急欲迫使我们背叛祖国，并派遣特务、叛徒来控制战俘营，残酷镇压我们的反抗，斗争日益尖锐，我积极投入了这场斗争。

在我参加了第三收容所的地下党组织后，我曾向我的入党介绍人王化英、段天强和王平等战友汇报了葛琪中尉的情况和她向我学书法之事，他们都同意我继续和她接近，要我设法从她那里多了解些前方的消息与和谈进展情况。我较好地完成了组织上布置的这个任务。每次我检查完“作业”就顺便问一点和谈消息，她不仅如实告诉我，有时还主动向我讲在谈判中双方代表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的分歧和争执，这些对我们决定战俘营的斗争策略起到重要作用。

### 葛琪中尉你在何处？

1952年元旦过去不久，葛琪中尉面带忧虑地来告诉我，又将有一批伤愈的战俘出院去巨济岛，她得知这次有我在内。她拿出一张诊断书说：“我为你开了一个不能承担重体力劳动的医生证明，如果到了岛上，他们强迫你做苦役就把这个证明给他们看。”所有这一切来的太突然了，好半天我才回过神来，我低着头说：“葛琪大夫，真是太谢谢你了。”

“那支钢笔你就留下当纪念吧。”她低声说：“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到中国我还有机会继续向你学习书法。”

我听了，再也忍不住眼泪，只得急速地背过身去擦掉。又听见她也有些哽咽地说：“我一定要回到中国去的，我的亲友，还有那么多好友、同学在等我呢。”等我转过身来，她已走出帐篷。我追出去喊了声：“谢谢你！再见！”她回过头来，招了招手快步走了。我呆呆地站在帐篷前直到她的身影消失在公路那边。

40年过去了，每当我看见在釜山开刀留下的长长疤痕，就想起在那段极其阴暗、痛苦的岁月里的这段遭遇，也想起葛琪中尉，眼前又出现了当年在那岗楼林立和众多横眉怒目的美军岗哨前面，她那最后离去时的身影。

葛琪中尉，你现在何处？你是否知道当年你在战俘营播下的中美人民友好的种子已经在你的第二故乡开花结果了。我多么希望能在北京、在我经营的“蓉城酒楼”里，和我的难友们一起专门为你举办一次答谢宴会啊！

（罗节操）

## 严密封锁下的通讯奇迹

1952年7月上旬，巨济岛“602回国支队”的战友们被迫移至济州岛第八战俘营分散隔离。6000中华儿女坚持回国的斗争，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在济州岛的一年里，祖国坚贞不屈的战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爱国主义的凯歌：他们能取得辉煌胜利应部份归功于通讯联络网的同志们，他们高度发挥了聪明才智创造了通联工作的奇迹。

济州岛第八战俘营位于济州市西郊、汉弩山北麓，濒临济州海峡。这片营地是敌人精心设计修建起来的，在整个集中营周围拉有多层带刺的铁丝网，四周探照灯密布、岗楼林立。大营内部又分割成东西两片，东营区分列着四个小营场，西营区分列着六个小营场，东西两营区相距200米而每个小营场之间相距也达80米以上。每个小营场又围有两层铁丝网，设有卫兵日夜看守营门。

此外，敌人在第八战俘营南面1000米远的水塔下面，还设有一个乱石垒砌的监狱：含有两个囚室的拘押“肇事犯”的小监狱和一个拘禁所谓“战犯”的“战犯监狱”。1952年7月以后，赵佐端、魏林、杜岗等总委领导同志和一

对方取回文件后，亦应及时回告。利用敌人粮车传递文件是既迅速又安全的“联络法”，我们将文件藏在敌人给战俘营运粮卡车的底盘固定空隙位置里，随着卡车依次进入十个小营场，我们的机要员就在卸粮战友掩护下，取出文件，把敌人的运粮车变成了我们的“交通车”！

#### 4. “投掷联络法”：

通过投掷法投递文件，迅速及时，这是群众智慧的创造，是广大战友对通讯联络工作有力的支持。各个小集中营之间相距80公尺以上，单凭臂力使手投掷是不行的。我们把密码文件紧捆在小石块上，利用绳甩动的力量把石块投掷到对面的铁丝网内。在采用这种方法前，均经过试投的训练。如“五号”就有不少投掷能手，多为山西放羊娃出身的老同志。在投掷前，预先打信号与对方联络，布置有关人员准备。投掷时，一般能百发百中，少有失误。仅有个别时候，失手投到敌人哨兵的岗楼打在哨兵的钢盔上，他还认为是营内战俘在向他故意“挑衅”。敌人哨兵常常大骂几声或把枪栓拉几下，以示恫吓，也就算了。

#### 5. “王芳专密”与“远距离步行联络方法”：

1952年12月12日，黎子颖，何平谷和郝智根三位同志因夺旗斗争被扣至小监狱。在囚室内，通过山墙顶端的小洞，深夜可与王芳等被扣的领导同志秘密联系。在监狱的一月中，何平谷等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晚间通过铁丝网外路灯透进铁窗的微弱灯光，编制了“王芳专密”，并拟定了“远距离步行联络方法”。从而沟通了集中营与“战犯监狱”的联络渠道，粉碎了敌人隔绝我主要领导干部与大营场之间的联系的阴谋。

“战犯监狱”与第五号小集中营遥遥相望，相距1000公尺左右，距离太远，只能看清对方石头房子的窗户和人影的移动。根据这一实际情况，何平谷同志拟定了“远距离步行联络方法。”<sup>①</sup>至9这十个数字仿照“摩尔斯电码”用“·”“—”(的、嗒)表示。

这一联络方法只限于第五号小集中营（指导部）与王芳处相互

之间联络。1953年2月下旬，联络渠道正式沟通。指导部具体负责联络的人员为钟骏骅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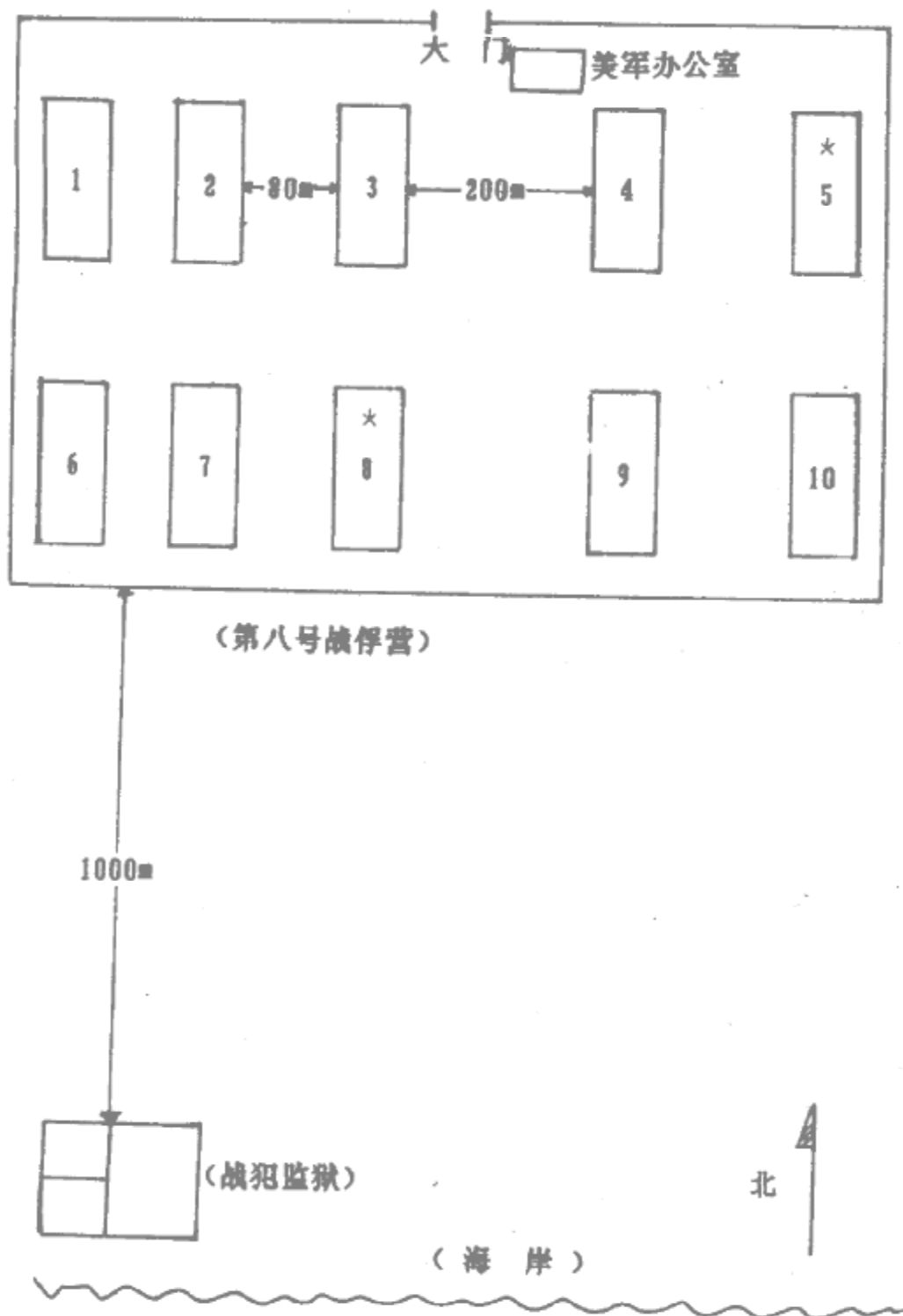
#### 6. “釜山专密”：

济州岛第八战俘营与釜山休养所伤病战友的联络，主要靠来往于济州岛与釜山间的“病员”进行。鉴于1953年1月26日敌自三号小集中营扣走我机要人员王金成等9人，王所携带之“通用密码本”落入敌手。根据总委指示，我们除了加强有关保密措施外，重要斗争行动只能通过“手势联络方法”传递信息，同时吴孝宗、何平谷等人立即研究变码方法，以提高“通用密码”的保密性。此外，并由何平谷同志编制了“釜山专密”，进一步加强了与釜山伤病战友的联系。

在济州岛一年的通联工作实践中，我们的机要人员一般均能熟记密码，记码迅速、准确。“发报员”也动作熟练，准确无误，即使在敌人岗哨的监视下，亦能因时因地制宜，机动灵活，及时地把报发出。敌人处心积虑玩弄的隔离封锁阴谋彻底破产了。我们每展开一次斗争，都使敌人措手不及，十分狼狈。而敌人对我们的行动计划，却是茫然不知。

敌人为了破坏我们的通讯联络网，不遗余力，费尽心机。曾以“格杀勿论”相恐吓，明令禁止。同时敌人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拦截我们秘密传递的文件，但这些密码文件对敌人无异于“无字天书，不知所云。”和谈签字后，在我们离开济州岛前，一位同情我们的美军管理人员透露：为了解开这个谜，美军当局曾从国内搬来所谓“破译专家”，这位“专家”一上岛就声称，只要研究了我们的三份不同的密码文件，就能破译密码。但我们的“密码”是根据集中营的斗争实际自编的，没有什么特殊规律可循。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位“破译专家”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最后只得承认我们的“土电台”真是“奇迹”！

济州岛第八战俘营设置示意图





在集中营斗争最艰苦的“波特纳恐怖时期”，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所建立的通讯联络网，被敌人列为重点破坏目标之一。但是，我们有总委会强有力的领导，有广大战友的热情支持，自始至终、屹然挺立，组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钢铁联络网。通讯联络网的全体同志，怀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对党的事业的坚定信念，对伟大祖国的一片赤诚，人人献计献策、忘我工作，高度发挥了聪明才智，出色地完成了对敌斗争的光荣任务。在济州孤岛，创造了通联工作的奇迹。（何平谷 唐耀）

济州岛第八战俘营三种用形体动作表示数码的联络方法

数 码	种 类	手势联络方法	小手势联络方法	远距离步行联络法
				(人站窗左为“·”人站窗右为“—”)
1		右手向右平伸	右手摸胸	· · · ·
2		右手向前平伸	左手摸胸	· · · —
3		右手向上高举	双手摸胸	· · — —
4		左手向左平伸	右手叉腰	· — — —
5		左手向前平伸	左手叉腰	— — — —
6		左手向上高举	双手叉腰	— — — ·
7		双手左右平伸	右手摸耳	— — · ·
8		双手向前平伸	左手摸耳	— · · ·
9		双手向上高举	双手摸耳	· — · —
0		双手压肩	双手摸脸	— · — ·

### “王芳专密”的诞生

1952年10月1日，济州岛第八战俘营10个营场里10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时升起，迎着海风胜利飘场。美军妄图用血腥的镇压把红旗抢走，中华优秀的儿女用鲜血保卫了国旗，宁死也没有让国旗落入敌人的手中。

但是，敌人并没有放弃抢夺红旗的阴谋。1952年12月12日，

敌人突击搜查第五号营场，我们珍藏的红旗被搜出来了。

在返回营场时，黎子颖、钟骏骅、何平谷、郝智根、范杰、李振华、孙凤歧等 33 个战友，在敌人的刺刀丛中，视死如归，奋力夺回五星红旗，捍卫了祖国的尊严。在这场夺旗斗争中，黎子颖、何平谷、郝智根三个“罪魁祸首”，被敌人毒打后，关进了“肇事犯”监狱。

第八战俘集中营的“肇事犯”监狱，只有两间并列的囚室，封顶的石墙把这两间囚室同专门拘禁所谓“战犯”的监狱隔断。这座乱石垒砌的监狱统称“L 号营场”，依地形不规则地围着两层带刺的铁丝网。铁丝网内紧靠隔墙两端又拉有铁丝网，从中把两个监狱隔开。铁丝网外有岗楼，由美军日夜守卫，轻机枪正对着囚室的牢门。

“肇事犯”监狱的囚室，只有一个装有铁栅的窗户。木制的牢门开有一方监视囚犯的“窥孔”，牢门前有两级石阶，下面是放风的坝子。坝子里还支有一顶军用小帐篷，这是担任杂役和监视“犯人”的叛徒住的地方。我们在被押着路过“战犯”监牢门口时，看见了许久未见的张济良战友，我们多么想跑到一起互叙别情，亲切拥抱啊！但只能互相用深情的眼光表达一下心意！

铁丝网外面的灯光，透过囚室窗户的铁栅洒进了牢房。

牢房里空荡荡、黑沉沉。水泥地面冷冰冰，光秃秃。

走过去是三步，走过来还是三步。大个子黎子颖在阴暗的牢房里来回地踱着，沉思着。小何和小郝紧紧地依在一起，凝望着铁窗外幽幽灯光，苍苍夜空，思念着还在露天野地里挨冻受饿的夺旗的战友。

牢门开了，囚室霍然亮起来。担任杂役的叛徒拿来了三床破军毯，随后又畏缩地提进一只便桶。

黎子颖横眉怒目，狠狠地瞪着这个叛徒，在我们仇恨的目光下，叛徒胆怯了，他低着脑袋，象一只丧家犬，夹着尾巴退出了牢门。

牢门又关上了，囚室里又暗了下来。

大个子在阴暗的囚室里踱来踱去，又陷入了沉思。他是在担心被抢回来的国旗的命运，还是在思考我们在这小小牢房里如何继续开展斗争？

思绪绵绵，长夜漫漫。

三个“囚徒”饥肠辘辘，疲惫地躺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辗转反侧，夜不成眠。凝望着窗外的夜空，他们的思绪飞出了铁窗，飞到了飞机窝里战友们的身旁，飞到了坚持回国斗争的行列，飞到了祖国温暖的怀抱……

黎子颖想得更深远。敌人用冻、饿来惩罚我们，我们决不能屈服，我们要顽强地斗争！他提出我们三个“共产主义团结会”的会员成立临时小组。小组的首要任务，是尽快设法同拘禁在隔墙的“战犯”监狱的团结会总委领导人取得联系。这个提议使何平谷和郝智根立即兴奋起来。我俩选他为小组长，领着我们干。

我们再也不能入睡，大个子披上破旧的军毯走到窗前，两手扶在狭窄的窗台上，仔细地观察外面的动静。

夜，静悄悄的。

“笃、笃、笃”。隔墙那面轻轻地响了三声。这三下低沉的、有节奏的叩墙声顿时驱散了寒冷和饥饿，赶走了疲倦和睡意……黎子颖侧过身来，盯着隔墙，两眼熠熠闪光。他是多么兴奋啊！小郝一骨碌翻身坐起，耳朵紧贴着冰凉的墙壁。小何的心也狂跳起来！

隔墙那面拘禁着赵政委（被俘后化名王芳）、杜岗、魏林等坚持回国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及骆星一、张济良等人。五号营场发生了意外情况后，他们就一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早就焦急地等待着午夜的到来。

又响了三下低沉的叩墙声，小何也有节奏地回叩了三下墙壁。

牢房里，分外宁静。三个人都屏住呼吸，注意地倾听着。

屋角隔墙的上端沙沙作响，我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盯着发出

响声的地方。一条黑呼呼的东西，在墙顶同屋瓦的接缝处蠕动，慢慢地伸了出来。

高高的墙顶，一个人是够不着的。

黎子颖蹲下他那高大的身躯，小何便双脚踩在他的肩膀上，扶住墙壁，小郝在一旁细心保护，帮助大个子慢慢地站立起来，刚好够着墙角的屋顶。小何小心翼翼地把一根又细又长的用雨衣油布裹着的袋子从墙和瓦的接缝处拖了出来。

我们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油布。啊，里面紧紧地裹着米饭和酥脆的鱿鱼片，还夹有一张纸条。赵政委那遒劲的笔迹出现在我们眼前：“发扬斗争精神，养息身体，提高警惕，注意联络。”

香甜的米饭，美味的鱼。饥饿的“战犯”把最好的食物留给了“囚徒”！可是“囚徒”们又怎么忍心吃下去……

刚劲的字迹，短短的话语，饱含着无限深情，寄托着殷切的期望！

小何噙着热泪，把纸条交给黎子颖，三个“囚徒”在窗前借着透过铁栅的灯光反复传阅，心情无比激动。像登上了高山之巅，看到了光明和希望的远景。

“餐”后，我们通过那个墙洞向赵政委他们汇报了自“十一”升旗斗争后敌人的动向，战友们学习、工作和斗争的情况，还着重汇报了我们通讯联络工作，以及这次夺旗斗争的过程。那边传来了政委的话：“同志们，你们干得漂亮，你们辛苦了！祖国人民会记着这一切的！”等小何听完，从大个子肩上跳下来时，他抚摸着肩头笑着对小何说：“你要是再多站一秒钟，我怕就要趴下了！”小何看着他瘦削的、冒汗的面孔，真有些心疼他了。

小何把政委的话传达给他们，大家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小何想起已经有半年没见到总委书记那慈祥的笑脸，叛徒多么可恨！竟然把我们的总领导人出卖给敌人，切断他和大家的联系，这对斗争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失啊。要是、要是……

像一道闪电划过小何的眼前，“我有主意了！”小何急忙翻过

身去低声对大个子说：“嘿，我们何不利用这个机会编拟一份专用密码来打通赵政委跟营场的联络呢？”

郝智根小鬼耳朵真尖，还没等大个子答话，就在那边嚷起来：“对呀，这真是个好主意！”

“嘘！”大个子让小郝别大声嚷嚷，坐起来挠头说：“就我们三个干，行么？我可是一点都不懂呢！”

“准行！”小郝抢着说：“现在各小号间用的密码就是小何跟吴孝宗他们一起编的。”

“你别忘了小郝在部队干的就是报务员！”小何提醒他。大个子看看小郝，又看看小何，一下子把他俩紧紧搂在一起：“你们真是好样的！那就抓紧编吧！要我干什么就请下命令吧！”

这回该小何挠头了，编写密码得用纸、用笔，小何看看空空如也的小牢房说：“得先解决纸和笔的问题！”急性子的小郝捶打了下脑袋：“要早知道，把我那截铅笔带来就好了！”

“你幸好没带来，这次鬼子把我们衣服缝缝都摸过了，你那宝贝武器还不让鬼子缴了械！”大个子用来安慰小郝的口气挺硬，小郝伸了伸舌头。大个子沉着地用眼光搜寻四周，猛然他捅了小何一下：“窗台，你看窗台上是什么？”

在幽暗的灯光下，窗台上一小卷白色的手纸在小何眼里赫然亮了起来。小郝也看见了，一下跑过去把那卷手纸捧了过来，兴奋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说：“明天放风时我去捡些树叶子回来当手纸用就行了。”

可是，笔呢？大家高兴一阵心又凉了下來，只听大个子说：“别着急，明天问问隔墙的张济良，没准他们那边有铅笔呢！快睡吧！”

度过那难捱的一夜，天没亮小何就催大个子要求早点跟隔壁联系。这次是我们先敲墙，那边立刻有了回音。仍然是小何踩在大个子肩上小声地和张济良“通话”。小何先把昨晚我们的想法告诉他，要他请示赵政委。等了一下，只听他用嘘声说：“政委非常

高兴，表扬你们的主动请战精神哩！他说等着听你们的胜利消息呢！还问你们有什么困难？”

“笔，铅笔！你们有没有？”

“有，有一小截，你等着，这就送过去！”

这时小何明显感到大个子身上抖得凶了，不忍心再踩着他，便说：“要不我先下来！”

“不用，不用。”大个子一听说有铅笔就一下挺起身来，一点也不抖了！一直眼巴巴地望着墙洞的小郝也立即靠拢来用双手撑住小何的脚跟。不一会儿，又一个细长的雨布卷蠕动过来，小何接过它跳了下来。除了又有米饭外，里面还真有一支约两寸长的铅笔。小郝一把抢过去将它贴在了心口上。

于是我们研究起如何编密码来。但要确定密码方式先得定出传递信号的方式。这真是一个大难题。在营场里，各分号营场之间相距不过百米，我们的“发报员”使用的是“做体操”方法，即类似旗语的手势传递方式。但这个监狱离营场近千米，打手势极难辨认。怎么办？靠灯光么？甭说没有手电，就是有了敌人也会立即发觉。靠唱歌么，就是敌人允许唱，那要多少人齐唱才听得清楚。我们各人提出的方案都被否决了。

那怎么办？怎么办？

大个子又坐不住了，在牢房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最后他说：“好不好先做编码的准备工作？大家边准备边继续想办法，三个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呢，我就不信三个团结会员就找不出法子！”

于是，小郝被组长分配去放哨，防止突然来查房的美军和到门口来送水送饭的叛徒发现我们的活动。我们还分了工：万一美军突然撞进来，就由大个子去挡住他，小何立即将写有字的手纸塞入口里咬碎，小郝则立即坐在便桶上解手并将铅笔扔入桶中。有了这些准备，小何才和“秀才”黎子颖一起把常用汉字偏旁部首分类整理，按笔划顺序排列，作好编写密码的准备工作。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联络方法。

连日来，小何苦思苦想，继续寻求一种切实可行的联络方法。小何否定了又一个又一个方案，在不断的否定中，思路豁然开朗。半年来通讯联络工作的实践，结合小何小郝两人原有的报务知识，在“摩尔斯电码”的基础上加以简化，即用“.”(的)“一”(嗒)来表示十个数码，终于创造出“远距离步行联络方法。”即让“发报员”背手“散步”用停在窗户的左边、右边、正中表示“.”“一”和换码。

关键的问题解决了，大家是多么高兴啊！

小何被抬起来转了一大圈。于是，大家集中精力投入编制密码的工作。

夜阑人静，铁丝网外高高的路灯投进的微弱的亮光，照射着窗台那块小小的平台。白天要领饭、倒粪桶或出去放风，既有干扰也不安全，干脆白天睡、夜晚干。连续几个晚上，小何伏在窗台上不停地写，饥饿折磨得小何腿发抖，手发颤，眼发花，头发晕，多少次想停下来，多少次对自己说：“坚持，再坚持一分钟

太平洋上刺骨的寒风从窗洞里吹进来，小何的手实在冻得写不成字形了，小郝和大个子就轮换来把小何的手塞到他们怀里暖和一会儿……

铅笔芯写到头了，没有小刀削笔怎么办？大个子用指甲硬抠，指甲都抠破了；小郝用牙咬，牙根都刺破了……

有的字大家都想不起来了，那就空着。躺在“床”上再挖空心思，最后还多半是大个子黎子颖猛然想起，立即爬起来告诉大家，免得又忘了……

就这样，我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十几天的奋战终于编出了上千个常用字和常用词的密码来。每个字、词均为四个数码。这个密码将专门用来打通“大本营”和化名王芳的总委书记、赵佐端政委之间的联系。我们将它取名为“王芳专密”。

小何将编好的密码用蝇头小楷整理书写成册，连同《远距离步

行联络法说明》通过墙洞一并送了过去。赵政委亲自站在墙洞那一边激动地对小何说并要求立即往下传达：

“同志们，你们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表现了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惊人的智慧！你们为今后的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代表总委会衷心感谢你们，向你们学习致敬！”

等小何向他两人逐句传达完毕时，大家都哭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高的奖赏呢！小牢房似乎变得温暖光明起来，大家得抓紧想办法赶在“刑满释放”之前将密码带回营场去。可是这又是一大难题，字写得再小，藏得再机密也难保证不被敌人搜出，一旦搜去就前功尽弃了！

我们面面相觑，这回真是束手无策了。过了一会儿，只见小郝站起来坚定地说：“我把它全部背诵下来带回去，鬼子总没法从我脑子里搜走！”

“1000多个字词，只剩几天了，你能全部记牢么？”小何心里怀疑，但看来这又是唯一的办法了。大个子却轻轻地打了小郝一拳说：“好，就这么办，你要真背下来给你申报个特等功！”小郝脸一红拿过小何手中的密码本独自走到窗洞前就着光亮默默地背诵起来。

整整两天，除了吃饭、解手，他就坐在墙根前看一下密码本，闭一会儿眼。后来看的次数越来越少。终于小郝艰难地站了起来，把密码本还到小何手中说：“你考核吧！”

我们都凑到窗洞前，就着灯光一个字一个词地进行了“考核”。愈是往后检查，我们愈感惊奇，小郝真的背下来了，一点都没错，直到最后一个字考完！啊！这真是人间奇迹！小何和大个子呆呆地盯着他，好半天，大个子一下把他抱了起来，转着圈，轻轻地喊着：“乌拉！满赛(朝语万岁)！”而小郝却已经无力地垂下头昏睡过去了！

两天后，我们告别了政委他们，被“释放”回五号营场。一周后，从“11号战犯监狱用“王芳专密”传来了“关于在新的一



年中做好长期斗争思想准备，以及如果和谈破裂，怎样抗击敌人镇压”的最机密的指示。

“战犯”监狱与第五号营场的联络渠道沟通了！

30个寒冷的夜晚，30个饥饿的白天。三个“囚徒”胸怀祖国耿耿丹心，在铁窗里顽强地坚持工作，终于胜利地架设了一座6000回国战友与“战犯”监狱的桥梁！（何平谷 郝智根）

## 活跃在战俘营的文艺宣传队

### 英才荟萃的群体

1952年4月，我们来到了红旗飘扬的“602回国支队”，在“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下开始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新的战俘营里的生活。革命队伍要富有朝气、要有文化教养、高尚的情操和集体主义精神，就需要有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工作，6000多人生活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更是十分需要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因而，建立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文艺宣传队伍就是十分必要的——这是支队领导重要决策之一。

听说要成立文工队了，大家无不欢欣鼓舞。各帐篷里能弹会拉的、能说会唱的、能演会舞的，还有能写会画的……凡是有点艺术细胞的人都被推举出来了，更有不少自荐的“毛遂”也被吸收进来。

这是一个英才荟萃的群体。有抗日战争时期大学生，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远征军的；也有解放前在大学里就已参加了地下党的；有八路军、解放军里的宣传员；也有志愿军里的文工团员；还有革大、军大学员随营学校的学员；有中学音乐教师，也有他的学生们。有琴师、号手、鼓手；也有吹、拉、弹、唱样样都

在行的多面手；有作词、谱曲的专业人才，也有能把“四大歌剧”、著名秧歌剧和传统京剧折子戏背得下来的“万宝囊”。还有会说英语的、俄语的、日语的和朝鲜语的呢

负责领导这个文艺宣传队的是总委工作组下属的“文艺组”。文艺组的正、副组长张城垣和骆星一，成员有高子、吴均度、姜瑞溥等。我们文工队有 50 人，队长马有钧、副队长彭林都是“委派”的。但大家都很讲民主，遇到问题大家想办法解决，谁的主意好就依着谁。

一提到老骆，就想起了他唱《赤叶河》的情景：他曲膝端坐，弹指击拍地唱着……那富有表情的神态，字正音圆的唱功至今记忆犹新。原来他参军前就在中学里做音乐教师，到部队仍是干他的老本行。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当时的中心工作进行活动——教育自己、打击敌人。我们的活动形式是多样的，内容是丰富的。比如到各大队教唱新歌，帮助“青年分队”搞好文体活动，组织人员编写剧本、诗歌、快板、谱曲、填词；写标语、画漫画、制造各式各样的乐器。另外还要制做布景装置，服装道具等。当然演出节目才是我们的“正宗”事。要演文艺节目，要演大戏必须有个舞台才行。可是在光秃秃的大空地上要搭台子演戏，该又是多么不容易啊！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竟不出一天的工夫，我们就用汽油桶、石块、木箱子、纸箱子、帐篷杆子、破帐篷帆布等搭起了个高大的舞台。这都是靠各大队义务劳动大军的支援来完成的！

我们有意将舞台搭在距离铁丝网不远的地方，且台口是向外开的。在这里，曾演出过很多精彩的文艺节目，其中吴均度等人创作的大型活报剧《华尔街之梦》给大家的印象最深，演出的效果最佳。

这出戏以及其它很多节目演得那么成功，除了“群策群力”、“众志成城”之外，那就应归功于高子。因为大量的编导排练工作多半是由他苦心完成的！大家都知道他是战俘营里顶呱呱的英语

翻译，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部队就是十二军文工团的编导！

演出较大的节目需要很多人，文工队全体上了台还不够用，那就只好到处“拉壮丁”。只要有人提供个线索，就去拉。各大队的宣传干事、文化教员、青年分队的小鬼们都被拉来配个角色。目标多得很，就连支队部对外办公室的郭乃坚都给拉了来，他化了装，上台演起戏来还真行！

令人遗憾的是，张泽石当时常和孙振冠一起去跟美国鬼子打交道太忙了，要不，这位当年的“杨白劳”的扮演者就能重返舞台，大显身手了。

文工队里除了高子，最使人难忘的要数能自拉自唱一口好京戏的彭林了。他年龄虽然比一般小青年大两岁，可是看到他蹦蹦跳跳欢乐的样子，就会觉得他比谁都年轻。他浑身都是幽默细胞，尤其他扮上装，出了场，那就更是逗人！然而，他对工作却又十分严肃认真，从不将就，是个很好的宣传队长。“602”战俘营里还有两位叫得响的“童声”演员：一个是杨永成，他早在‘86’，就因唱《白毛女》、《刘胡兰》插曲和《王大妈要和平》出了名。另一个叫赵万明，《南泥湾》这首歌就是经他一唱才响遍了整个回国支队的。后来他们到了第八战俘营都成了各自宣传队的主演了。

余国范不仅外有风度，而且内有才气，是个好演员。他在军文工团演《钢铁战士》里的“齐得贵”出了名，他演的农村老汉也十分成功。有人说他有“傲气”，应该知道，他还有着一种可贵的敢于斗争坚持原则的骨气！

王洪度、王铁龙这两位亲兄弟都是文艺宣传骨干。到了第八战俘营，他们都离开了宣传队，肩负更重要的任务，可他们仍经常参与各号的文艺宣传活动。

谁都知道“大尉”刘光在战场是英雄，在叛徒、特务面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打不垮的硬骨头。然而他在导演面前却象个听话的小学生，他扮演的日本人真是惟妙惟肖！

张济良是个文静潇洒的青年，他很有才华，能歌善舞，又能

演奏几样乐器。却不曾想到他戴上那纸糊的大“礼帽”，穿上特制的“燕尾礼服”，装扮起“洋大人”来竟是那样的恰到好处。在战友们的心目中，他是位可亲可爱，心地坦荡，富于正义感的好同志，更是一位优秀的宣传队员！

再如，姜瑞溥、吕杰、吴均度在宣传队里都曾显露了他们的艺术才能。

我们实在记不起更多的战友们的事迹了。如果以后有人加以增补，那将是难得的好事。

### 特殊的“武器”

文艺宣传队里不能没有乐队，建立乐队就要先有乐器，这可是个大难题！我们还是老办法，发动群众。不到一个月的光景，不仅文艺队有了个像样的乐队，而且在全营地 100 多个帐篷里几乎都能听到琴声、鼓声、笛声了。

读者要问，那些乐器到底是怎样做成的。“铜管乐器”的原料是用罐头盒子的马口铁，像钣金工做白铁壶那样敲打成的。号嘴是用捡来的废铅“翻砂”而成的。（据说，第一个模子是一位司号员保存着的铜号嘴）照这样的办法，又制做了长笛、唢呐、箫、管之类的乐器；大、小鼓是用截断了的不同规格的汽油桶做鼓体，再蒙上美军雨衣，绷紧而成。各种琴的制做过程比较复杂。最初，琴鼓（音箱）是用罐头盒子做的，后来就有了木板粘合的和竹筒子的。琴杆大都是用木条刮制的，也有少数用竹竿做的。松香是从松木烧柴里熬出来的。琴弓多数是粗铁丝做的，也有用木板，竹板精心刻制成的。琴弦“马尾”是把粗麻绳劈开了，在温水里泡一泡，拉展梳平就可以拴在弓子上用了。琴板（面板）的制做很有些变化，有用水泥袋子糊的，有用木板刮的，有用雨衣绷的，有用现成的薄三合板的，有就着罐头盒底面做面板的，还有用老鼠皮做的。这要看它的用途和需要的音色而定了。除了大量的胡琴，还有月琴、吉它、三弦等各类拨弹乐器，后来还有人制成了几把小提琴！琴

弦那就更简单了。钢弦是从电线里抽取的，要粗有粗，要细有细。丝弦是从美军卡克服上和皮鞋上的丝带里抽的。提琴弦比较费事，必须按它的“G、D、A、E”各弦的区别去挑选钢丝和缠绕些细纤维什么的，边做边试，直到适用为止。反正心灵手巧的人总是能想出办法来，如果要有足够的材料和工具的话，在那里完全可以建成一座象样的乐器厂。

绝不要以为那只是供我们娱乐玩耍的乐器，那不仅是乐器，还是“武器”，而且还是一种武装自己打击敌人的特殊的“重要武器”。

另外，我们还有另一种“武器”——笔杆子。我们用笔编写教材，书写声讨敌人罪行的文章，创作剧本、诗歌、快板、谱曲等，战友们学习文化更是少不了它。这种“武器”的用途大，制做却很简单——用罐头盒子剪个笔尖往半截筷子上一绑，就成了。

我们还使用过一种少见的大型“武器”，美其名曰：“画笔”。其实，只不过是些用布条、破麻绳、麻包片子之类的东西扎成的刷子。我们用它写出较大的美术字——有中文的、英文的还有朝文的，又醒目又漂亮，还用它画出大幅漫画和舞台布景来。在那苦难的岁月里，这些作品给枯燥的囚笼生活增添了些风光，带来了些情趣，也算是战俘营里的创举！

#### 连敌人也叫好的美术作品

在战俘营里，英文的大幅标语和“无言”的大幅漫画，每次斗争挂在铁丝网上，是对敌宣传最有效的武器。有一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需要画大幅人物漫画，到处物色“画家”。先找到了张辉宗，小张说他会写标语，画布景，但画那么大人物画“弄不好”。后来，军大的同学把吴春生推了出来，吴当时有初生犊儿不怕虎的愣劲儿，二话没说就应下了。可是，用什么去画？又画在什么上面？在文工队队长们的努力下，搬来了长木板子、废帐篷杆、铁丝、电线、沥青油、锅烟子、水泥袋、旧雨布、小铁钉，

后来，又搞来些油漆——这是意外的奢侈品。待一应俱全之后，大家就动手钉的钉、绑的绑、绷的绷、糊的糊，一会儿就制成了第一张板面。接着大家又分组，半晌的工夫七八张板面就做妥当。

可是等把它竖起一看，好家伙！快有屋顶那么高，软软塌塌的，又没有工作架，实在不好画，只得让它躺在地上。吴踏在上面弯下身子，向后退着画，麻刷子小了，就用麻包片制成个小笤帚来涂，再不就用脚上的鞋底子来抹，怎么得劲就怎么干。好在我们不是让艺术家来鉴赏和评论，那是一颗颗“大炮弹”。画完，只要同志们说声“带劲！”就可以“打”出去了。

记得《such a father》（如此神甫）那幅画，一开始，吴把人的脑袋画小了，为了整个布局只好给他弄了个细脖子，大肚子和两条长麻杆腿，稍翘起的屁股上又加了个大口袋，边缘上露出几个小脑袋——活象个变态的大袋鼠，实在可笑！

难友们看到名为“神甫”实是大特务的伍培礼及其豢养的丑类们在那里现了原形，看到敌人的阴谋被揭穿，看到那一张张漫画，一幅幅大字标语被各国记者抢进了镜头，都说这种宣传真管用！这下子可惹恼了那个“鹰派”的美军的军官，那家伙哇哇怪叫，可又没有胆子把这些标语、漫画去掉。而更让他生气的是，他身旁的几个站岗的士兵竟然伸出大拇指对这些漫画大声叫好！

见此光景，文工队员们得意地相视而笑，真没想到，我们这点儿业余作品竟会在战俘营里起那么大的作用。

写到这里，我们还要向大家来介绍一位默默工作的肖大国。他从未对我们说过他会画，更不知道他在被俘后，冒着那么大的危险还一直保存着一张毛主席像。直到“602”，他把毛主席像片放大了之后，才悄悄叫我们给他“指点指点”。他是一位多么谦逊而又稳重的人！他的这一贡献是多么适时而又重要！为大会会场、游行队伍增添了光彩，壮大了气势。更重要的是他使 6000 战友见到了革命的象征，多少人为之欢呼雀跃啊！却很少人知道这张像是相貌平平的肖大国画的。

## 迅速成长的演员队伍

1952年7月,敌人将我们移往济州岛,并把6000人分割成10个小营场,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分化瓦解我们的斗争,其中包括瓦解我们这支使他们大伤脑筋的文工队。

然而,敌人又打错了算盘,既已团结起来的爱国之心是绝对分不开的。在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下,10个铁丝网就是10个战斗的集体,就有了10个文艺宣传队。他们扰乱了我们一个,却使我们壮大了10个。这实非敌人始料所及的呀!

10个文工队大致相同。只是由于条件所限,人员有多有少水平有高有低,但却都能充分利用自身的条件,努力工作,各自的活动都开展得十分出色。我们虽然分居10处,但紧密得仍像一个团体。无论哪个铁丝网里有了新歌,写出了剧本,不出一个星期,保准10个铁丝网都能传到,很快全营地都学会了。

我们都像正规的文工团那样,早起练功,一天晌安排着文化课,业务课。像在部队里一样按时上政治课,晚上就寝前一定要开生活检讨会,处处体现着抗大作风。

如果要把10个铁丝网的文艺活动都写出来那将是厚厚的一本书,这里只能把我们所在的“九号”的文工队的情况写一写,让读者了解一下我们整个第八战俘营文艺战线的的一个缩影。

“九号”的文艺活动搞得好,其主要原因除了大队领导的重视与大力支持外,应归功于直属中队领导杜荣光。他一贯倾心于文艺宣传工作,他不仅参与了文工队的组织建设、思想教育、全盘工作的开展,他还深入下层,积极参加集体活动。他领导有方,知人善用,充分调动了全体队员的积极性。他从“残废中队”调来了莫非做文工队的音乐教师兼指挥,请高子来兼职“总顾问”“总编导”。他让“黄埔军校”22期毕业的起义军官黄庚来做副队长,调来林模丛、赵荣华、何瑞、马吉廷、杨永成、高庆涛、韩安治等各有专长的骨干队员,也调来了万国波、杨子贵、兰清华、



胡兰等小鬼，要把他们培养成后备的主力军。因此，吴春生这个“正队长”是十分容易当的。“行政”上有黄赓老同学全面总管；业务上有高子、莫非两位专家分头“承包”；还有那么多的骨干分子，有任务都是抢着干，根本用不着去督促。我们的文工队的活动是最能体现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集体智慧的。

高子(化名高化龙)是《华尔街之梦》的大导演。他的担子最重，大小节目的演出他都参与。就象《白毛女》、《刘胡兰》、《钢铁战士》、《掩护》、《四姐妹拜寿》、《兄妹开荒》、《光荣灯》等剧目剧本的整理，角色的分派，舞台语言训练，台下的导演，台上的监督都是他“大包大揽”。他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很紧，写歌词、快板这样的小东西都是利用空隙加班加点完成的。必须说明的是，那么繁重的工作，可没有哪个去派他去催他，都是他自觉自愿的。

莫非受伤后被敌人截去半截小腿带着假肢，本该安心休养的，然而他勇敢斗争、吃苦耐劳的精神却依然有增无减。他在文工队里和大家一样起居，从不要任何照顾。在台下他是教师，上了台就做指挥，真是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奋斗。他是我们的榜样。

黄赓不仅是一位能干的领导者，还是个出色的演员。看外表他是典型老生扮相，但是他演起“张志坚”<sup>①</sup>来却照样得体。他那内向的坚韧性格，正好把剧中主人翁的那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塑造了一个活的张志坚。他不仅能演能唱，还和高子一起整理了很多剧本。

林模丛，这位 30 年代著名速记家，蒋介石的速记秘书林春华的儿子，他若去台湾应该是“前途无量”的。可他偏偏要回国，还要积极参加斗争！他个子不高，乍一看腼腆得象个小姑娘，却是个了不起的强者。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有着精明的辩才。他拉出的琴音，可以使你心潮澎湃、斗志昂扬，又能使你手舞足蹈、情不自禁。

<sup>①</sup> 张志坚——著名话剧《钢铁战士》中的主人公。

赵荣华是乐器队队长。他对集体演奏要求十分严格，对练功抓得更紧，我们那支乐队的成长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

学习进步最快的要数何瑞了。他只有高小文化水平，又带着个残废的胳膊，竟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了识唱简谱，练好了胡琴，并能唱歌演戏实在难得。

马吉庭，才华横溢，少年英俊。初到宣传队只会吹笛子，但是他学啥啥成，不久就成了乐器组的多面手了。

杨永成，嗓子好，扮相美，在“高导演”的严格训练下，小小年纪，竟能“反串”那么多的角色。他能演好“喜儿”“刘胡兰”，还能演《钢铁战士》里的女特务哩！

再就是小鼓专家陈克华，他常谦虚地说，谁都“比我强”。可只要他把鼓槌在鼓面上轻轻一击，那“沙拉拉”的响声就能延续几秒钟，再高扬起那鼓槌，鼓声就像一阵疾风骤雨袭来，他不愧为大乐团下来的鼓手！

我们“业余演员”也很多。最出色的就是那位李医生。他带着山东味的舞台语，字正音圆高亢有力，他演大胡子连长最拿手。

还必须记上一笔的是，我们的制琴能手高庆涛，多面配角韩安治、兰清华、王长模、杨子贵，儿童演员万国波，还有个“总务主任”王俊文，都为演出做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还经常自编些小演唱，如快板、山东快书、活报剧。如果隔段时间不换新，就觉得对不起观众，没脸上台。小演唱是我们最得意最顺手的节目，但总不满足，后来我们还集体排练了大合唱《英雄战胜了大渡河》。通过这一多声部歌曲的排练、演唱，很好地训练了声乐队伍，提高了大家的唱歌水平。这是莫非的一大功劳。

我们还演出许多舞蹈。自编的有，《操场练兵》、《打靶》和《团结就是力量》等。也演出过现成节目，像《鄂伦春舞》、《海军舞》、《炮兵舞》，朝鲜民间舞蹈，《阿里郎》、《道拉吉》什么的。这些舞蹈的总教练都是带着一条假肢的莫非，每个舞蹈都是他和我们一

起滚、爬、跌、打练成的呢！每次活动下来，他都累得汗流浹背，伤腿又常被假肢磨出了血。可你如叫他暂停教练，他决不答应。直到腿发了炎肿胀得带不上假肢时，他才就地坐着用嘴教，用手比，让张德义、何瑞代他做示范，完成每个动作。同志们当时都称他为东方的“保尔·柯察金”！

全体战友在那里都仍保留着革命部队的习惯。早晨晚上，开饭前和开大会时都集体唱歌，到外边“出公差”的队伍更是歌声不断。当时，大家最爱唱的是《走，跟着毛泽东走》，后来又唱起了《十月一的红旗》和《不听它》这两支新歌。

这两首歌曲是在“十·一升旗斗争”之后创作的，为表达广大难友们悲愤激昂的情感，进一步激励战友们的斗志，战俘营里应该有一支最适宜的歌曲让大家唱。于是写歌的任务，支队宣委就交给了“九号”文工队的高子、莫非。

高子接到任务，把他那满腔的对敌仇恨，对英雄的崇敬，对烈士的哀悼全部凝聚在笔端，他捏起铅笔头，在一片烟盒纸上飞笔疾书，很快就写成了字字千斤的歌词。音乐家莫非，面对歌词，双目凝视，一遍又一遍地默读着，一字一音地推敲着。此刻，他的心在燃烧血在沸腾……帐篷里是那样的寂静，同志们在屏息以待……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终于咬紧牙关，含泪挥笔，点划为雨。顷刻间，那满腔的悲愤化作复仇的最强音，一支具有历史意义的爱国主义歌曲就这样草成了。后来，经过大家切磋、琢磨，试唱成功后就把它推向全支队。这支歌既是高子、莫非二人的代表作，也是歌颂志愿军被俘人员英雄行为的主题歌。几十年来有多少难友唱着它跨过了一道道坎坷，历经了漫长而又艰辛的岁月！

至于《不听它》，那是在支队宣委下达任务的当天，高子几分钟写成的“急就章”，吴春生稍微改动了一下，就交给莫非去谱曲。不想他婉言推辞了，他说“这种歌词不对他的路子”原来他是爱写正面歌曲的。当时，吴春生便发动大家都谱。说实在的，吴春生只跟莫非学了几次作曲，既没有本领，也找不到“灵感”，真是

有些做难。但是形势逼人也就顾不上什么“律”，什么“调”了，吴春生把在四川唱过的《古怪歌》、《茶馆小调》拿来作引子，比猫画虎地谱了出来。经过试唱，大家又都说“够味”就算定了下来。莫非对吴春生这个非正式受业弟子的处女作大加赞许。高子也开玩笑地说：“你说你是笨鸭子，这不是也飞起来了么？”

同志们之所以愿意唱这支歌，不是由于它的曲调如何优美动听，只是它来得适时，歌词的针对性特别强，很能体现出大家对那电杆上的广播喇叭宣传的厌恶情绪和反抗精神。

（吴春生 马有钧）

### 《华尔街之梦》演出记

为了扩大政治影响，揭露美军当局的“自愿遣返”阴谋，纪念即将到来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由总委决定，成立了文艺小组，组长由抓宣传教育的张城垣担任，副组长骆星一，组员有马有钧、高子、姜瑞溥、张济良、吴均度、吴春生等。

文艺组开会研究决定，编排一出三幕五场大型活报剧《华尔街之梦》。大意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在美帝国主义的种种侵略和压迫下，奋起斗争，最后使得华尔街的大老板们霸占全世界的梦幻破灭。剧本由吴均度执笔，导演由高子和骆星一担任。为了演出这么大的活报剧，决定成立支队文工队。文工队长是马有钧，副队长彭林。全队人员有 40 余人。

这一安排经总委批准后，全体人员紧急行动，分头进行工作。

支队文工队是白手起家，要啥没啥。演出需要的各种器材、道具、乐器、舞台、灯光等，如前幕、条幕、天幕、顶幕、服装都得一件件解决。支队总委抓后勤工作的顾则圣出面，召集各大队的后勤部门负责人共同协商，要大家动脑筋、想办法，群策群力，保证演出胜利成功。

“602”营地广场，可容纳六七千人。有一方地面高出整个地面约 40 厘米，不太平整。各大队派出数十人，轮流干活铲去舞台

左右前面高的地方，一来垫高舞台，二来平整观众场地，使看演出的人能清楚地观看演出。舞台四周用水管和帐篷杆搭成框架，便于吊挂各种幕布。经过三天辛勤劳动，一座能容纳六七千人的“露天剧场”完成了。

筹集各种物资由彭林抓，每天由他与各大队的有关部门联系。支队伙房拿出面粉口袋 100 多条，医务室拿出红药水、紫药水数十瓶，染黄用的奎宁丸几瓶。二大队拿出队员盖的黄色和灰色旧军毯几十条，其他大队拿出电线、电灯泡以满足演出需要。

二大队队长马兴旺为了支持演出，还腾出一个小队住的帐篷，以作演出人员化装休息之用。他还抽调了擅长缝纫技术的队员几十人，交给彭林安排。彭林根据导演和服装设计人员的要求，派人先将面粉袋洗净，再用红、紫药水调配，染成需用的各种幕布。再将黄色、灰色军毯，请剪裁技术高的战友缝制，灰色做西服，黄色缝制美式军装。

顾则圣抽调了几位会做木器家具的能工巧匠，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用美军装香烟的纸箱、烧饭用的木柴做成沙发和日本人用的“榻榻米”（地铺）。

各大队调来电工数人，安装舞台灯光。用薄木板做成槽灯、筒灯罩。为了加强舞台灯光效果，采用盐水减压办法，使舞台灯光，根据剧情需要，能达到亮、弱、暗、灭等效果。

文工队全体人员由马有钧领导，钉制各种景片。先用木柴钉成景框，绷钉上装大米的麻袋布，由擅长绘画的吴春生等几位同志，根据剧情需要画成各种景片。

各种乐器是文工队的队员和各大队调来擅长白铁冷作的战友协同完成的。他们用木板、罐头盒、雨布（尼龙制成）、剑麻绳（扯帐篷用的绳子）、8号铁丝等材料，做成具有演奏效果的小提琴、二胡。大小鼓是用汽油桶加仑桶做的，效果也不错。

经过一周辛勤劳动，各方的通力合作，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有演出任务的文工队员们，一面做道具、布景和乐器，一面还得抓

住空隙背熟台词。

临到演出前夕，扮演美国人需要高鼻梁和棕色浓眉，在集中营里，既无口红，也没眉笔，更无化装用的各色油彩。怎么办？为了演出，顾则圣从仓库里拿出一些比较好的黄色军毯，晚上和铁丝网外边站岗的南朝鲜军人做交易。用军毯换来了眉笔、口红、硬脂酸、石蜡、口香糖、油用颜料等物品，又从医务室拿出一些凡士林作为调制化装油彩之用。口香糖是用来作加高鼻梁的材料，先由演员嚼干，再用清水漂洗，就可作为高鼻梁的油灰之用。

临到排演时，由高子、骆星一召集所有演出人员，介绍剧情、人物个性、场次先后、舞台工作人员的分工，以及演出时所有人员应该注意的舞台纪律。

人心齐，泰山移。大型三幕五场活报剧《华尔街之梦》终于在1952年5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南朝鲜巨济岛的602集中营里，和6000多战友见面了。

主要演员有：彭林饰美国总统杜鲁门，姜瑞溥饰国务卿杜勒斯，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由高子、马有钧、，张济良等扮演。各国工人群众由赵万民、杨永成、蔡平生、蔡仁杰等扮演。剧情生动曲折，时而紧张，时而诙谐。演员扮演的人物维妙维肖，音乐气氛浓厚、灯光效果配合良好，演职人员配合默契。演出历时约两小时，最后在6000多战友热烈掌声中，在高昂的歌声中，徐徐降下帷幕。

此剧在演出时，在铁丝网外边站岗放哨的美军及南朝鲜士兵，围集铁丝网边。有的踮起脚来，聚精会神观看，个个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有的美军看到杜鲁门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怒吼中，吓得浑身颤抖，无处可逃时，破口大骂，把枪口对准扮演杜鲁门的彭林；有的美军则哈哈大笑，乐不可支，还呼喊：“Get away Truman!”（滚蛋吧，杜鲁门！）美国士兵中对杜鲁门看法不同，褒贬不一。美军管理人员在和我方翻译交谈时，惊奇询问我们在集中营里何以有如此能力演出如此大型的活报剧来。我方翻译高子对他

讲道：“中国人有的是智慧和能力，只要下决心去做，没有不成功的。”这次演出，对 6000 多战友具有深刻教育意义，使大家认清了形势，增强了团结，加强了回国信念。同时也为各大队后来开展文娱活动培养了许多文娱活动积极分子。（骆星一）

### 莫非与《战俘营创作歌曲选》

人民子弟兵向来有爱唱歌的传统。记得参军时唱过一首部队歌曲，内中有几句：“我们的解放军是个大学校，唱歌学文化，打球又出操。”

被俘后，失去了武器，失去了自由，但还有手和嘴巴。当敌人侮辱祖国的尊严与个人的人格时，手可以近距离与之格斗，但更多的时候，是用嘴呼口号、唱歌与之斗争。这几种斗争方式中，唱歌运用得最多。由于被俘前所唱的歌曲，都是反映部队生活的歌曲，这就迫使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为了适应被俘后斗争的需要，去摸索着创作反映战俘营团结、学习、斗争的歌曲。在当时，一唱这些歌曲，就热血沸腾，怒火满腔。回国后，每遇到不可克服的艰难险阻时，禁不住会想起当时唱起这些歌曲与敌人拼死搏斗的情景，不由得在心中默默地哼着这些歌曲，它们便化为战胜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我们是把这些歌曲作为革命的传家宝在心里保存下来的！

这些歌曲是紧密地结合和反映当时的对敌斗争写出来的，从其创作背景看，可分作三个阶段：

1. 从 1951 年初到当年 11 月。这时的斗争是分散的、零星的。在未被敌人完全控制的战俘营中，既有团结起来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又有不知应怎样斗争的迷惘。在已被敌人完全控制的战俘营中，在高压和毒打下，则有意念的反抗和无声的怒吼。这段时期创作的歌曲有：莫非的《向北望》、《在巨济岛上》和吕杰的《我们的前途永远光明》。吕杰在部队是宣传工作者，对唱歌是特别的爱好。在 72 战俘营中，多次遭到毒打，而且堵住嘴巴不准出声。每

次毒打时都把对敌人的愤怒和对前途的追求在心里默念着，逐渐升华为音乐，这就是《我们的前途永远光明》。他说，这支歌是被敌人打出来的。

2. 从 1951 年 11 月到 1952 年 4 月。这时已有少数的战俘营控制在我们手中，对敌斗争出现了新的前景。莫非的《看谁是铁，看谁是钢》和《杜鲁门求和》，正反映了这时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对我们提出新的要求和敌人的蔑视。张泽石、骆星一合作的《挽歌》是为纪念在“十·九”反升国民党旗斗争中牺牲的王绍其烈士而创作的。张、骆二人被俘前同在一个团宣传队，就曾合作过。由于《挽歌》的词意愤怒而有力，曲调严肃而深沉，此歌成了以后纪念历次死难烈士的悼歌。“四八甄别”后，要求回国的难友都汇集到“602”。为了适应当时大规模斗争的要求，骆星一等又创作了《我们热爱和平》和《四季小唱》。骆星一解放前即是中学音乐教师，那时我在校曾唱过他改编的歌曲。在“602”文工队中又亲受他的教诲，才使我逐渐接触到创作歌曲这一领域。

3. 从 1952 年 5 月到 1953 年 8 月，要求回国的战俘几乎全部迁往济州岛第八战俘营。这段时期是敌我双方矛盾最为深刻，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是我们创作歌曲最为兴盛的时期。由于张泽石、骆星一先后被敌隔离，无法创作。这时，解放前的中学教师、在部队当过文工团导演的高子，和在部队搞歌曲创作的莫非来到九号营地，于是，九号营地成了第八战俘营的歌曲创作中心，完成了这一时期的几乎全部歌曲创作任务。这里面有：纪念国庆三周年的《自由幸福万年长》、《庆祝国庆三周年》，有悼念“十·一”护旗死难烈士的《十月一的红旗高空飘扬》，有响应总委“团结、学习、斗争”三大任务的《三大任务歌》、《咱们比比看》，有怀念祖国、怀念党的《可爱的祖国》、《指路明灯毛主席》、《毛泽东的战士人民子弟兵》。有讽刺敌人丑恶嘴脸的《美帝丑态全现完》、《杜鲁门快完蛋》，《艾森豪威尔睁眼瞎》，有反对敌人毒化宣传的《不听它》、《去它妈的》。这些歌曲中，大部分都是高子、莫非二



人合作创作的。其余如吴春生写的《不听它》，歌词也是在莫非的指导下，修改下完成的。其中《十月一的红旗高空飘扬》和《不听它》是唱得最多，流传最广的歌曲。敌战俘总管曾下达过一个正式通知，禁止各营地唱这两首歌。结果却越禁越烈，可见对敌人打击之大。1953年4月，莫非在交换伤病战俘中交换回国，高子则调至7号营地，此后的创作歌曲仅有我的一首不成熟的《起来吧！亲爱的战友》。

莫非原名潘漠辉，广东顺德人。解放前是香港大学生，解放后回国参军。抗美援朝受重伤被俘，被敌人高位截肢而失去了左脚。在釜山伤病战俘收容所中，即创作《在巨济岛上》、《向北望》以鼓舞难友斗志。后该收容所被我们控制，他又主动担任文化教员，教难友学文化和唱歌（包括他自己创作的歌）。当时有一首小演唱《王大妈要和平》，既长难度又大。他竟能改为大合唱，而且唱得很准。在第八战俘营九号营地中，他除作曲、教唱歌、教文化外，还指挥乐队和合唱。有一次指挥二部合唱《万岁毛主席》，演唱者绝大多数人以前没有上过音乐课，有的还是文盲，半文盲，在他的严格训练下竟然唱得和谐悦耳，乐感很强。这时，恰巧杀人不眨眼的大尉布鲁克斯路过，不禁驻足倾听，继而循歌声入室，他还以为唱赞美诗呢。歌声刚停，他意犹未尽，要求再唱一次。这时，大家劲头十足，巴不得把“万岁毛主席”五个字狠狠地灌进他耳中去。唱完后，他竟独自鼓起掌来，主动上前和莫非握手，称他是“伟大的音乐家”。莫非除上述工作外，还把教作曲作为他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只要你下决心学，不管水平再低，他都不厌其烦地循序渐进地教你。我就是在他手下从一个一个乐谱的练习写起，进入歌曲创作殿堂的。谢智齐、吴春生等都是如此学出来的。每次高子写出新的歌词，他要求大家都谱曲，然后择其优者再集思广益进行修改，有时甚至把自己谱的断然放弃，而去帮助修改别人谱的曲。如《不听它》的创作过程就是如此。《十月一的红旗高空飘扬》他是彻夜含着眼泪写的，先后三易其稿。在“仇恨结

成力量”这句词该怎样谱曲拿不定主意，究竟是

6 5 |，还是 |  $\dot{1}$  5 |  $\dot{1}$ .  $\underline{5}$  | 6 5 | 呢？他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 | 3 1 |  $\dot{1}$ .  $\underline{5}$  | 6 5 | 更有力，他接受了，竟然感谢我，可见他的胸怀是博大的了。在战俘营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几位良师——续公度、骆星一、高子、莫非等，就数莫非和我接触最深、最长。我所敬爱的莫非战友现在竟不知在何方？但愿他在回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中，能依靠那只高截位的义足站得稳，挺得住，没有倒下！（林模丛）

### 我们的歌声使敌人恐慌

在我们被俘归来的难友中，都有这样一个相同的感受：革命歌曲的教育作用和战斗作用，莫过于集中营内发挥得那么充分了！在大家身陷囹圄的两年多的日日夜夜里，革命的歌声表达了我们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强信念和对党、祖国、人民的赤胆忠心！慷慨激昂的歌声也激励起大家信心和勇气，向敌人展开前赴后继的坚决斗争！

敌人就象蝙蝠怕见阳光似的害怕我们的歌声。早在 1951 年秋，因赵明智当众唱革命歌曲，蒋帮特务就给扣上“煽动战俘，反对联合国军当局组织战俘暴动”的罪名，妄图将其置于死地。到了回国战俘营后，只要一唱歌，特务分子就破口大骂或投掷石块进行阻挠。而美军当局一再明令禁止，并以谁唱歌格杀勿论相恫吓，经常因大家唱歌给予断粮断水、甚至施放毒气、开枪杀人的惩罚。但雄壮歌声，始终在战俘营内回响起！

记得当时大家爱唱的革命歌曲中有这么三部分。1. 祖国歌曲，如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走！跟着毛泽东走！》、《钢筋铁骨》主题歌、《蒋匪帮一团糟》等等。2. 国外歌曲（主要是朝鲜歌曲），如像《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金日成将军之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哈拉山游击队歌》、《不是囚徒，是俘虏》等等。3.

集中营创作歌曲。不论上述哪一部份歌曲，当时都尽情发挥了炸弹和旗帜的作用。

拉起手，我们要勇敢前进。

拉起手，向法西斯战斗！

我们团结我们才有力量。

看那光明就在前头。

在敌人的魔掌中，团结比什么都重要，只有大家团结一致，向法西斯化的美帝国主义作不屈不挠的斗争，才有光明前途。

我们的青春，像烈火样的鲜红，

我们的青春，像海燕样的英勇。

原野上长满荆棘，让我们燃烧得更鲜红，

天空中布满了黑暗，让我们飞翔得更英勇。

我们要在荆棘中烧出一条道路，

我们要在黑暗中向着黎明猛冲。

披荆斩棘的英雄气概和迎着风暴一往无前的海燕精神，不正是我们在暗无天日里向黑暗势力抗争所应具备的么。

走！跟着毛泽东走！

我们要的是民族的独立，

不能给美国当洋奴，

.....

二十多年血海深仇，

再不能忍受，再不能保留。

.....

那时美帝口口声声宣扬什么对中国人民的友善关系，千方百计地引诱、胁迫被俘人员背叛自己的祖国，去台湾或海外所谓自由世界。但当我们在歌声中重温美帝近百年的侵华史实，牢记血海深仇，不给仇敌当洋奴的民族自豪感就油然而生，更加焕发了中国人“沛乎塞苍溟”的堂堂正气。

我们是光荣的共产党人，

我们有坚定的政治方向。  
在法庭，在刑场，  
在敌人的面前，在激烈的沙场，  
我们共产党人有无比的勇敢，  
我们共产党人品质最高尚。  
我们是硬骨头，我们最顽强。  
对革命意志坚似铁，对敌人心肠硬如钢。  
为人民事业忠心耿耿，  
奋斗到全人类彻底解放。

革命战士的被捕、被俘，不是战斗的结束，而是阵地的转移。在新的阵地上，同样坚持着为革命而战的顽强斗争，比之于两军对垒的战场，更艰巨，更复杂。大家正是把集中营当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整个战争中的一个特殊战场来对待的。我们在这个阵地上一次又一次挫败敌人的进攻，在国际正义舆论中使对手处于十分狼狈的被指控的地位。

记得我们在 71 集中营的时候，一箭之隔的 72 集中营内的蒋帮特务份子，不时向我们发起所谓政治攻势（其实除诬蔑、谩骂外，毫无内容可言）。每当这个时候，一批小同志就集合到离他们最近的地方，反复地齐唱：

蒋匪帮，一团糟，  
坏蛋痞子真不少，  
贪官污吏还不算呀，  
汉奸特务还有狗强盗。  
蒋介石，赛阎王呀，  
专制独裁他要做皇上。

犀利的歌词，讥讽的曲调，比挖了他们的祖坟还恼火，气得敌人暴跳如雷。他们越跳，我们唱得越起劲，直到迫使其灰溜溜地走掉完事。

《不是囚徒，是俘虏》，当敌人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强迫我们中一些人承认是战犯或危险份子时，大家就唱这首歌回答它。明确告诉敌人，我们是战斗失利的被俘者，不是犯了你们美国哪条王法的囚徒。我你之间敌对关系并没有改变，我们参加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何罪之有！

为了反击李承晚份子的挑衅和对南朝鲜人民扩大宣传，我们用朝语唱《金日成将军之歌》等朝鲜歌曲。每当我们在服苦役与朝鲜同志相遇时，就情不自禁地用各自的语言齐唱《民主青年进行曲》，或是他们用中文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而我们就用朝文唱《人民军军歌》、《金日成将军之歌》回答他们。不管看押我们的敌人怎样威胁，也禁止不住我们之间的兄弟般的国际主义感情交流。

各个时期为配合斗争的需要。我们先后创作了不少斗争歌曲。这些歌曲曾被新华社记者称之为“用鲜血和斗争写成的”。1951年10月9日晚，因反对敌人在“86”集中营升挂国民党旗，王绍其同志被敌人乱棒打死。事后为了追念烈士、寄托哀思，也为了激励难友，鼓舞斗志，创作了下面这首挽歌：

在没有太阳的地方，  
在苦难的日子里，  
你的鲜血、染红了异国的土地。  
为了追求光明，坚持真理，  
在敌人刺刀下，宁死不屈。  
你壮烈牺牲的事迹，  
我们永不能忘记。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仇恨要我们来洗清。  
今天，我们立下誓言，  
誓死为你们复仇。  
踏着你们的血迹，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祖国和人民将永远追念着你。

这首挽歌，以后各次追悼会都采用了。因为后来敌人杀人多了就在歌词“你”字后面加上“们”字，其它地方也作了小的改动。

1952年4月18日，由“71党团临时支部”和各中国战俘集中营里众多的地下斗争组织统一改建的地下核心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创建了。不久，就根据团结会提出的三大任务，创作出了《三大任务歌》：

团结、学习、勇敢斗争，  
是我们一致的方向。  
我们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  
像钢铁般的坚强。  
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武器，  
永远前进打胜仗。  
我们坚决勇敢的斗争，  
使美帝发抖、恐慌。

短短的歌词，像宣言书一样，把团结的原则、学习的内容、斗争的对象，阐述得一清二楚。

敌人为了对我们进行反动宣传，在每个营场外的铁丝网上都安了扩音器，播送“美国之音”等反动节目，在播音时，大家就齐声高唱自己创作的《不听它》。

电杆上有个大喇叭，  
洋声怪气说鬼话。  
黄色滥调洋霉气，  
低级色情真肉麻。  
粪坑苍蝇嗡嗡叫，  
咱们谁也不听它。

U·S·A· 特务到处爬，  
阴险凶狠真毒辣。  
造谣欺骗最拿手，  
引诱、诬蔑行毒化。  
阴谋诡计早揭穿，  
咱们坚决反对它。

这首歌曲，有力地抵制了敌人的反动宣传，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又一阴谋。

1952年10月1日，6000人为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周年。在10个营场上空，同时升起了10面五星红旗，敌人对我们的爱国行动既恨又怕，疯狂地开枪镇压。当场打死56人，打伤100余人，制造了震惊国际的“十一”事件。事隔不久，我们就谱写出下面这样一首悲壮的挽歌，也是后来传唱最广的斗争战歌。

十月一的红旗，高空飘扬。  
共产党人的鲜血，  
写下了美帝的血腥罪状。  
敌人越残暴，我们更坚强。  
拳头挡住刺刀，石头抵住机枪。  
臂膀靠着臂膀，胸膛筑成铁墙。  
保卫了我们的国旗，打击了敌人的疯狂。  
仇恨结成力量，血债要用血来还偿。  
万恶的美帝，逃不出世界人民的巨掌。  
新中国男儿，英勇事迹天下扬。  
十月一的红旗，高空飘扬。  
英勇的烈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

歌曲真实地再现了“十一”斗争的壮烈场面，同时向世界人民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钟骏骅 杨永成）

## 殊途同归

### 战俘营里的黄埔军校生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  
这是革命的黄埔。  
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  
预备做革命的先锋。  
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  
携起手，向前进！  
路不远，莫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  
发扬吾校精神，  
发扬吾校精神！

北伐时，叶挺将军曾率领他的黄埔铁军，唱着这支歌去冲锋陷阵，而我们这些黄埔生也曾在战俘营内唱着这支歌去和美军及其走狗做不屈的斗争。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我们黄埔军校第23期、24期全体学员宣布起义，随即并入“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简称‘军大’)”。经过不到一年的政治学习，改造思想，便分配到一八〇师。1951年3月即随军入朝作战。在1951年5月底，部队陷入重围后，我们黄埔生中也有不少突围未遂而不幸被俘，这些原国民党黄埔军校学生在战俘营内成了“特殊人物”。叛徒



特务们认为我们理应是“他们的人”，千方百计要拉我们下水，而党员干部们却担心我们这些人会走回头路，不愿或不敢相信我们。我们大多数曾为此十分苦恼，一开始我们只能“物以类聚”。尽量找我们的“军大老同学”（这一直是我们黄埔同学在战俘营的互相称谓），在苦难中相互安慰，在黑暗中互相鼓励。共产党的歌不能唱了，国民党的军校校歌总可以唱吧，当我们在一起轻声哼唱校歌时，“预备做革命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两句歌词竟使我们热泪盈眶。我们忘不了革命前辈们为了祖国的新生所洒的热血，也忘不了在军大学习革命理论时，对共产党对新中国对共产主义的信服。我们总是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做一个真正的炎黄子孙，而决不认贼做父，甘当洋人走狗来互相勉励。但总又有一种“独善其身算了”的消极情绪。然而，战俘营的严峻形势却迫使我们很快投入了斗争。被俘之后，大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该如何对待敌人在生活上对我们的虐待。其中特别是饥饿折磨，美方给我们每天两个大麦米饭团和两碗清汤，确实是难受，更为难受的是当我们看见难友们为多吃一点饭而相互争斗的情景。

1951年6月初，我们二三百名志愿军被俘人员从釜山第十一收容所移到附近另一所大铁丝网里住下来。我们的饭食起初是由朝鲜战俘做好送去的，因为“僧多粥少”，两个美军士兵用尽了手段也管不好这些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战俘，抢饭打架的事天天发生。那种鸟兽争食现象，剧烈地刺痛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于是，黄埔23期学员郭乃坚忍不住挺身而出维持秩序。由于他会日语与当时共同关押在一起的朝鲜人民军难友能够通话，得到了他们的重大支持，他成了中国小队“当家人”。在他主持下，大家同甘共苦，不再有争饭打架现象。之后押来的中国战俘越来越多，美方管理人员要我们成立一个独立的中国大队，自己管理自己。朝鲜战友鼓励郭乃坚自告奋勇当大队长，他却认为自己的“黄埔生”历史不宜担此重任，他只愿当专管战俘卡片的“书记官”协助工作。但当时又找不到自愿出来当大队长这个“俘虏官”的党

员干部，大队长便被一位姓王的新参军的担架兵抢去，等到这位大队长和他的亲信多吃多占引起大家不满，郭乃坚才后悔了。幸好他的“军大老同学”王怀麟、阳文华也被押送来了，王怀麟有勇、阳文华有谋。根据阳文华的建议，郭乃坚趁美军要提一批人去巨济岛之机，利用他书记官的职权，将那位王大队长及其一伙亲信列入调离名单，打发到海岛上。推举王怀麟当大队长，而阳文华在下面联络其他军大同学及其他可靠同志来支持他，从而完全控制了这个大队的“政局”。后来这个大队全部移往巨济岛成为 86 联队的第一大队，为“86”反变色的爱国斗争奠定了一块基石。当时，在釜山其它中国战俘营的“黄埔生”也曾自发地投入“反虐待”斗争，赵国玺即曾在第十一收容所参与组织了一次“反饥饿”的绝食斗争。

1951 年 7 月以后，敌人加紧在战俘营推行其强迫战俘改变信仰，背叛祖国，拒绝遣返回国的罪恶政策，并大力扶植叛徒、特务搞白色恐怖，镇压战俘的反抗。战俘营内反对虐待和坚持民族气节的斗争，便向反背叛坚持回归祖国的斗争方向深化。这对我们这些黄埔军校学生是一个更加严重的考验。

在巨济岛上的中国战俘营、72 联队，美方早就派叛徒、特务对该营实现了严密控制。那里的忠贞与背叛斗争，就更为尖锐艰难。特别是其中的“军官大队”，敌人难以在较高级别的军官或老共产党员中“策反”，自然就将希望寄托在那些原国民党起义军官身上，特别是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军官身上。于是黄埔 23 期学员张济良就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他是湖南人，长得挺英俊，对人热情直爽，说得一口漂亮的英语，到了军官大队被已在联队部工作的“同学”路禄推荐当上了大队“翻译官”。军官大队大队长叛徒王友敏多次找张济良“谈心”，极尽利诱、威胁之能事，要他参加军官队里的秘密核心组织“国民党六三支部”（取“流散支部”的谐音）。张济良再三考虑之后，决定将计就计打进其核心，了解其内幕和动向。因此，一些内部情节就由他通过原九十五军起义军官

彭林源源不断汇报给军官大队中我们的地下党支部领导人孙振冠教导员，有力地支持了那里反背叛斗争。不久他被美军“牧师”伍培礼“请”去当他的翻译。这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张济良在亲自对他进行考察之后，便提高了警惕，努力设法离开这家伙。1952年11月初，军官大队我地下党支部发动了以签名方式集聚力量，集体向美方提出要求取消战俘营内特务控制和镇压的大规模斗争。张济良立即通知当时已调往联队“文娱小队”的彭林和骆星一回军官大队参加签名。在地下党支部领导下，经过200多签名难友的坚决斗争，迫使美方将签名者移送第71联队。他们三人和大家一起冲破了叛徒、特务的控制来到“71”，参加了巨济岛上第一个中国战俘“红色根据地”的建立。从此，张济良如鱼得水，以翻译身份全身心投入了集中营斗争中的外交和敌工工作。

而在72联队的战士队里，曾在釜山以战俘代表身份和林学逵一起发动过绝食斗争的赵国玺，却在另一种条件下进行着更为艰难的反背叛斗争。按说赵国玺是具有国民党宪兵和黄埔24期学员双重“反动身份”的，然而，正是这个经历使之有了更为强烈的两种军队的对比体验。更加坚定地相信共产党，更加热爱新生的祖国。何况在72联队再一次看到特务横行专制虐杀战俘的行径。赵国玺不顾白色恐怖，开始和林学逵一起暗中联络难友寻找地下组织，好不容易和隐蔽在战士队化名杜资明的团参谋长杜岗联系上了，参加了他领导的“回国同志战斗总部”组织并担任了总委委员。然而正当赵满怀激情参加斗争的时候，该组织不幸被叛徒出卖而遭到破坏。杜岗、赵国玺都被特务看管。赵被长期“夜审”，受尽毒打、轧杠子等酷刑，逼其供出组织人员名单。赵只咬定一句：“我自己要回国，与别人无关”，保护了其他战友。

1952年初美方在海边成立一个专门从事海港搬运的苦役战俘营——70联队，敌人便将72联队中的“不稳分子”、“顽固分子”送往70联队服苦役。赵被送去后又秘密参加了张城垣、韩子

建、门培英等党员干部领导的夺权斗争。在那里，他见到了黄埔校友阳文华，阳也是领导成员之一。“四八甄别”时，赵带领其联系的爱国难友一起到达“602.回国支队”。

在72联队还有赵志道、黄祖籍、朱国民等黄埔生在极其艰险的情况下，各自以不同方式、力所能及地进行着顽强斗争，而在最后关头都能誓死表达回国意愿到达“602回国支队”。

与此同时，在86联队，黄埔学员们也在该战俘营激烈地进行着反背叛、反变色斗争，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和手段形成一条重要的爱国阵线，跟该营的地下党组织和爱国弟兄会密切配合，阻止着敌人欲将“86”完全变色的企图得逞。他们的共同点是：既有文化又有国民党黄埔军校生这一护身符，具有担任队长、书记、文书、卫生管理员、各部门管理员乃至“战俘代表”等各级俘虏官的“资格”。他们充分利用了自身这种“优越性”，努力占领着战俘营的行政岗位，争取建立像抗日时期的“两面政权”那样的爱国阵地。具有代表性的是在联队部担任过副联队长的阳文华和一直担任书记长的郭乃坚，他们起着一种“保护伞”的作用，掩护了许多党员干部、斗争骨干，使他们能较为放手地开展宣传教育、组织群众的秘密活动。保护他们不受叛徒特务的迫害。在各大队、中队有王怀麟、吴春生、罗厚根，刘英虎、黄赓、王铁龙、李焯等一批黄埔生占领着有人事调动权的书记官职位，也在各自岗位上张开自己那小一点的“保护伞”，掩护着本大队、中队里的反变色斗争。1951年10月9日的“反对升国民党旗斗争”被镇压之后，“86”联队形势根本逆转，叛徒们组织的“反共抗俄同盟会”到处招兵买马，黄埔生自然成了重点发展对象。当我们加以婉言拒绝后，又立即变成重点怀疑监视对象，各大队被叛徒们夺权之后，我们连自己也保护不住了。只有一点我们能坚持住，那就是绝不同流合污。

11月份美军当局要调一批人到釜山去做劳工。郭乃坚立即暗中通知吴春生，吴和军大老同学刘英虎积极活动，造表填册，组

织了百余人到釜山。去后，刘英虎到第二号收容所当翻译，吴和李炽、罗厚根等 100 多人到了第五号病俘收容所做勤杂工，在那里建立了中国服务大队。我们接受了“86”教训，视“掌权”为第一重要大事，当即吴被选为代表专管外事，杜大举为行政大队长，李炽为中队长，公认军大学员王铁龙和共产党员魏善洪做幕后指挥者。在釜山近 4 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和朝鲜病俘难友亲如一家，共同对敌，牢牢地掌握着领导权，带动全体人员和朝鲜反动分子们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我们在那里学政治、学文化，偷看敌人的报纸，谈论着和谈的进展，兴奋地期待着回国的消息。但是，时间一长，我们就放松了警惕性，被眼前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因朝鲜叛徒告密，3 月中旬，吴和杜大举、李炽以及另外两个中队长被美军宪兵抓走，押进铁丝网里的小监狱。几天以后又被押送到“86”。此刻的“86”已变了样，各大队的环境都布置得金碧辉煌，一条条反动标语，一幅幅反共对联就镶嵌在那一片片“金碧”之上，乍一看到真叫人毛骨悚然。

“你们是蒋校长的宝贝疙瘩！”

当时，李炽被送到了一大队，新上任的大队长是军大学员贾忠林。对李炽表示“友情”，想感化他一起反共抗俄而暂时未施加压力。吴春生被送到了四大队一个小队里，原以为会遭反动分子报复，不料一到那里，小队长对吴十分客气，让吴和一位老同志挨着安了个铺位。这位老同志是部队的“炊事上士”叫郝秉义，晚上他们俩蒙着毯子窃窃私语、无话不谈。从他那里吴知道这个小队一切情况：这里还有 1/3 以上的队员没写去台湾的“申请”，没刺字。小队长也从不强迫，吴心里就稍微平定了些。

第二天，小队长在“生活会”上当众介绍了吴春生的情况。说吴是原来一大队书记长，黄埔军校学生，刘大队长特别关照了的。他破格给吴一些优待，不出公差，不参加唱反动歌，不参加讨论，出小队不用报告等等。到此，吴就有了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但

愿能够这样平安熬到回国那一天。后来知道，吴春生一进这个铁丝网就引起了刘大队长的注意，小队长的话没错，刘大队长确是时刻都在“关照”吴的。

一天，吴和刘大队长在大队部前相遇，他把吴请到他的办公室。初次见面，只寒暄了几句，吴拿了他一块口香糖就告辞了。

第二次，通讯员专意来请吴，在刘大队长那里摆有一些饼干、罐头食品，互相拉了些家常，就回去睡觉了。以后又有三四回这样的交往，刘从不谈政治，也不说“86”的过去和现在。到第5次，刘才开始了攻心战。“老弟，我看你白白长这么大，保准连女人也没挨过，要是死在朝鲜亏不亏？”吴春生只觉得满脸发烧，无言以对。“在八路军里，要熬到营级才能带老婆，你能受得了吗？前几年，像你们这些洋学生，什么交女朋友啦，挎密丝逛马路啦，多风流！”此刻刘某人撑起身子，伸长脖子现出一副狡黠的脸色。又说：“老弟，到时候，有那么一天，你要肯赏脸，我请客，领你到一等妓院里玩一场。那才叫痛快哩！保你不再想家！”说罢，他又觉走了嘴，说了些自己是“粗人”，“心直口快”，“话遇知己格外多”之类的话，给自己圆了场。

以后又有过两三次同样的“拉家常”，只是偶尔暗示了一下“今后的打算”。他还不止一次地说了些“人各有志”之类的“通达”话。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最后一关还没过呢！一天通讯员又来说“大队长有请了。”吴一进到大队部的帐篷，就觉得气氛不对。冷不防一阵掌声从那烟雾缭绕、灯光摇曳、人影晃动处响起，接着便听到有人说了声：“吴书记长请坐！”

大家都坐下来，眼前的六七个不相识的人，桌上丰盛的食品，刺鼻的烈性酒和乱七八糟的中西结合的餐具，不禁使吴有些眼花缭乱了，而其中两把铮亮的餐刀尤其扎眼。刘大队长的开场白很简单，只说：“一是让这位小兄弟和大家认识认识；二是庆贺一个好消息，咱们这就要到自由世界去了。”

他的话一落音，与会者无不热烈鼓掌，眉飞色舞，并都争先

恐后地发表演说，畅谈感想。吴也装作受了“感染”连称“好好好”。

在他们举杯祝贺时，刘某人知道吴不会喝酒，也没勉强。可当他们听说吴春生不跟他们一道去台湾，也不去美国、瑞士的时候，他们都惊诧了。刘某人深表惋惜地说：“人家是军政大学毕业，共产党的红人，人家要回大陆去哩！”

“军政大学算个啥！连个排级干部都当不上！谁不知道黄埔军校出来就是少尉，这回要是到了台湾，你可是蒋校长的宝贝疙瘩呀！”

“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失掉到台湾去的这一次难得的好机会！你咋想不开，到底为了啥呀？”

接着又是一阵群起而攻。说吴“傻”，不识时务，最后又要吴说出个究竟缘故来。又是那位刘大队长为吴春生解了围：“算了，算了，别瞎喳喳了，人各有志么？来，喝酒！”于是把他大茶缸里的酒往一个小搪瓷碗里倒了些，放在吴面前说：“老弟，我知道你不喝酒，可咱快要各奔东西了。哪怕你光沾沾嘴唇呢，也得表示表示……不枉咱们兄弟一场，就算留个纪念吧。来，干！”吴没有只让那酒沾了沾嘴唇，而是狠狠地喝了一大口，酒呛得他差点喘不过气来。

“好！够朋友”大家便轮流向吴敬酒。并说喝完了碗里的酒就放他回去睡觉。吴便把酒喝完，说声“失陪”放下酒碗起身要走。“不行，还没喝我的，来！”边上一位打手不等吴站起，就手握刀子把吴一按，接着，一把美军不锈钢的大杯子便朝吴的脸上操来。“咣当”一声，吴便连人带椅子一起仰翻在地。在一阵骚乱中，刘大队长将吴扶起，又快速转身过去给了那家伙一记耳光。骂道：“混蛋，你发什么酒疯！”

那家伙恼了。隔着两三个人，挥舞着刀子，蹦跳着哇哇怪叫：“……姓吴的，你别不识抬举，你敢瞧不起咱弟兄！你有啥了不起？不就是个黄埔军校么，屁！你死跟八路走，就是国军的叛徒！你

拍拍胸口想想，一不叫你参加组织；二不逼你刺字，处处优待……大队长待你好，我可六亲不认！问你为啥不去台湾，你连屁也不放，我就不信，这刀子扎不出你一句话来！”说罢一扬手狠狠地把刀子投向桌面，“咚”的一声，刀子扎在桌上。“混帐！快滚出去！”刘大队长一声喝斥，那人被连推带拉地弄走了。

室内好一阵子沉闷，静得几乎能听见心跳。后来，刘大队长终于哑着嗓子说话了：

“说句良心话，老弟，我是真心喜欢你。一是爱你的人才，二是看你为人忠厚，咱这大老粗愿意和你交个朋友，自知有些高攀。直说了吧，我是有个私心眼的，就是想拉你去台湾，跟着你沾点光。你这军校牌子到了台湾吃香，蒋校长一定会重用你们，用不了几年就高升了。可，我们算啥？杂牌军一个！我们在大陆就是后娘养的，到了台湾还能好多少！总想着你老弟到了台湾比咱强……等你升了师长、军长的时候，你还能忘了咱们这铁丝网里的患难之交么？可是，你怎么喝了共产党那么多迷魂汤，你究竟为啥不去台湾呢？”

如果刘某会演戏的话，准是真的动了感情。这时，他眼眶里的泪水已经掉出了几滴，并且声调都有些哽咽了。

吴春生盯着刘的眼睛轻声地说：“大队长，我谢谢你的一番好意。就象你刚说的，人各有志。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回家，我想家，想我的父母兄弟，还有我的未婚妻。”说着也动了感情。

这一下，全场人都没辙了。好一会，刘大队长才拍拍吴说：“兄弟，你太年轻了！……”

“你背叛党国就别想活！”

“86”联队在“四八甄别”时，尽管美方也唆使特务、叛徒对难友们进行百般恐吓、阻挠，尽管联队部里也有一个当上联队副的、投靠了敌人的黄埔生王尊铭控制着联队部，但他们尚未能严密控制住全联队，不敢过于猖狂。以郭乃坚为首的“86”爱国



黄埔生经过斗争顺利地冲破敌人的阻挠到达了“602 回国支队”。

但在“72”的爱国黄埔生却是另一种遭遇。4月7日晚，李大安亲手杀死了坚持回国的林学逋烈士，将烈士剖腹挖心。第二天清晨，李大安又领着已完全认贼作父的黄埔生路禄来到军官大队专门监禁“危险分子”的帐篷，“看望”被押在那里的阳文华。阳文华是在被送往“70”队服苦役时，又积极参加夺权斗争，被叛徒们告密，他和张城垣、姜瑞溥、续兴林等6位领头人被美军押送到“72”军官队来加以严惩的。他们已经被残酷折磨了一个多月了。路禄是阳文华的同届黄埔校友，他劝阳文华“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遭到痛斥之后，便恼羞成怒。他骂阳文华是“有辱黄埔军校荣誉、背叛党国的叛徒”，一边用棍棒毒打，直到用尖刀刺进阳文华心脏。阳文华始终未屈服求饶，这位黄埔生，用他年轻的生命维护了做人的尊严，维护了祖国的荣誉！也遵从了黄埔军校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教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1952年“四八甄别”之后，当巨济岛“71”、“70”、“86”、“72”各联队的共5000多名坚持回国的中国战俘，冲破层层阻力来到602战俘营之时，爱国的黄埔生们也汇集到一起了。他们流着眼泪互相察看着对方在遭受长期折磨后留下的创伤，交换着一年来各自的遭遇和对美军、对叛徒的仇恨，愤怒地谴责那几位失节叛国的黄埔同学，对阳文华校友的壮烈牺牲无限悲痛与尊敬。他们互相勉励要完成阳文华烈士的遗志，将斗争进行到底。

至此，战俘营里的黄埔军校学生泾渭完全分明。大多数坚持了民族大义和革命气节，而极少数则堕落成为民族的罪人！

“602 回国支队”成立了统一的地下党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之后，爱国黄埔生们以对祖国的忠诚和突出的斗争表现，大都第一批被吸收入会，并被分配到重要岗位上工作。郭乃坚担任支队书记长；张济良调到团结会总委会的敌工组，参与外交和敌工工作；吴春生调往支队宣传队发挥其美术和文艺才干。其他军大老同学都分在下面几个大队里，在翻译、代表、书记等岗位上

发挥着斗争骨干作用。

1952年7月，“回国支队”被全部移送济州岛第八战俘营后，和谈僵持，看不见回国曙光，而美方又加强了分化瓦解、血腥镇压。爱国黄埔生们在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下，各尽其力，努力完成总委会下达的“团结、学习、斗争”的各项任务。吴春生和黄赓在第九分号营场担任了正、副宣传队长，他们和高子、莫非一起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十分出色地以自己创作的歌曲、话剧、舞蹈，鼓舞着难友们坚持回国的信念。吴春生还被任命为该号团结会的分委委员。赵国玺则分到第七分号营场，被任命为该号团结会分委委员，参加该号的领导工作。在1952年“十·一”升旗斗争中，该号遭到美军的血腥屠杀，赵与代玉书、李国堂一起领导护旗敢死队英勇抗敌，赵与其他120多名战友身受重伤，荣立特等功。赵在釜山治伤期间，仍坚持工作，在那里迅速建立起团结会支部，领导难友们继续斗争。

1953年秋，和谈签字，“回国支队”的6000余名中国战俘，在坚持了两年多的血与火的斗争之后，终于盼到了回归祖国这一天。

回国后，我们这些黄埔生也和所有志愿军归俘一样受到“终身控制使用”的不公正对待，遭受了几十年磨难，所幸的是我们大多数还能活着。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下达（80）第74号文件为我们全体志愿军归国战俘落实政策。我们也恢复了军籍，恢复了政治名誉。虽然我们都已进入暮年，但回顾40年前我们在美军战俘营的斗争岁月，回顾几十年来虽身处逆境而仍然坚持了当年我们对祖国的信念，对人民的一片赤忱。今天祖国繁荣昌盛，看到海峡两岸靠得愈来愈近，我们这些当年的黄埔生不禁又心潮澎湃，总想着怎样才能去为祖国的统一、人民的幸福奉献余生。

（吴春生 赵国玺）

### 拼死冲出“中立区”

我被俘后，一直关押在72集中营，这个营场是大家知道的暗

无天日的“阎王殿”。侵朝美军司令李奇微视察“72”营地时，称赞它是巨济岛上的“模范”战俘营。

1951年4月7日夜幕降临时，小队长宣称：“联队通知愿回大陆的都到礼堂去开会，绝不给大家为难。”我心动了一下，但没有冒失站出来。不久礼堂里就传来了受刑人的惨叫声。半夜过后，警备队员把我们从昏睡中叫起，只见联队副李大安手提一串从刺字人臂上割下的人肉，一手握着刀尖上挑着的一颗血淋淋的人心，恶狠狠地恐吓大家说：“这就是跟毛泽东走的人的下场！你们要回大陆，就跟他们去！”我暗自庆幸自己没有上当。一时间营场内阴森恐怖，使人肉跳心惊，整夜我根本无法入睡。

第二天，我跟着参加“甄别”的人群行列，头就像灌了铅似的，昏昏沉沉进入临时设置的帐篷内。当“甄别”人员问我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时，我仍怕是特务们玩弄的花招，没敢表示愿回祖国的真心，而是违心地走向愿去台湾的那个铁丝网夹层。当我眼见不少难友乘上了汽车离开这座“阎王殿”时，已是追悔莫及，无法挽回了。但我回国之心不死，总想寻找机会脱离这无边的苦海。

我的心意，早已被特务们窥透。在1952年5月我们从巨济岛转移到济州岛的慕琴浦后，我就被特务列入“不稳分子”的名单，受到严加看管，并遭到凶残的迫害。为了堵死我回国的道路，让我早死回国的心，特务们在我胸膛上刺了两面国民党的旗帜和反动口号。当时，我咬着牙想：刺字由你，回国由我。你刺在我身上，刺不到我心上。同队的车学智暗中激励我说：“解放战争期间，阎锡山青训师的官兵都被刺上了反共标语。太原解放后，这些人不但没有被杀，而且医生替他们割掉了字，他们不少人还参加了解放军。”

美蒋特务对我们既用毒辣的手段胁迫刺字，又施以卑鄙的诱降花招。

1953年10月初，战俘交换已结束。一架台湾飞机降落在济州

岛机场，为首的是一个国民党中将军官，在美军管理人员陪同下巡视了营场。特务中的头面人物王顺清之流集合全场人员，听中将讲话。他首先抬出蒋介石，说：“蒋总统对你们这些‘反共义士’非常看重，特派兄弟前来慰劳大家。蒋总统欢迎大家去台湾参加反共复国的大业。弟兄们去了台湾，愿从军、愿从学、愿从事其它职业，都悉听尊便。保证提供条件，满足要求。”还假惺惺地说：“你们不久就要到中立区去，共产党要骗你们回去，这关系你们一生前途，决不可回大陆去。你们若是回去了，共产党将会用‘三头政策’收拾你们。啥叫‘三头政策’呢？就是在中立区共产党人向你微笑点头；离开中立区就强迫你认罪低头；过了鸭绿江判你死罪杀头。”最后，他用“兄弟代表党国及本人再次向‘反共义士’们表示敬意”结束了他的讲话。还恐诱骗不力，份量太轻，又给大家放了一通蒋介石的讲话录音。最后宣布并展示他带来的慰劳品，分给每人蒋介石照片一张，印有青天白日的背心一件，军装一套，呢大衣一件。此外糖果两包，罐头两听，香烟一条。各营场还分别给了篮球、排球、扑克、书报、铜锣、铜钵、铜号、皮鼓等。面对这些物质引诱，我不屑一顾。我一心只想早日见到祖国亲人，结束这种苦难的日子。

送走这批人后，特务们加紧了去中立区的准备工作。首先他们要难友们订立连环保，一个人回了国，就要处死前后的保人。同时还强迫大家演习对我解释代表进行攻击、辱骂、殴打、伤害的方法。

1953年10月10日，我们被移送到中立区。表面上由印度等中立国部队接管，但内部的管理照旧，特务的控制更有增无减。解释工作开始那天，不让我们前去，而由大小俘虏官、特务叛徒们轮番冒名顶替去解释场地捣乱，致使解释工作无法进行。当时能逃出魔掌的人实在太少太少，像王旭、李金泉等难友，要不是利用他们大队代表和大队长的身份，是很难见到我解释代表，更不用说申请表示回国意愿了。我这个挂了号的不稳定份子，根本见

不到解释代表。

眼看解释工作快要结束，特务们兴高采烈盘算着去台湾的日程，我心急如焚。想：再不采取行动，就会永远回不去祖国了。我暗地同好友刘双桂商量，决心不顾一切寻找时机拼死跑出去。一天，刘双桂终于趁机跑了出去，特务对我的控制更加紧了，屎尿屎尿都有特务跟着，机会难找，但我仍决心拼死冲出去。

1953年12月1日，早上集合点名的时候，我趁特务不备朝大门猛跑，小队长发觉后，握着匕首紧追上来。为了惩治这家伙，我有意放慢脚步，让他临近时，顺手提着身披的大衣向他扑去，就势把他按倒在地，用锥子刺进他腰上。并向难友们高呼：“快跑呀！再不跑就没有机会了！”一时队伍乱了套，不少难友趁机纷纷向营大门冲去，这次冲出的难友共109人。后来听说这是不直接遣返人员要求回归的最多的一次。（非直接遣返申请回国的共有424人，这次回归的占25%）

可能是回来的人多吧，解释工作代表团的人员前来迎接我们。当见到亲人时，我们都泣不成声，哭成泪人，欢迎的人们也热泪盈眶。住定后，我见到了曾组织我们坚持回国斗争的车学智营长，历尽苦难之后，我们在温暖的祖国怀抱中重逢，不禁失声痛哭。次日，代表团团长黄华亲自接见了我们，并安排我们向中外记者团控诉美蒋特务的滔天罪行。（梁光辉述、管同应整理）

### 毁敌机、跳伞回祖国

我1927年出生于辽宁省辽中县老观坨乡老观坨村一个农民家庭。后来考入国民党军校23期通讯兵科，1949年底在成都起义。1950年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大川西分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六十军一八〇师司令部电台任报务员，1950年3月随军入朝。

1951年5月24日，我在师前线指挥所，同师首长一道突围，至27日在鹰峰被打散，我独自向北突围到29日，在冲过封锁线

时陷入敌手。

被俘后，我被关进南朝鲜巨济岛第 72 战俘营第五大队。当时“72”已被叛徒特务所控制，他们一方面对坚定的共产党人进行迫害，一方面胁迫战俘去台湾。当特务们发现了我曾是黄埔军校学生后，就千方百计动员我在要求去台湾的血书上签名，要我出任俘虏官和带头在身上刺反动字。我以不介入政治为藉口拒绝了刺字、签名，只同意为难友们生活服务，担任五大队翻译。

1951 年 7 月 14 日，72 联队部来人手持着我的战俘卡片，说美国人调我去审查。美军将我们 30 多人，用登陆艇送到釜山美军情报机关，没几天又送往日本东京美国远东军总部（U. S. Far Eastern Commanding Group）。我们在“联络处”的一个铁丝网内，换掉带有 PW(战俘)字样的衣服。一个美军特务王麻子大尉(美籍华人)对我等进行了个别审讯，然后用卡车将我们送往东京情报学校。一个叫威廉·戴维斯的美军中尉宣布：“你们已经不是战俘，而是‘联合国军’的情报员了。”我们对美军的这种欺骗行为极为愤慨。一个叫王善的战俘当即表示：“什么工作我也不干，等战争结束后，我要回中国去。”该校副校长水野（美籍日人）大怒说：“到了此地，就不能由你了。”王善回答：“我就是死也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于是他被押走，再也不知下落。情报学校的美军特务常常威胁说：“你们要认清这是什么地方，谁要想不干决不会有好下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被迫写自传、照相和在英文卡片上盖了指印，情报学校便藉此进一步要挟我们。在此期间，我痛苦至极，总想：作为一个中国人，怎么能丧失自己的民族感情，作出背叛自己国家的坏事呢！我怀着这种自责的心理，被迫地接受着情报学、武器学、欺骗学、跳伞学等特务训练课程。后来又学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编制、地理、记忆法、观察法等。我们受完特务训练经过短期实习，即被送往美国远东军总部联络处汉城派遣队(代号 8240)所属战术情报作战组（简称 T.L.O.）。这个组是以空降、海岸潜入、火线潜入等方式派遣特务到北朝鲜的前线和后

方刺探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兵力兵种、炮兵阵地、运输线等军事情报和调查美军细菌战效果。战俘们既不愿意充当特务去干背叛自己祖国的坏事，又难以忍受特务机关的逼迫，有的人被关了几个月禁闭，不少人企图逃跑和自杀。当宣布我们这个组 5 个人被空降到谷山一带执行潜入任务时，我心情矛盾重重。

1952 年 2 月 19 日，我们 5 个人登上一架美制 C—46 型运输机，在 12 名美军押送下强迫在北朝鲜谷山郡空降。我下定了决心，在跳伞前就揭开特务机关发给我的美式手榴弹盖，当我的四个同伙先跳伞，我最后一个跳。在跳出机舱时，我一只手拉住伞带，另一只手将手榴弹投向机舱。飞机立即被炸毁，驾驶员和一个班的美军一半被炸死，一半连同机体坠落下来。我跳伞着陆后，立刻投向当地我志愿军部队，并揭发了美军强迫我接受特务训练和派遣的经过。回到祖国后，北京军区奖励我 800 元，给予转业安排工作待遇。柴成文和赵勇田在《板门店谈判》一书中这样写道：“张文荣在关键时刻，临危不惧，以自己的英勇行动向祖国——母亲报到”。（张文荣口述 张城垣整理）

[附]

### 叛徒李大安的下场

1953 年 4 月 22 日深夜，一架美军运输机从汉城军用机场起飞，偷偷地往北方飞去。当飞机飞临北朝鲜飞来峰上空时，吐出了两朵“黑牡丹”似的降落伞。降落伞带着两名全副武装的“志愿军”和收发报机，平安地降落在一片灌木丛中。这两名空降特务，一个叫王勤，另一个就是在中国战俘营里双手沾满志愿军战俘鲜血的大叛徒李大安！

与此同时，朝鲜碧潼郡内务署的保卫人员在听到半夜飞机声后，立即在飞来峰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李大安和王勤尽管曾在仙甲岛和汉城的美军特务学校受过训，仍然没有逃脱高度警惕着

的朝鲜民兵的搜捕。民兵们高兴地将这两个垂头丧气的空降特务移交给了志愿军司令部。

志愿军司令部经过初步审讯，查清了他们的战俘身份，随即将他们押送回国。

李大安在巨济岛上，曾经用美国主子给他那把匕首割战俘们的肉、挖战俘的心，以阻止战俘回归祖国。他万万没有想到当他完成了“任务”，自己在战俘营已没有多少用处之后，美国主子反而会用这种方式将他“遣送”回国！

1958年6月24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以“投敌叛国、屠杀我被俘人员、充当美军间谍、危害我国安全”罪，将李大安判处死刑！

祖国终于为被李大安杀害的烈士们报了仇、雪了恨！

•（方向前）



## 长眠于异国孤岛上的烈士英魂

## 不畏强暴的林学逋

整整 40 年过去了！许多记忆都已模糊。但你那颗被敌人剖腹挖出穿刺在匕首尖上的心，那颗鲜红的、冒着热气的、仍在微微搏动的的心脏啊，却依然晃动在我们眼前！你临死前愤怒的呐喊：“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你就义时深情的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也仍然轰鸣在我们的耳际！

整整 40 年了，太平洋上汹涌的波涛仍然在冲击着巨济岛，我们却无法到岛上去寻找你的遗体、当时敌人为了消尸灭迹，把你肢解后藏在粪桶中倒入大海里。你的肉体可以化为太平洋的苦水，但你那铮铮忠骨是化不掉的。它将埋在海底成为永恒的化石，作为中华儿女为祖国英勇献身的见证！作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浩然正气的象征！

40 年前，你还不到 20 岁啊！在你知道敌人要下毒手时，你却对我们说：“我死而无憾。只要对得起祖国人民！”我们终于冲出牢笼回来了，你却倒在了异国的孤岛上，再也回不到你深深热爱着的祖国，再也见不到你日夜思念着的骨肉亲人！

我们不禁想起了 1950 年冬你参军时的情

景：那是在成都四川大学英语系的一次集会上，你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届大学生，第一批发展的青年团员，腼腆地站起来要报名参加志愿军。你说你会用英语喊话去瓦解敌人。

入朝后，你背着近乎体重一半的沉重的背包、干粮、武器，咬紧牙关和我们一起行军。有一次你被炸弹掀起的土块埋住了，你拱出来拍拍土笑着说：“龟儿子没把老子送上西天，我就继续革命！”

我们部队一上去就消灭了美军一个坦克连。你可高兴啦！你的英语口语果然用上了，在押送美军俘虏时，你和黑人士兵谈起了他的家乡加尼福尼亚的黑奴生活，谈起了黑非洲他的祖先曾经惨遭殖民主义的掠夺的故事。美军下士哭了，忏悔他不该当兵来朝鲜杀害无辜百姓。

当部队不幸陷入重围后，我们厮杀了三天三夜，已经弹尽粮绝，你把仅剩下的两把炒面分给了战友们说：“我不会打仗，还是你们吃了好杀敌人。”半夜突围时，你却昏倒摔下山岩，和我们这些伤员、病号一起被敌人搜山队抓去。

在釜山战俘收容所时，你公开号召大家绝食来抗议敌人对我们的非人虐待。你再次使用流利的英语和美军上校辩论，痛斥美军违反日内瓦战俘公约的罪行，敌人从此把你当成眼中钉，阴险地把你押送到巨济岛那个已经被叛徒们控制了的第 72 号集中营。

叛徒们正发愁没有自己的翻译，曾动员你跟他们走。“凭你这样的学问，到台湾、去美国都可以平步青云！何必跟着共产党跑。眼下你要做苦工、挨冻受饿，将来停战返回大陆，也会遭怀疑，一辈子翻不了身！”你却冷冷地回答：“人各有志，用不着你们来替我操心！”于是，你虽不是共产党员，却已被敌人看成“死硬派共产党人！”他们恨你、怕你、严密地监视你，用苦役饥饿来折磨你！你却利用一切机会寻找地下党组织。当我们根据团参谋长杜岗指示，趁在海边做苦工的忙乱中，偷偷地发展你为“回国小组”的成员时，你眼里的泪光多么晶莹！你说：“我像无依无靠的孤儿终

于找到了母亲！”叛徒们看到苦役冻饿不能改变你的回国意志，又采用了软化的手段，把你调到“文工队”搞“创作”。你不仅没写出反动剧本，反而偷偷地哼唱《国际歌》给难友们听，叛徒们恼羞成怒，把你绑在柱子上打得昏死过去了。当你醒来发现自己手臂上竟被强行刺上了“反共抗俄”几个血迹斑斑的大字后，你愤怒地斥责叛徒：“你们能够在我的表皮上刺字；却永远不可能把这些字刻进我的心！”

1952年4月8日，美军强行在战俘中进行“甄别”，要我们每个人都明确表态：是背弃祖国还是回归祖国。叛徒们得到美方密令：用一切手段阻止战俘表达回国志愿。而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决定：要想一切办法鼓舞难友们坚决要求返回祖国。于是，在整个巨济岛上展开了一场忠贞与背叛的大决战！在这场维护祖国荣誉与民族大义的战斗里，你挺身站到了最前面！当叛徒李大安将你们“劳改队”集合在广场上，让四周站满手执“警棍”的警备(P.G.)队员，对你们进行动员：“蒋总统的船都来了，等着送大家去台湾过自由生活”时，是你勇敢地大声疾呼：“中国人当然要回大陆，台湾不能代表中国。”李大安猛然拔出了伍培礼牧师送给他的匕首，喊：“谁要想回大陆，得先把臂上刺的字给我留下来！”你坚定地说：“割下来吧，你刺的还是你割吧！”广场上难友们愤怒的眼光使李大安心慌了。他走到你面前一刀就割下你臂上刺字的大块肌肉，你仍然昂着头咬紧牙关任鲜血直流！难友们骚动起来了，李大安急忙叫狗腿子们把你捆起来抓到“战俘学校”的大教室里，那里已有几十名被五花大绑抓进去压倒在地的爱国志士。你被拽到台上，要你对何去何从再一次表态。你毫不犹豫地向下战友们喊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这庄严的呐喊轰鸣在整个72集中营，震撼着难友们的心！李大安眼红了：“好，你要回国，现在就让你回去！”他举起匕首逼近你的胸膛狂吠着：“你再说一次，到底要回哪里去？”你鄙视了一眼刽子手，又环视了一下战友们，用尽全力在匕首尚未插入胸膛时喊出了：“中国共产党

万岁！毛主席万岁！”

你英勇地倒下去了，你的红心被李大安挖了出来穿在匕首尖上，拿到各个帐篷去威胁难友们。“谁要回大陆。谁就和林学逋一样下场！”叛徒们没想到更多的难友反而被你的英雄行为所感召，他们在第二天正式“甄别”时选择了回归祖国的光明大道！

忠魂归来兮，林学逋烈士，我们的好战友！

1982年8月，党和政府正式追认你为光荣的革命烈士！祖国承认你是她最忠诚的儿女！你的家乡乐山市已在她的市志上留下了你这位优秀儿子的名字。

1987年4月8日，在你壮烈牺牲35周年的忌日，在你的母校四川大学召开了极其隆重的纪念大会，几千名你的校友聆听了你英勇斗争的事迹。你的英名已刻在母校那块“四川大学烈士英名碑”上！还可告慰于你的是：

今天，你为之献身的亲爱祖国已是阳光普照、蒸蒸日上了！  
安息吧！我们亲爱的战友，林学逋烈士！

（张泽石 赵国玺 丁先文）

[附]

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追认林学逋同志为革命烈士的批复  
川府函(1982)143号

乐山地区行政公署：

乐署发(1982)85号报告悉。

乐山市城郊公社林学逋同志，系志愿军一八〇师政治干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被俘，为争取返回祖国，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52年4月8日壮烈牺牲于巨济岛。根据国务院《关于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的规定，省

人民政府同意追认林学逋同志为革命烈士。

此复

四川省人民政府（章）

1982年8月18日

阳文华怒目圆睁

“人民早晚要惩罚你们！”

在南朝鲜巨济岛美军集中营腥风血雨的日子里，一批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因为坚持民族大义、拒绝背叛祖国，被推入血海！阳文华烈士就是被敌人残杀的一个。他壮烈牺牲时年仅 22 岁。

阳文华，1930年出生于陕西洋县东街一个商人家庭，祖籍湖北，原姓欧阳。其祖父因参加太平天国起义，被清朝政府通缉，隐居陕南，改姓阳。他父亲长年经商在外，文华只得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了清贫的少年时代。1945年夏，因家贫不得不从洋县中学辍学，入国民党工兵部队当兵。1947年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第22期，后在九十五军电台任职。1949年底随军在四川起义，合编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八〇师司令部电台，继续担任报务员。由于他工作积极，追求进步，于1950年成为起义部队第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入朝后，他曾在师部前线指挥所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突围、辗转、流离，当我们再次见到他时，他已是“86”联队——这个拘有8000多名被俘人员的战俘营内的副联队长了。

当时，战俘营里完全是一盘散沙，大家都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之下。随着朝鲜停战谈判的进展，“战俘”被作为一张王牌放到了开城的谈判桌上之后，战俘营内便开始了“信仰”与“信仰”之间的搏斗。斗争的焦点便是对大陆和台湾的抉择。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阳文华首先想到的是自己是个青年团员，是全师首批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作为一名原国民党军校学员，他对两种制度、两种信仰有亲身感受，何去何从，他已做出抉择。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他表面上以灰色的面目出现在大众面前，但

暗地里，却利用职务之便，私下安排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难友当了“俘虏官”，掌握了全联队的相当一部分中、小队的控制权。并在联队部翻译高化龙、安保元和书记长郭乃坚等一批大学生的支持下，形成了一个团结、互助、情同手足的核心。他们坚持反对虐待俘虏，拒绝在俘虏营中“清党查干”。他们还对每个新来的人加以试探、区分，并及时向爱国俘虏告知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朋友。

在他的暗中支持下，大批共产党员、志愿军干部隐藏了自己的身份，受到了保护。一些知识青年利用当文书、翻译或中、小队长的合法地位，在那里进行着灵活多样的爱国宣传活动。对于当时巩固革命军人气节和斗志起了积极作用。

阳文华和张城垣在战俘营的正式交谈是在进入 86 联队的第二天。他通过“86”医务所的朝鲜医生朴××把张叫到诊所里。他告诉张城垣，我们新来的 1400 名战俘被编为第六大队，新任大队长是新近从日本东京“美军心理作战处”受训回来的王福田，是个战场投敌分子，对王要提高警惕。他还告诉张，他已建议任命张为大队书记（即文书），要张利用职务之便开展工作。临走时，他随手递给张一张南朝鲜的报纸，上面登载着我方谈判代表坚持全部交换所有战俘的提案。后来，我们开展了全联队拒绝穿红衣服（囚服）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阳文华等人的努力下，“86”成为当时岛上几个志愿军战俘营中唯一没有对共产党员进行大规模残酷迫害的联队。

1951 年 8 月，敌人加紧了对“86”进行有计划的争夺领导权活动，大批败类、特务以新战俘的身份向 86 战俘营陆续渗透，原“86”的联队长应祥云、副联队长阳文华被强行调往釜山接受“审查”。

在审查中，他严守机密，立场坚定，无畏无惧，显示出他那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

1952 年 2 月，阳文华被押往巨济岛海边的 70 联队做劳役，在

那里我们又见面了。又在一起开展夺权斗争，不幸再次被叛徒发觉，我们一起被押送到人间地狱“72”。在“86”曾被我们痛打过的李大安一见我们就狂叫：“在‘86’你们打我，今天可轮到教教训你们了！”刹时，打手虎狼般扑过来，把我们按倒在地，每人先打20大棒。再由李大安用木棒打踝骨、砸关节，直到我们被打得鲜血淋漓，爬不起来。他还发明了一种“水鞭刑”，用帐篷布拧成鞭子，蘸着冷水抽打我们，直到把一桶水蘸干为止。我们在这皮鞭下的洗礼中，坚持了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和信仰。阳文华在敌人拷打时一声不吭，还鼓励我们说：“只要咬住牙，忍住第一分钟痛，以后就麻木了，不疼了！”

1952年4月7日，在美方对“72”战俘进行血腥“甄别”的前夜，战俘们被叛徒驱赶到大礼堂里，礼堂正面写着“反共抗俄誓师大会”。李大安挥舞棍棒高喊：“这次不是释放战俘，是美国人对我们的一次考验。谁回大陆我就宰了谁！”

从4月7日夜到4月8日晨，是一个难忘的恐怖之夜。

700多名要求回国的战俘被分批带进大礼堂，在那里，早已布置好的手持凶器的打手，进来一批打一批，昏黑的礼堂里，鲜血横流。

杀气腾腾的李大安手持尖刀，割下了几十名坚决不去台湾的战俘胳膊上的肉，边割边大喊：“要回家的，把肉给我留下来！”他把割下来的肉用细麻绳串成一串。串不下了，就盛在一只大碗里。那天夜里，有数百名志愿军战士被割下了身上的肉。不知有多少要求回国的战俘遭受酷刑以至残害至死的啊！

4月9日拂晓，李大安带领20多名打手冲进我们的“小监狱”，在一阵毒打之后，叛徒路禄走出人群，揪住阳文华，把他拉了出来。

“阳文华，你还认识我路禄吗？”

阳文华和路禄是国民党军校的同班同学，在部队中，路禄因不适应南方生活，时常得到阳文华的照料，两人情同手足。这一

次，为了得到在台湾邀功领赏的机会，路禄终于决定拿老同学阳文华开刀了。

路禄说：“阳文华，你我都是黄埔同学，都是蒋总统的学生，想不到你要回大陆？”

阳文华坚决回答：“大陆是我的家，我为什么不能回？”

路禄凶狠地扬起铁棒朝阳文华打去。阳文华怒目圆睁，破口大骂：“叛徒、败类，人民早晚要惩罚你们的！”打手们一拥而上，将阳文华吊起来，用铁棒抽打。阳文华一次次高声呼喊：“毛主席万岁！祖国万岁！”

十几分钟过去，阳文华已是血肉模糊奄奄一息了，他仍拼着最后一点力气喊出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此刻路禄猛地一棒打在他的头部，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

阳文华用自己的鲜血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正气歌。他壮烈的革命气节，进一步激发了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爱国精神。

由于在监禁期间敌人对我们的折磨十分残酷，我们每人都随时准备牺牲，当时都没有互相留下家庭地址。回国后，我们一直在寻找阳文华战友的亲属，特别是在1980年中央发布了为我们落实政策的文件以后，我们更加努力去寻找。直到1986年才由张城垣打听到阳文华的老母还健在，当时已94岁，跟阳文华的姐姐住在陕西咸阳。我们向她们汇报了阳文华的英雄事迹、表示了衷心的慰问！1988年，张城垣和吴成德专程到陕西民政厅陈诉了阳文华战友为维护祖国尊严而壮烈牺牲的事迹。1989年陕西省咸阳市政府下达文件正式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张城垣 姜瑞溥）

### 为护旗邓洪斌捐躯

每当看到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或听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歌声，我全身立即热血沸腾，心如刀绞，苦涩的泪水夺眶而出。眼前闪现出我那年轻的战友邓洪斌的英姿：小腹被敌弹打穿了，他



将随血冒出的大小肠塞进肚里，用布片拦腰捆紧，继续冲向敌群。最后倒在血泊中！他那张英俊的脸庞已深深刻进我的脑海，使我终生难忘。

我和邓洪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连队并肩战斗多年。我是连队文化教员、团支部副书记，他是军械员、团小组长，两人工作接触多，彼此感情深厚。

40年前，我们用鲜血书写请战书，终于被批准赴朝参战。在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因孤军深入被敌包围，在无弹药无粮食的情况下，我俩同时不幸落入敌人之手，最后一起囚禁在南朝鲜济州岛第八战俘营七号营场里。

在战俘营里，美军管理当局挖空心思，用一切卑鄙、阴险、残忍的手段来强迫我被俘人员背叛祖国，制造“中国战俘不愿回大陆要去台湾”的假象，激起了我们坚决顽强的反抗。

1952年9月底，为了配合板门店的军事谈判，揭露敌人污蔑我们“拒绝遣返”的阴谋，“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决定10月1日升起五星红旗，庆祝国庆，邓洪斌被批准参加护旗敢死队。他对我说：“一看见美国官兵白日青天搂着朝鲜妇女公开侮辱，就恨不得一天一夜打败美帝国主义，实现世界和平。”

他抚着尺多长蓬乱的头发说：“来，背背通讯处。”在那残酷的日子里，每个人随时随地都有死亡的可能。我们约定，如果战友中有幸存下来回到祖国的，一定要与死去的战友的亲人取得联系。并告诉他们：“你的亲人没有背叛祖国，背叛党，他是为人民而牺牲的！”在那时，这就是身陷囹圄的战士的最大愿望。

我们互相背了一遍，他扔掉烟头说：“唉！这次斗争是残酷的，死不可惜，可我刚享受翻身之福，正是为祖国出力的大好时光而被囚禁受苦，帝国主义害得我们多苦啊！”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我的心一动，只说了“别难过”三个字，喉咙也梗了。

国庆节前夜，海风呼啸，大浪冲击着海岸，如同天翻地覆。战俘营的勇士们的热血也似海浪在翻滚。那夜好漫长，大家想到升

旗庆贺国庆的喜悦，哪里睡得着？翻来复去地等待黎明。

天亮了，战友们望着祖国方向，异常激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冲到每个人的喉边，但怕暴露秘密又忍住了。

上午六点，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总委会一声令下，各分号的战友穿着干净的旧衣服，戴着缀有用铁皮做的红五星的军帽，举行了国庆仪式。然后冲出帐篷，列成纵队，掩护护旗敢死队，他们将用帐篷杆子绑成 10 米高的旗杆，迅速竖在营前。这时 10 把自制的军号一齐吹响，10 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上高空，迎风招展，显示着中华民族的骄傲与庄严。我们看到红旗，如同看到了天安门城楼，看到了祖国。战友们流着热泪，齐声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集中营旁的飞机场上，敌人慌作一团。扩音器里高喊：“不准升旗！不准升旗！”接着，坦克车、装甲车开来了，戴着防毒面具的美国士兵，背着步话机、毒气弹、火焰喷射器，气势汹汹地冲来，带着火箭的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怪吼。布鲁克斯气极败坏地吼着：“降旗！降旗！快给我降下来！五分钟内不降下来，统统打死！”几千战友，一个想法：红旗多挂一分钟，就多一分胜利。于是用更激越的歌声作为回答。

邓洪斌和敢死队的战友们，短装衣束，准备搏斗。布鲁克斯发疯了，用手枪发出进攻令，霎时各种武器一齐射向七号营场。坦克向天空发炮，气势汹汹地压倒大门，冲向人墙。前排的勇士倒下去了，后排的勇士挺胸而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歌声，响彻 10 个分号。敌人扔出催泪弹、糜烂性毒气弹，妄图夺下红旗。邓洪斌高喊：“同志们！为祖国立功的时刻到了！挡住强盗，保卫国旗！”他和战友们一起用石块、石灰包、木棒、开水，击退了敌人两次冲击。

坦克下，躺着寸步不让的中华儿女的尸体，血肉阻止了履带的滚动，持枪的敌兵绕过坦克向旗杆逼近。邓洪斌右腹中了枪弹，大小肠随血淤冒出来，他看到五星红旗有被敌人抢去的危险，忍

住剧烈的疼痛，撕下衬衣，将肠往里一塞，拦腰捆紧，神速抢步上前，配合另一勇士迅速降下五星红旗。并按计划用早已备好的汽油泼在旗上，将旗点燃，烧成灰烬，然后与夺旗的敌人扭打，嘶咬……

护旗斗争中，高勇、马如龙等 56 位勇士壮烈牺牲，邓洪斌、牛更新等 109 人负伤。中华骄子们的壮烈行动立即传遍了地球上每一个角落，有力地揭穿了敌人污蔑我们“拒绝遣返”的可耻阴谋。腹部负重伤的邓洪斌被送往釜山一收容所，并未得到认真及时抢救，不久即结束了他年轻的一生，年仅 20 岁！

他是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与荣誉壮烈牺牲的！他是祖国忠诚的儿子！

40 年过去了，邓洪斌的形象一直印在我的脑际里，不断地鞭策着我，激励着我，同时又折磨着我。因为我忘记了他家乡的地址，没有找到邓伯邓妈，没有将烈士的遗言告诉他的亲人。本来，他的通讯处我记得滚瓜烂熟，由于那次斗争后，敌人疯狂报复，我在肉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神志有些不清，只记得是西安附近某县人，是什么县全忘了。近年来多方询问，毫无结果。每当我与儿女们团聚欢乐之时，心里常常涌起一种负罪感——我太对不起洪斌同志！没完成烈士的嘱托，终身悔恨！

但愿邓伯伯邓妈妈和洪斌的兄弟姐妹们能读到此文，免我终生遗憾

亲爱的洪斌同志，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王勇超）

## 珍贵的战友情

### 与战友同生死的杜岗

杜岗同志是我们“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副书记，他离开我们多年了。每当我们抚今思昔，想起他那平易近人、忠厚朴实、英勇善战、坚贞不屈的崇高品德与英雄业绩，尤其是他一生多次的不幸遭遇就难以抑制住我们激动的心情。

杜岗，又名杜好名，1922年11月出生于山西省万荣县城关镇七庄村一个贫农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只上了几年初小就随父参加农业劳动，困苦的生活，黑暗的社会，使他养成了刚毅正直、见义勇为的性格。“七七事变”后，晋南大地到处弥漫着日军侵略的硝烟，面对乡亲父老处于水深火热的现实，他怀着求知救国的愿望，考入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第二分校。1944年转入抗大中条山大队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临汾县武工队任队长，战斗在敌占区里，为临汾人民的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于194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太岳军区警卫四团排长、连长、副营长。解放军六十军一八〇师五三八团三营营长，参加了运城、临汾、太原、西北、西南各战役，经历战斗百余次，5次负重伤。他任指挥员期间，充

分发挥了他的领导才能，不但在各次战斗中冲锋在前，撤退在后，而且能以父兄之爱、手足之情关心战士的思想和生活，把减少战士的流血牺牲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他能经常总结经验，研究技术，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使他的营连在许多重要战斗中出奇制胜，多次获得“英雄连队”的称号。解放战争期间，他的营先后歼敌 4000 余人，他荣立了大功并获得了西北“人民功臣”勋章。

1951 年，他被提为五三八团的副参谋长。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我们师掩护全线部队转移时，遭受到数倍于自己的美军包围。敌人仗着坦克和空军的优势，疯狂向我们阵地倾注钢铁，大地化作一片焦土。为了扬长避短，他组织部队与敌人短兵相接，连续冲锋，协同兄弟部队击溃了敌人一个坦克连后，夺路突围。由于后勤支援中断，部队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粮尽弹绝，十多天内，只能以皮带和野菜充饥，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到无法走路的地步。为了战胜饥饿，他忍饥带领 6 个人去找粮，中途遭到敌人的埋伏，而落入敌手。在这环境逆转关头，他心情沉重，但革命信念丝毫不移。他要求同时被捕的同志，千万镇静，不要被恶劣环境所吓倒，要挺起胸来，作好迎接艰苦斗争的准备。他自己立即作了应变措施，化名杜资明，以事务员身份隐蔽到战士中。在水原战俘转运站，他见到本团宣教干事张泽石在那里当翻译，即鼓励他利用翻译身份了解敌情、团结难友、开展斗争。不久他被移解到南朝鲜巨济岛 72 集中营。这里是敌人的魔窟，特务通过叛徒很快确认了他的身份，接着便将他关进专门监禁已查出军官身份的小队里，对他严密监视，施加人身折磨，强迫他带头叛离祖国去台湾。他公开向敌人严正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坚决反对去台湾，誓死要回祖国。”他在极为困难条件下秘密组织了“回国小组”，吸收爱国知识青年参加，并教育和鼓励被俘人员同敌人展开反迫害、反虐待，坚持回国的斗争。他总是在脖子上围条白毛巾，难友们互相传说：“想回国就找那个围白毛巾的大个子。”杜岗的

革命活动，对叛徒们是极大的威胁。他们早已恨透了杜岗，当他的斗争活动终于被特务发觉之后，便对他惨施毒刑，给他上压杠子，用木棒敲击他的髌骨；甚至将他推入挖好的土坑里，以活埋相威胁！他不屈不挠，敌人问他还组织了哪些人回国，他坚定地回答：“就只有我一个！”叛徒又把他拉到军官队毒打，打掉他4个牙齿，使他遍体鳞伤，步履踉跄。后经战友们营救和他本人坚决抗争到了“71”回国阵地，他又立即投入了“71”党支部的领导活动。

1952年4月，在“甄别”中，坚决要求回国的6000名中国战俘全部被拘禁到“602回国支队”后，杜岗立即积极参与组织领导6000同志的对敌斗争，任地下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副书记，负责行政领导，主持对全体同志进行军事训练，以适应战争情况下暴动的需要。他亲自组织安装旗杆，在集中营广场挂起了五星红旗，参与组织反对扣留的绝食示威斗争。是年7月，美军当局，为了进一步分化中国战俘，将我6000坚持回国的同志移拘于济州岛编散插乱，分别拘禁在10个小集中营，并先后扣走了总委书记赵佐端、副书记魏林。在这一极端困难的时刻，他肩负起代理书记的重担，加强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各级组织的建设，充实和调整10个分委和40个基层支部的领导骨干，保持了对敌斗争的正常进行。为了向敌人表示中国战俘坚持回国的斗争决心，他亲自部署了10月1日纪念国庆的斗争活动，敌人虽然在9月30日上午将他关进小监狱，但是9面五星红旗和一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与北京天安门升起国旗同时在济州岛上空飘扬起来。6000人在“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和敌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斗争。

在祖国的营救下，朝鲜停战后，杜岗随同坚持斗争的6000名同志胜利地回到祖国怀抱。在开城，他和战俘营的领导人受到了中央领导及志愿军首长的接见和慰问。

1954年11月，东北军区归来人员管理处用左的路线处理了

我们的被俘问题，他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随后转业到鞍山建设第二矿山公司任行政科长期间，他奋发努力，不计较个人得失，积极工作，荣获鞍山先进工作者和荣转军人积极分子称号，于1956年二次入党。1959年调任湖南湘潭钢铁公司行政处副处长，1965年任第四冶金建设公司企业公司副经理。1973年调任建字〇二五部队后勤处副处长，1975年调任山西铝厂行政处处长（行政14级）。他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任劳任怨，经常带病上班。由于他秉性耿直，疾恶如仇，对同志又和善可亲，生活朴素，作风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受到职工的尊敬和爱戴。多次被评为市公司和厂的先进工作者。

由于被俘这段历史，十年动乱期间，又受到了各种残酷迫害，以“叛徒罪”被长期审查和无情打击，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摧残，家庭子女也受到株连。1976年3月杜岗在出差途中突发心肌梗塞，急救无效不幸逝世。逝世后，仍以“被俘罪”不准正常办理丧事，不准悼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西铝厂根据中央（74）号文件精神，经运城地委和山西省军区批准，对杜岗的被俘问题作了新的复查处理，撤销了原开除党籍的处分，恢复党籍，党龄从第一次入党算起，并隆重举行了追悼会。确认杜岗是一位政治坚定，作风正派，深受群众爱戴的共产党员。他为人忠厚，作风朴实，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品德，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佐端 张城垣 徐寿田）

### 怀念郭兆林、王化英

郭兆林、王化英两位老战友是当年釜山地区中国战俘坚持遣返斗争中公认的领袖。他们两人都是一八〇师司令部的，郭兆林是炮兵主任（正团级），王化英是作战科副科长，他们也都是第五次战役中后撤突围时受伤被俘的。

郭兆林被俘后化名“李老汉”，掩藏在战士队中，他于1951年

7 月上旬被押往巨济岛“86”战俘营，先在 2 大队，后在医务室病号帐篷。这期间有张城垣、韩子建、郭乃坚、阳文华、刘英虎、边世茂、萧树钧、朱政权等人和他联系，请示对敌斗争的策略、方法。不久发现敌人在查找他，经郭乃坚介绍，通过医务室朝鲜人民军医生金光贤、朴明哲的帮助，去了岛上的战俘医院，后又转到釜山第六伤病战俘收容所。他在离开“86”前曾对留下的党员干部做了交代，要张城垣、韩子建建立党支部。让杨永成转告马兴旺，要他把“86”的青年团员们组织起来开展斗争。

郭兆林到釜山六所以后，和当时在三所的王化英等人，积极组织力量开展斗争。王化英被俘前两度负伤，右手三个手指被打断，腰部不能动弹，被俘后在釜山三所战俘医院。他化名王小山，自报战士身分，兼之已成残废，躲过了敌人的审问。他和郭兆林一起向接触到的战俘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发起组织“中国人爱国同乡会”，提出了“反饥饿、争温饱、反扣留、争回国”的口号同敌人进行斗争。

1951 年 8 月 1 日，他们发动三所 300 余名中国伤病战俘绝食一天，以抗议美军当局对战俘的虐待。他们包围了所内美军管理人员的办公室，高呼口号、游行示威，打响了釜山中国战俘斗争的第一炮！

当时釜山地区与巨济岛“72”“86”两战俘营比起来，形势要有利得多，在朝鲜战俘爱国力量的大力支持下，内部基础较好。各收容所里都有坚持遣返的爱国同志进行零星的分散的斗争。如一所有赵璧（化名曹友）、王洪度，二所有王铁龙，三所有张合顺、段天强，五所有杜大举、吴春生，六所有陶钧善，七所女战俘营有我们志愿军被俘人员中的唯一的女同志小丫，十一所有臧根旺、徐寿田。他们各自成立了“爱国主义小组”、“回国小组”、“毛泽东青年团”、“51、71 爱国小组”以及“中国人爱国同乡会”等坚持遣返的革命组织。为了壮大爱国力量，便于统一指挥，更有效地开展斗争，郭兆林、王化英两人于 1952 年 1 月中旬发起成立



“釜山战俘营抗美援朝同盟会”，以统一釜山地区各收容所中国战俘的各种革命组织。同盟会于六所秘密开会，选出总委会的领导成员：郭兆林、张合顺、王化英、韦光明、张金苏、臧根旺、徐寿田等人。郭兆林为书记，张合顺、王化英为副书记。从此釜山地区中国战俘的斗争在“抗美援朝爱国主义同盟会”的领导下进行。如十一所在3月份的夺权斗争，一所、三所在4月份进行的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甄别斗争等，都是同盟会统一指挥的。王化英在“甄别”之前暴露了身份，被美军当局自三所扣走，送到了巨济岛上72战俘营。他在那里受尽了折磨，于1952年4月9日经甄别到了602战俘营。他到“602回国支队”以后担任三大队大队长，“共产主义团结会”成立之初，他即被选为总委委员。到济州岛第八战俘营后，“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指挥中心设在八号营场，他即在八号营场兼任分委书记。他亲自给大家上“革命气节教育”课，主持军事训练，布置“十·一”升旗斗争的准备工作。“十·一”前夕，他被美军当局利用叛徒李小广认出，押到拘留赵佐端政委的，名为L号营场的“战犯监狱”隔离起来。后来，根据工作需要，他又伪装生病住院，转回了釜山，和郭兆林一起继续领导釜山地区的斗争。

1953年1月，郭兆林、王化英两人经过反复考虑，提出倡议并征得同盟会总委会同意，将釜山地区的“抗美援朝同盟会”统一在济州岛第八战俘营“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之下，同时号召釜山地区的难友尽可能地支援斗争最前线的济州岛的同志。从此釜山与济州岛这两股爱国力量，在坚持遣返的斗争中更加团结，更加有效地配合与呼应。同年4月上旬，板门店停战谈判出现转机，先行交换伤病战俘的可能性很大。根据这个形势，郭兆林、王化英两人建议成立“中国伤病战俘回国支队先遣队”，积极着手回国前的组织、宣传、外交方面的准备工作。在他们的带领下，先遣队自制国旗一面作沿途宣传之用，并不断向美军当局交涉，要求释放所有伤病战俘，包括在釜山被单独关押的吴成德同志。为

此，受到美军当局投掷大量瓦斯弹的镇压。

他们二人带领 1030 名伤病战俘于 1953 年 4 月下旬先期遣返。郭兆林和王化英两人被留在开城和谈代表团及解释代表团工作，向组织上提供战俘营的详尽材料，以争取更多的战俘得以突破特务控制，回归祖国。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任务。

回国后，郭兆林、王化英都转业到本溪工作。郭兆林担任物资局副局长，工作十分出色，深受群众拥戴！但由于被俘历史问题，也受到“终生控制使用”，几十年只能任副职，文革中还被打成“叛徒”。王化英先在本钢一厂化验室，他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以小学程度经过长期艰苦进修、达到了大学水平，被提任副厂长、厂长，本溪钢铁学院院长，本钢设计院院长。我们大家多么为他感到自豪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两人和赵佐端一起，首先代表我们 6000 人向中央申述大家几十年来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要求平反，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以后他们三位还不只一次到北京为大家上访。

在我们落实了政策，大家都决心为祖国奉献余生之时，他俩却因积劳成疾不幸先后逝世，使我们深为悲痛！您们走得太早了啊，亲爱的郭兆林、王化英战友！（赵佐端 杜学贤 臧根旺）

### 韦光明在釜山水牢中

韦光明（原五四〇团组织股长）在 1951 年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不幸被俘。后被敌拘留在釜山伤病战俘第四所。

韦光明参加了以郭兆林为首的釜山地下组织——“抗美援朝同盟会”总委会。他被选为总委委员兼任伤病战俘第四所地下总负责人，组织领导该所伤病战俘同美军和叛徒特务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

1952 年 4 月 9 日，美军搞所谓“志愿甄别”，企图强行阻止战俘回国。结果全四所 150 多名伤病战俘中坚决要求回国的有 120

多人，占 80%，使美军、叛徒、特务非常丧气恼火。为此，在 4 月 26 日，强迫回国的伤病战俘迁移时，美军投放了很多枚毒气弹，用刺刀刺伤了多名回国战俘。这时，战俘中出了个贪生怕死的叛徒张学文投奔美军，并指认出韦光明的领导身份。韦光明于 4 月 29 日被押往釜山水牢，给予残酷折磨。我们 10 人在被押往巨济岛时，看见了在单独关押韦光明的水牢门上，挂着他用鲜血写在白手帕上的：“反对甄别” 4 个红字。

水牢是个水泥池子，水深约半米，又脏又臭，池子四周是带刺铁丝网。对“重犯”还在池子一侧隔开一个“单间”，单独监禁。囚犯每天都强行被赶入水牢中处罚半天，已经十分虚弱的战俘被迫站在水中，太困了，太累了，往往倒向铁丝网，被铁丝尖刺伤流血。这是敌人迫害我们的一种非常残忍的刑罚。

韦光明虽然身材瘦小，而意志却非常坚强，决不向敌屈服低头。在“单间”牢里，他鼓舞牢里 30 多位难友们的斗志，动员大家集体向敌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出狱回到战俘营去。在 1952 年 7 月 1 日党的生日那天，韦光明还组织了难友们集体纪念党的生日，齐唱《国际歌》。因此，被敌人罚他站了一整夜水牢！他一共蹲了整整 70 天水牢，在 7 月 7 日才和同牢难友们一起被押送到巨济岛“602 回国支队”。

韦光明到达“602 回国支队”时，受到战友们的热烈欢迎和慰问，他立即被选为“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委员。当“回国支队”迁到济州岛之后，他担任了总委副书记积极参与领导了长达一年多的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直到 1953 年秋回归祖国。

韦光明在集中营的斗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不幸，在文革中却被扣上“叛徒”帽子并迫害致死，战友们听到噩耗不禁涕泣。

1980 年后，中央发布文件为 6000 名归国难友当年的爱国斗争做出了高度评价，韦光明也得到平反昭雪。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我们将永远怀念您！（杜学贤）

## “硬骨头”刘光

1990年的深秋，我应邀去成都参加本书的第一次审稿会议。首先见到的是在楼下等着接人的筹备组长钟骏骅。他告诉我：“与会的很多战友都来了，新疆的刘光也乘飞机赶来了！”

“哦，刘光！”我惊喜地大喊一声，便不顾自己有严重的气管炎，以小跑的速度登上6楼，又迫不及待地重重敲门。开门的正是刘光！他边开门边问：“谁呀？敲得这么急！”我喘着气、微笑着、不出声地看着他。他把我上下打量着突然叫了起来：“傅稚恒，是你！”接着就给了我一拳，又紧紧地拥抱住我！我们分别了36年，多么漫长难过的36年啊！我们互相深情地看着对方，眼睛都濡湿了。使我高兴的是，我发现他除了两鬓变白以外，依旧那么热情豪爽、魁梧敦实。看着眼前的刘光，脑海里不禁又浮现出当年在集中营的刘光……

刘光，是被俘后的化名，他原名董勤荣，山东招远县人，被俘前是我军炮二师二十八团一营一连的连长。1940年参军的老八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立功受奖的战斗英雄。入朝参战后，他于1951年4月21日凌晨随营长带领几个观测员至前沿阵地观测地形，突然遭遇敌人，营长只身后撤，董勤荣却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赶紧组织人员收拾地图、罗盘及各种观测器材，然后带领大家后撤。这时，他们已被十倍于他们的敌人——土耳其的军队包围，很难突围出去。同行的一个观测员思想动摇，竟把枪扔了，趴着不走，准备投降。董勤荣见状大怒，用手枪逼住他，叫他跟着走，否则就打死他。他们在与敌人交火中边打边撤，董勤荣不幸肩部中弹，从腋下穿出，负了重伤，完全失去了抵抗力而被俘。

被俘以后，在前线登记时，他即化名“刘光”，后被叛徒汪注山出卖了，暴露了他的连长身份。在前线及押往大邱途中，美军多次审问他，要他交代我军的军事机密，逼他承认自己是连长并

亲手“打死过很多美军战俘”。董勤荣都拒不承认，因而多次遭到美军的毒打。美国士兵把他的身体当成拳击的靶子，不停地用拳头打他，用烟头烧他的脸和颈部，用木棒打他的踝关节，还用电线将他捆住，然后用手摇电话机给他过电。经过这样的折磨毒打，董勤荣在自己已遍体鳞伤，口鼻流血，伤口发炎红肿的情况下，反倒去鼓励和安慰在他旁边不断呻吟的一个被俘的志愿军伤员。

后来，董勤荣到釜山临时收容所，初去时，被单独关在一个禁闭室里。又是叛徒汪注山，引来李大安毒打他。李大安一贯以心毒手狠闻名，对着董勤荣的伤口猛击几拳，他当时被打得痛入骨髓，汗珠大颗大颗往下滴。他狠狠地瞪了一眼李大安，大声怒叱道：“你这个叛徒，决无好下场！”

我认识董勤荣是 1951 年 8 月在巨济岛 72 联队四大队的时候。当时大队集合点名时，担任大队长的叛徒特务魏四喜、王友敏之流经常说道：“刘光这个顽固分子”、“刘光又不老实，还在搞破坏活动”云云。敌人视为“顽固”与“不老实”而又在“搞破坏活动”的人，当然就是我们最可靠的同志了。从敌人口中得知，董勤荣和赵佐端、孙振冠等人刚从监狱出来不久，因他继续进行活动联络同志，又被敌人发现，关在警备 (P. G.) 队，每天打 100 棒，连续三天，虽然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从不哼一声。因此在群众中得了个“硬骨头”的称号，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刘光这家伙骨头硬，难对付！”一次，一个担任美军战俘学校教员的反动家伙，在大会上给全大队的战俘讲什么“马列主义过时了。”董勤荣当时就在下边说：“我看没有过时！”巡回走动的警备队 (P. G.) 队员听见了，马上把他抓至帐篷，两个队员拿着棍子上来就打。董勤荣奋起反抗，左右开弓，很快就把这两个家伙掀翻在地下。接着卡住其中一个的脖子，正举拳欲打，突然后面一棒打来，他头部被击，当时昏死过去，直至翌日早上方才苏醒过来。这一次董勤荣被打得够厉害的了。但这些警备队 (P. G.) 队员知道他身手不凡，从此见着他也都心存三分畏惧，不敢轻易动手了。

董勤荣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拥护和热爱中国共产党。在坚决要求遣返祖国大陆这个问题上，是从来不含糊、不动摇的。他为此而受到敌人的毒打和迫害次数之多、程度之深就不必说了，更可贵的是他在遭到自己同志乃至组织上的误解时也是如此。他在72联队四大队时，一次去厨房抬饭途中，碰见一个原部队同一营里的汽车司机告诉他：“在你被俘以后，敌人的飞机炸平了我们营的阵地，组织上认为你已叛变，开除了你的党籍……”他听了之后，开始有点不解，但很快就想通了，他坚信回国以后一定能说清楚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回国以后在归管处，为了董勤荣的问题，归管处党委与原单位函件往来讨论了若干次，终于弄清了问题，统一了认识，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军籍。对此，赵佐端政委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很多同志被俘后，在那种复杂艰苦的环境中，思想上都难免有过一度消沉，但刘光却是始终坚强，一直没有消沉！”这在归来的6000战友中确实是很少见的。

董勤荣在敌人面前横眉冷对，决不妥协退让，但在自己同志面前却是非常谦和极平易近人的。他是工农干部，又是老八路、连长，但与我们当时一批参军不久的知识青年又是同龄人。到了71联队这块回国阵地以后不久，我、马有钧、何平谷、张昌辉、吴求用等人与董勤荣混得很熟。我们一起说笑打闹，相处极其融洽，绝无半点上下级之间，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之间那种格格不入的生疏情况。我们敬佩他，喜爱他，也听他的。他当时不是领导，但他一声号召和领导的命令同样有效。1952年的3月中旬，71联队调来了上千名所谓“拒绝”遣返的朝鲜战俘，领导权都掌握在少数反动分子手中。他们在营内组织了一次“反共大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丑化我领袖毛主席的化装场面。当时董勤荣和我们正在门边隔着铁丝网观看，见到这个场面，大家气愤极了，纷纷指着外边游行队伍高声大骂。董勤荣挽起袖子站到前面大喊一声：“同志们，我们冲出去揍那些王八蛋！”这一声大喊，如一根火柴点燃了汽油桶，大家争先恐后拉开了大门，在他的带领下，先以石块投

向游行队伍,然后齐声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向游行队伍冲去。当时把他们的游行队伍冲得乱七八糟,溃不成军。对方人多势众,正欲进行反扑,魏林、孙振冠两人带着一些人赶到门口来接应我们,见我们没人受伤才松了口气。老孙指着董勤荣说:“你这位老兄也太莽撞了,冲出去以前应该给我们先打个招呼,好让我们有思想准备组织接应。敌人那么多,万一陷入重围,出不来怎么办?你们才二三十个人啊!”董勤荣听了,笑嘻嘻地伸伸舌头,那憨厚样子,真像一个小孩犯了错误被大人揪住似的。这一来把老孙也逗笑了,我们大家也同声大笑起来,在笑声中,我们拥着董勤荣走了,在笑声中,我们也欢庆了胜利。

董勤荣在釜山临时收容所曾被派去烧开水。凡是新到的战俘来要开水喝时,他必定通过看、问或其他观察方式,了解其思想状况和基本的政治态度。若是自己同志,就满满地舀一勺开水给他,并热情地鼓励几句。若是思想反动的投敌变节份子,虽然也给予一小勺开水,但总要严肃地教育他们一番。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些小动作,但在当时环境下,对于鼓舞同志,震慑叛徒,还真有一点作用呢。

董勤荣在战俘营中是敌我双方都很知名的人物,在敌人眼中他是软硬不吃的“顽固份子”,美军称之为“dead heard comunist”意为“死硬的共产党”。而我们则是引以为骄傲,公认他是“硬骨头”。根据他的表现和级别,到了71联队建立回国大队后,在党内和行政上本应担任更重要的工作,但是他仍要求组织上派他去烧开水为难友们服务。后来到了“602回国支队”,人数增多了,组织扩大了,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建立了回国支队,下面的文工队、纠察队、后勤处各种机构相继建立。总委会派他担任纠察队领导工作,他就带领队员日夜巡逻。到了济州岛第八战俘营五号营场,他担任了分委委员兼直属中队的中队长。“十·一”升旗斗争时,他坚决要求并经组织批准成了突击队(又称“敢死队”)的队长,决心在“十·一”那天带领突击队员凭血肉之躯以石头

木棒去阻击美军，在枪林弹雨中保卫国旗。只是当天美军冲进了七号营场，未到五号营场来。否则，他早就血染黄沙，长眠异国他乡了。

回国以后，董勤荣的组织结论很好：党籍、军籍和一切政治荣誉都恢复了，但他仍然和我们一样被处理复员回乡，几经曲折才找到了工作。在工作中，他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但在提升和使用方面，同样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在文革中，同样因被俘历史问题而受到残酷的迫害，到落实政策时，他已步入天命之年成了快退休的人了。《昆仑》杂志 1987 第 1 期上发表了靳大鹰的长篇报告文学《志愿军战俘记事》，其中记述了很多同志的斗争事迹，有些还记得很详，但对董勤荣这位 6000 战友公认的“硬骨头”斗争英雄，却记得很略，只提到一个名字而已。我们都感到惋惜。可是这次会议期间，他对此不但没有丝毫不满的情绪，还和我大谈当他读到《志愿军战俘记事》时的兴奋心情。他总是在斗争需要他时挺身而出，走在最前面，而在个人的名誉地位面前，却甘于默默无闻，从不争个什么，实在难能可贵。

我从遐想中回过神来，这时，一个容貌娟秀、风韵犹存的中年女子笑吟吟地站在我的对面望着我。我不知她是谁，正不敢冒昧称呼之际，董勤荣赶忙把她拉过来向我介绍道：“这是你嫂子郭淑卿。”她很大方地伸出手来，我赶忙站起身来握住她的手。笑道：“久闻嫂子芳名，30 多年前还在昌图的时候，就听说你们的恋爱故事哩！”接着董勤荣向我介绍了他在文革中挨整之际，淑卿嫂子如何照顾他、安慰他、与他共患难的情景。我听了之后，由衷地为老战友祝福，为他有这样一个贤慧的终身伴侣而欣慰。

那天晚上，我们促膝长谈，共同回忆了当年的斗争和回国后各自的不幸遭遇。我发现他仍然保持着当年对祖国人民那片赤子之心，不禁更加钦佩我的这位老战友，好兄弟！（黎子颖）



## 多才多艺的张济良

退休以后，我们分别长住武汉、北京和成都，有时也常到各地走走。无论走到哪里，只要遇到当年从美军战俘营归来的那些生死与共的老战友，都要互相打听张济良战友的情况。

“张济良在哪里？”

“张济良现在怎么样？”

总是这样类似的问话，但总是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有的战友多次写信到他的家乡湖南安乡县他的亲人处查询仍无下落。几十年来，特别是 198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共同发布的《关于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复查处理的意见》文件下达以后，全国各地的战友，纷纷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军籍和党团籍，有的还重写了组织结论，安排了工作，境况有了一些改善。可是张济良呢？

“张济良怎么样了？”大家还是这样关心地问。

有的说：“1954 年他回家以后不久即被关押，后来冤死狱中。”

有的说：“在家乡一浴室挑水，以劳动换取生活费用。”

有的说：“因无职业，给一个老太婆作义子，相依为命。”

其说不一，仍无确切消息。去年 10 月，本书的第一次审稿会议期间，当年“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的一些主要领导及全国各地很多战友聚集成都。大家畅叙当年共同斗争的岁月，不禁又想起张济良战友来了。互相谈论之间，济良战友 40 年前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似乎他正在从济州岛第八战俘 M 号“战犯监狱”的大门向我们走来……

我们认识张济良很早，彭林因和他同是六十军一八〇师五四〇团宣传队的，被俘后在前线即在一起。骆星一则是 1951 年 7 月在巨济岛 72 战俘营四大队认识他的。当时济良在大队部作英文翻译，彭林也在大队部管些杂务工作，骆星一则在三中队一个小队里。一天，他把骆星一叫到三中队队部帐篷里谈话。他从大队的警备队 (P. G.) 队长张蜀骏哪里知道骆星一是学音乐的，要骆教他

识简谱和一些乐理知识。骆星一当时考虑到这不涉及政治问题也就答应了，但对他的“大队翻译”身份还心存三分戒备。后来骆又听说他是国民党军校 22 期毕业生，说话就更小心了，每次与他会面，除讲授乐理知识以外，绝少说其他内容的话。但是张济良常常主动找骆星一谈一些当时战俘营内非常敏感的问题。他很坦诚地对骆星一表示：他将来是要回国的。他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更看不惯战俘营内那些“俘虏官”飞扬跋扈，欺负自己同胞的可耻行为。他态度极诚恳、极认真，可以看出完全是由衷之言。因此，骆星一逐渐消除对他的戒备。当时我们都觉得他虽然是国民党军校学生，又在国民党九十五军干过，但他绝无旧军队中那种“兵油子”的流气。他正直热情，为人处世还是那样纯真和执著。后来，有一次全联队集合的大会上，有一个联队警备队(P. G.)队员鞭打一位难友，张济良当即公开出面大声制止，并利用自己翻译的身份指斥那个警备队(P. G.)队员。这在当时，确实是很难得的，事后他向我们谈及还很气愤。由此，我们更对他有了好感，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后来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了。

1951 年 10 月，骆星一调到了联队文工队去弹风琴，这时 72 战俘营的白色恐怖已达高潮。一天，张济良找到骆星一说：“他们逼我刺字，大队部的人现在只有我和彭林、吴孝宗 3 人未刺了，我们几人的压力很大，你想法把我们几人调出军官队吧。”骆星一找到王顺清推荐了张济良、吴孝宗和彭林 3 人，把他们调到了联队文工队。这里与军官大队比起来，相对地要宽松一点。11 月上旬，军官大队的干部魏林、孙振冠、马兴旺、陈吉庆、梁宗正、黎子颖等人组织签名斗争，反对叛徒特务的压迫，表示坚决要求回国的意愿。张济良和我们都签了名。11 月 8 日，斗争胜利，我们 148 人到了 71 战俘营组成一个大队，建立了巨济岛上的第一个回国阵地。

在“71 回国大队”，骆星一任副大队长，张济良仍为大队翻译，吴孝宗为大队文书，彭林管大队生活。在这块由我们坚持回国意

愿的战俘自己掌握的天地里，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和团支部。张济良由于思想进步、斗争勇敢而被吸收参加团的组织。

张济良到了 71 战俘营回国阵地后，努力学习，爱憎分明，立场坚定，斗争勇敢，很多事迹现在想来还非常感人。如：一次我们回国大队的大队长孙振冠在铁丝网边与营外的美军管理军官交涉事情争执起来，双方都火了。美军少校大声咒骂，气势汹汹，随行的美军管理人员也一起咒骂，大有进来动武的架势。这时，马有钧一步上前站在孙振冠的前面保护他，张济良看见，又一步跨到马有钧的前面用身体挡住他们，并用英语与美军军官辩论。张济良大义凛然，面无惧色，据理力争，终于使美军管理军官理屈词穷，悻悻而去。当时，很多同志目睹这一场面都十分佩服他那种大无畏精神。

1952 年 3 月下旬，美军当局通知我们 71 回国战俘营，要调吕志国、卜幸、骆星一、张泽石 4 人去釜山接受审查。当时，我们为营救“72”与“86”的难友，急需张泽石作一些文字和口头上的翻译，在外交斗争场合中，张泽石又是我们的代表孙振冠不可或缺的助手。党支部经研究决定派张济良冒名顶替张泽石去釜山接受审查。为了大局，张济良毫不犹豫，毅然领命而去。临行前的欢送会上，他唱起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当他唱到“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几句歌词时，脸上流满了泪水，我们大家也都哭了。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氛。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71 战俘营是巨济岛上唯一的回国阵地，是战俘营中号称“小延安”的“解放区”。去釜山以后返回巨济岛时能否重返 71 战俘营，尚在未定之中，如果送到“72”或“86”就不堪设想了。更何况张济良还是冒名顶替的呢？果然，他们审查完毕回到巨济岛，途经“61”战俘营转运站时，美军管理人员要核对战俘卡片上的指纹。吕志国、卜幸、骆星一等 3 人都顺利通过，回到了 71 战俘营。而张济良却因冒名顶替、指纹不符而被查出卡下来了。当时正“四

八甄别”前后，战俘营风云变幻，异常紧张之际。“72”里的叛徒特务屠刀高举，林学逋、阳文华等烈士被剖腹挖心，以及众多战友被割肉、被严刑拷打的消息不断传来，而济良又迟迟未归，我们都为他的安全和下落不明而揪心地挂念。直到4月11日，我们都到了“602”已经三天了，张济良才和150多名难友来到了“回国支队”。当他一进“602”大门的时候，我们像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把他抬起来，然后紧紧地抱在怀中。当时那种欣慰之情，实非这支秃笔所能言表。

张济良到了“602”后，被分配到支队文工队工作。他多才多艺，既会几种乐器，又能唱歌演戏，实在是难得的文娱人才。在演出《华尔街之梦》大型活报剧中，他穿着燕尾服，戴着高高的礼帽，手拿“司提克”饰演一个洋资本家，真是维妙维肖，给战友们乃至门外的哨兵都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2年7月上旬，我们到了济州岛第八战俘营后，被拘在五号营场。“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书记赵佐端被美军当局从四号营场扣走，隔离拘押。不久美军当局通知我们第八战俘营的总代表魏林，要给赵政委派一个炊事员和英文翻译。炊事员很快物色好了，五十军的一个排长。翻译这个人选很重要，既要能尽力保护赵政委的安全，在可能的条件下照顾好赵政委的生活，又要在政治上绝对可靠，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和应变能力才能胜任。当然，这也是件苦差事，战俘营的囚徒生活本来就很不舒服，但是有几百人乃至几千人聚在一起，还有个群胆可依，情况到底好一些。去和赵政委连炊事员在内3人一起隔离，看不见、听不着“大本营”的消息，这种孤独、苦闷的味道就更加难受了。“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会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派张济良去。领导上找他谈话，征求他的意见，张济良又如前次冒名顶替去釜山一样毫不犹豫，毅然领命去了。他总是这样，在关键时刻，斗争需要他时，他就挺身而出，从不计个人安危。这种牺牲自己顾全大局的可贵精神，不需要再加以什么赞颂之辞，就已令人感佩不已了。

张济良到了号称 L 号营场的“战犯监狱”后，在赵政委身边做了大量工作，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他既当翻译管外交，又理内政管生活，每次隔墙有“肇事犯”入狱时，他都负责与之从墙洞进行联络、送饭。1952年12月12日黎子颖、何平谷、郝智根3人，因保卫国旗入狱被关在隔墙后，是张济良首先发现他们与之进行联系，后来又协助他们制成了“王芳专密”，打通了赵政委与“大本营”之间的联系。

1953年7月初，张济良和一些同志又被移到 K 号营场。这时总委的顾则圣、杜立旺、李喜尔、陈吉庆等领导干部和机要秘书组的黎子颖、吴孝宗、何平谷等工作人员，以及众多的从各号营场清出的大中小队干部共约 500 余人都聚集在这里，成立一个大队。张济良又担任大队翻译，和代表彭林一起担任 K 号营场回国前夕的一些外交工作。7月27日《停战协定》签字，8月5日开始遣返战俘。张济良于8月6日经板门店遣返归来。由于工作的需要，他和总委一些领导和工作人员一起被留在开城解释代表团工作，以争取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印度部队看管下的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中，能有更多的难友打消顾虑，冲破阻力，回归祖国。

1953年12月，张济良和战友回到了祖国，在设于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教导第二团某连学习。当时，我们也分别在各团“交待学习”，由于住地较远，大家又都忙于检查交代自己的被俘情节和被俘后的一切表现，因此，竟没有再见到他一面。只是听说，他的境遇很不好。他的国民党军校 22 期毕业的历史，和在战俘营跟牧师伍培礼一起教战俘唱“耶稣爱我”之类的宗教歌曲的错误，已使他抬不起头来。加上他耿直的个性，又使他得罪了一些不该得罪的人。后来听说他出国前就已订终身的未婚妻，为了表示自己与“俘虏”划清界限，站稳自己的“立场”，把济良在回国后写给她的一封信，回寄给归管处教二团济良所在连队组织收。这封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千山万水，云天望断，我恨祖国竟是如此辽阔广大，使我们天各一方，不能很快地聚在一起。”

连队领导拆开一看，抓住信中有“我恨祖国”这几个字，“好家伙，还恨我们的祖国！”自然就上网为“现行反革命活动”了。“新帐老帐一齐算”，最后组织结论时，就将他作“开除军籍”处理了。

自归管处复员回家，天各一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家都很不如意，很少知道他的景况，除本文开头提到的几个片断消息外，1955年他曾到过武汉找彭林，想寻一份工作以糊口。当时正值肃反开始，他这种情况，彭林哪里去为他找工作？也只好带着彭林给他的路费怅然返乡了。此后就再没有见到他的来信和他本人。只是在文革期间，审查彭林的专案组中一个人对彭林说：“你知道张济良现在怎么样？他已经到另一个星球上去了……”

和张济良长期生活在济州岛“战犯监狱”的赵政委带着沉重的语调说：“张济良是个好同志，我们对不起他！”

被俘初期曾在前方病得很重，由大田经大邱到釜山押送途中受到同行难友彭林、张济良细心照料的姜瑞溥说：“每每想起这些，对他的思念就更加强烈！”

在巨济岛“71”时，曾经由张济良冒名顶替代他去釜山受审的张泽石说：“济良同志在战俘营中做了那么多好事，总该抵消得了他跟牧师传了几天教的错误吧！我们不少党员干部被俘初期有些错误都可谅解，为什么他不能？济良那次自愿代我去釜山受审，受了那么多的罪！至今每每想起都很难过。我非常怀念他。”

曾和张济良在巨济岛“72”、“71”、“602”和济州岛第八战俘营五号营场，以及“L”、“M”号监狱、“K”号营场一直到遣返归来留在开城工作时期都生活在一起的黎子颖说：“我印象中的张济良是个热情、正直、追求真理的爱国青年，他爱和人辩论问题，喜怒形诸于外，你和他一接触，他就向你敞开心灵的窗扉，从不隐瞒什么，难道集中营那么严峻的考验还不能证明他是个好人么？”

……

死者长已矣！但愿济良兄弟和济州岛上的烈士英魂能相互慰藉。

（彭林 姜瑞溥 骆星一）

## 坚贞不屈的代玉书

1989年10月23日，代玉书因癌症去世，噩耗传来，不胜悲痛！

我们与玉书在解放军时是同一部队的战友。1951年3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我们一起入朝作战。同年5月我们又一起因部队陷入重围，激战突围未遂，弹尽粮绝被俘。被俘后我们又在一起度过了两年多极其痛苦的战俘集中营生活，一起反抗敌人为迫使我们背叛祖国而施加的种种威胁利诱与残酷迫害，最后，我们又一起冲破重重阻力于1953年秋胜利回归祖国。在那充满血与火的岁月里，生死与共的斗争中，我们结下了终生不渝的战友情谊！

玉书为人耿直坚毅，性格刚烈豪爽。他爱憎分明，无丝毫奴颜媚骨，始终热爱自己的祖国人民，追求真理和正义，反抗压迫与奴役，厌恶卑鄙与怯懦。正是他的这些优秀品质使得他在其艰难坎坷的一生中，表现出非凡的勇敢斗争精神和闪闪发光的人性！

少年丧母，玉书自小失去母爱。为了生活，他常与小兄弟们一起在垃圾堆上捡煤核，在河沟里摸鱼，每当遭到欺压时，他宁肯自己头破血流也要挺身而出为被欺负的小朋友打抱不平，他自然地成为那群穷孩子们的头头。

玉书在尚未长成“壮汉”之时，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那时祖国的大半国土尚被日本侵略者霸占着。为了抗日，他忍受了旧军队里的痛苦生活，期待着像岳飞那样精忠报国，但部队还没有上前线小日本就投降了。他没想到5年之后，他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解放军战士时，真有了实践其精忠报国志的机会。

1950年冬，朝鲜战争的烈火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奉命开往东北集结待命，他离别了新婚不久的妻子随军出川北上。1951年3月部队入朝作战，一路上见到的尽是被战火烧焦的城镇，听到的尽是失去亲人的老百姓的哭声，这一切深深震憾了他的心；于是玉书再次想起了民族英雄岳飞和杨家将，他决心要拒敌于国门之

外，以身报国。在部队追赶逃敌时，他英勇战斗，杀敌立功！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所在的那支曾在抗日和解放战争中赫赫有名的常胜军竟会打败仗，而他和战友们在完全丧失战斗力之后求死不得而落入敌手！

被俘之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民族精英的“身被俘而志不屈”的榜样激励着他，他又以英雄们的气节去鼓舞身边的难友！于是在他身边集结起一批不愿认贼作父的爱国者，他和这些难友们组织起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会”。

代玉书在集中营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清醒地认识到单靠自己这点力量是斗不过敌人的，他尽力寻找战俘集中营内的地下党组织。当他以自己的一身正气和实际表现，赢得了地下党组织的信任并争取他共同对敌时，他立即诚恳地带领“弟兄会”接受了党组织的领导。后来他又被吸收为集中营地下党——“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成员。从此，玉书如虎生翼，在那场正义与邪恶、忠贞与背叛的特殊战斗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勇敢和智慧，终于成为我两万多名志愿军战俘中出色的斗争英雄人物之一。

在长达两年多的集中营斗争生涯中，根据组织上的安排，代玉书参与领导了多次重大斗争，其中影响最大的几次是：

1. 1951年7月在巨济岛第86集中营内，美军管理当局正极力支持其派遣到营内的叛徒特务们加紧从组织上控制战俘，玉书带领“弟兄会”巧妙地夺取了该集中营第四大队的行政领导权。他担任大队长，从而有效地、合法地团结了该大队千余名难友，成为该集中营的一支基本爱国力量！

2. 美军管理当局命令巨济岛上的全体中国战俘换穿深红色短衣短裤，这种类似马戏团猴子穿的囚服显然是一种人身侮辱，是敌人企图从心理上压垮中国战俘的心理战术。代玉书根据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带领全大队千余名难友严正拒绝换衣，挫败了敌人这一阴谋！



3. 1951年8月，敌人通过上述事件深感第“86”中国战俘集中营内爱国力量十分活跃，遂派遣其忠实走狗、大叛徒李大安，前往86集中营担任联队长，以加强对该营的反动统治。玉书在其到达的当天夜里，便亲自带领几名弟兄痛打这个铁杆汉奸，迫使敌人将其调离86集中营。这极大地灭了叛徒们的威风，长了难友们的志气！

4. 1951年10月9日，敌人决定在第二天即国民党的双十节，在第86集中营升青天白日旗。地下党组织立即察觉这是敌人阴险的企图：要以此证明中国战俘心向国民党，好在板门店和谈会上坚持其所谓的战俘志愿遣返的无理要求，来破坏和谈与强迫将中国战俘送往台湾。当晚，我们紧急动员了由代玉书亲手建立和训练的第四大队警备队为骨干的武斗力量，包围了叛徒们的联队警备队，抢走并烧毁了国民党旗，挫败了敌人的这一阴谋。

5. 1952年10月1日，我们6000名坚决要求回归祖国的志愿军战俘，在济州岛的第八集中营升起了十面五星红旗庆祝新中国国庆节，我们是要以此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战俘誓死回归大陆的决心！当美军用坦克开道冲进第七分号大门，掩护其士兵用毒气弹、刺刀、冲锋枪来镇压卫旗勇士们时，代玉书和敢死队员一起以血肉之躯向敌人展开了英勇搏斗。在那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惨烈战斗中，我们有56位勇士献出了宝贵生命，109名勇士身受重伤，玉书身伤4处而终生残废。他为祖国实践了精忠报国的赤子之愿，被集中营地下党委评为特等功臣。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集中营严酷斗争考验中，代玉书不愧是一位坚贞不屈、忠勇过人的爱国志士，是祖国的优秀儿子，也正是那场悲壮激烈的斗争，使代玉书从一个爱国主义者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在极“左”路线影响下，我们这些“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回国后长期遭受了不应有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而代玉书由于家境贫苦和身残多病，处境更为艰难。他为了生活，重新找出父亲

时，他已是病人膏肓、生命垂危了。我们问他有啥子话要我们带给首长们时，他只说了一句：“我现在还没有领到残废军人证明书。”我们不禁心酸落泪。时隔 10 天，于 1989 年 10 月 13 日，他就带着这个终身遗憾离开了世界。代玉书在 1951 年 10 月 1 日，为保卫五星红旗，身中 4 弹。74 号文件下达后，有关部门虽恢复了他的军籍，却又拒绝给他“评残”。

但代玉书在当地也有知己，德阳文史馆王朝华同志替他整理了一篇《美军集中营亲历记》的专访，在政协领导支持下，刊登在德阳市市中区《文史资料》上。

余国范是六十军文工团演员。他疾恶如仇，认理不认人。10 月 9 日“反升旗”斗争中被敌人打得动弹不得。他自认为是必死无疑了，把我叫到跟前，要我记住为他报仇。后在监狱里和在“71”，他对我非常关心，在政治上、文化上给了我不少帮助，他的人品也给了我良好的影响。1954 年 8 月在昌图临别时，他写了：“骏骅今日飞，不知何日归”10 个字送我。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后来听说他过早地含冤而去，我再也不能飞到他身边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陈其武为人直爽，斗争勇敢，黑瘦脸上有个疤痕。在“86”弟兄会里是一员冲锋陷阵的猛将，每次斗争都把他和陈志君派到第一线。他的缺点是有点残存的旧习气。回国之后，他开始还在政府部门工作，不久又听说在肃反中被当成“叛徒”判刑劳改，冤死在狱中。

曾宝元、王世富都是在“86”就参加了团组织活动的，几次斗争都是其中的骨干。曾宝元在“602”初期是共产主义总委会通讯联络组的组员，后来被分派到纠察队。1952 年 10 月 1 日保旗斗争中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不料回国后，也被当成“叛徒”判刑。1985 年，他在“服刑”的劳改单位、石棉县石棉矿山落实了政策，不久身患绝症，他死时遗下一个 7 岁的孤儿远在绵阳市农村。成都的战友们都关心着这个孩子，可是大家都很难，好在

他生前所在单位——成都市综合建材工业公司领导都十分关心，其中也包含着该单位曾将他以“叛国罪”送去劳改的“歉意”。该单位工会主席严星达同志和一位姓王的科长几经周折把他孩子的户口迁进了成都市，而且安排到“八·一”学校就读。单位按月支付生活费，由他的幺婶黄崇芳代管。对于这个单位在孩子身上付出的爱心和人力、财力，不光是曾宝元的亲人十分感激，作为他的战友的我们也铭感于心。

王世富家住在山青水秀的夹江风景名胜地区——千佛岩侧。74号文件下达后，夹江县工业局给他办了干部退休手续。他利用游览区的有利条件，开了一家综合店铺。1988年秋天我去看他时，他自己盖起了一幢两层的新楼房。生活刚有转机，可惜天不假年，去年吴仲铨战友带来噩耗，说王世富不久前去世了，听后使我难过不已。

在10月9日斗争参加者中，我熟悉的岳大宏、王刚和我们团组织的成员郭信贤、王宏兴这些同志至今没有联系上，生死不明。我无时无刻不想念他们。

40年的沧海桑田，不少往事如过眼烟云，了无痕迹。只有这些曾经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不曾忘却，也不敢忘却啊！我愿借此一角篇幅寄托我对死者的不尽哀思，送去对幸存者深深的祝福。

（钟骏骅）

## 附 录

## 志愿军总部 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慰问信

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脱离了美国侵略者的杀场，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里来了。你们被拘禁在敌人的战俘营中，受尽各种非人道的折磨和迫害，勇敢地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志愿军全体同志对你们的归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亲切的慰问。

1951年7月就开始的朝鲜停战谈判，直到最近才达成协议，在这两年停战谈判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战俘遣返的问题上，美国侵略者曾施行了各种阴谋诡计，来拖延阻挠和破坏停战协定的达成协议。而我方则坚持了公平合理的原则，经过各种严正的斗争，连续地粉碎了敌人的各种阴谋。特别是由于朝鲜人民军从1950年6月25日开始的英勇抵抗，和随后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0年10月25日入朝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三年零一个月中，取得了歼灭美、李侵略军109.3万余人（其中美军占39.7万余人）的巨大胜利，敌人在军事上遭到了愈来愈大的打击，而美国侵略者的国际地位愈来愈孤立，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力量日益强大，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保卫和平的运动日益高涨，这样，才迫使美国侵略者不得不最后签定停战协定。因此，朝鲜停战的实现乃是我中朝人民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斗争胜利的成果，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重大胜利。

“遣返战俘”是停战谈判中斗争最久、最激烈的问题。在这问题上，美国侵略者曾在谈判会议上，蛮横无理地坚持强迫扣留的办法，妄想扣留我方大部被俘同志，交给李、蒋匪帮充当炮灰。同时，在战俘营中，对你们进行了残暴的血腥迫害，“武力甄别”，强迫要在你们身上刺上违反你们自己意志的字样，想尽各种毒辣办法来威胁恐吓，使你们不敢自由地表示返回祖国的愿望，妄想借此来达到强迫扣留的目的。而我方则为了维护真理，为了维护你们正义愿望，坚持了反对强迫扣留战俘的原则，进行了坚定不移的、严正的斗争；并得到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有力的支持；同时，你们自己为了坚持遣返，也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很多优秀的同志，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光荣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结果才粉碎了敌人强迫扣留的阴谋；使你们胜利地返回祖国。祖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正义的人民，为了使你们跳出火坑、恢复自由，是做了极重大的努力的。

亲爱的同志们，志愿军的全体同志，是无时不在关心着你们的：对你们在战俘营中所遭遇到的不幸，是同情的；对你们所坚持的英勇斗争，是支持的；对于那些在暗无天日的敌人战俘营里英勇牺牲的同志，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我们全体同志，为了以作战的胜利，粉碎敌人强迫扣留我方战俘的阴谋，争取停战的成功，许多同志流了血，以至英勇牺牲，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生活在自由、幸福的祖国的同胞，也时刻盼望着你们早日返回伟大祖国的怀抱，他们全力支援我们作战，直打到敌人不得不放弃强迫扣留你们并实现停战为止。现在，你们回来了，志愿军全体同志衷心地热烈欢迎你们。我们希望你们在归来以后，首先恢复你们的健康，同时不要忘记美国侵略者对你们所施行的各种侮辱、虐待和迫害，不要忘记为祖国、为和平、为正义在前线的战斗中，在敌人酷刑下而光荣牺牲的同志，时刻激励自己的斗志，准备为祖国的和平建设贡献出你们的力量。

最后，告诉你们，我们仍要继续努力，使一切被敌人阻挠迫

害且仍未返回祖国的同志，都实现他们的愿望，回到祖国来。我们的斗争是正义的，我们一定胜利。预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积极地参加到祖国伟大的和平建设事业中去。在战俘营里坚持斗争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志愿军 司令部  
政治部

1953年8月14日

## 附 录

## 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 告被俘人员书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的同志们：

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对方谈判中，根据日内瓦战俘待遇公约，一贯坚持在停战后你们有返回各自祖国回家过和平生活的权利，并曾于 1952 年 4 月 6 日发表声明，完全欢迎你们回到祖国的怀抱。现在朝鲜停战已经实现，你们返回祖国的时机已经到来。根据中立国遣返委员会职权范围的规定，任何人都不容威胁你们并阻挠你们实现返回祖国的愿望。我们深切了解你们对于祖国的想念和被俘以后的不幸遭遇。你们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间被迫在臂上刺字，写过某种文件，参加过某种组织，在对方战俘营中担任过职务，或有其他类似行为，我们认为这些都不是出于你们的自愿，不应由你们自己负责。我们特此郑重负责宣布：凡我方被俘人员，不管他们在对方战俘营中有任何上述行为，回到祖国后，一律不咎既往，一切归国人员，均得与家人团聚，参加祖国建设事业，并过和平生活。兹派代表前来慰问你们，通知你们返回祖国的有关事项，并欢迎你们返回祖国。我们和朝中两国全国人民都在关怀着你们，切望你们归来。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3 年 9 月 14 日

附 录

## 中朝各人民团体 对被俘人员的慰问信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代表全朝鲜和全中国的人民，欢迎你们，慰问你们。并且派了朝鲜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们来看望你们。

自从你们被难以后，我们两国人民时时都在关怀你们。知道你们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尽了折磨，知道你们时时想念着自己的祖国，并为重返各自祖国的愿望作了英勇的努力。

你们这种真诚的愿望，不仅使我们两国人民更加怀念你们，而且一直为两国人民所支持。为了使你们脱离苦难，重返各自祖国的怀抱，两国人民作了最大的努力。

现在、朝鲜停战已经实现。按照停战协定的规定，你们在两个月内，就可以全部回到自己的祖国的怀抱了。你们苦难的生活马上就可以结束了。你们恢复自由的日子已经来到了。

全朝鲜和全中国的人民都在热烈地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回来和久别的父母妻子团圆，欢迎你们回来参加伟大祖国的和平建设工作，我们已经为你们重返家乡作好安排。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

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

朝鲜民主女性同盟中央委员会



朝鲜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  
朝鲜农民同盟中央委员会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  
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  
1953年8月1日

附 录

## 有关志愿军被俘人员 情况报刊资料篇目索引

(1952、4—1954、5)

钟 骏 骅

(一)

我们有祖国

——记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反对美方非法“甄别”，要求遣返回国的斗争。（1953年9月19日《光明日报》）

被捕美军空投特务供述——美方在巨济岛虐待和杀害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罪行（1952年4月5日新华社新闻稿）

大批蒋匪特务在美方俘虏营进行罪恶活动（1952年4月24日新华社稿）

美国侵略者支持蒋匪特务为所谓“自愿遣返”创造条件（1952年4月25日新华社新闻稿）

所谓志愿遣返的真相（1952、5、7、新华社新闻稿）

巨济岛地狱景象（1952年5月18日新华社新闻稿）

美帝扣留和屠杀我被俘人员的罪证（1953年10号《新华月报》）

第72联队两次非法“甄别”真相（1953年12月《新华月报》）

侵略者的“人道” (1953年9月6日,《人民日报》)

反“甄别”的斗争 (1953年8月30日新华社新闻稿)

(二)

美军将军的供状——杜德事件真相 (1953年9月5日《人民日报》)

我方被俘人员对美帝强迫扣留进行英勇反抗 (1952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南日将军痛斥李奇微——企图屠杀我被俘人员的无耻论调  
(1952年5月11日新华社新闻稿)

巨济岛我方被俘人员的英勇反抗行为彻底揭穿了美方“自愿遣返”的骗局 (1952年5月14日新华社新闻稿)

西欧报纸纷纷评论巨济岛我方被俘人员英勇反抗的消息  
(1952年5月15日新华社新闻稿)

朝中发言人评我方被俘人员的正义要求 (1952年5月16日新华社新闻稿)

美国侵略者妄图掩饰杜德事件所暴露出来的真相 (1952年5月16日新华社新闻稿)

美方战俘营负责人透露的巨济战俘营情况使美国国防部坐立不安  
(1952年5月17日新华社新闻稿)

有关杜德事件短讯十二则 (1952年5月18日—6月14日各报)

美方开始大规模屠杀巨济岛上我方被俘人员 (1952年6月11日新华社新闻稿)

坚决支持我方被俘人员正义斗争 (人民日报短评) (1952年6月12日新华社新闻稿)

美方发表无耻声明企图推卸屠杀我方被俘人员的罪责 (1952年6月13日新华社新闻稿)

美方逮捕我方被俘人员企图推卸罪责 (1952年6月20日新

华社新闻稿)

我方归来人员控诉美方刽子手波纳血腥屠杀战俘罪行 (1953  
年 8 月 19 日新华社新闻稿)

(三)

国旗飘扬在巨济岛和济州岛上——我方被俘人员英勇斗争纪事  
(1953 年 8 月 17 日新华社新闻稿)

我被俘人员为庆祝国庆竟遭大规模屠杀南日将军向美方提出严重  
抗议 (1952 年 10 月 3 日新华社新闻稿)

美国屠杀战俘又一血腥暴行(人民日报短评) (1952 年 10 月 3  
日新华社新闻稿)

美方制造“暴动”谎话掩饰屠杀我战俘罪行愈加彻底暴露美方强  
迫扣留战俘的阴谋 (1952 年 10 月 6 日《人民日报》)

斗争的歌声震响在巨济岛和济州岛上——我方被俘人员英勇斗争  
纪事 (1953 年 9 月 21 日《光明日报》)

济州岛上的一年 (1953 年 23、24 期时事手册)

美方继续分散我方被俘人员而阴谋继续进行强迫甄别 (1952  
年 6 月 14 日《人民日报》)

坚持回国的斗争 (1953 年 19 期《时事手册》)

血 债 (1953 年 8 月 24 日《光明日报》)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向克拉克提出备忘录抗议美方虐待战俘  
罪行(摘要) (1953 年 8 月 23 日新华社新闻稿)

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向全世界人民控诉美方虐待扣留战俘的  
罪 行 (1953 年 8 月 25 日新华社新闻稿)

(四)

回到祖国怀抱——记我方被俘人员英勇斗争 (1953 年 18 期  
《时事手册》)

志愿军总部对志愿军被俘归来人员的慰问信 1953 年 8 月 14

日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

中朝各人民团体对被俘人员的慰问信 1953年8月1日

首批被俘人员回到祖国怀抱，李相朝、杜平等亲临慰问（1953年8月6日《人民日报》）

第二批被俘人员回到祖国怀抱（1953年8月8日《人民日报》）

在祖国怀抱之前（1953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

应直接遣返的至少有129名志愿军被俘人员尚未被遣返（1953年8月13日新华社新闻稿）

我方在战俘遣返委员会上再次指斥美方强迫扣留我方坚持遣返的被俘人员（1953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归来的我方被俘人员的控诉（1953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美方送交我方大批中朝被俘人员的死亡名单（1953年8月10日新华社新闻稿）

我方与美方交换关于被俘人员的死亡材料（1953年8月25日新华社新闻稿）

33天双方遣返总数（1953年10月号《新华月报》）

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代表团关于战俘名单问题的公报（1953年10月5日新华社新闻稿）

（五）

阴谋（1953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

杜鲁门的“一粒苦丸药”（人民日报短评）（1953年6月24日《人民日报》）

杜勒斯又叫嚣要大量扣留我方被俘人员三则（1953年6月15日12月22日各报）

赫尔与蒋匪合谋劫夺战俘三则（1953年12月24日27日各报）

迪安用自己的手揭穿了自己的骗局（1953年12月16日《人

民日报》)

蒂迈雅承认特务用恐怖手段阻止战俘遣返等四则 (1954年1月4、6、7、21日各报)

李承晚、蒋介石两匪首在美国导演下举行会谈阴谋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破坏朝鲜停战等11则 (1953年7月12、14、21、8月13日9月3日7日12月1、2、5日1月2日4日各报)

美国侵略者强迫扣留我被俘人员的阴谋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等8则 (1953年12月15日21日1月7、10、13、19、20、23日各报)

美蒋特务预谋杀害和劫持我方解释代表

特务扣留和殴打托拉特少将罪行等4则 (1953年10月3、14、24日各报)

我志愿军被俘人员张子龙被特务谋杀经过等5则 (1953年11月23日12月10、13日各报)

(六)

坚决反对美国强迫扣留战俘(《人民日报》社论) (1953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1952年4月6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发言人对遣俘问题发表的声明(1953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

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告被俘人员书(1953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我国解释代表向志愿军被俘人员的讲话。(1953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金日成、彭德怀致函赫尔要求美方具体交待我方每一被俘人员等两则(1953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朝中方面致函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坚决要求继续进行解释工作,补足90天期限等3则(1953年10月3日、25日各报)

打破顾虑坚决回祖国等 8 则 （1953 年 10 月 18 日 20、25 日，  
11 月 2、3、12、13、20 日各报）

反对把战俘交还原拘留各方等 3 则（《人民日报》社论） （1953  
年 11 月 29 日，1954 年 1 月 21 日 30 日各报）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 1953 年 12 月 27 日通过的关于委员会工作的  
临时报告（1954 年 1 月 9 日《人民日报》）

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最后报告（摘要） （1954 年 3 月 3 日《人民  
日报》）

朝鲜外务相南日关于美方强迫扣留朝中战俘的声明（1953 年  
9 月号《新华月报》）

周外长就美方强迫扣留朝中战俘发表声明（1954 年 1 月 30  
日《人民日报》）

## 后 记

我们真诚地希望能通过出版这样一本回忆录，将我们这些历经苦难换来的对祖国的认识留传给读者和后人。

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我们奋斗了整整 10 年！从 1982 年开始，即我们多数同志落实了政策、改善了境遇之后，原集中营地下党组织的一些主要领导和骨干发起成立了一个“志愿军被俘人员在美军集中营斗争史料汇编征稿委员会”。在原一八〇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同志主持下，邀请参加委员会的委员有 40 余人，覆盖了全国大部份省市。“委员会”委派张泽石、钟骏骅具体负责征集稿件工作并向当时有联系的各地战友寄发了《征稿倡议书》，得到了战友们的热烈反响。1984 年初，《志愿军被俘人员在美军集中营斗争史料汇编第一辑》完成，共 25 篇，约 10 万字。

由于几十年的坎坷遭遇，大多数战友已失去联系，而联系上的许多战友又都不愿回首往事，加上文化水平限制，致使这《史料汇编》，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不能反映当年那场艰险复杂的斗争。于是“编委会”在继续向大家征稿的同时，安排了编委丁先文到东北、山西各地进行重点采访，笔录当年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叙述，收获仍不能令人满意。

为了加快编辑出版关于美军集中营斗争的回忆录，编委张泽石、黎子颖于 1989 年秋再次赴沈阳、鞍山、本溪、长春、太原、运城等地，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向原集中营地下党组织领导人汇报请示，最后在吴成德同志家中确定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和召开审



稿会议方案，并通报各地战友。

1990年秋在成都召开了本书的编审、编辑委员扩大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本书编审委员会及编辑委员会。确定了基本篇目及其撰稿人选。

1991年10月，本书主要编委：张泽石、黎子颖、钟骏骅、吴春生、吴均度在四川都江堰市集中一个月进行初选工作，编成了30余万字的本书“样稿”，并印发了40本给本书编审、编辑委员们征求审定意见。

1992年1月在北京举行了本书的“审稿碰头会”，前来与会者有编审委员吴成德、赵佐端、孙振冠、顾则圣、张城恒、李喜尔、陈吉庆和主编张泽石。会议根据各地战友已提出的意见，对“样稿”逐篇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以期本书在内容上更为充实。为了便于读者了解集中营斗争的全貌，我们在原稿的基础上，又对本书的框架标题内容作较大的变动、删节，使其更为精练，文风上更为统一。

尽管我们做了反复修改补充，但限于主客观条件，本书还是难免在史实人名上有个别遗漏甚至差错，而文笔上也仍有粗糙乃至讹误之处。我们期待着读者，特别是了解当年那场斗争的知情者，给我们指出缺点，以便在再版时加以进一步修正。

回顾本书从征稿到出版问世所得到的各方面的热情支持，令我们激动不已！首先是和我们一起被俘归来的战友们，包括其家属子女们的支持。大家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本书作者多数年迈体衰，写作艰难，仍尽力而为或由其子女协助完成了写稿任务。更有许多未署名的“作者”，提供片断史实或指出个别错误，给予更正补充。而本书以最初的印稿成册所需纸张、刻印、邮寄费用，到后来采访，集中编辑和两次审稿会议的旅差、食宿、会务费用，也完全靠战友们捐赠。我们绝大多数战友尽管生活困难，一旦知道要出书，哪怕两元三元也要尽其心意，我们战友之中仅有的几位企业家，在其艰苦创业后更是解囊相助。朱国民、臧根旺、张达

等都曾成百上千元给予资助，而罗节操的捐献已不止万元！我们原部队一些老首长、老战友对本书也给予了很多关怀，其中北京的北沙、周根龙、陈克难、王瑞林、孟伟哉，成都的汪元昌、尹志军、胡樵文等同志都给予了感人的帮助。本书还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如都江堰市委机要科的同志们，用电脑打字为我们赶印出精美的“样稿”，特别是全国政协文史办的同志们，从始至终给我们以指导、鼓励和协助。

我们谨在此一并致谢！

编委会



1953年7月28日,彭德怀司令员在停战协定文本上签字,右为李克农,左为杜平。

被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病伤员一批244人在1953年5月13日回到祖国,当他们经过安市街头时,受到安东各界人民的欢迎。



1953年8月,板门店遣俘。杜平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我方被俘归来人员。





被美方一直无理扣留着的朝中被俘人员的代表吴成德等,终于在1953年9月6日遣返回来了。这是吴成德在临时帐篷里向记者诉说他在战俘营里受虐待的情况。

65名我志愿军被俘人员纷纷向记者和中立区工作人员控诉敌人强迫刺字和虐杀的罪行。



美蒋特务为控制我方战俘,强行在其身上刺字。



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们被装在带刺的电线覆盖的货车上,由全副武装的士兵押往隔离地点。



在济州岛,美军对坚持遣返回国的志愿军战俘进行血腥屠杀同时,对不愿接受遣返的战俘送麻将供他们赌博玩耍。



### 原集中营部分领导及骨干

前排左起：唐耀、顾则圣

后排左起：王云生、张城垣、周灿行

前排左起：刘光、孙振冠、魏林

赵佐端、杜岗、韦光明

后排左起：何平谷、王云生、张达

黎子颖、张泽石、马有钧

周灿行



### 安度晚年的原志愿军战俘

左起：王化英、郭兆林、  
张福庆、龚村（吴成德夫人）、  
赵璧、吴成德、李明山、赵佐  
端、李秀玲（赵佐端夫人）





# 本书中述及的部分原志愿军战俘

(按姓氏笔划排列)



丁先文



马兴旺



代玉书



刘光



吴均度



吴春生



李喜尔



张合顺



岳大宏



陈吉庆



钟骏骅



骆星一



姜瑞溥



高子



贾跃先



郭乃坚



曾德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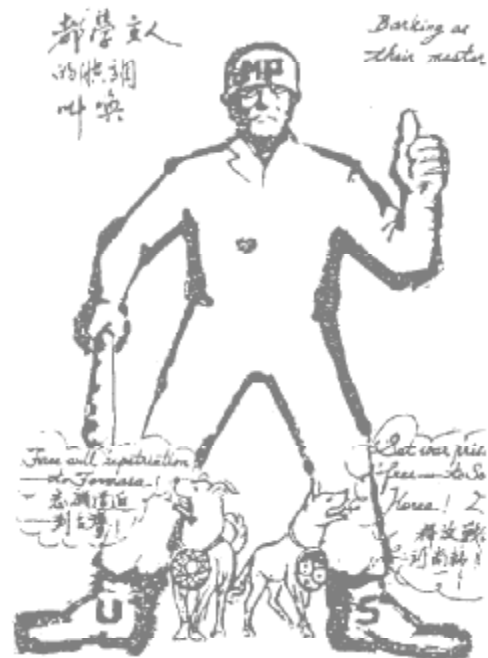


韩子建



志愿军战俘在集中营创作的漫画

(作者:吴春生)



5.5 5.3 | i. 6 | 5 — | i i 2 i | 5 — | 5 —  
 十月一的 红 旗 高空飘 扬。  
 6.6 6.5 | 6. 5 | 4 — | 2 4 3 | 2 5 4 | 3.2 3.2  
 共产党人的 鲜血 写下了 英雄的 血腥罪  
 1 — | 1 — | 1 5 1 | 3.2 1 | 3 2 3 | 1.6 5  
 状。 敌人 越残暴， 我们 更坚强  
 5. 5 | 6.5 2.3 | 2. 2 | 3.2 1.5 | 3. 3 | 1.2 3.3  
 拳头 挡住刺刀 石头 抵住机枪， 臂膀 靠着臂膀  
 5. 5 | 3.5 6 | 6 0 | 1.6 5.5 | 6 5 | 6.6 5.3 1.1  
 胸膛 筑成铁 墙， 保卫我们的 国旗， 打击敌人  
 2 — | 3 — | 3 — | 3 1 | i. 5 | 6 5  
 疯狂， 仇恨 结成 力量。  
 3. 1 | 2.3 2.1 | 2 5 | 2 2 1 | 3 3 | 5 3 5  
 血债 要用血来 还债， 万恶的 美帝 逃不出  
 6.5 3.5 5 | 6 6 | 6 5.6 | i i | 1.6 5.3 | 2 5  
 世界人民的 巨掌， 新中国 男儿 英勇事迹 天下  
 5 — | 5 — | 5.5 5.3 | i 6 | 5 — | i i 2 i |  
 扬， 十月一的 红 旗 高空飘  
 5 — | 5 — | 6 6 5 | 4. 6 | 5 — | 1.6 5.3 |  
 扬， 英勇的 烈士 永远活在  
 2. 5.5 | 3 2 | 1 — | 1 — |  
 我们的心 上

志愿军战俘在集中营  
里创作的歌曲选

(林模丛提供)

3 | 6 6 7 6 5 7 | 6 — —  
 在 没 有 大 阳 的 地 方。  
 3 4 3 2 3 | 6 — — 6 6 | 3 3. 2 3  
 苦 难的 日 子 里 你们 的 鲜血 染 红  
 1 2 7 6 3 | 6 — — 3 3 | 6 6 1 —  
 异 国 的 土 地。 为 了 追 求 光  
 7 — — 1 6 | 3 3 0 2 3 1 2 | 3 3 2 —  
 明， 坚 持 真 理， 在 敌 人 的 刺 刀 下  
 6 6 — 3 3 | 1 1 7 7 6 7 6 6 | 6 6 6 3 0  
 不 屈， 你 们 壮 烈 牺 牲 的 事 迹 我 们 永 不 忘 记。  
 7 1 7 2 1 2 3 2 3 | 4. 3. 2 1 2 3 | 3 — —  
 要 用 血 来 偿 还 仇 恨 要 我 们 来 洗 清。  
 3 — — 1 1 | 7 6 5 7 | 6 6 | 4. 2 3 3  
 天 我 们 立 下 誓 言， 誓 死 为 你 们  
 6 — — 1 1 | 6 6 7 1 7 0 1 5 6 | 3 3 3 1 2  
 仇， 踏 着 你 们 的 血 迹， 坚 决 和 敌 人 斗 争  
 6 — — 0 | 6 — 7 3 | 6 — 7  
 底 1 去 息 吧 安 息  
 3 — — 3 4 3 | 6 — 6 3 | 2 1 2 3 3  
 亲 爱 的 战 友 们 祖 国 和 人 民  
 3 2 1 2 7 6 | 3 — —  
 永 远 追 念 着 你 们。

6 6 5 | 6 3 0 | 3 3 5 6 5 | 6 1 0 | 3 3 5 | 1 2 0 |  
 电 杆 上 有 一 个 大 喇 叭， 洋 声 怪 气  
 U S A 特 务 到 处 爬， 阴 险 凶 狠  
 3.5 6.3 | 5 5 3 | 5 5 5 5 1 | 2. 3 | 5 5 5 5 1 | 2 0 |  
 说 呀 说 鬼 话 呀， 说 呀 说 鬼 话 呀， 说 呀 说 鬼 话，  
 真 呀 真 毒 辣 呀， 真 呀 真 毒 辣 呀， 真 呀 真 毒 辣，  
 i i | i 3 0 | 3 5 3 5 | 6 6 7 | 6 7 6 5 3 5 | 6 0 |  
 黄 色 泥 河 洋 呀 洋 毒 气 呀， 洋 呀 洋 毒 气，  
 逆 语 欺 骗 最 呀 最 拿 手 呀， 最 呀 最 拿 手  
 3 3 2 | 1 3 0 | 3 5 2 6 | 1. 3 | 2 2 3 2 6 | 1 0 |  
 低 级 色 情 真 呀 真 肉 麻 呀， 真 呀 真 肉 麻 呀，  
 引 诱 诬 蔑 行 呀 行 毒 化 呀， 行 呀 行 毒 化 呀，  
 0 1 1 | 2 1 | 1 3 5 5 5 | 3 1 | 3 1 3 2 | 1. 5 |  
 我 坑 害 编 骗 呀 呀 呀 们 谁 也 谁 也 不 听 它， 咳  
 阴 谋 诡 计 早 揭 穿 呀 们 坚 决 坚 决 反 对 它， 咳  
 1 2 | 1 0 |  
 不 听 它！  
 反 对 它！

## 编审委员会

主任：吴成德

副主任：赵佐端

委员：孙振冠 顾则圣 马兴旺 张城垣

李喜尔 陈吉庆 张自强 张合顺

王金芳 门培英 徐寿田 董勤荣

## 编辑委员会

主编：张泽石

副主编：黎子颖 钟骏骅

委员：吴春生 罗节操 何平谷 林模丛

张辉宗 郝智根 吴均度 张光普

丁先文

## 前 言

我们都曾是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战士。在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中华儿女为了保家卫国曾经付出过巨大的牺牲！我们不少战友血洒疆场，而我们自己则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陷于敌后，又突围不成，在未冻死、饿死、病死之前不幸被俘。在战俘集中营里，为了反抗敌人强迫我们背叛祖国，我们曾经进行过长达两年多的殊死斗争！40多年来，我们一直怀着一种强烈愿望：把我们当年在那场战争中亲身经历的战俘集中营的斗争史实写出来！

这个愿望，一开始是由于我们在被交换遣返回国后一直受到误解，长期承受了极不公正的对待，因而渴望祖国人民，特别是党和政府，了解我们当年在美军集中营里的表现，确认我们并没有变节和背叛，而是以生命和鲜血捍卫了祖国和党的尊严！

在中央于1980年专门发布文件为我们落实政策之后，我们这种强烈愿望便超越了对自身命运的考虑。作为曾经为建立和保卫新中国而献出了一生的老战士，当我们发现在一些年轻人心里，祖国的观念日益淡漠时，我们再次为祖国的命运担忧，便更加希望将自己当年在那场血与火的严酷斗争中所感受到的关于“祖国”的切身体会告诉年轻朋友们。

祖国！在我们被囚禁在异国孤岛上那段艰难岁月里，我们曾多少遍痛苦地思念过她！当我们站在忠贞与背叛的十字路口，必须独自做出将决定终生命运的抉择时，我们曾何等深情地呼唤过她！而当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归祖国怀抱之时，我们又曾为她洒下了多少激动的泪水！

那时，敌人把我们这些坚持要求回归祖国的战俘，一律视为“死硬共产分子”。其实我们 7000 人并不都是共产主义者，相当多的难友当时仅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们相信是共产党救了中国，他们出于爱国之心而亲近共产党。正是这种爱国之心成为我们全体难友忍受苦难、拼死斗争的最基本最深沉的动力！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祖国怎么会那么吸引我们去爱她呢？甚至心甘情愿地去为她献身呢？难道仅由于那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是祖先坟墓之所在？有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有我们熟悉的语言文化？

我们是在被迫离开祖国怀抱，在异国受尽迫害，付出了鲜血和青春之后，才真正懂得了“祖国”这个概念所包含的无比丰富的内涵的！那时我们在阴暗的囚牢里，抚着身上被敌人鞭笞的伤痕时所深深怀念着、渴望着的一切之总和，原来就是我们亲爱的祖国啊！从哺育我们成长的慈母的香甜乳汁、家乡清清的泉水，到给我们以知识与智慧的中华文明、光辉历史；从滋润我们生活的甘露、鲜花、阳光，到温暖我们生命的亲情、友情、爱情；从体现我们生命权利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到体现我们生命价值的学习研究和创造性劳动……这一切正是在战俘集中营里被完全剥夺了的！那时，这一切于我们是如此遥远又如此珍贵！那时，我们曾多么惧怕会永远失去她啊！

40 多年来，尽管我们的祖国走的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而我们这些“归俘”更是历尽坎坷，但我们却从未后悔过当年做出了回归祖国的抉择，也从未动摇过对祖国的爱，这正是由于在我们内心深处总忘不了当年在战俘集中营所深深铭刻下的对祖国的感情和认识！

我们真诚地希望能通过出版这样一本回忆录，将我们这些历经苦难换来的对祖国的认识留传给读者和后人。

我们那些在集中营的残酷斗争中壮烈牺牲的战友们，他们的遗骸已长留在韩国釜山、巨济岛、济州岛。当年我们无法带回他

们的遗相长留人间，这些年来又未能去慰问他们的亲人共寄哀思！现在谨以此书告慰烈士的亲人！谨以此书敬献给在异国孤岛九泉下烈士们的英灵！祈告他们魂归故土！

啊！归来吧，长眠异国的亲爱的战友们！你们当年为之献身的祖国已春回大地、奋起腾飞了！

编委会